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四章（下）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第四章

1911年-1937年

===============================

蒋宋孔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A4%A7%E5%AE%B6%E6%97%8F_(%E8%92%8B%E5%AE%8B%E5%AD%94%E9%99%88)

四大家族，或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嘉澍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其美家族，其成员有许多担任中华民国政府或中国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曾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的说法。

各家族人物

蒋家

蒋中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即四联总处）主席（相当于战时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

蒋经国，蒋中正之子

蒋纬国，蒋中正养子

宋家

宋霭龄，孔祥熙之妻

宋庆龄，孙中山之妻

宋子文，宋美龄的哥哥，轮船招商局、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淮南路矿公司、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控制人

宋美龄，蒋中正之妻，中美实业公司控制人

宋子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控制人

宋子安

孔家

孔祥熙，宋霭龄之夫，中国兴业公司及长江公司控制人

孔令侃，孔祥熙长子，扬子建业公司控制人

孔令仪，孔祥熙长女

孔令俊，孔祥熙次女，又名孔令伟，恒义升公司控制人，2006年中华民国国税局称孔令伟去世前不久曾经卖股获利，要求其唯一的继承人，年已90岁的长姊孔令仪补缴遗产税1亿5,700万新台币。

孔令杰，孔祥熙次子

陈家

陈其美，蒋中正的结拜义兄

陈其采，陈其美弟，太平兴业公司控制人

陈果夫，陈其美侄子，负责国民党党务

陈立夫，陈果夫弟，国民政府党政大员

观点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认为：陈伯达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他的创作基本上是宣传品。其著作《四大家族》里头有许多谬误，如陈果夫、陈立夫 管党务但以清廉出名。蒋中正、蒋经国 管政也非常清廉。而孔宋家族原本就是巨富，孔祥熙、宋嘉澍还曾是孙中山革命时期的金主，宋子文的总财产约七八百万美元，至今没有查到贪污的具体事证。

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的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了1939年10月，侵华日军特务机关“登集团参谋部”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所做的秘密报告显示：“蒋介石拥有资产6,639万（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094万（377万美元）、宋子文有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有5,214万（635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并列出国府高层政要29人总计存款额为78,606.7万元”。

另据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戴鸿超的研究，日本当局确曾在战时制造过国民政府高层财富的谣言。其中最著名一例，即通过散布所谓国府政要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宣传“宋子文是1940年代的世界首富”。

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此秘密调查了宋在美国花旗银行与大通银行的存款，据1983年解密的美国调查局文件，“证明这一消息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考虑到日军“登部队”本身即负有对华宣传战的任务，所谓登集团所做的中国党政要员的财产统计其真实性，是极为可疑的。）

毛泽东秘书陈伯达著有《中国四大家族》一书，该书认为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华民国全部中央企业、四大银行和中华民国大部分金融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炎黄春秋》杂志社顾问曾彦修认为，以现在的观点看，陈伯达这本书更接近是政治宣传文宣而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参考价值不高。

参考文献

《‘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香港环球内幕秘闻社

郭岱君：个人日记公开　学界重新评价蒋介石

启之. 目的与手段：文革思维今与昔. 炎黄春秋. 50年后，人们才知道，此书以学术之名，行宣传之实。其失实错谬，不下百处。所谓200亿美元的资产和存款，端赖陈伯达的移花接木之术——他将所有与蒋宋孔陈的姓氏名讳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到这四人的名下。陈伯达对陈果夫、陈立夫的栽赃诬陷最为明显。

“四大家族”的来龙去脉. 1945年10月，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即布置陈伯达按照上述思路编著《中国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在位时究竟“违法敛财”了多少？陈伯达在书中明确写道：“至少当在两百万万美元左右。”他的整本书也就是为了论证这一数字而存在的。陈氏将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总额都算做四大家族可以任意提取、挥霍、转移的个人财产，那么有多少呢？文中介绍，有近43亿元法币，相当于十多亿美元。陈氏又认为，“自抗日战争以来到现在……美国政府曾给蒋家朝廷十四项借款，总计约十四亿一千四百五十余万美元”。此美国战争借款就算“四大家族”在抗战中分文未用，全部中饱私囊，再加上前面列举的银行总资产，也不过30亿美元，和作者反复强调的200亿美元，差距很大。

曾彦修 口述，李晋西 整理. 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炎黄春秋. 2012年01期. 《中国四大家族》可能是在日本投降前后毛叫他写的，名字也是毛取的，助手是何均、陈真...这本书的内容现在来看完全站不住脚，即所谓“主题先行”。这个书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两局等的财产全算成了蒋、孔、宋、陈的私人财产。除了这四行两局外，国民党当时还搞了许多国营企业，都算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以，“中国四大

家族”就来了，说中国的财富就是他们四大家族的。

现在解放60多年了，证明这个论断无法成立...陈伯达这本书，是先有结论，后找一些材料来拼凑，方法就错误。所以，费了那么大的劲写出来的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剑桥中华民国史・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年》

《蒋宋孔陈 ： 中国四大家族》，陈伯达，一桥出版

《蒋氏家族隐私生活相册——震撼一个时代的王朝》

陈廷一:《宋子文大传》，团结出版社

《论官僚资本》，郑振铎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早期发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

1920年9月1日，党派名称最早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中称为“社会党”，后来改称为“共产党”。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并且首先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对此他在考察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等欧洲各国共产党后提出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当时人在上海市的陈独秀与人在北京市的李大钊、张申府也通过信函讨论名称问题，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歌事实上是《国际歌》，但是并未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历史发展

共产国际时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鼓励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五四运动中，中国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开始与社会运动结合，许多学者于中国各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其中，陈独秀是首位公开支持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1920

年4月，新成立的俄共（布）远东局派遣吴廷康等人作为代表前往观察中国状况，计划在上海建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并且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吴廷康随后在翻译杨明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与李大钊会面，之后则到访上海和陈独秀共同商讨建党问题。同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后来在上海组建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学界一般将它的成立，视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次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视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中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由李大钊担任负责人。此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先后加入。尽管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否要在中华民国政坛从事政治改革之论点有所差异，然而两人都把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开创性的行动，认为它预示著许多被压迫的国家即将进入新的时代。1920年秋季，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施存统为负责人。同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则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季陈独秀联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先后由陈独秀和谭平山担任书记。同一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张申府为负责人。中国当代学术界，将这八个小组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启始阶段，统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参考了列宁所提出的先锋主义运作，并且被蔡和森等学术界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这些共产主义工作小组成员有组织且有计划地扩大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且批判各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还在各个地方还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

工人学校，并且领导工人成立工会以发动工人运动，这些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自身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发行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积极创办了以工人为主要读者的通俗刊物，借此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这包括有上海发行的《劳动界》，北京发行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发行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发行的《劳动者》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以此为基础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进而举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同时还在各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1920年开始，有关共同组建团体以改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成为普遍的共识。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等人前往上海协调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来自中国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和日本的13名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与2名第三国际代表全部抵达上海法租界召开代表大会。7月30日，上海会场遭到警方搜查，会议地点转往浙江嘉兴的嘉兴南湖一艘游湖船上进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宗旨和原则等决议，并且制定有关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的临时性纲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为领导机构，分别由陈独秀担任书记一职，而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与宣传工作。在1922年7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同时还通过加入共产国际而成为其分支机构的决议，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其中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定位在实施列宁主义路线的共产主义革命政党，同时作为左派政党而与当时其他右翼政党争夺政治权力。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初期绝大部分运作经费是由总部设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所提供，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一部分而接受第三国际的指挥。而后者提供的资金来源除了美元和卢布外，还包括有贵重的珠宝、钻石、鸦片等。1923年1月12日，第三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系统性地阐述了对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体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隔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样也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1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入选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至此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但是当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后，蒋中正开始排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关系陷入紧张。1927年，蒋中正率领部队进驻当时由共产主义武装成员控制的上海，并于1927年4月12日发起大规模捕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支持人士的四一二事件。之后蒋中正试图进攻武汉，但是遭到中国共产党将领叶挺军队的阻拦。与此同时，蒋中正许多盟友张作霖、何键等也开始打击中国共产党。在这次清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25,000多名锐减至10,000人。清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但在7月12日后则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退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开始清除所有原本在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领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率领部队发动南昌起义。由于不断遭到国民政府部队的攻击而被迫南撤至汕头，最后被赶至福建省边区。随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7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武力夺取政权的方针。隔天，汪精卫在武汉下令处决中国共产党党员。9月，中国工农红军的毛泽东以长沙为据点，在湖南省、江西省发动秋收起义。在9月15日认定进攻长沙失败后，他率领1,000多名幸存者往东前往位于江西省的井

冈山。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并且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但随即被张发奎率兵镇压。1928年4月28日，朱德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井冈山会师，并于1928年5月合并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后来中国共产党便在其军队势力范围内展开土地改革，并与国民政府派遣的国民革命军在1930年至1934年间发生5次反围剿战争。另外在党内自身政治结构上，1927年8月13日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发出第44号通告，进而发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而中国共产党原先在城市的组织系统遭到破坏也促使得党内制度的变革，除了原本作为革命组织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立采取民主集中制，并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而由其成员担任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样的改组结果增加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集权状态，同时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含原先实际掌握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各个层面有所重叠。1929年中国和苏联因为中东路事件而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战争，陈独秀等人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而被开除党籍。自此中国共产党内部早期知识派系因而失势，尔后陈独秀于1931年5月1日在上海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统一大会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而在陈独秀遭开除党籍后，1929年至1930年则由李立三实际掌握政党组织。但是李立三的一连串错误决策反而让中国共产党一度接近瓦解状态，之后第三国际开始积极介入并且在1930年取得主导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援下于11月7日在江西省瑞金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该区颁布宪法以及发行货币，并且在隔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解除毛泽东的军权。不过在1934年第五次围剿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从瑞金县撤退展开长征，期间与国民政府部队多次交火而损失惨重。此时一连串与中国国民党为首的国民政府部队的冲突，使得中国工农红军内部被迫重组，主要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部门负责领导和监督部队；并且自1934年5月开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圈。

毛泽东时代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遵义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遭到毛泽东等人批判。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领导权，并且和周恩来与王稼祥确立为军事最高领导。尽管当时政党事务依然由第三国际所掌控，然而这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非正式领导者，而担任正式主管的周恩来和张闻天则成为他的非正式代表。同年8月时，在毛儿盖召开的沙窝会议上确立由张闻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圈。到了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西省延安市，与部署在陕北红军会合。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县会合，长征宣告结束。而在1936年5月时，中国共产党遵照苏联“联蒋抗日”的明确裁示，由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地区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呼吁中国国民党中央高层“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同年12月爆发西安事变，蒋中正因而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要求。1937年7月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因而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随后暂缓冲突，针对日军入侵中国组成统一战线，进而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8月22日，陕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而改编为八路军；到了10月，位于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新四军。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名义上维持合作关系，但是在1940年时双方便结束所有合作关系。原因在于尽管正式结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利用这次机会扩大和发展自身独立的根据地，进而为之后可能与中国国民党间爆发的战争做出准备。为此中国国民党自1939年开始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但这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由于双方不希望在面对日本入侵时爆发内战，使得有关的冲突一度逐渐减少。

自19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到要摆脱外国势力的影响才能取得

政权，因此展开整风运动，排除以王明为首的第三国际代表在党内的影响，将毛泽东的理论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指导思想。自194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扩大自身的根据地。通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地位，当选首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隔年双方则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5个决议案，表示同意共同实现民主宪政。之后双方分别在1946年2月底达成整军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达成《东北停战协定》。不过直到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间的和平谈判结束为止，双方并没有达成实质效力的共识。而当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比起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兵力还要多出3倍，因此在整体军事实力上来说似乎更占优势。这使得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美国和日本合作下，很快便重新接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拥有200万兵力，但是仍然无法击败较为弱势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也迟迟无法重新取得中国共产党作为据点的农村地区。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部队则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并且大规模地向东北地区扩张势力。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期间，中国国民党所控制的主要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其中甚至还包括曾被中国共产党作为总部的延安市。然而，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优势，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战术性地撤离城市，并且转而煽动居住在城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等人发动抗议行动，进而抨击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发动内战，而对此中国国民党则往往大力镇压民众作为回应。在此期间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开始与蒋中正为首的执政派系爆发权力内讧，反对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党内实施专制统治，这削弱了中国国民党应对中国共产党攻击的能力。其中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当时由中国国民党所主导的国民政府下令停战，但是后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双方仍然因为《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事宜而决裂。尽管国民政府也应美国政府代表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的要求呼吁中国共产党与之和谈，但是中国共产党南京市代表陆定一拒绝这建议，自此国共谈判完

全破裂而使得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发起有限的反攻行动，并将目标明确订为从华中地区发展至华北地区，以及重新收复中国东北地区。而当时中国国民党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本身则出现大量军人逃兵，其中在1948年中华民国国军从原先有的200万人兵力减少至100万人左右。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凭借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基本上消灭中华民国国军主力部队，进而让中国国民党掌管的地区面积快速减少，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则逐渐丧失。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市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为新中国。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占领中国大陆和绝大多数沿海岛屿，迫使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同年12月撤往台湾地区。而此时中国大陆由毛泽东以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统辖，主要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所建立。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半岛参与韩战，直至1953年朝韩双方签署停火协议。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时发起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隔年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过到了1957年发起了整顿思想的反右运动，并因为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被严重扩大，大批知识分子因而被划成右派成员。1958年至1960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主张“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倒退和大饥荒的发生。其中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为彭德怀等人的异议而下令发动反右倾运动，进而造成社会经济陷入困顿，并且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后才得以制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为意识形态差异而宣告决裂。

此时期毛泽东主张尽管社会主义革命似乎获得成功，但是社会内部的阶级敌人仍然持续存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观点。1966年2

月3日，中国共产党透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在这之后引起长达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并且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古迹造成严重破坏。这时期也因为文化革命造成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最终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遭到瓦解而结束。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朱德、贺龙、刘少奇、彭德怀、林彪、陈毅、等等共产党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A4%A7%E9%92%8A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推翻北洋政府的主要角色之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1927年，因里通苏联颠覆中国政府被捕，后在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的统治下被判处绞刑。

生平

早年

李大钊是遗腹子，出生时，李父已病亡六个月，李一岁半时母亲病故，由祖父将他抚养成人。1899年，十岁的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姑娘赵纫兰结婚。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回国后，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913年8月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在校期间与同学郭须静一起加入中国社会党，毕业后到北平参加中国社会党活动。同年，中国社会党领袖陈翼龙被杀，社会党被查封，李大钊逃离北平，避难于家乡乐亭县的祥云岛，及后得到天津绅士孙洪伊的资助，赴日本留学。

入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受茅原华山影响甚深。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世凯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中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后担任过经济系、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推动共产主义。

组建中共

1920年，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和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

1922年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但1923年国民党北京地区党务负责人卢钊指称李大钊为首鼠两端的骑墙人，指责李大钊假意国共合作，张继亦持相似看法。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李大钊曾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李大钊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

逮捕及处决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平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李大钊在热河主办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学习，在热河掀起了农民运动高潮。同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农工兵

大同盟成立大会，来自热河、察哈尔、绥远各地的200多名代表与会。大会选举李大钊、韩麟符、赵世炎、李裕智、王仲青、陈镜湖、郑丕烈为大同盟执行委员，李大钊任书记，韩麟符、赵世炎任副书记。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平“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

1927年4月6日，在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的授权下，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李大钊接受军法审判。在此期间李大钊著有《狱中自述》。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很大压力，但是李大钊等人的罪行已经重到让西方国家剥夺苏联外交豁免权。为此他给政府前方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南方的蒋介石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6/09/21/618873.html

被教科书骗了！李大钊被处死的真相

作者： 阿忆

李大钊是共产党，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

研究历史，一定要以档案资料为依据。本人在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时，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中共党员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

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来，对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

至于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历史课本简明扼要，说军阀害怕说真话的记者，疯狂残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杀李大钊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在北大宣扬共产主义。

说到此，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俊不禁。

那是1998年4月，屠洪刚的公司要投拍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英烈》，先做“北大篇”，我是总撰稿，把《李大钊》一篇先写成样本，由北大党史专家汇审，提意见。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批评我不懂历史，一是把北伐军说成是国民革命军，她认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时期的专有名称，20年代应该叫北伐军，二是我把李大钊写成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总指挥，她认为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和张作霖南北呼应，分头屠杀共产党，所以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听著这番话，我半途已惊呆。如果她是中学历史老师，我尚能谅解，教学大纲如此，占有材料稀少，也只好简单地读解历史。但她是大学学者，居然一直寓于中学教科书的藩篱，可见教科书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

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

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著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他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

李大钊被处死，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1/3/26/n3209695.htm

林辉：李大钊到底以什么罪名被处死？

李大钊，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农村，在其出生前，父亲就已亡故，一岁半时母亲又不幸病故，因此由祖父抚养长大。

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此后赴日本东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学成回国后，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其它职务。后来被聘为教授，开设了一门课程。不过，以其学术地位而言，完全不可与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同日而语，充其量只是三等教授。

尽管在学术上李大钊并未有太多建树，但却因与陈独秀在北大共同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闻名。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

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并共商建党之举。中共成立后，李大钊先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

中共为了发展壮大，采取了“借壳”方式，即中共党员加入实力强大的国民党，借机发展自己。而事实上，根据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应该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能公开批评国民党。然而，中共党员如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在加入国民党后，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分化国民党。

比如，1924年7月，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连梁启超等人都因惊醒而高声疾呼“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国民党也公开指责苏俄，但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个人因苏俄分裂中国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此时，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的所为与卖国者何异？

再如，当一些国民党人，如刘成禹、冯自由、谢英伯、许清和等针对中共党员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而开会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攫取国民党党统时，李大钊等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中山乃宣布四人无罪。

正是在中共这种“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性下，中共逐渐夺取了国民党的组织权、党权、军权和舆论权，而李大钊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发现了大量军火及策划进行颠覆中华民国的活动证据，共七大卡车文件；此外亦在藏匿在兵营中的李大钊的驻地查获了苏联大使馆的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毫无疑问，叛国罪乃是重罪。李大钊全家被捕。

李大钊被捕后，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于是发电向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将领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其余人等皆主张立即正法。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为什么要采用绞刑呢？要知道当时中国杀人主要采取杀头或者枪决的方式。原来李大钊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因此提出采用比较体面的受刑方式——绞刑。

对此，大老粗张作霖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表示尊重，并命令驻外领事馆,向有关国家购买绞刑架,最后从美国买到了一个,完成了李大钊最后的愿

望。中共党史中说“行刑者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是行刑者缺乏经验才导致如此惨况的发生。

李大钊去世后，北大教授及其友人纷纷捐款，并发起公葬。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并打出了“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的挽联。然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一个宁愿保卫一个红色侵略政权而不要自己祖国的人的精神可赞吗？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忘记道义而心向他国之人呢？

https://www.aboluowang.com/2020/0312/1421669.html

李大钊为何被绞死？看其都干了什么

1927年，报纸报道，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勾结苏俄颠覆中国政府，被执行死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蓄着浓密胡子的李大钊看起来年龄较大，但是他当时不过30岁上下。直到张作霖对他处以极刑的时候，他才38岁。为什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会戛然而止呢？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河北乐亭人。他出生不久就失去双亲，与祖

父相依为命。按照当地风俗，他11岁时就与比自己大七八岁的赵纫兰结婚。第二年他外出读书，妻子不仅要替他服侍年迈的祖父，还要为他筹措学费。1905年，他参加科举考试，正好遇上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遂进入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中学深造。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全新的知识，并通过阅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初步了解到西方社会。1907年李大钊的祖父去世，他有感于国势衰微，萌发了研究政治的想法。这一年暑假，他到天津报考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0年，同学蒋卫平投笔从戎后在东北被俄国军队击毙。他写下"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来"的诗句，表达了他对俄国的印象。

辛亥革命以后，李大钊来到北京，加入了江亢虎发起的中国社会党。该党主张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个人自治、世界大同，是一个追求理想的政党。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江亢虎却与汪精卫同流合污，成了日伪政权里的一个重要成员。可见理想与背叛只有一步之遥。

1913年冬天，李大钊东渡日本，并于第二年春天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这时，日本学者河上肇已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而李大钊就是通过日文间接地了解马克思理论的。

1918年初，经章士钊推荐，蔡元培聘请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李大钊虽然不能身临其境，以便了解事情真相，但他根据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写了一批歌颂苏俄的文章。文章认为西方世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了人类社会新的向上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试看将来之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为不同意李大钊"只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倾向，胡适与他就"问题

与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如此，李大钊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文章仍然值得称道。比如他在《危险思想和言论自由》一文中明确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因此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力量都没有资格干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李大钊虽然是北大教授，但是他仍然热衷于从事现实政治。为此，他不仅在苏共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努力做拉拢孙中山、吴佩孚等人的工作。据胡适日记记载，1922年前后，李大钊经常到保定或洛阳去找他的老同学白坚武。当时白坚武是吴佩孚的政务处长，因此他找白坚武的目的不言而喻。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据说李大钊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苏共党员。1925年五卅运动和1926年三一八运动，李大钊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据顾维钧回忆，李大钊甚至在请愿中提出：“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

为此，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骤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对李大钊下达通缉令。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逃入了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1927年4月，张作霖突然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不仅逮捕了李大钊，还宣布发现大量军火和颠覆政府的证据。事后，张作霖将这些文件择其要者编辑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前几年我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宫旧书市场上还看到有人高价出售这套资料。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以里通外国罪被处以绞刑，这一年他38岁。

耐人寻味的是，在十年以后的1937年，白坚武也因为投靠日本人被冯玉祥枪毙。

（原文有删节）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936865

如何评价李大钊？

想起来回答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知乎昨天给我推送了一个胡说八道的回答。那个回答声称：

张作霖说过，啥都好说，但是牵扯到领土免谈。就这一点，比很多政治人物都强。所以，对李大钊极力鼓吹蒙古独立的事，张作霖是极其痛恨的。

把李大钊先生打成“汉奸”、“苏联特务”，然后借以将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先生的行径合法化的路数我是见过的。但把张作霖吹成这样，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你这么吹张作霖，张作霖自己认么？翻翻史料，张作霖说过什么话还在那记着呢

日本国在满洲拥有重大利权，与满洲具有特殊关系，而为本人所熟知，亦为民众知晓。日本国如能以往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与外人更为了当。

当此时此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

穷则卖国当狗，达则寸土不让，果然是铁骨铮铮的一条好汉呢。在张作霖这日本人欲求多年而不得的满蒙五路修起来了，袁世凯和段祺瑞都不敢签的卖国条约，为了扩充实力，张作霖签了；最扯的是外蒙有事，张作霖以出兵为名从中央讹到海量军费和兼署蒙疆经使的帽子，然后将奉系势力扩展到了热察绥三特别区——至于外蒙，跟我老张有个屁的关系嘛！让我表态寸土不让没问题，让我出兵？呸！

张作霖之征蒙费，索去已五百余万。而所组征蒙军者，尚未越雷池一步。今又以得经略为武器，而弋取热河，张真北方之骄子也。

言归正传，咱们说回李大钊先生遇害这事。李大钊先生遇害在当年轰动一时，乃是北洋时期最后一桩司法大事，号称“党案”，属于反动势力对革命进步势力的联手绞杀。请记住，李大钊先生遇害的日子是1927年4月28日——看到这个时间，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没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清党。

你说这事巧不巧？

巧个屁！

前晚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晨报·1927年4月29日

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民国日报·1927年4月30日

所以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军阀张作霖杀了共产党人李大钊，更是反动军阀对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和共产党的一次联手绞杀。“党案”一口气弄死二十个人，此外天津三月份被捕的一批国民党人也跟着倒了霉被弄死了——你要说张作霖痛恨李大钊一个人，那特么的连带着杀这么多国民党是几个意思？

……经过各界营救，可以不死，近受俄使馆党案及李景林图谋不轨之影响，军事当局训令，着即治罪，定死刑

实际上张作霖跟蒋介石私下早有接触，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国民党内部不断趋于分裂，而北伐的战斗又主要是跟吴佩孚、孙传芳这些人打的，所以张作霖跟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糟糕。从1926年7月开始，国民党

右派与奉系之间的联系就始终没有断过：

粤中宜采远交近攻之法，与奉联合

（奉军）绝不援吴、绝不援孙、无论如何，不使孙全部力量对北伐军作战

你想远交近攻，我欲驱虎吞狼，最妙的是你反赤我也反赤，这事就好办了。四一二清党之后奉系跟老蒋的关系迅速升温——你甭管后来怎么样，反正在这个阶段，双方是颇能达成共识的。而且日本人此时大喜过望，急忙给双方牵线搭桥，张学良跟蒋介石等人频繁联系，表示愿意让出关内，服从三民主义——所以说张学良改旗易帜的事情，实际上是草蛇灰线，早有伏笔了：

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凡属中山同志，与真正三民主义不相违背，平时为共产党徒胁迫，无可赴诉者，仍当本与中山合作之初衷，一律友视

反共的大背景交代完了，咱们才能回过头来讲讲李大钊先生的事。李大钊先生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早期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党的核心——二大的时候李先生才是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到了四大召开的时候也没进入中央局，反过来你猜他在国民党那边怎么样？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大钊同志为国民党最有威望的中央委员，长期不倦地领导北方数省的国民革命运动

1924年国民党一大，李大钊先生被孙中山先生钦点，定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在国民党中权位不亚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几人。由于在国民党内地位远超其在共产党中的地位，所以他在联俄联共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特殊的作用——换而言之，假如他只是一个共产党员李大钊的话，那么张作霖就未必非要杀他；但他是国民党大佬、又是共产党员、第三国际秘密党员，曾极力促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事宜（陈独秀等人对此极为反对），乃是国共合作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之一，因此反共清党，他就非死不可。

人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早期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想法非常激进，而李大钊先生则充当了一个“润滑剂”的角色，在共产国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相互协调，从“救国”这个角度出发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而在北方搜集情报，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自然也是工作重心之一——这也是张作霖对他下手的直接原因。

蒋介石的清党是在南方进行的，对北方国民党和共产党，他鞭长莫及。然而张作霖发动的“党案”则直接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北方的权力核心一网打尽。特别法庭给出的死刑审判理由如下：

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

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

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

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颠覆政府活动。

二三纯属扯淡，按照二三的理由，中国当时的军阀有一个算一个，全得枪毙——谁没勾结外国政府参与内战？谁没跟其他军阀有点秘密关系？所以归根结底，李大钊之死是反动军阀对中国进步革命力量联合绞杀的结果，他是为共产党而死的不假，但也是为国民党而死，这点就连国民党人自己都是承认的：

因守常长我四岁，我一向以兄视之。守常同志在北方所主持的，不但是共产党的党务，也有国民党的工作。他实是以一身而负一时北方全部革命事业之重者。而他就是因为这个而被张作霖绞死了的。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反动军阀因为利益没谈拢被日本人炸死，这就属于轻于鸿毛的死，李大钊先生为了革命事业被军阀绞杀，这就属于重于泰山的死，无论这牺牲是为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想要用“爱国”这个大帽子给军阀洗白，呵呵……

恶心！

参考

《洛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第51号，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

72页。

张作霖辞经略[N].申报，1921-09-14(3):11.

李杨.李大钊案:北洋末路之判[J].看历史,2011(05):40-47.

津国民党党员被枪毙·申报1927年4月20日

陆山致畏公密函·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杨宇霆致张静江等函·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张作霖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4

李大钊同志略传·现存莫斯科·转引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9日

张申府. 张申府文集 第三卷[M]// 张申府文集, 第三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949950

作者: 任百棱　一本书在中国的命运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我昨天部分转贴了一本书《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的相关章节，这本书是195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纽约出版的，它所对应的中文版本名称叫做《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来源，据学术中国的一篇解密文章《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中一件档案的使用问题——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版本说起》（链接：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3355）指出：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是1927年4月6日北京军警搜查驻京的苏俄大使馆后得到的文件，当时"俄馆案中之证据文件，堆满两屋，清检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译，尤费手续，迭经警厅公布，多只目录清单。" 同时公布的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在搜查这些文件时有些已经烧毁，所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有些文件是残缺的。

当时这是一件非常有名的事件。顾维钧曾回忆；"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

北京警署后来把搜查到的主要文件，在很短的时间内翻译成中文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印行。书前有六篇序言，首篇为张学良所写。这套材料不是作为图书发行的，因为没有注明出版单位。可能只是作为一种资料供相关机构使用。当时中国稍大一点的图书馆可能都曾得到过，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图书馆。”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

″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三月二十日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记载，独至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三月二十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

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当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第三、我以为在汪蒋合作时期，立夫先生不应在市党部作这种挑拨离间，和混淆视听的演说，致党又发生破裂。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

别发印书馆是近代以来在华的著名印刷机构之一，1870年由英商别发洋行创办，经理施露。如果陈公博的记忆不错，那么这套资料可能还有英文本流行。不过因为蒋介石自己对搜查俄使馆持否定态度，不可能让这样的资料大量流传。1927年4月8日，蒋介石对搜查俄使馆事件曾有专门慰问

电，其中说：″兹敬以最诚恳之友谊，专电奉慰贵代大使暨全体馆员。″ 这是当时中国各政治势力中唯一发给苏俄使馆的慰问电。

邹鲁在《回顾录》中说：

″后来张学良在北京搜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在文件中发现一个鲍罗廷的报告，其中说’汪兆铭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共产党因此利用汪以除异己，来扩展势力，而汪则借共产党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鲍胶漆相投了。″

虽然记忆有误，但提到的大使馆秘密文件确是真实存在的。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那时俄国方面也不愿和蒋先生的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苏俄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顾问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北伐成功对俄国只有好处，虽然我们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相当接近，对反对帝国主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当时可以互相获益。″

因为不是常见的资料，所以这些重要人物在写回忆录时都没有去查阅，但他们提到的事实，大体不错，解释虽有不同，但关于俄使馆的秘密文件的基本事实是真实的。对这一基本材料的使用，涉及对前辈学术工作的尊重和评价问题，所以虽是小事，但应特别引起特别注意。

这本书因张作霖的下台和国民党迅速统一全国，而被束之高阁，只有1988年台湾影印过一套作为历史研究使用。中国大陆解放之后，这本书的流传更为稀少。据网络检索到的历史学者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间，也是历史学家通过《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相关文件推证出来的。

可是很清楚的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在国内连很多历史学者都难于谋面，许多的历史研究者往往采用3手、4手资料来作文章。这本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著名历史资料，就因为国共之私，就这样而被有意隐藏起来（国民党在这方面的自由度，还是应该比共产党大得多）。

按照陈公博的说法，当时（1927年）就有英文版的存在，那么《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这本书1956年出版的书，就应该是当年英文版的再版，或者重新翻译出版的也有可能。

海外，还有一片天空，它既不姓国、也不姓共，为中国保留了一份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俺在互联网海遨游中的真实感慨。

（网络引文结束）

（以下继续引述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7%8B%AC%E7%A7%80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字仲甫，家谱名庆同，科举名乾生，留学日本时名由己，办《安徽俗话报》时名三爱，辛亥革命后始名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时名只眼，号实庵。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十里铺（今属安庆市大观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及首任总书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精神领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创办了著名白话文刊物《新青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其评价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

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1921年作为总书记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大量金钱和鸦片（代替货币以方便在中国南方变现）援助，但反对无效。他于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剥夺中共党内领导职务。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中苏正在中国东北开战，他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开始向托洛茨基主义靠拢，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于1931年主持建立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因此同时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攻击。1932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有期徒刑，囚禁于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释放。陈独秀晚年脱离托派组织（托派组织保留其党籍），但仍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并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缺陷，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极权主义。

生平

少年生活

清光绪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城内（属于怀宁县）。2岁时，他的父亲陈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落榜，未能考中举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后，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没考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独秀前往东北的嗣父陈昔凡的住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国，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办报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爱国会，抨击时政。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当局不满，两江总督端方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称："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一体缉获。"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的朋友，得到端方电令后，连夜把消息透露给陈独秀。陈等人得到消息后逃往上海。至上海后，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此后，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

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后来《安徽俗话报》由于受到政治压力而被迫停刊。

1905年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教学生涯

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凯“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担任助编。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副题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1926年停刊）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

发表《敬告青年》，提出6个原则：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宣传倡导“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和钱沅的作品。为了扩大编辑部，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的学生、教师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蔡元

培担任校长后，致力改变这种风气。但陈独秀却依然流连在妓院之中。蔡元培起初还在报章上写文支持陈独秀，但后来迫于压力，在1919年3月26日深夜的一次会议商议后，决定废除北大的学长制，间接去除陈独秀的校务职位并放他一年假期，陈因此在事实上离开北大。多年后，参会的胡适与汤尔和曾争论3月26日的那次会议的结果造成的影响。之后亦有观点认为，当时北大的多名教师也有包养二房太太，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也有嫖妓，但是他们都没有受到处罚。北大的学长制废除其实在校务会议已经通过，陈独秀也是同意的其中一人，只是因为嫖妓事件发生才提早执行。陈独秀被开除排斥更多是因为他在校内的政策得罪太多同僚（如说话直来直往，推行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允许发放讲义等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目发表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后被捕。9月16日保释出狱。

创立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开始宣传社会主义。

1919年秋，陈独秀出狱后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期间，陈独秀常与喜谈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的戴季陶、张东荪过往。

1920年春，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金斯基（吴廷康）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来访，建议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与维金斯基多次长谈之后正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7月《新青年》发表宣言，正式拥护马克思主义。8月，陈独秀、李汉

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并创办《劳动界》周刊。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共领袖时期的陈独秀

192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这时，他与胡适在新青年的政治立场上发生争执，胡适强调新青年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陈独秀则在第8卷中发表《谈政治》加以抨击。

1921年10月4日被捕后的陈独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陈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后，即于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罚100银元。

陈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

籍。最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陈独秀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最初都表示反对。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他也日益对莫斯科的意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挥感到不满。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陈独秀主持西湖会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同意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于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于是再度迁回上海。不久再迁广州。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国民党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发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已经没有实权了。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

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于是给临时中央发了一封辞职信。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中国的势力中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吸收了中国当时最优秀青年的总汇。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此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带来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陈独秀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拒绝出席。

加入托派组织

此后，陈独秀由于对共产国际不满，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过，他也不赞成同样背离共产国际路线的毛泽东农民革命的思想。1929年9月，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牵头创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同年11月16日，陈独秀因在中东路事件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公开信。1930年3月1日，《无产者》月刊创刊，陈独秀主编。陈独秀是少数经过30年代还幸存下来的中共领袖之一，但对自己所创建的政党已经不再能产生任何影响。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统一后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

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2年12月8日，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3年4月，陈独秀一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当陈独秀听到章士钊说“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时，登时脸色大变，愤然起身，想打断章的辩护，却被法警制止。章士钊长达53分钟的辩护话音甫落，陈独秀立即严辞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的《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晚年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在与博古、叶剑英的沟通中，陈独秀向中

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并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托派问题上不予明确答复。之后中共中央称只要陈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陈独秀出狱后在报纸上发布声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晚年陈独秀书信来往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托派成员。

在苏联共产党清洗托派的情势下，陈独秀于1938年中期被中国共产党抹黑攻击，指控其为"汉奸"，由王明、康生为首，采用苏联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观点类近者打击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掀起一场"肃托"运动。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陈写信驳斥，表示自己不允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任何政治势力的宣传手段"。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后住在武汉、重庆。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更被赶出医院。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继续关注时局发展，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但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缺乏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陈独秀以医生介绍的偏方，泡制蚕豆花茶水，据称可治高血压。但其所用之蚕豆花有部分已发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陈独秀喝了此水中毒，最终于5月27日21时40分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岁。

思想

早期

陈独秀推崇欧洲十九世纪的实证论和功利主义，提倡怀疑精神，曾大力抨击宗教，根据19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论，认为人类进化分三个时期：宗教迷信时期、玄学思想时期、科学实证时期，现代世界应清除一切宗教迷信与玄学幻想，打破虚伪的偶像。陈独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拥护“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

陈独秀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观点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陈独秀在1922年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简短自序中写道：“……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将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呻吟的说话，在这一点上，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例如，陈独秀在1917年抨击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1920年时却一反态度，肯定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思想”，可以救中国，并重估了宗教的作用，认为宗教可以净化和美化感情。他憧憬一个以爱和关切为基础，没有权威等别，也没有阶级和种族的大同社会。

后期

新文化运动时期，宣扬民主和科学，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批判广为流传。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陈独秀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成为总书记。1927年八七会议后，因为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开始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参与中国托派组织，并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反思。

提倡新美术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美术革命 — 答吕瀓来信》，以为“首先要革王画的命”，然后“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陈独秀把目标集中于美术中的国画，针对国画的模仿、写意之弊，提倡输入西方的写实主义以改革中国画。陈独秀的提倡间接促使其后一代艺术家奔赴西方学习艺术，孕育出颜文梁、徐悲鸿、林风眠、方干民、潘玉良、吴大羽、吴作人等留学西方的艺术家。

轶事

据陈独秀自己在《实庵自传》中所讲述，他在1896年（当时他17岁）时参加怀宁县院试，当时的考的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这种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在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影响及遗产

评价及影响

中共党内

1927年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议、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陈独秀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个重要决议。这些决议以及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文革”前党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书”），总结了陈独秀的十项罪名：

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

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托陈取消派

反苏

反共产国际

反党

反革命

汉奸

叛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1920年6月“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战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张闻天、毛泽东的名义作出“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其精神实质是要陈独秀等承认托派的错误，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在此时，王明回到延安，极力阻止这一工作的进行。王明晚年回忆：“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陈独秀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1942年3月30日，也就

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再论陈独秀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提陈独秀，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

1980年代后，陈独秀的"罪名"从学术界开始被逐步推翻，至2004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性。

纪念与纪念地

陈独秀逝世后，由于经济拮据，家属无力将其归葬安庆，只能由当地士绅、生前友好资助，临时厝于西门外鼎山邓燮康园地。墓碑上刻有陈独秀生前好友欧阳竟无写的"独秀先生之墓"6个字。1947年2月，陈独秀三子陈松年根据父亲遗言，将其归葬于安庆北门叶家冲（现属十里铺），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于一冢。墓碑上刻"先考陈公乾生之墓"（陈乾生是陈独秀参加科考时所用的名字）。1979年10月，陈松年得到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4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墓地。碑文为传统行文"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安庆市人民政府确定陈独秀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又重修了墓冢。此次所立碑上刻着"陈独秀之墓"五个字，石碑的背面仅有生卒年月，无其他字样。1998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各级有关部门编列投资1300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现墓园占地总面积为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碑上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纪念馆在安庆建成并对游客开放，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唯一系统展示陈独秀一生的纪念性展馆。

2019年10月，为了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的《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纪念刊文，肯定了陈独秀先生在党史上作出的贡献，“讲一讲他的功劳”，并认为“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也指出其在历史上所犯的右倾主义错误。

家庭

元配高晓岚（高大众）（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临淮乡人，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于安庆。

妾室高君曼（高小众）（1888年－1931年），高晓岚同父异母庶妹。与姐夫勾搭成奸私奔，育有二子一女。病逝于南京。

情妇施之英，医生，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另嫁他人。

平妻潘兰珍（1908年－1949年），江苏南通人，因病去世于上海，无子女。有一养女潘凤仙，现居于上海。

长子陈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浙江及江苏区委书记。高晓岚之子。1927年6月26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被国民政府逮捕，拒绝招降，于7月4日被乱刀砍杀。

长女陈玉莹（陈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于上海。

次子陈乔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被处决。

三子陈光美（1907年－1999年），近年有证据表明此子是陈独秀与高君曼早年所生并寄养在四川的，此子成年后才学超群，但长期隐居蜀中，由于

历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认是陈独秀儿子。

四子陈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幼女陈子美（1912年－2004年），妇产科医生。文革时经香港前往美加地区，后常住美国行医。她逝世后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崔爱民前去吊唁。

养女潘凤仙，随潘兰珍姓，现居于上海杨浦区。

著作

《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统一书号：11102-101

《陈独秀著作选编》（全六册），任建树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ISBN：97872080814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6%A0%A1%E5%8F%B2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有着超过一百年的悠久历史。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戊戌变法中。变法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1900年，义和团兴起，京师大学堂停办。1902年，清廷恢复京师大学堂。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1912年，民国政府将京

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后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蔡元培实施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延揽人才，辞退冗余，实行选科制，创立研究所，设立学报，重视体育，提倡美育，支持社团活动，招收女生。期间，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中国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1927年至1929年是北京大学校史上动荡的时期。先有奉系军阀主张北京八所高校合并，后有南京政府倡导的大学区制。1930年，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改革了学校的管理制度，整顿教师队伍，北京大学的理科得以快速发展。仿照美国制度，规范北大办学，图书仪器也得到扩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西迁长沙，不久再迁至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期间日本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以国立北京大学的名义办学，后被称为“伪北大”。1946年，北京大学回到北平，复员后的北京大学文、理、法学院得到加强，医、农学院处于中国顶尖水平。

内战爆发，时局动荡，校长胡适与一些教授离平南下，北京大学在1949年2月被解放军接管。学校的管理体制、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改造。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汇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学者，奠定了北京大学文理两科在中国长期领先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校内发生大规模武斗，组织了“梁效”批判组，干部、教师受到迫害，师生下放血吸虫病疫区劳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大学的教学秩序得以恢复。北京大学先后加入“211工程”“985工程”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现今北京大学是一所兼具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医学以及新型工科的综合性大学。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校（1898－1916年）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明定国是诏

建校至停办 （1898－1900年）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诏书中提出创办京师大学堂。随后，梁启超草拟了《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并在7月3日得到光绪帝批准。这份章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制纲要。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统辖各省学堂。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兼为中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课程分普通学、专门学。吏部尚书孙家鼐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9月21日，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但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京师大学堂校址设在景山东街和嘉公主府（今北京市沙滩后街，明代时为内廷二十四衙门御马监下设的马神庙，清乾隆时在原址上修建公主府）。大学堂这一时期的办学情况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此阶段的京师大学堂只是一所旧式的书院，以经史教育为主。但也有学者查找当时的媒体报道，认为京师大学堂注重西学，并非以经史教育为主，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藏书楼，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图书馆之一。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1900年8月3日，清廷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再次受到毁损。

重开 （1900－1912年）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委任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责成经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得以恢复。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副总办。洋务运动期间于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办开学典礼。京师大学堂恢复之后，首先开办的是速成科（分为仕学馆、师范馆）与预备科。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47名学生出国留学，开中国高校派遣留学生之先河。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设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十三学门。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校 （1912－1916年）

辛亥革命、清朝灭亡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5月3日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接手时，学校急缺资金，办学困难。严复多方筹款，使北京大学暂时渡过难关。同年7月教育部下发命令，以“成绩未著”、“各方不满”为由结束北京大学。严复作《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并吁请各方支持北大办学。最终，政府收回了命令。这年的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附设译书馆为大学。10月，由于派系斗争等因素，严复辞去校长职务。1914年，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已有黄侃、辜鸿铭、钱玄同、马叙伦、陶孟和、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等名家在北京大学任教。

清末民初的北京大学仍有不少衙门气，很多教师原为清朝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多；部分教学内容陈旧；学生大多无心学术研究，务在做官发财，多读法科；有的学生带着听差上课；一些师生出入八大胡同等地的妓院。

北京大学与太学

胡适、冯友兰、任继愈、季羡林等学者认为，北京大学传承了太学的传统，故有“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之说。但是，陈平原等学者表示反对，认为北京大学并非传承了太学的传统。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1916－1927年）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这十年，被视为北京大学校史上的一段辉煌期，“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开学，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蔡元培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辞退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国、外国教师。他聘请陈独秀、夏元瑮分别出任文科、理科学长，聘请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等到校任教。此期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还有黄节、吴梅、刘文典、陈垣、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康心孚等。对有学术造诣、政治上守旧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蔡元培也用其所长。

蔡元培仿效德国大学的管理制度，在北京大学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制度。他设立了评议会，将其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评议员由教授选出。后来，又在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教授会管理学门（系）内事务，有较大的自主权。教授会主任由教授互选。教授、讲师，中国教员和国外教员都是教授会的会员。随后又设立北京大学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至1920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已经基本成熟。蔡元培倡导教育独立，认为官僚政客不应干涉教育，“我绝对不能再

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为此几次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蔡元培力图将北京大学办成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将商科并入法科，把工科并入北洋大学。1919年，蔡元培撤销文、理、法科，学门不再隶属于科，并改学门为学系，设14个学系。蔡元培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以发展学生个性，沟通文理。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养研究生。这是中国高校最早的研究所。1918年，他创立《北京大学月报》，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蔡元培积极开展学术交流，邀请杜威、罗素、班乐卫、普朗克等名家到北大讲学。

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旁听生制度，使北大的学术活动对社会开放。北大还创办平民学校，为一般民众提供教育。1920年，北京大学允许3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并在同年秋天正式开始招收女学生，开中国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蔡元培重视体育、首倡“美育”，设立音乐研究会（后来改名为音乐传习所）、画法研究会，聘请徐悲鸿、刘半农、陈石曾、萧友梅任教。他还支持学生社团活动，鼓励学术争鸣。1918年1月，蔡元培为整饬校风，设立了进德会。

1917年，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将他创办的《新青年》迁至北京。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等北大文科教授参与《新青年》编辑，倡导民主与科学。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作《文学革命论》，鲁迅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陈独秀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创办《新潮》《国民》等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9年，北洋政府密令中国外交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消息传至北京，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邀请北京12所大专学校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会，大会决议将原定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游行

提前到5月4日。5月4日，北京大专院校三千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任游行队伍总指挥。集会宣读了北大学生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游行中散发了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随后，上海等城市出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学生运动取得胜利。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率先在中国系统地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北大成为中国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8月，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小组。1920年10月，李大钊创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中共一大前，中国53名中共党员有21名是北大师生、校友。

蒋梦麟时代的北京大学（1927－1937年）

1927年至1929年，北京大学遭遇动荡。1927年8月，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将北京大学与北京另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京，国民政府将京师大学校改名为国立中华大学后来政府又仿效法国制度，推行大学区制，改国立中华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师生反对合并，坚持复校斗争。1929年初，教育部决定妥协，将北京大学改名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同年3月11日北京大学在停课9个月后得以复课开学。同年6月，教育部宣布终止大学区制改革，8月6日北京大学恢复原有校名。

1930年12月，蒋梦麟成为北京大学校长。此前，他曾三次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蒋梦麟改革北京大学管理制度，提出十六字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改评议会为校务委员会。1932年6月，北京大学实行学院制，设文、理、法三个学院，胡适、刘树杞、周炳琳分别出任院长。蒋梦麟整顿教师队伍，推行教授专任制，理学院聘请了江泽涵、程毓淮、奥斯古德、饶毓泰、吴大猷、朱物华、周同庆、曾昭抡、钱思亮、张景钺、李四光、谢家荣、孙云铸、斯行健、葛利普等知名学者，北

大理科得以快速发展。蒋梦麟仿照美国制度，规范北大办学，推行学分制，设立研究院，规范研究生入学考试、论文答辩。北大还邀请朗之万、玻尔等教授来校讲学。这一阶段，李四光、丁文江、葛利普、饶毓泰、曾昭抡、孙承谔等人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蒋梦麟多方筹款，帮助学校购买图书仪器、建造设施、设立讲座教授。此期间，北京大学新建了图书馆、地质馆、宿舍灰楼等建筑。1935年时，北京大学有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设备居中国高校前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大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同年12月，230余学生组成北大南下示威团，前往南京示威，要求政府收复东北、与日本断交。1935年12月9日，北大、燕大、清华等校师生前往新华门示威，反对“华北自治”。12月16日，北大学生与20余所学校学生在北平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发表《告民众书》，会后进行总示威。后来，平津学联设立南下扩大宣传团，北京大学负责第一团，赴河北多地宣传抗日救亡。

抗战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日军先后占领北平、天津。遵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迁至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起上课，设17个系，有147名教师，至11月20日有三校1120名学生报到。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仓促，缺乏经费、图书、设备，办学条件非常困难。1937年底日军攻破南京，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空袭长沙更加频繁。1938年1月，国民政府批准临时大学迁址云南昆明。1938年4月2日，学校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的本科学生中，原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毕业时分别发给三校的文凭，联大成立后入学的学生毕业时则发给联大文凭。1939年5月，三所学校的研究院分别在昆明恢复，学生的学籍分属三所学校，但课程为统一开设。北京大学研究院设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下设十二个学部。西南联合

大学办学条件仍然艰苦，校舍紧缺、缺少仪器、资金不足。部分师生不得不兼职以维持生计。尽管条件艰苦，西南联大办学九年间本专科、研究生毕业3,882人，在校生共8,000人左右，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其中90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含外籍院士），6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章者共23人），3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45年8月，日本战败。由于交通条件困难、三校原有校舍有待修缮，西南联大继续办学一年。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举办结业典礼，联大宣告结束。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学生中有1,100余人投笔从戎，走上战场。战后的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等校学生自治会在举办了反内战时事晚会，发动学生罢课反内战，遭到国民党军开枪威胁。12月1日，国民党军人和特务袭击西南联大，炸死4人，伤者50余人，史称一二一事件。

1937年8月日军攻占北平之后，北京大学委派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周作人四名"留平教授"看管校产，学校每月发给每人50元维持费。除了周作人，另外三名教授都是因为疾病、年老而不能南下昆明，并在日本战败前去世。1938年，周作人与冯祖荀出名具函托时任傀儡政府教育总长汤尔和与日本人谈判，保住了北大二院。但是周作人不久就与日本人合作，在日本人组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任要职。

日本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自1938年起谋划"恢复北京大学"。傀儡政府整合北平大学，在1938年5月至9月间先后设立农、医、工、理四个学院，1939年1月14日补办开学典礼，大学的名字仍为"国立北京大学"，通常被称为"伪北大"。后来傀儡政府又增设文、法学院。"留平教授"周作人曾先后担任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日本战败后，傀儡政府的北京大学停办，学生进入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补习及格后可转入北大等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立北京大学（1946－1949年）

1945年9月，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胡适尚在美国，到任之前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在重庆时曾发表声明，称"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傅斯年赴北平接收北大，坚决辞退在傀儡政府所办北京大学任职的教员。这一阶段，北京大学的校舍得到扩张，还延聘王竹泉、钱思亮、杨钟健、袁翰青、季羡林、马坚、庄圻泰等知名学者任教。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第四院大礼堂举办复员北平开学典礼。复员后，北京大学新设医、工、农三个学院，总共有6个学院、33个学系、2个专修科。后来，学校又设立文科、理科、法科、医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据1946年12月的统计，北大有注册学生3,420人。复员后，北大文、理、法学院得到加强，医、农学院处于中国顶尖水平。胡适还拟设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但是因局势动荡未能实现。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首批院士，北大十名教授当选，列中国大学之首。

1946年12月24日晚，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在东单被两名美国驻军士兵强奸。此事引发了"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12月30日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在北平举行示威游行，中国多地的学生予以响应，据统计各地参加游行的学生计50万人。国共内战中，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1947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喊出"反饥饿反内战"口号，同月20日"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爆发，游行队伍返回北大后将红楼北侧的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1948年11月，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国民政府原本计划让北京大学南迁，但北大教授会决议不南迁。国民党拟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出飞机，希望一批重要学者离开北平南下。胡适、钱思亮、毛子水、姚从吾等人受邀南下，但大多数学者留在了北平。胡适离校后，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校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的北京大学（1949－1966年）

1949年初，解放军进占北平。2月28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下发命令接管北

京大学，当天下午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了欢迎接管大会。1951年2月，中共北大党委成立。1956年6月，北大的领导体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1962年，领导体制再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国民党时代的一些课程停开，添设“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新课。至1950年3月，停开的课程共77门，新设课程100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仿效苏联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1949年，北京大学农学院参与合并组建北京农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1950年，北大医学院独立为北京医学院（后来改名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与北京大学合并）。1950年，北京中法大学撤销，其文学院文史系、法国文学系师生全部并入北大，理学院数理系、化学系部分并入北大。1952年，北大工学院建制撤销，机、电、土、建四系并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合并到天津大学；北大教育学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各少数民族语文专业并入中央民族学院，经济学系一部分并入中央财经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文、理院系并入北京大学；北大法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参与合并组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北大由校、院、系三级体制改为校、系二级体制，设12个系。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将校址迁入北京西郊燕京大学校址。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一所拥有文、理、法、医、工、农的大学变成一所以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后，原来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学者云集北大，奠定了北京大学文理两科在中国长期领先的地位。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223名学部委员中，北大在任教师有28人，居中国高校之首。院系调整后，北大在1954年重建法律系，1956年重建图书馆学系，1960年重建政治学系。1958年，北大创建中国首个原子能学系。此外，北大在中国最早培养半导体专业人才，并在中国计算机研究起步阶段就办了计算机学习班。据1966年的统计，北大时有在校生近九千人。这期间北大培养的毕业生有百余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这段时

间，北大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如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

由于政治活动频繁，人文社科研究受到干扰。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视为此阶段北大最突出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但文章发表后就遭到了批判。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大七百余名师生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中共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开始纠正各种失误，同年整顿高校工作，提高了北京大学的教学质量。196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将北大作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向北大派出工作队。运动中，不少北大党员被错误批判。1965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纠正了工作队的错误做法。

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大学（1966－1976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大党委副书记彭珮云，指责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聂元梓的大字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大字报。6月，改组后的北京市委宣布撤销陆平、彭珮云的职务，设工作组代行北大党委职权。7月，北京市委撤销北大工作组，江青点名要求聂元梓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9月，校文革正式成立，聂元梓执掌大权。聂元梓被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校文革成立之后，北大还成立了不少造反派组织，如“红联军”“井冈山”等，后来形成了保聂、反聂的两个派别，两派的对立越发严重，最终酿成大规模武斗，校内秩序混乱，校产受到毁坏。1968年9月18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军宣队”）派492人进驻北大，中止了武斗。1973年10月，在迟群、谢静宜的筹划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立，批判组有“梁效”“柏青”“高路”等共十几个笔名，发表181篇文章，帮助江青等人进行“批

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大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的很多干部、教师被打成“黑帮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残酷迫害。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有冤假错案1,000多宗，400余户被抄家，知名学者饶毓泰、翦伯赞、俞大在内的60余人非正常死亡。1968年5月16日，校文革设立“监改大院”（也称“黑帮大院”，俗称“牛棚”），关押干部、教师218人，对其进行迫害。1969年，七千余名北大师生被下放鲤鱼洲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鲤鱼洲位于江西南昌，是血吸虫疫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连续四年停止招生。1970年，文革之前的在校生已经全数毕业。同年中共中央发文，废除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主要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招收“工农兵学员”。1970年至1976年，北京大学共招入7届工农兵学员，总人数超过12,700人。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入学时的文化水平相差极大，教学困难重重。

文革之初，北京大学的各项研究大多中断。1970年后，一些应用性的研究得到恢复。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曾指示周培源恢复北京大学理科的基础研究。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等随即指使上海《文汇报》发文攻击，基础研究恢复工作受到干扰。这期间北京大学取得的几项研究成果（如猪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等）后来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7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建成启用，是中国当时面积最大、设备最好、藏书最丰富的高校图书馆。

1976年后的北京大学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文化大革命间的错案得到平反。因《新人口论》被批判的马寅初也得以平反，成为首位北京大学荣誉校长。1978年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首批学生入读北京大

学。北京大学重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管理制度，并恢复重建校系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机构。北大恢复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北大逐步实行了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了经济学院等多个学院。设立方正集团、青鸟集团等公司，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庆祝中国男排胜利，喊出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传向中国全国。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时，北大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打出横幅“小平你好”。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学学生与北京其他高校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悼念活动后来发展成为游行请愿活动。4月26日，中国共产党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该次运动定性为“动乱”，认为这次运动根本上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5月13日，广场上的学生发起绝食活动，直到6月3日夜晚人民解放军进行清场。这就是“六四事件”。198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北京大学开始对新生实行一年制军政训练，此制一直延续至1992年。

1986年起，北京大学多次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96年10月、1998年5月，中国政府先后启动“211工程”“985工程”，资助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1999年1月，中共北大第十次党代会宣布全面启动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目标用15年或更长时间让北京大学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2012年中共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通过报告，计划大体在北大建校120年前后，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此后再用15年或更多时间，将北大建成更高水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在2048年前后，力争让北京大学走在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2000年4月3日，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后来，北京大学又成立了工学院、艺术学院等学院。为发展交叉学科，北京大学成立了信息科学中心、计算机语言学研究所等单位。北京大学成为兼具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医

学以及新型工科的综合性大学。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推进教学改革。2001年，北大启动“元培计划”，首先在元培实验班中试行学分制、导师制、弹性学制，实验班学生入学只分文理科而不分专业。后来，北大将本科生自由选课学分制推向全校，建设了有三百多门课程的通选课体系，对低年级本科生实施通识教育，对高年级本科生实施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除少数专业外，新生入学时按院系和学科大类招生。北大还投资新建、扩建了一些基础设施，如建设了理科楼群、图书馆新馆、北京大学体育馆、人文学苑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4%BA%AC%E5%A4%A7%E5%AD%A6

燕京大学（英语：Yenching University），简称燕大，是20世纪初由四间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于北京开办的综合大学，为当时中国教学品质、校园环境优秀的大学之一，也被认为是中国教会学校之首。校名源自于北京昔名——燕京。现今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即以该校为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燕京大学资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随后遭到整并而解体：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其他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医学系并入中国协和医学院。其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成为北京大学的主校区，现已列为古迹保护。此外，其大学董事会和部分教员南迁香

港，参与崇基学院的创建，为香港中文大学创始的成员书院之一。

历史

起源

1918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的大学”，其前身是美国教会在北京一带办的三所教会学校：

汇文大学（Peking Huiwen University，美国美以美会）。前身是1870年创办的崇内怀理书院，1889年改名汇文大学。校长刘海澜博士，在崇文门船板胡同的校址后来改办汇文中学。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是美国公理会1864年创办的贝满女塾），位于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有22名西方教师。校址后来改办贝满女中。

通州协和大学（Tongzhou Harmony University）。前身是1867年创办的“公理会潞河书院”。谢卫楼（Davelle Sheffield）校长。

除了美以美会和公理会外，美国美北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也参与燕京大学的创建。

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的资产：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包贵思记载：“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里，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和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并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

变迁

1920年，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推举亨利・卢斯为副校长，负责在美国为建校筹款。

1921年，校长司徒雷登获得美国著名出版商的父亲亨利・卢斯及美铝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捐款，在北京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聘请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1926年，正式迁址。全校共辖有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又称医预院，学制为三年预科），以及文科和理科相关专业学系。

1929年，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开展国际学术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提高了燕大学术地位，也扩充燕大的经济来源。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第二天，日军进入燕京大学，将所有美籍教职员作为战俘逮捕，同时逮捕了十余名中国师生。校长司徒雷登当时出差天津，也随即被捕。

1942年10月，燕大在成都华西坝复课。成都燕大与在成都复学的另外四所教会大学一起，被称为华西坝“Big Five”。

1945年春夏之交，燕大师生开始分批回到北平复校。

1952年，中国大陆实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学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其他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

传承

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校董会联合其他十三所基督教大学在香港成立崇基学院，崇基学院随后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

燕京大学校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中共政府接管，燕京大学就此终结，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迁入燕大的校址。由于当时“院系调整”规模较大，除院系外人事亦有很大调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等院校，其中一些调整在1949年以后已经开始，所有原教会背景学校于此时停办，院系及人员分拆进入其他大学。严格意义上说燕京大学与其他中国教会学校的历史在1949年正式终止。

另外，香港地区的香港校友会则成立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以继承及发扬燕京大学之办学精神和传统。学校沿用“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

校园

燕京大学原址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校园最初的基址是清朝三山五园的附属园林，包括漱春园、弘雅园（墨尔根园）（漱春园和弘雅园为明朝勺园的一部分），1921年自军阀陈树藩手中买入。后又陆续从载沣等人手中购入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等园林（1949年后，原由徐世昌家族租用的镜春园、鸣鹤园并入燕京大学园区）。1921年—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

燕京大学的正门位于校园西边，坐西向东，以玉泉山玉峰塔为对景，门内为东西轴线。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安佑宫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

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燕京大学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

传统

校训

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1937年至1945年改为：因自由 得真理 以服务

校歌

燕京大学校歌

曲：选自亨利·S·汤普森所作《安妮·莱尔》，词：赵紫宸

第一节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第二节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第三节

Lift we high united voices, joyfully we sing.

Loud in praise of Alma Mater. Glorious Yenching.

Lured from every part of China. Here's to old Peking,

We as one our college honor, Hail O Hail, YenChing.

校长

司徒雷登：1919年1月-1945年，后长期担任校务长

吴雷川：1929年-1934年为代理校长

陆志韦：1934年-1941年为代理校长

梅贻宝：1942年-1945年为代理校长

陆志韦：1945年-1949年为代理校长

翁独健：1949年-1952年为代理校长

https://www.cingta.com/detail/1710

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多少顶尖人才？

摘要：燕京大学存在了33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的，就超过100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

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母都是在清末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但司徒雷登自己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司徒雷登的“中国人”身份，始于杭州，最后又因为他的骨灰归葬于此，也终于杭州。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直到11岁回到美国读书，他都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度过了完整的童年，学会了一口纯正的杭州话，并认杭州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04年，司徒雷登结婚后偕妻子回到中国，第一站也是杭州。在这之后，他的主要事业是传教，并钻研汉语。1908年开始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

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曾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在杭州，他参加创建了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他的弟弟后来成为之江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一生最辉煌的成就，是因为他创办并长期主持燕京大学。在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司徒雷登首先是一个教育家，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

清末，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创办者后来计划重建，将其合并为一所大学。但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上分歧很大，后来达成妥协方案:选一位“局外人”任校长。非常了解中国，且学养出众、令名远播的司徒雷登，成为在华美国人公推的校长人选。

司徒雷登接过了这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曾骑着毛驴为新学校选址四处奔波，为筹集办学经费四处化缘，用传教的虔诚和毅力，在北京西郊建起了一座园林一样优美的大学。如今，燕京大学早已不复存在，但司徒雷登留下的校园，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今日燕园的湖光塔影、中国风格的校长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基本保持了司徒雷登主持设计的原貌。

燕京大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司徒雷登却提出了“使燕大彻底中国化”原则。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作为教育家，他深知“大学不仅要有大

楼，还要有大师”的道理，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短短时间内，燕大名师云集，几乎个个如雷贯耳:洪业、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顾颉刚、张东荪、冯友兰……

同时，他积极推动燕京大学与一流名校交流合作，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作为一个学术项目至今仍备受推崇，被视为学术质量的保证。

司徒雷登出色的建设和经营，让燕京大学的知名度和学术水平迅速提升，短短十多年，已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在80多年前，就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燕京大学存在了33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的，就超过100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燕京大学还是中国新闻学、社会学教育最早的开拓者，培养的著名校友有冰心、费孝通、侯仁之、杨绛等，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作为校长，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在日本侵占华北期间，大批燕大学子从沦陷区奔赴解放区，司徒雷登亲自为他们送行。

司徒雷登后半生背上“美国在中国彻底失败的象征”的标签，源于他于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大使任上，他曾受邀到杭州参加活动并祭扫父母亲之墓，并被授予“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中国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前夕，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广州，希望充当中国内战调解者的角色，但最终因为形势剧变，不得不悄然返回美国，随即退休直至去世。

因为他在驻华大使任上的表现，“举世无仇敌”的司徒雷登成了各方眼中都不受待见的人。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因为那篇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著名文章，他成了对华侵略政策代理人和声名狼藉的失败者的代名词；回到美国，他被支持国民党和奉行麦卡锡主义的当局“禁言”，还被一些人骚扰攻击，贫病交加，孤独落寞。如果不是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晚景会更加凄凉。

1962年9月，卧病多年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他最后的遗愿，就是把骨灰送回中国，葬在燕京大学校园。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在早已成了北京大学校园的燕园，司徒雷登留下的建筑仍在使用，但校园里至今没有一座司徒雷登的塑像，早年安葬于此的其妻墓地，也不知所终。

在傅泾波后人持续不懈的推动下，司徒雷登的第二故乡杭州，最终接纳了他。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虽然这不是遵照他遗愿的最优选择，但杭州是他出生成长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父母和弟弟的长眠之地。生于斯、葬于斯，也算完成了他叶落归根的心愿。

杭州，这个美丽包容的城市，给了司徒雷登这个中国人“熟悉的陌生人”故乡的温暖，也成就了两个大国之间超越历史的友好佳话。

（新华社　作者 丁永勋）

https://ishare.ifeng.com/c/s/7roCs11InRr

消失的燕京大学，影响中国百年！

为什么不少人都说燕京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历史上曾享誉中外的燕京大学，因何故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民国时代，北大清华的名气，可能都还不如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名字是中国的，但却是洋人开办的。洋人进入中国传教，在各地开了教会大学，比如在北京，就有华北协和大学、美以美会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汇文大学。 这些大学背后的老板，有美国长老会，美国女公会，英国伦敦会等。听这这名字，就知道后台有多硬。但教会大学太多，显得比较零散，洋人就把这几所大学合并。1916年，三所大学正式合成一家，当时定的名字，就叫北京大学。

因为没有合并经验啊，大家也是各玩各的，学校乱七八糟。直到1919年，中国通司徒雷登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可当时已经有了北京大学，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很容易弄混。所以，司徒雷登把学校改名为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虽是几所教会大学合并的，但他们慢慢就谈化了宗教特色，纯粹是所高校了。

燕京大学非常的牛，各个院系都有，文、理、法俱全。什么国学、英语、欧洲文学，哲学、音乐，到物理化学地质军事，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只要你想学，燕京大学应有尽有，除了做驴肉火烧。

大学牛不牛，主要看教授牛不牛。燕京大学的教授牛人有：钱穆、顾颉刚、雷洁琼、冯友兰、张东荪、毛主席的老朋友斯诺，周作人。个个都是大腕，有这些牛人坐镇，燕京大学的金字招牌更加值钱。 当时燕大也是很有骨气的，日本人打进北京，想安排点日本学生到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一

句话：日本人可以进，但必须要考。 那就考吧，结果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够及格，所以也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进入燕京大学，不知道是试卷特别加大了难度，还是日本人真的笨呢？ 到了1949年，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去了香港，被并入了香港中文大学。

留在大陆的那部分，在1952年被撤销了。工科由清华大学接收，文理科由北京大学接收，法学院和社会学系由中国政法大学接收（当时叫北京政法学院）。 而燕京大学的旧址，给了北京大学。

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的父母都是来华传教士，司徒雷登就出生在他父母传教的杭州。司徒雷登在杭州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年，11岁的司徒雷登回到家乡弗吉尼亚读书，1899年考入神学院，1904年，携新婚的妻子回到杭州，与父亲一起在中国传教布道学习中文。1906年，他的独子在杭州出生，1908年，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开始了他作为职业教育家的生涯。

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后，迅速扭转了管理混乱的局面，在很短时间内就将燕京大学变成了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学。

燕大的校训在当时非常有名：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个校训出自圣经，是司徒雷登亲自拟定的。

司徒雷登上任后，用募集到的捐款从贝勒载涛手里买下了清华大学东部的燕园、朗润园、芍园等一大片地，并聘请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墨菲按照中国古代宫殿的风格设计燕京大学的校舍，形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建筑风格。

燕大还广聘名师，比较著名的教授有埃德加·斯诺、夏仁德；教育家林迈可、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许仕廉；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江平；哲学家冯友兰、张东荪、洪谦；史学家钱穆、顾颉刚、邓之诚、韩儒林；文物鉴定家王世襄；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院有周作人、郑振铎、冰心、冯沅君、林庚、顾随、陆侃如等名作家和学者；西方语言文学系有吴宓、吴兴华等大家。

所以，燕京大学在很短的二三十年里就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她还与哈弗大学共同建立了哈弗燕京学社，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声望的中国国学研究机构。燕大也是哈弗最先认可其教学品质的中国大学，燕大和哈弗的课程学分可以通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积极参与转移营救学生，并留守燕大看管校产。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被日本华北驻防军逮捕入狱，在日本的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三年。1945年，司徒雷登转任美国驻华大使。

1950年，国务院决定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和组织在华办学，已经有的大学一律撤销。

1952年12月，燕京大学被拆分。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有：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和民族学专业）。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的，有清华大学的工学院。

具体来说，燕京大学的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

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它先是被拆分，其中最主要文理学院被北京大学合并，然后北京大学搬到燕京大学的校舍里办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实际上是鸠占鹊巢。

可以说，燕京大学的消失，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催的一页。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4841753/

燕京大学:1919-1952

作者: 陈远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3-8

页数: 262

定价: 39.8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铁葫芦·历史馆

ISBN：9787213055379

豆瓣评分

8.0

内容简介　・・・・・・

★这不仅是一部校史，更是中西文明冲突视角之下的中国近现代史

★燕京大学校友余英时作序、章诒和题写书名

★94年来最独特、最好看的燕京大学校史

★燕大一隅，折射着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开始它33年短暂历史中的辉煌业绩；1952年在新政权推行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永远地消逝了。33年间，燕京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极为显赫的声名，并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学生运动……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燕大有关；司徒雷登、傅泾波、张东荪等燕大人，也深深地介入了时代。本书讲述了民国一代学人风

采、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曲折历程、燕大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等侧面，通过燕大这个角度，展现出中西文明冲突中一个时代的命运。

★本书取材丰富、分析精密、叙事流畅、论断公允，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33年间的辉煌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燕大校友 余英时

作者简介 ・・・・・・

陈远，近代史学者、媒体人。学术视野关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大学史、文化生态变迁、知识分子研究等题目，近年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另外侧重于重新构建民国史体系。2008年赴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2011年受澳门大学之邀为其研究生院做学术演讲。著有《 燕京大学1919—1952》《消逝的燕京》《负伤的知识人》《在不美的年代里》《穿越美与不美》《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等。

目录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5%9B%BD%E7%84%98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山明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八一南昌起义主要发起人之一。张国焘在中共党内资历极深，长征后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实力远在中央红军之上，是最有资格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人。后来由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九军团等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张也在中共党内失势，遂改投于国民党，不过他并没有在国民党担任职务太久，此后便退出政坛移民加拿大。

生平

早年

张国焘的父亲张鹏霄曾任象山知事。张国焘少时进私塾读书，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但是张没有读完本科，就成为职业革命家。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是北京学运领袖之一。

1920年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8月11日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张国焘任首任总主任。1922年1月，参加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处境、以及土地关系、学生运动和罢工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同年中共二大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参加领导二七大罢工。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因为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被批判左倾。张国焘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1924年5月11日在

北京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有一百多人抓捕名单，因时间紧急有文件未来得及烧毁，未受酷刑但有军阀强行按手模等行为。在1949年后整理北京档案时，发现张国焘当年文字材料，有当时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与全国铁路系统党员名单，或与此有关。1924年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他们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出狱后他隐瞒这一情况，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1927年四月中共五大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负责人。1927年八七会议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春，会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曾慎重建议“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三月初，…，就因陈先生的慎重，而作罢了。”（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十三篇第二章）。1928年6月中共六大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1930年11月回国，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发动白雀园肃反，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在长征时期，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张国焘说是为策应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

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不足三万人。会师后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而中共中央坚持“北上路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并非是反对北上，当时北上决定并未确定。9月9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称张国焘发密电要求武力解决，得到叶剑英报告的毛泽东等不辞而别，仅率领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等组成的中央纵队北上，张国焘则率四方面军及部分一方面军部队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南下。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开会，并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第二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署名向陕北的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提出“党内急谋统一”，“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1936年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朱德的提议，致电张国焘、朱德，电文称：“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1936年2月14日，张闻天、林育英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

一”。

中央红军在陕北与陕北红军以及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建立并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1936年6月6日，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并准备成立中央西北局。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部队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彭德怀诱使张国焘脱离大部队，仅带数十人的警卫排进入根据地，由此解除了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彭德怀带领的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接替张国焘控制了红二、四方面军。

根据中央命令，由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红九军团等部组成红军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任中共西路军前委书记兼西路军政委，徐向前任总指挥。西路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奉命向北，先是试图打通经中卫、阿拉善进入外蒙到苏联的补给线，后中共中央又接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北线，转而打通经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补给线。

西路军在北上被宁马马鸿逵打击后，转而退入河西走廊，试图打通经由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以及甘肃军阀马

鸿宾的猛烈攻击，同时由于中央军委和军委前指（彭德怀司令）指挥错误，致使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东突西冲，犹豫徘徊，始终不能摆脱被追杀的被动局面，经数月浴血拼杀后，将近3万人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仅有李先念率残兵一千余人进入新疆，其余部队大部被歼，少部分被俘或被打散。被俘和被打散的一部分人员（如徐向前等）后来逃回陕北。

由于红军未能打通陕北到苏联的补给线，使蒋更有信心剿灭红军；红军发动宁夏战役失败，也使东北军、西北军更难和红军正式、公开结盟，因为张学良希望与红军在打开与苏联通道后结盟，否则无法抵抗强大之中央军。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学良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后，东北军不能继续与红军秘密合作，使张学良难以“剿共”与“联共”。

张国焘于1937年3月遭到毛泽东、张闻天、凯丰等之批判斗争。张国焘于《我的回忆》〈第二十篇第二章〉自述此时期心境：“…我回忆已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力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1937年9月起，张国焘答应中共中央代理林伯渠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职务，之后渐被边缘化，直至1938年4月初。

与中共决裂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中共特工李克农率人在汉口火车站拦截住并扣押起来，周恩来到武汉，多次要求张回延安未果，最后决定让张选择回归中共与否，张说愿意被破门。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

张国焘脱离共产党后，蒋中正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领导人戴笠“妥善运用”，但此后张国焘对中共（特别是主要以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组成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施高德路创办“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虽然他看似仍对共产主义抱持信心，但张国焘退党后，在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指责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改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晚年

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举家迁到台北市；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1949年至1952年10月张国焘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连载文章，并于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1968年举家飞往加拿大。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1976年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士嘉堡一个养老院病逝，后葬于多伦多东部士嘉堡的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终年82岁。《多伦多星报》亚洲局记者比尔·史勒（Bill Schiller）撰文引述张戎表示张国焘死前信基督教。

家庭

1924年，张国焘和杨子烈（1902年12月9日-1994年3月27日）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两人有3个儿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人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定居，分别是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

著作与相关书籍

张国焘 著. 《我的回忆》. 刊于1971年至1974年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后于1974年该出版社结集成书；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1980年11月初版，共两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共三册，ISBN 7-5060-0985-4；2004年3月重排再版，共两册，ISBN 7-5060-1701-6）(注释：因中共早期领导人物较少写回忆录，故本书突显其重要性。对于张国焘的书中言论，中共官方否认是事实，并出书反驳，而“我的回忆”一书在大陆皆以灰皮书（因封面是黑底或灰底白字）方式出版。

姚金果、苏杭 著. 《张国焘传》 2000年6月初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 ISBN 7224054941.

路海江 著.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 2004年4月初版. 中共党史出版社. ISBN 7801369106.

张树军 著. 《张国焘》（中共一大代表丛书） 1997年12月初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ISBN 7202022168.

《驳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长征篇》 2003年出版.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ISBN 962-86523-2-X.

刘统 著. 《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 2004年5月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ISBN 7219050305.

杨子烈 著.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1970年初版. 香港自联出版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6%B3%BD%E4%B8%9C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重要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幼年进入私塾读书，也务过农。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1927年-1949年间成为第一次国共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主要参与者。1942年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以巩固地位，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逝世。1949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至1959年转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先后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暨名誉主席等职。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自1945年起终身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生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朝鲜、柬埔寨、越南等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世界各地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充满争议。其在推行计划经济、推动工业化、开展扫盲运动、主导修订《五四宪法》、提出发展两弹一星、推行个人崇拜的同时，亦发动或主导了土地改革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也曾一度退居二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总数由5亿多增长到9亿多、曾一度鼓励生育，而期间的各类政治运动及大饥荒共造成了4,000万－8,000

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亦有数千万中国人遭到批斗和迫害。外交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苏交恶、越南战争、中美破冰、红色高棉夺权等冷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生平

早年岁月（1893-1922）

童年时期

清朝光绪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户农民家中，出生后，取字咏芝（后改为润之）。毛泽东父亲名毛贻昌，母亲名文素勤。因为其家头两胎婴儿都不幸夭折，出于迷信，母亲文氏便抱着出生不久的毛到娘家一座石观音小庙中将一块巨石认做干娘，因此有了小名“石三伢子”。

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10岁时，家中共有田产15亩地，父母、祖父、弟弟等五口人同住一室。童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接受传统教育，但却对其不甚以为然，在性格中也有着叛逆、不甚循规蹈矩的一面。此外，同时期的《盛世危言》等作品对毛泽东也有着显著影响，他厌倦在地里劳动，希望得到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机会。

1911年，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一天，毛泽东在学校墙壁上贴文，称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提出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为同清政府决裂，毛泽东倡议并带头剪辫子。武昌起义后，毛泽东兴奋异常，觉得激烈战斗需要更多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10月24日，长沙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不愿参加学生军，投

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列兵。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助理员，除打扫外，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者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

毛泽东早期受到多种思想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新青年》）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11月15日李大钊把演说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使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政治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无政府主义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之环节。毛泽东认为在北京生活条件差，住在三眼井，同7个人合住小屋。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流行政治主张对毛泽东影响不小。毛泽东早期即开始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10多天，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正式出版，"创刊宣言"称："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民众的大联合"称：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

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之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新民学会厌恶北洋政府，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迅速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毛泽东坚决拥护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之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公启于1920年2月20日在《湖南》月刊发表。11月8日至11月10日，长沙《大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启事称：“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后三年中，毛泽东同《大公报》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为该报撰写不少文章。

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10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在赴京期间毛泽东等发表“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12月18日，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十余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到北京后主持驱张运动，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之大本营。12月，杨昌济病重，在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之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曾与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1月22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凡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1月23日，父亲毛贻昌在家乡病逝，与母亲文氏合葬于韶山土地冲；毛泽东在北京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湖南奔丧。3月14日，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在致周世钊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

人”。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是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之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一些旅沪之新闻、教育人士组成。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6月12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6月14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6月17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

主张湖南建国及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0年9月，毛泽东应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至1921年夏），被一师校友会推举为会长（连任2年半），毛泽东题写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礼堂，以勉励学生。

10月21日，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由自治期成会等召开之各公团联席会议，自治期成会等6团体提出仍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而终止。

毛泽东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之代表，离长沙同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之代表12人（毛、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会后，任中国

共产党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10月10日，湖南省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1922年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成熟；接着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哀兵必胜”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意见，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经过5天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

12月，毛泽东等23人就政府表示对工界之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态度等10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12条规定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之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

青年及中年时期（1922-1949）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维汉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4月，毛泽东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行前向继任中共湘区委书记之李维汉移交工作，把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具体工作，分别交给郭亮、夏曦等。

6月，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局秘书。总书记陈独秀颁发的中央文件由中央秘书毛泽东副署后发给各级党组织。

毛泽东参与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之活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代理部长；提出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之领导权。

1924年2月，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5月10日至5月15日，毛泽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之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7月，由于同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经常发生分歧，毛泽东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领导文书科工作，另推荐中国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组织部秘书。

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湖南疗养；年底，偕杨开慧等回到湖南。

1925年1月，毛泽东缺席中共四大，并落选中央局委员。

1月中旬，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

2月6日，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并带回一百多斤重书籍。五卅运动后，湖南许多地方成立“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锺志申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20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是国民革命一项基本内容。

6月中旬，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主持锺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8月28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此密电，写信交人快送到韶山。

9月，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10月5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写两本小册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1926年春，毛泽东前往上海。3月18日发生中山舰事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兼职。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之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为党培养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根据整理党务案，5月25日毛泽东离开代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位置。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农民部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担任农民运动视察员。

10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会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下旬，毛泽东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12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12月13日至12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毛泽东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

1927年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月4日开始，毛泽东考察湘潭县、湘乡县、衡山县、醴陵县、长沙县，32天行700公里。提出依靠农民同盟军进行革命斗争之主张，揭露和批判陈独秀之右倾投降主义。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很快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万多字。毛泽东同时同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提议得到批准；于3月7日开课，学员来自17个省739人；每个学员发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

3月10日至3月17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在武汉召开之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3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4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土地委员会；4月4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左派193人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上。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参加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5月17日，夏斗寅驻宜昌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400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5月21日，许克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马日事变；6月3日，毛泽东任常委之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毛泽东要求湖南工农干部“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6月17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周恩来向来不轻易发火，和他大闹

一场；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任书记；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之新湖南省委。

第一次国共内战

1927年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之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等7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

8月18日起，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之湖南省委会议。

8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主力。

9月6日，毛泽东通知在铜鼓之第三团将参加起义部队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毛泽东看到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来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受到严重挫折；

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之长沙暴动。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认为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之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军强固设防之长沙，湖南省委原来之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

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之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当时需要极大勇气提出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毛泽东之主张，“议决退往湘南”。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

9月25日，向莲花县方向前进，因第三团团长苏先俊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国军袭击，人枪各失300；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后卫撤退而犠牲，年二十三岁；毛泽东十分痛惜，怒斥苏先俊指挥错误：“还我卢德铭！”行军艰苦，毛泽东脚被草鞋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谭希林回忆：“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9月28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称：“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9月29日晚，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之措施，决定三湾改编。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召开两天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秋收起义以来之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场所；要从政治和军事团结和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之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大批枪支；所以，12月28日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在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报告：“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

1928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1个团和1个营进攻万安，又以1个营进占宁冈东部新城；2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2月18日，经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1个营，俘虏近

300人，打破国军对井冈山第一次“进剿”。

3月初，中共湖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之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之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对毛泽东是极严重打击，但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担当师长职务；后驻军酃县中村时，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毛泽东“开除党籍”之误传，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

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之朱德、陈毅部队会合；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后与朱德、陈毅率领之一部分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

4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打破国军第二次“进剿”。

5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报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300支枪。

5月20日，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5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长杨如轩率领下第三次“进剿”井冈山，朱德、王尔琢击退；6月下旬，赣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五个团第四次“进

剿”，湘军吴尚部三个团配合，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击退。

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6月4日，中共中央回信，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11月才送到。

井冈山根据地割据区域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共50多万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称：“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7月中旬，湘赣两省国军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八月失败”。9月至10月，打破湘赣两省国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

11月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统辖边界和红四军军委，毛泽东为书记，与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组成。

11月7日，蒋介石任何键为湘赣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6个旅约3万兵力，1929年1月1日进攻井冈山。

从1928年开始，先后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之战略思想。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进军赣南。2月10日之大柏地战斗，后来陈毅于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3月，毛泽东、朱德在长汀整编红四军，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根据

中共六大决议，原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各纵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支队、大队只设党代表不设政治部。

4月13日，毛泽东《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6月，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称："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流寇思想和集权制领导原则之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中共中央指定之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7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经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多次讨论，陈毅执笔起草，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之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会议，是红军发展史上十分重要会议，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指示。

红军一部分人等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就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覆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国革命之发展前途。

闽、粤、赣三省14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次"会剿"；1月上旬，毛泽东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第十二师离闽回赣。

2月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二七会议"；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之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向前发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之重要原因。

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社会调查，整理成《寻乌调查》；并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全军团1万多人，党员4千人，枪7千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10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10月，毛泽东做兴国县调查，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

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1930年9月13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向株洲、醴陵转移。

10月14日毛泽东给党中央写信，说各级指导机关“多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整军中开展肃“AB团”半个多月，在4万红军中肃“AB团”4400余人，12月发生“富田事变”，肃“AB团”持续进行，从赣西南到全苏区，从1930年到1934年，据事后调查，苏区杀“AB团”达7万余人。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兼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此后毛泽东开始被称呼为“毛主席”。

1932年8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体会议，会议根据临时中央之决议和指示，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反对打赣州等是“纯粹防御路线”、“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合围开始之前，粉碎敌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

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连续粉碎国军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毛泽东为其成员。被补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长征及西安事变

但由于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

1935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结束，确立新中央领导。此后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国军围追堵截，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路线和政策。

1936年，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担任此职务直至逝世。

中国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认识论和辨证法。7月13日，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7月19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

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毛泽东很快表示欢迎：“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7月28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日，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不吃亏。”

据同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8月8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电：“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8月9日，在延安之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一次会，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一次重要会议，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会议召开，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报告。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11人，书记毛泽东，副书记朱德、周恩来。

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

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

洛川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全力指导八路军华北作战。

9月21日，毛泽东同意前方提出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之意见；

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时间和地形，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大捷。

9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周恩来在7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之《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之合法地位，称有必要团结救国，标志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9月25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来往电报分工：张闻天处理党的工作；毛泽东处理军事问题；王明处理统一战线，外出回到延安前由张闻天负责。

1937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东。11月29日，王明、康生和陈云同机到延安，毛泽东第一次会见王明。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上发言："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

12月17日，毛泽东致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电，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磨擦，团结对敌”。

12月24日，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

1938年1月，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间通宵达旦；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之意见强加于人。

2月23日，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电，主张国民政府应采取“攻势防御”方针，结合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但蒋介石没有采纳：“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

8月6日，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电：“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

9月至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

题》等讲话，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批判速胜论和悲观论两种错误思想。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通常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

1939年12月，合作写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卫参谋蒋泽民回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1940年2月22日，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并告朱德、彭德怀电：“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阎锡山，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经谈判协议：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共21条，在政权建设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

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根据九月会议之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之议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五项实施办法；毛泽东看到提案后非常重视，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本子上，用红笔圈起重要地方，并在旁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之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1942年号召开展全党范围之整风运动，统一思想、组织，从而为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基础。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

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3月3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谈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报告《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据8月2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正确轨道；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严重，向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9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王震第120师359旅开荒生产取得成就，兴奋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所以破坏整个宗派

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

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

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作报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之具体内容；毛泽东起草该意见书。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之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之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之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之地位和作用。

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之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手稿：“现时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

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称：《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日，毛泽东向大会做口头报告：“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

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建立起以毛泽东为核心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7月5日，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历史周期率问题，据黄炎培7月5日日记记载："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8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之形势和党之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的城市和交通要道。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下《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评论，提醒中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

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保，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8月28日下午，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代表周至柔，还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下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

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10月11日，毛泽东偕同张治中、王若飞回到延安。11月中旬，毛泽东病倒，得神经系统疾病，用毛泽东的话是"神经疲劳"。1946年开春毛泽东的病逐步好转，工作逐渐恢复。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之无条件停战之建议，同中国共产党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3月27日，又达成《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3月25日，毛泽东听任弼时说山西文水县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就义事迹，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3月29日、3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枣林沟召开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4月11日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之化名，示意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

7月21日至7月23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资格统一指挥。

10月上旬，毛泽东在神泉堡，修改审定《土地法大纲》，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重新修订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先是7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平共匪总动员令》；10月10日，毛泽东选定由新华社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立刻轰动国际。

10月下旬，经毛泽东自己调查研究，又听取任弼时报各区土改情况，毛泽东敏锐发现党内“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看重此问题，认为要坚决克服正在抬头“左”的倾向。

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习惯称为“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讲话：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与毛泽东商议后就实施许多重大战略决策；后来周恩来称：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3月21日，为直接掌握各战场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书记处几位书记书记能及时研定新时期重大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称：“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

谈话："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会议选出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席。9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著，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周恩来称用原来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最后拍板，歌词不改。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9月30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建国初期（1949-1966）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方针。下午3时，开国大典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谈话："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朝鲜战争及其后

1950年3月27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

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

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9月20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27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日内瓦会议及其后

1954年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之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之国际会议。

1954年10月19日至10月31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3次会谈。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开幕，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关于和平宣言之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之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5月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毛泽东曾察觉和思考中国经济构成过于单一：“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

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论十大关系》到八大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之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之汇报，实际听汇报时间为43天。2月16日，毛泽东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两天汇报，毛泽东首先提出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2月17日，毛泽东批评只讲多快、不讲好省之片面性：多快好省（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2月19日，毛泽东对中宣部2月1日报告苏联学者在中山大学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之论点看法不同，批语手稿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

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2月20日，毛泽东听建筑工业部汇报时说：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2月21日，毛泽东听城市建设总局和二机部汇报时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3月2日，毛泽东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时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3月4日，毛泽东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时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4月19日，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2月24日夜至2月25日

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之4个半小时秘密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犯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之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之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之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之错误态度等。

3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之汇报；3月1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之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破除了迷信；一是捅了漏子，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4月5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名义、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讨论，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

9月27日，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毛泽东建议，八大通过之党章

增加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多事之秋与整风反右

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10月21日，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当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由于情况紧急，讨论结束时毛泽东立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答复尤金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赴莫斯科。

11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汇报；11月2日和11月4日，毛泽东分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

1956年11月24日、11月25日、11月27日、11月29日和11月3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估计国际形势，分析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之问题写一篇文章，12月2日毛泽东提出文章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10月起还发生部分农民要求退社；对事件怎样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之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之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矛盾激化，引起毛泽东严重注意。

1957年1月18日至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

议，有人习惯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宣布，会议议题主要有3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28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写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讲话。在毛泽东的建议下，3月6日至3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邀请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占全部与会者五分之一。

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4月4日至4月6日，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插话：“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

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4月10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等谈话，对《人民日报》工作提出批评。

1957年，直到3月底，毛泽东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

4月3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写编者按手稿："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肯定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同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之整风运动。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党之工作之意见。5月14日及5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有关。

6月8日和6月10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4月24日至6月17日，毛泽东三次自修稿加征求意见十次稿，共十三稿，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7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之表现，特别点名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章罗同盟"；事实证明，批评并不能成立。

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全国右派骨干名单从4千人增加到8千人，北京从4百人扩大到8百人；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6万多人；到1958年整个运动结束时，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7月17日至7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之青岛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之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会议期间，毛泽东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归纳谈话要点写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7月26日至7月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之青岛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8月3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此文，改十一稿。

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10月9日，八届三中会会举行闭幕式，最后毛泽东讲话。

1958年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军运输护航，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全面炮击。

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

渡”之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全县范围之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毛泽东起草〈郑州会议纪要〉：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5日结束，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到会，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讲意见，然后讨论几次，结果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规定14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之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3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之合理性，并且作自我批评。会议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之“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之体制等等，决策一定程度上否定原先设想之“一大二公”之大公社。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集团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之宣传舆论工作。叛乱分子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措，还拖尸示众；3月12日，毛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

3月17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直到3月20日凌晨向驻藏部队武装进攻；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3月25

日，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12条问题要大家讨论。会议文件实际上是反映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之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八届六中全会之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脱离实际、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束缚生产力发展；三是整个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之集体所有制过渡之基础上。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4月5日召开，决定降低钢产指标；继续维持原来六中全会公布之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主要顾虑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4月5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共谈十几个问题：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当天毛泽东来到杭州，4月12日回北京。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4月18日至4月28日，北京举行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宪法之规定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6月20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6月26日，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已经没有祖宗牌位，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

庐山会议

从1959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之精神和实事求是之原则，如实指出“大跃进”中之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之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内容还是组织原则，都是正确；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之范围时，就会不可避免提出反右之问题；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问题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无助于弄清是非，必然伤害同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之困难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之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1月9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胡乔木起草之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三大纪律”：（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

七千人大会

1962年5月1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批发《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连同中央财经小组之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

好先阅指示，由田或林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

中苏、中印边境、台湾

从1962年初开始，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居民越境前往苏联，越境居民累计达到6万余人；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便利。根据毛泽东意见，4月30日周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明确指示；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事件。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参与事件之伊犁、塔城地区之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事件迅速平息。北戴河会议期间，8月3日，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方负责人谈话摘要：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1962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到7月，印度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防之间甚至侧后，冲突一触即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之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2月26日、3月22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改变中印边界是危险，“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到6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7月5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7月8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

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之真面目；二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之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之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方针是“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毛泽东又补充：“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10月17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猛烈炮击。同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日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20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自卫还击；10月20日至10月29日，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东段收复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之全部领土；西段清除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中方建议。11月14日至11月16日，印度又一次猛烈进攻中国军队；中国边防军自卫反击战第二阶段从11月16日至11月21日，东段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之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入侵阿克赛钦地区之全部印军据点。11月19日，毛泽东从当天《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1月18日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毛泽东当即在《参考资料》第五四〇六期上批示。毛泽东抓住契机，作出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下，主动全线停火并后撤；11月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之步骤，扭转中印边境之紧张。

4月间，中央军委注意到蒋介石有迹象派军犯境；5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成武、许世友向毛泽东汇报蒋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军事冒险之动向，并谈6月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讨论情况。6月24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毛泽东审阅定稿之新华社电稿，揭露蒋“反攻大陆”，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美国人连忙向蒋施加压

力，劝阻蒋放弃“反攻大陆”计划。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声明，不支持蒋进攻中国大陆。

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7月8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参加之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河南、山东之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之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形势；毛泽东表明反对包产到户，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之决定。

从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之报告，当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思想、理论、政策准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9月24日至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重要指导思想；以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思路之延伸和发展。毛泽东肯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技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从1960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大量成套设备；1963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之合同；随后，又从英、法、德、瑞典、意、瑞士、荷、比、奥等国进口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84项成套设备和技术。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之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冬和1963年

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之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之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对运动中提出之问题做调查研究。中央工作会议，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一个是对基础工业。

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之意见，并通过刘少奇起草之转发批示。

12月15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之一些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之分歧公开化。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中央工作会议又在1965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之一些做法。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之重要文件。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

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1965年，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恶化；为应付战争危险，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之《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0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之问题。

上海《文汇报》在11月10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在江青策划下写出、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几个小时汇报；12月8日至12月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发言，罗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之机会。

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成员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初

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这个汇报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1966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1月5日从杭州到这里之毛泽东汇报；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汇报提纲》。

从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提出所谓"黑线专政论"。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196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列席会议之吴冷西回忆道："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冷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3月31日，回到北京之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毛泽东几次谈话之内容，4月9日至4月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批评彭真，彭真和到会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4月14日送给在杭州之毛泽东。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4月20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4月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一开始就提出吴晗之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毛泽东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之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之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

文化大革命及晚年（1966-1976）

文革的开端及发展

1966年6月1日，在陈伯达率领之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之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

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之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信中内容：“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7月16日，毛泽东七十多岁在武汉畅游长江。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已离开半年多的北京，连续听取各方汇报。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讲话，承担派工作组一事之责任，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全体代表，表示肯定和支持。

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毛泽东通知林彪要到北京参加会议，林彪8月6日中途到会。全会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候补委员3人，选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依次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以后只把林彪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副主席职务。

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6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之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穿军装。

8月18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许多人流下眼泪，几万名红卫兵出席。红卫兵开始“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之“破四旧”活动，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都是正当之“革命行动”，但他们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

从8月20日起，在“破四旧”之旗帜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普遍发生强迫抄家和打人等践踏法制之行为，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之人员被打致死，更多被强行遣送回乡，同毛泽东初衷并不相符。

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8月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由于参加“大串连”之学生一律免费坐火车，他们之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发展得如火如荼；到11月下旬止，毛泽东共8次接见北京和到北京串连之红卫兵总共1,100多万人次。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一份应予保护之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

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之调子，并在1966年7月25日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到北京革

命师生大会上之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中共中央从10月9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出席，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15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晚上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吃饭，饭前毛泽东长篇讲话。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场更大之“全面阶级斗争”之风暴即将来临，重大决断只是由毛泽东个人来决定和宣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之稳定。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之《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自杀，有些机关瘫痪，此次到北京开会之干部，心情很紧张。

1月28日，《中央军委文件》发布，通常称为“军委八条”，遏制军队内部之混乱现象。1月27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其他有类似混乱情况之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

1967年3月13日，为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根据毛“三支两军”

（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具体步署，周恩来在军队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毛泽东首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2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批评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7次“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江青等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4月6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之《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命令》共有10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6月以后，各地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毛泽东7月14日凌晨乘专列离开北京，是自1966年7月18日后首次，当晚抵达武汉。

7月18日，毛泽东同陈再道、锺汉华等谈话，批评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做法。

7月20日，包括相当多军人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由军委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怀疑是否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事件被称为“七二〇事件”。

7月21日，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安排下，乘车去机场乘机到达上

海，是1958年以来第一次破例乘坐飞机。

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后之混乱，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晚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外交部造反派砸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之大权；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8月25日，周恩来单独约见杨成武，把“八七讲话”记录交给杨，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当天上午杨立刻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9月16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回北京。

12月18日，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1968年3月，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事前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表明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毛泽东对敌情作过分严重之估计，采取“大民主”之方式，大张旗鼓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布告；7月24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发出七·二四布告。

7月28日，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学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扩大之十二中全会，出席全会133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59人，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10人递补已去世之中央委员名额。在党之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

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0月18日提交之《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9年8月，毛泽东批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八·二八”命令》，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

1970年11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之指示，同时印发《我的一点意见》，“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1971年9月，林彪一伙终于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指令，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10日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9月12日抵达北京，回中南海休息。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去向；后来周恩来又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毛泽东很快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之118室。

9月24日，毛泽东决定对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隔离审查；以上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

尼克松访华、批林批孔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1年3月至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被称为“乒乓外交”。5月29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

6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800名新生，实现毛泽东的计划。

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10月26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

1972年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泽东称：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田中角荣一行应邀于9月访华，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9月29日，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前往江西南昌至2月5日，2月8日抵达杭州。2月27日，毛泽东指示对在押之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之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

4月5日，蒋介石逝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到华之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之关心。

5月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逝世、后事及文革结束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突然出现血压下降的凶险症状。当天入夜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医院看望毛泽东。在连续抢救四个多小时后，9月9日北京时间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撒手人寰，享年82岁，这已经是当年的第三位国家重要领导人逝世（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人担任了其治丧委员会的成员。9月11日起，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毛举行了长达6日的吊唁活动。9月18日下午，其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共计约有数十万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民众参与了此追悼大会。此外，联合国总部和其安理会也在毛泽东逝世后以不同形式对其致哀，包括美国时任总统福特在内的多国政要也通过声明、唁电等形式表达哀悼之意。但由于中苏交恶，苏联方面反应冷淡。

中共中央于毛泽东逝世当天即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其遗体被放置保存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至今，供人参观与瞻仰。

由于毛、朱、周三位重要领导人接连逝世，致使中央权力出现了一定的真空，因而政治局面顿时变得异常复杂，这也促使北京权力中心的各方加快了相关的计划与行动。在毛泽东逝世将近一个月后，1976年10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连同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高层元老采取果断措施，将密谋篡党夺权的江青等“四人帮”成员予以控制并隔离审查，一举结束了已进行十年有余的“文化大革命”，史称“粉碎四人帮”。事后，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正式成为了新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著作

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的著作。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

文学、史学及书法造诣

毛泽东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是一位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国内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细批注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进而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与《矛盾论》，并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晚年尤其青睐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二十四史，重点史册或篇章还多遍阅读。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

家庭

祖父母

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之庄稼人，因家道窘迫，把祖传一些田产典当给人；只有一个儿子，毛恩普去世时毛泽东10岁。

祖母刘氏。

父母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当几年兵，长见识，积累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收80担稻谷；毛顺生集中精力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滚到两三千元，自制"毛义顺堂"流通纸票，在韶山冲算是财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父亲）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母亲文素勤，在同族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七妹18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5男2女，四个夭折，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文素勤一生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时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者；平时虔诚烧香拜佛。

兄弟姐妹

胞弟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

婚姻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罗一秀：由父母作主，1907年至1908年间娶罗氏为妻；1910年春因痢疾而不幸病逝。毛泽东14岁那年，毛顺生给毛泽东包办娶18岁媳妇罗氏；毛泽东始终不承认婚事，从未和她同居；父亲无可奈何，只能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毛贻昌对毛泽东的反抗并无办法。

杨开慧：生于1901年11月6日，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1918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毛泽东经常往来于杨昌济先生家里，和杨开慧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1920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1924年6月初，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五八三弄），杨开慧除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等，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1925年冬，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由湖南来到广州，同毛泽东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和编辑《政治周报》。1927年8月，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领导机构；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毛泽东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成为他们最后离别。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下于1930年10月将杨开慧逮捕。1930年国民党当局杀害杨开慧，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毛岸英等三兄弟到上海。

贺子珍：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的妹妹。毛泽东三次到永新县西乡塘边村，先后住40多天；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1928年6月结婚。1937年10月，因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交往过密，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

江青：1938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之江青结婚；此婚姻上之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之生活，特别是毛泽东之晚年带来极大之不幸。江青在文革时期是中央文革小组及四人帮的首领；1976年秋毛泽东逝世后在怀仁堂事变中被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逮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3日自尽。

子女

杨开慧/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在长沙清水塘出生，一说生于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1936年，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学习。1945年12月初，毛岸英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在朝鲜战争中，1950年11月25日，联合国军轰炸机向志愿军司令部投下几十个凝固汽油弹，毛岸英阵亡。

杨开慧/次子毛岸青：1923年11月13日出生在长沙东乡板仓杨开慧家，一说生于长沙清水塘。患有精神疾病，2007年逝世。

杨开慧三子毛岸龙：1927年4月4日在武昌出生。1931年，毛岸龙患病死。

贺子珍/长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没过半个月被送给当地杨姓乡人抚养，改名杨月花。

贺子珍/四子毛岸红：小名毛毛，生于1932年，长征开始后交给毛泽覃，后下落不明。

贺子珍/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

贺子珍/次女：生于1935年，长征途中，送给当地乡人抚养，下落不明。

贺子珍/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

贺子珍/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苏联莫斯科，十个月时夭折。

江青/四女李讷：生于1940年，出生于延安中央医院，随母姓（江青原名李云鹤）。26岁担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副军级），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景清（李讷丈夫）：云南某军分区参谋长。

孙辈

长女杨月花有6位子女，都在龙岩市工作，属工薪阶层。

毛新宇：毛岸青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少将军衔。

孔继宁：孔令华和李敏的儿子，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卫视主持人。

孔东梅：孔令华和李敏的女儿，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丈夫陈东升，泰康人寿、嘉德国际和宅急送公司老板。

王效芝：1972年生于江西，李讷的儿子，现下海经商。

曾孙辈

毛东东（2003年－）：毛新宇之子

毛甜懿（2008年－）：毛新宇之女

孔冬梅子女三名，与陈东升所生，名称不详。

亲属

毛远新，亲侄子，26岁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毛远志，亲侄女，原中央组织部局级干部

毛楚雄，亲侄子

贺麓成，亲侄子，国防科工委副军级干部

王海容，表侄孙女，外交部副部长

毛远耀，堂侄，原长沙市副市长、衡阳市委书记

王曼恬，表侄女，文革期间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王季范，姨表兄，曾帮助毛泽东的学业

王德恒，表侄

杨展，内侄女

杨开明，前妻杨开慧的堂兄

向钧，表弟

罗石泉，堂舅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81%A9%E6%9D%A5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乳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重要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和外交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的主要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在建国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等要职。

周恩来出生于清朝末年，早年在家中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在其亲生母亲万氏与养母陈氏都不幸因病早逝后，随其伯父离开江苏故居，北上东北地区的铁岭、沈阳等地求学。1913年，赴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堂（今南开中学）就读，后于南开大学肄业。早年曾短期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并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少年共产党骨干。1924年回国后，担任

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并指挥长征。在西安事变中，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签订合约，共同对日军作战。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负责国共双方军事与政治调停。日本投降后，陪同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前往重庆，与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于重庆谈判。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代表中共参与北平和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直至1976年1月逝世。1949年至1958年期间，曾兼任外交部部长。此外，他也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职，并主持了中国的"一五计划"和"两弹一星"工程。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对周恩来的官方评价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厉行节俭，严于律己和关爱群众，所以在社会上至今声望高企，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官方和民间提及其人时往往敬称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周恩来有同胞兄弟两人，名为周恩溥与周恩寿。夫人邓颖超，于1925年在广州结婚。两人没有亲生子女，收养了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内的数名烈士遗孤。

生平

早年岁月（1898-1919）

童年时期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农历二月十三（公元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城内驸马巷的周家宅邸中。其家族祖籍为浙江绍兴，祖父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后改名起魁），在清咸丰年间跟随其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外祖父万青选曾先后三次出任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知县长达十年之久，官至淮安知府。

周恩来的生父名周劭纲，生母名万冬儿。其出生后不久，即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后由守寡嗣母陈氏抚养长大。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命途多舛，其出生之际，家族已然濒临败落，年幼的周恩来曾随家人多次迁徙住所。因生母与养母重视教育，故幼年的周恩来在读书、习字等学业上颇有成绩。然而不幸的是，生母万氏因肺病于1907年夏天病逝，过继给的继母陈氏也于不久后早逝。两位母亲的接连病故，加之父亲又常年在外谋生，促使刚满10岁的周恩来操持起照顾年幼弟弟等的艰难家事，这也催生了其早熟独立的性格与不俗的办事能力。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离开江苏，赴中国东北地区，在铁岭银冈书院学习，自此周恩来再未回过家乡淮安。半年后，转入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中学时期

1913年7月毕业，8月16日入天津南开学校，因表现优异而为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器之为“宰相之才”，后一语成谶。学校特免了其学杂费，这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名额。青年周恩来相貌英俊潇洒，在南开曾反串表演，相识了妻子和革命伴侣邓颖超。

南开大学及被捕、留学

1917年至1919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修读日语一年后，曾应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第一高等学校，但皆未录取。1919年4月，得悉南开学校即将

创立大学部，周恩来决定返回中国到母校南开继续深造。临行前，他将《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给南开同学张鸿诰。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领导核心。

1919年9月8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大学部注册进入文科学习，学号为62号，其后大学部正式改名南开大学。1919年9月16日组织成立觉悟社。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用笔名“伍豪”在报刊上发表时评文章。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四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当局拘捕。校方在直隶省教育厅压力下，开除包括周恩来在内被捕学生学籍。为此，南开校父严范孙特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深造。

1920年11月7日，周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柏林大学考察学习。

期间，1921年1月，周恩来曾准备投考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他在法国巴黎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后又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继续学习法文，还在雷诺汽车厂做过工；1922年周恩来从巴黎来柏林，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告别了求学生涯。在巴黎结识也是勤工俭学的邓小平，并与赵世炎介绍他加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终生好友及革命伙伴。

投身革命（1919-1927）

在旅欧的岁月中，年轻的周恩来就表现出卓越的政治领导天赋和强烈的政治倾向。1921年3月，他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一说是吴明）共5人一起建立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虽然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无代表参加当年7月的中共一大，但仍被认为是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签署《孙

文越飞联合宣言》，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不能赤化国民党。

1923年6月周恩来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执行部部长王京岐）。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容共”的政策，接受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这项主张后来被共产党宣传成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及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

由张申府推荐，周恩来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与蒋介石等一起组织领导了第一、二次东征，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第一次国共战争（1927-1936）

第一次国共内战初期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同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来与张国焘、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4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11月返回上海，此后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

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组织成立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特科三科（俗称“红队”、“打狗队”）负责暗杀活动，也被称为“伍豪之剑”。

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兼三科科长顾顺章变节供出了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后，顾家九人被特科暗杀，即“爱棠村事件”。

1929年，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中共领导人被白鑫供出并遭国民党杀害，周恩来、陈赓等人亦设法暗杀白鑫。

1930年3月，离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把持中央，周恩来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爱棠村事件后，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周恩来主持，史称宁都会议，矛头主要针对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局领导以临时中央的行动方针为依据，批判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前方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的建议。最后经周恩来折冲，通过留毛泽东在前方辅助周恩来指挥的决议。但毛执意离开前方，答

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大胜。周恩来在1972年遭斗争时曾反复检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同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也从上海到达瑞金，任军事顾问。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遂完全依靠李德进行军事指挥，由于军事战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困境，中共中央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统筹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史称“老三人团”。

长征和遵义会议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目前官方说法是，“三人团”受到王明“左倾”路线影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批评，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过半，周恩来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为由朱德、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但不久周恩来即罹患重病，毛泽东遂逐渐取代周恩来负责指挥。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接任。

9月，在南下与北上问题上红军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省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长征期间，周恩来在毛儿盖附近突患阿米巴痢疾，病情危急。警卫员从远处雪山上取冰冷却，并服用特效药，最终得以康复。在1975年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时，提到这次病说“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

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抗日战争（1937-1945）

抗战期间，周恩来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担当国共之间的党务交涉工作。周恩来同时主持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宣传中共主张。

1938年，周恩来同王明在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作为与教条主义相唱和的经验主义代表遭到批判。

1939年7月，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一起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途中江青所骑骡子在过小沟时惊吓了周恩来的坐骑，周摔下后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在这之后，周恩来落下右臂无法伸

直的残疾。事后蒋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疗（接到乌鲁木齐后由苏联方面接到莫斯科）。在苏联期间，周恩来除了向苏联与共产国际方面汇报工作外，也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些资助。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对国民党军队的做法表示抗议。同年，中条山战役国军失败后，重庆《大公报》指责中共军队在山西招兵买马，游而不击，周恩来撰文谴责，后《大公报》将此文章一并发表。

1943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毛泽东、刘少奇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此段时间，因周恩来曾与王明共事，而被毛泽东、刘少奇等定为"经验宗派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受严厉批判斗争，周被迫承认"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泽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1944年1月毛泽东连续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其与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1945年4月-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8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席。

国共第二次内战（1945-1949）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国共双方关系缓和，周恩来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重庆谈判直接达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此后，周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美国方面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委员会"，下辖"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目的是禁止国共

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以及谈判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协议。

1946年11月，由于在军队国家化和新政府组成等问题中双方意见分歧无法调和，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一度攻占延安，周恩来则跟随毛泽东在陕北转战。1948年11月，中共部队展开战略反攻，周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和毛泽东一同领导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了20天的和平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1949-196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之一。

10月21日，政务院成立，周恩来在第一次扩大政务会议宣布政务院任务："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12月22日和12月23日，周恩来对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代表讲话，谈及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1950年5月19日，中央军队整编复员委员会成立，主任周恩来，副主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6月2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我现

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

7月25日，周恩来作《妥善救济失业教师、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

后于1954年出任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全面负责政府工作，同时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

1949-1952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担负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国家建设与反冒进

建国初期建设

1949年至1952年间，周恩来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周恩来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主持制订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高饶事件

建国初期，毛泽东仿效苏联设立了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将原属政务院的主管经济部门调走，周恩来被架空，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而高岗乘机夺位，刘高矛盾也恶化。于是周恩来和刘少奇联手，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于七届四中全会上批斗高岗，使之下台。

反冒进

1955年，在经济好转的形势下，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开始倾向于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现状的过高指标。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其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却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并表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周恩来被迫作检讨。

1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并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5月15日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被迫再次进行检讨，大会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

会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和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但在此前后周恩来被免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

长、外交部长等兼职，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大跃进中的问题。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会议各小组讨论。23日，毛泽东发言，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座谈会，介绍庐山会议的情况，提醒到会人员划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的界线。8月2日，出席在庐山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七千人大会前后

1960年至1964年，为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0年8至9月间，他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

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召开（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1962年4月，被中断3年之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作《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讲话，200多名委员发言，提出400多件提案。

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派遣人员在海外持续购入黄金，以控制物价。

他在任期间，还支持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主持兴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且是中央专委主任，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工程的总策划与总指挥。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都给予特殊的关注。

1964年，周恩来亲自导演了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将剧目中南昌起义一节更换为秋收起义。10月1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演员，祝贺演出成功和原子弹爆炸成功。同一年，周恩来亲自指导修改了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把歌曲推向全国。

外交突破

1949年至1958年间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参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1949年10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中苏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来同毛泽东先后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进行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就旅顺口、长春铁路、经济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工作。

1953年12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

1955年，周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包租飞机）上安装炸药，

机上11名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事先改变行程，幸免于难。不过周恩来仍然坚持赴会，并在会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最终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

1955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建交。此外早期和美国的接洽也在暗处进行，为了召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周恩来利用外交手段，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并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换回钱学森等人。

1964年，周恩来会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上海达成协议。当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公报，中法建交。同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到达当日，几内亚为此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当地居民几乎倾城夹道欢迎。总统杜尔亲自驾车拜访。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64年11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试图修复中苏关系。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对贺龙说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议，并率领代表团离开当日晚宴。

文化大革命前期、中期（1966-1972）

文革前期

1966年2月1日，主持召开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付灾害、振兴农业的对策和措施。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主持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9日，赴震中灾区慰问。22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地震。4月1日，再赴震中灾区慰问。

参与文革

1966年学生串联期间，周恩来也参与了工作组。1966年8月1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3日，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积极维护文化大革命。

12日，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新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亲自劝说并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并首先称呼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18日，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周恩来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23日，国务院拟定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在次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被否定。30日，得知章士钊家被红卫兵所抄的情况，将其秘密转送到三〇一医院保护，同时，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31日，国务院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门对党和国家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次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不发。

9月2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在次日的讨论会上被否定。10月9日-28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集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它中央负责人，把冲中南海的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阻这样的行动。2月11日-16日，二月抗争后，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

武汉事件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飞赴武汉找军区干部谈话，稳定局势。21日，安排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到上海。22日，为稳定武汉局面，约陈再道、钟双华、傅传作、刘丰、牛怀龙等十二位同志来京商讨。对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一般认为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利用各种渠道从不同的方面减少动乱带来的影响[25]，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并保护了大批老干部，但也有记载相左的其他文献，包括陈再道案和孙维世案，但史学界争论不一。对于周恩来与刘少奇专案组的关系，杨成武则认为周实际上担任中央专案组负责人和领导者，并针对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主持专案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古迹文物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浩劫，周恩来不断设法予以保护，从而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为中华文化存续做出重大贡献，其中著名的实例有派军队进驻保护杭州灵隐寺、北京故宫、莫高窟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

伍豪事件

1967年，天津的学生查阅1932年的旧报时，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即1932年2月，国民党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随即将报纸抄件送给中央文革小组。5月18日，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谈。”

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

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再次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毛泽东一开始沉默不语，后亲自批示这是污蔑。

中苏冲突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爆发。4日，要求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划一道线。21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开会，针对苏联军队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进行商定。之后，从莫斯科传出消息，说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战略基地、原子基地。

中共九大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位列第四。周恩来在会上发言高度赞扬林彪，称赞“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周在毛泽东、林彪不赞成情况下，带头积极支持江青、叶群进入中央政治局。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以及林彪集团成员与张春桥之间激烈冲突，引起毛泽东反击。周与康生跟随毛批判陈伯达和吴法宪。

10月17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周恩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

林彪事件

1971年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面政治斗争，并将斗争引向林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先后主持华

北会议及军委座谈会，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进行批判。在毛泽东、林裂痕越来越大时，周恩来奔走中间缓和关系，提议林彪主动找毛泽东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仅周恩来知情，以保密电话随时联系毛泽东。

9月12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当日夜，林彪出逃，周恩来全程主持了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并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黄、吴、李、邱。由于林彪之死，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二号领导人，仅次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外交进展

尽管国内政治混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仍有成效。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达成一致，由中国方面派遣人员技术及材料，援建坦赞铁路。

乒乓外交

1971年4月7日，对外宣布正式邀请在日参赛的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访华。14日，正式接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华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21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5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并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7月9日-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先后举行六次会谈，最后商定尼克松于1975年5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

10月20日-26日，美国总统特使亨利·基辛格第二次秘访北京，并与周恩来就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26日，双方就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中美关系改善。

重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否决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提案。

中美破冰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应邀来华访问。中午，到达北京。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

22日-25日，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26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和上海访问。28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中日建交

1972年7月6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9月23日，同郭沫若等会见并宴请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席间对客人们说：我国有一句老话，叫作"饮水不忘掘井人"。中国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复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够恢复，这是由于松

村先生、高奇先生、石桥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难，做出巨大努力的结果。你们也做出了努力啊！

25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上午抵达北京。下午，周恩来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29日，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恢复正常。

纠左失败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组织进行批判极左思潮，对国民经济、对外经贸、科教文卫、民族统战等方面进行整顿。1972年9月30日，“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但均被姚文元删去。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精神所写《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张春桥、姚文元随即指使人撰写批驳文章，对周文进行围攻。

14日，根据周恩来八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一组批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为此，江青、姚文元组织批判会和批驳文章。周恩来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左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说：“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1973年，国民经济局势得到明显好转。但毛泽东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政策，周恩来的批左进程被迫中断。

晚年（文化大革命后期）、逝世及相关纪念（1972-1976）

身患癌症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1973年2月，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这时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

扎。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党内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领导人。同年，毛泽东以外交工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名义，发动对周恩来批判，组成“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

1973年10月，周恩来采纳了时任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著名国际法学家厉声教就领海宽度问题的重要建言，使得中国坚持了12海里而非200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并最终于1982年以既定12海里领海宽度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1982年最终通过了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成为主要签字国家之一，周恩来、厉声教等人的努力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维护国家主权，争取中国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以及对该公约的产生和顺利通过都作出了贡献。

批周会议

1973年11月，毛泽东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的右倾错误，江青、姚文元上纲上线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毛泽东对此批评道“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迫不及待”的是江青，而非周恩来。为避免不必要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1974年5月，癌细胞扩散，6月开始，周恩来被迫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直到病逝，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术；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批林批孔批周公

这一年，毛与江青等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党内“大儒”，后来直接点名“批周公”。

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2月，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亲自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其后他再度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身体已经极其虚弱。国务院工作移交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处理。其后，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范围整顿。周恩来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使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增长趋势。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后始办追悼会，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仪式。

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代表团，当时周恩来已经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10月7日，周恩来还不忘提醒杨度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在邓小平探望时，告诫邓须再三忍耐。

1975年冬，评《水浒》运动发动，将《水浒传》人物宋江作为反面教材，影射党内投降派。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手术室进行癌症手术之前疾呼“我不是投降派！”，并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邓小平接任总理，未获回应。

1976年1月7日，在弥留之际，周恩来临终遗言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逝世及出殡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因膀胱癌医治无效，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〇五医院逝世，享年78岁。从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去世为止，他一共进行了13次手术，身心和工作都备受折磨。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会场庄严肃穆，极尽悲伤。遵其遗嘱，周的遗体被火化且没有保留骨灰。其骨灰分别在高空被撒到了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渤海黄河入海口等地。出殡当日，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百万首都群众聚集在长安街道路两边，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中国大陆各地举行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仅仅几天时间，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群众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

后续事件及相关纪念

1976年4月5日，时值清明节。为纪念周恩来，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直接导致邓小平第三次下台。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集会并称“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同年10月7日，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粉碎“四人帮”，兵不血刃，结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由于周恩来声望高企，每逢相关节点其纪念活动一直在民间及政界进行。2018年3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周恩来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给予其高度评价，称“周恩来”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家族与私人生活

个人生活

周恩来在留法期间，曾有过女友张若名，后因志向不同最终分手，此后双方仍以朋友相处。1923年，周恩来寄给邓颖超一张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背面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此事后两人确定恋爱关系。1925年8月8日，两人在广州结婚，婚姻持续50年。周邓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因邓颖超革命任务在身而被邓自行堕胎，此举令周恩来大怒，故怀第二个孩子时悉心照料，将近生产时已近9斤。然而，在生产之时因体积过大造成难产，助产医生使用的产钳也损伤了胎儿的头部，再次造成了胎儿的夭折。加之邓颖超未及休息即为逃避国民党追捕而从广州一路奔波至上海，产后子宫没有收缩，对身体损伤很大，导致无法再怀孕，因此两人一直没有子嗣。此后他们帮助抚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其中包括孙维世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被视为经典，彼此总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悲喜同担。双方因为事务繁忙经常无法相聚，故邓只能以书写情书远距表达对周之感情。周恩来逝世后整理遗产，周恩来夫妇总共积蓄为5100元。其存款主要开支是资助亲戚朋友，剩余则交党费。

周恩来生性好酒，酒量不错，但也有几次醉倒的时候。首次是与邓颖超新婚之夜；第二次是在莫斯科，与苏联交涉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事宜前，和苏联领导人酒宴后酒醉，事后周恩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检讨，毛泽东原谅并调侃道应该“和对方比吃辣椒”；第三次是招待宴请参加朝鲜战争归来的将士，醉酒后写检讨，并被毛泽东批评。

周恩来在廉政方面对自己和家人要求甚严，在位时坚决不允许其亲属以其名义享受特权或优待，也坚决不收受任何礼品贿赂，如果推脱不下也一定付钱，算作购买。夫人邓颖超在其周恩来任总理的二十余年间也未担任过任何公职，其亲属与亲属的子女、家眷多自立谋生。周恩来也一直拒绝任

何单位、亲戚（包括其亲弟）与个人修缮其江苏淮安家乡的故居，并下令将自己家族的祖坟全部推平，棺木就地深埋，以腾出耕地发展生产。周恩来童年离开淮安求学后，再未回乡，部分原因是工作忙碌所致，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周不喜衣锦还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社会的陋习，忌惮回乡后自己和当地的亲戚族人享受政府的各类特殊对待。周恩来逝世后，除了与邓颖超夫妻二人的存款外，几无任何遗产，周亦没有保存自己的骨灰，要求火葬后立即抛洒，不设坟墓吊唁。留下的存款也多做捐助等用途。

家族

周恩来与鲁迅（本名周树人）同为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后人。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宜在《周恩来始祖迁浙新考》中披露，周恩来的始祖周茂曾任元代中书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谥忠宪。"而《周氏破塘祖茔祭簿》也有"一代元泊府君，讳茂，字元泊。由进士官至左丞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配司马氏，继施氏，俱一品夫人"等内容。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据家谱记载，先祖是宋朝学者周敦颐，与鲁迅（即周树人）同宗。也有观点认为周恩来直系男性祖先周茂就是元朝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孙子伯颜察儿。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一共有亲生兄弟三人，即周恩来称呼的四伯父周贻赓、嗣父周贻淦和八伯父周贻奎。周贻赓与周贻淦均无后，故周恩来出生后不久便过继给周贻淦做儿子，周贻淦的妻子陈氏也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养母。周贻奎与妻子杨氏育有一子周恩硕，在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相继过世后，杨氏便成为了周恩来的监护人，直至周恩来离开江苏北上求学。此外，周恩来幼年还曾有过一位雇来的乳母蒋江氏与其感情较好。

二弟：周恩溥（1899—1945），妻子王兰芳，育有一子：

儿子：周荣庆，基层工人，在河南焦作工作、生活。

三弟：周恩寿（1904-1985），妻子王士琴，共育有六名子女：

长女：周秉德，曾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丈夫是沈钧儒之孙、原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副院长沈人骅。

长子：周秉钧，曾任广州空军飞行员、师副政委、广空司令部参谋长助理，转业后任广州市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

次女：周秉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退休教授。

次子：周秉华，曾任北京新闻出版局处长。

三子：周秉和，从事私营经济行业。

三女：周秉建，曾任锡林浩特市副市长。

堂弟：周恩硕（1902-1943），妻子陶华，共育有两名子女：

长子：周尔辉，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次子：周尔萃，为空军飞行员。

评价

钱其琛评价："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轶闻

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午宴时，每人面前摆放一盒"熊猫"牌香烟，尼克松夫人帕特对此赞不绝口。周恩来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帕特疑惑道："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

此后，中国的一对雌雄大熊猫被送到美国国家动物园，成为了中美两国友好标志。

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国语学院文革红卫兵组成“揪陈大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门口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扬言要捉外交部长陈毅。周恩来与红卫兵对峙，并说道“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十万群众批判陈毅等二月逆流大会上，周恩来高度赞扬江青，称赞“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最后喊出“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的口号。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门前的联合国会旗降半旗。有称这是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为政府首脑降半旗。实际上，联合国只是遵循1947年制定的旗典中关于致哀规定：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

纪念

故居及纪念馆

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周恩来纪念馆、驸马巷周恩来故居

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漕运西路周恩来少年读书处（万公馆，外祖父家）

江苏宝应县：周恩来少年读书处

江苏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

北京：西花厅周恩来故居，毛泽东纪念堂的周恩来厅

浙江绍兴市：周恩来祖居馆

江西庐山牯岭周恩来纪念

辽宁沈阳：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辽宁铁岭：铁岭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陕西延安：周恩来枣园故居

广东汕头：周恩来汕头东征军纪念馆

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周恩来故居

纪念雕像和纪念碑

南开大学马蹄湖湖心岛落成的周恩来同志纪念碑

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汉白玉塑像（八里台校区）、南开大学周恩来铜像（津南校区）、南开中学周恩来雕像、南开大学"我是爱南开的"纪念碑、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汉白玉雕像、翔宇公园周恩来雕像

广东潮州：西湖公园周恩来铜像

新疆石河子市：周恩来总理纪念碑

日本京都：周恩来诗碑，位于日本京都西北岚山山麓的龟山公园

相关文艺影视作品

1979年，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1981年，电影《南昌起义》，孔祥玉饰演周恩来。

1983年，电视剧《周总理的一天》，柴云清饰演周恩来。

1990年，纪录片《周恩来》

1989年，电影《开国大典》，黄凯饰演周恩来。

1991年，故事片《周恩来》，王铁成饰演周恩来。

1992年，电影《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辽沈战役》，苏林饰演周恩来。

1998年，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

1998年，大型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

2000年，电影《1939·恩来回故里》，六小龄童饰演周恩来。

2001年，电视连续剧《长征》，刘劲饰演周恩来。

2008年，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重庆》，刘劲饰演周恩来。

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刘劲饰演周恩来。

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陈坤饰演周恩来。

2011年，电视剧《开天辟地》，靳东饰演周恩来。

2012年，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朱亚文饰演周恩来。

2013年，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孙维民饰演周恩来。

2014年，电视连续剧《领袖》，郭广平饰演周恩来。

2016年，电视连续剧《海棠依旧》，孙维民饰演周恩来。

2017年，电影《建军大业》，朱亚文饰演周恩来。

未播映，电视连续剧《人民总理周恩来》，刘劲饰演周恩来。

歌曲：《大江歌罢掉头东》，周恩来诗作，傅庚辰作曲。

货币与邮票

货币：

第四套人民币中最大面额的100元正面为四位中国开国元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3月发行《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流通纪念币和金银纪念币。

邮票：

1977年1月8日，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中国发行《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邮票

1996年1月8日，纪念周恩来逝世二十周年，中国发行《周恩来故里》特种邮资明信片，全套4枚。

1998年3月，中国发行《周恩来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4枚。

1994年，朝鲜发行《纪念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全套包括4枚邮票、2枚小全张和1枚小型张。

古巴、利比里亚、纳米比亚、坦桑尼亚等国也发行关于周恩来的纪念邮票。

机车命名

1976年10月30日，在庆祝“毛泽东号”机车命名30周年大会上，在北京的参加全国铁路100多个机务段学习“毛泽东号”模范机车组活动的司机们，出于

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思和敬仰，请求铁道部命名一台“周恩来号”机车。铁道部随即就向国务院请示在上海铁路局内命名一台“周恩来号”机车。1978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报告。1978年1月5日，东风3型0058号内燃机车被正式命名为“周恩来号”机车，配属上海铁路局上海机务段。

1984年“周恩来号”机车由东风3型0058号内燃机车更换为东风4B型2106号内燃机车，被人们称之为第二代“周恩来号”机车；1997年，全国铁路再次全面大提速后，由东风4B型内燃机车更换为东风11型内燃机车，被人们称之为第三代“周恩来号”机车。第三代“周恩来号”机车号为“东风11-1898”，其1898年正是周恩来的出生年份。

2015年5月4日，“周恩来号”机车进行第四次换型，此次换型使用的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公司自主研制的和谐1D型1898号电力机车，并担任T7606/7607、T7608/7605次列车上海至南京段的牵引任务，T7606/7607、T7608/7605次列车停运后，担任K1558/1555、K1556/1557次列车上海至南京段的牵引任务，将来有望延伸到周恩来的故乡淮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由启蒙老师在法国留学时改名邓希贤，1927年正式改名为邓小平，男，四川广安人，中国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革命家及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8年至1989年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将邓

小平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核心。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牌坊村，祖籍江西吉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经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介绍和影响下加入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三落三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出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后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参与了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斗争，1957年还参与了反右运动并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中共党内仅次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其子邓朴方因批斗而半身瘫痪，他本人也被软禁在江西。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死后，邓小平于1973年第二次复出政坛，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周恩来工作。而后因其整顿文革混乱引发毛泽东和“四人帮”不满，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撤销所有职务，保留党籍；毛泽东死后，于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第三次复出政坛，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领导地位，取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恢复全国高考、主导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领导中越战争、推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直至习近平2018年修宪后被改回、倡导计划生育、推行义务教育，提出一国两制，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2年主持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八二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和现行的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和思想。1985年，他主导了解放军的百万大裁军；1986年，他启动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并试图再度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但最终因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而失败，邓小平也于同年11月辞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重新提速。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邓小平一生未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普遍认为他是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中国共产党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称以其部分政治理念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为“邓小平理论”，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具体包括“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邓小平的政策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推动的改革还缔造了“中国硅谷”深圳。他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乔治·布什、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马来西亚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马哈迪·莫哈末等人也对他有高度的评价；却也因为未能彻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受到争议，后者被有些人认为是其晚年的污点。

生平

早年经历

家族背景

邓氏亲族邓时敏曾任担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邓时敏雍正十年中举，乾隆元年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以编修，后升为侍讲，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嘉庆年间朝廷为褒奖他和郑人庆，在村中敕建两块神道碑和一座牌坊，“牌坊村”因此而名。“邓家老院子”在广安县城北面约7公里处，是农家三合院，坐东朝西，为木穿斗结构。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广安州望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

庭，是长子，是父亲邓绍昌与第二任妻子淡氏所生。

少年时期

1909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不久，邓小平被送到本村私塾发蒙念书，当地人称“翰林院子”，是邓时敏修建。六岁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之私塾。私塾先生邓绍明对同辈邓绍昌说，孩子名叫“先圣”对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张将“先圣”改为“希贤”，邓绍昌认可。邓小平毛笔字作业常被先生画大红圈圈，常得到母亲奖励煮鸡蛋。邓小平在私塾念一年多后，邓绍昌决定把邓小平送到在协兴场开办之初等小学读书，离邓家大约2公里，由当地曾留学日本之革命党人胡光白和邓绍昌等创办起来，属于新式学堂。邓小平懂得孝敬大人，在家里经常帮母亲干家务和照看弟妹，时常背诵诗文给姐姐弟妹听。1915年下半年，邓小平考入县立高等小学。

1918年高级小学毕业。1918年夏，邓小平考入位于县城西秀屏山下之广安县立中学。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口号很快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流传；随后社会上出现“工学会”和“工读互助团”等团体，主张亦工亦学、亦工亦读，工读结合、学问和生计结合，消灭劳心与劳力之差别，改造中国和世界；“工读主义”思潮带有空想和改良主义，推动不少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五四运动后，邓小平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活动，他当时只有“工业救国”思想，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6月以后，由于学校已罢课，加之暑假即将来到，邓小平决定离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课；邓小平回到家里不久，邓绍昌从重庆捎回口信，使邓小平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9月，邓小平和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同学胡明德（又名胡伦）同行。邓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邓小平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学校共招收学生110人，分为初级

班和高级班，学制均为一年。邓小平后来称，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学校，不容易考进去。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83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37人为自费生，邓小平是其中一位。1994年5月邓垦称，这时邓家境已“日渐困难”，“到法国的路费百多元的筹集，都不容易”。

8月27日，邓小平等83名学生登上“吉庆”号客轮，8月28日启航沿长江东下，9月6日到达上海暂住“名利”大旅社。9月10日，邓小平等80多名重庆学生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9月11日起锚。10月19日，抵达法国马赛。

1964年2月16、17日，邓小平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谈话：“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邓小平愿意去法国，认为自己能够谋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勤工俭学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历时39天航行后，邓小平和同学们乘汽车前往巴黎。在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下，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小城巴约（又译“巴耶”）的巴约男子中学就读。10月21日晚，邓小平等24名学生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巴约，进入巴约中学学习，邓小平的学号是1421。巴约中学没有设立“附属高级初等学校”，校长把20多名中国学生安排在学校商务系学习，单独开班。

到1921年3月，邓小平身上钱所剩无几；学费成问题，而做工也不容易。一战后，在法国大面积失业，法郎大幅贬值。状况严重影响中国勤工俭学生学习和生活，而华法教育会“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

2月28日，400多名学生在蔡和森等人组织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法国政府提出和中国驻法公使代表联合组成“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决定暂时给无工无学之学生每日6法郎生活维持费。

3月13日，邓小平和18位勤工俭学之同胞离开巴约中学。他们欠下学费由法中救济委员会代付。邓小平离开巴约中学，结束法国“俭学”生活。

经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小平到勒克勒佐（又译“克鲁梭”），4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邓小平与叔父到处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小平只有16岁，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连饭都吃不饱。刚进厂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热轧的钢材。工人通常是面包和水，有时加一块巧克力糖，杂费开支不小。邓小平在工厂做20多天苦工，倒赔100多法郎。

4月23日，邓小平辞去施奈德工厂工作，辞职理由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日后他多次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国做工时干活太累，吃不饱饭。在施耐德钢铁厂做工期间，邓小平尝到艰辛劳动和生活，结识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

辞职后，邓小平暂居巴黎华侨协社，自4月26日起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每天6法郎生活维持费。生活维持费不能维持生活，邓小平开始打短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

10月22日，邓小平等11人被法中救济委员会介绍到巴黎第十区一家制作纸扇和纸花的工厂做扎花工，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做完，邓小平等105名中国学生即被解雇。

1921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旅法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电函求援，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万法郎汇至巴黎。邓小平等四川籍同学每人领到400法郎，勉强熬过1921年冬天。

1922年2月13日，邓小平从拉加雷讷科隆布到达蒙塔日（又译“蒙达尔纪”），到小城沙莱特（又译“夏莱特”），次日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工作。他被分配到制鞋车间，每天工作10小时，成为熟练工以后由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一天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据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郑超麟回忆，邓小平每个月除去开支还可以结余200多法郎。

在巴黎时，邓小平不得已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寄些钱来。父母收到信后卖掉些谷子凑钱寄给邓小平，1922年秋冬邓小平收到这笔钱。父母接济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积蓄，邓小平又萌生求学念头。

10月17日，邓小平辞去哈金森橡胶厂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纳省的沙蒂永（又译“夏狄戎”），想进入沙蒂永中学上学，最终因为钱不够没能入学，邓小平求学之梦彻底破灭。

1923年2月1日，邓小平又回到了沙莱特，再次进入哈金森橡胶厂，继续在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3月7日邓小平离开工厂，工卡上注明离开原因“拒绝工作。”或许厂方不满邓小平突然离厂，邓小平工卡上写明“永不录用”。

从事革命

1922年6月3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成立。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赵世炎经常到哈金森橡胶厂，王若飞也到工厂做工常与邓小平接触，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

1923年2月17日至19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离厂后不久，经汪泽楷、穆清、舒辉璋介绍，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在法国时，邓就加入到一小群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思考整体战略的知识分子中。

6月11日，邓小平离开沙莱特来到巴黎。到巴黎后，邓小平一面在工厂做工，一面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

1923年底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他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邓小平到书记部后主要工作是参与编辑出版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每月一期。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读者对象是留法中国学生。秋，中共旅欧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机关刊物《少年》改为《赤光》。《赤光》多数是半月刊，影响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赤光》更着重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以配合国内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小平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并负责刻蜡板和油印，所以获得绰号"油印博士"。邓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工作。邓写不少文章，攻击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邓和周恩来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编辑部小房间里打地铺；邓很敬重周恩来，耳濡目染，获益良多；从此友谊逾半世纪。邓实际上变成青年领袖周恩来的徒弟，能观察其如何建立组织。邓小平往家里寄七八期《赤光》；期间给家里写信讲退婚，邓小平父母没有办法，只好说通唐家女儿，由邓家置办嫁妆，把她作为邓家女儿嫁出去。从此，通过和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培养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

1924年，周恩来担任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4月，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5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

7月16日，在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负责抄写、油印和财务管理。按照中共的决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包括邓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

9月、10月间，邓小平染上伤寒，病倒；在医院和疗养院住两个月。期间邓小平还在《赤光》上撰文，攻击“国家主义派”和帝国主义。

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邓小平被选入执委会（支部）监察处和工会运动委员会；会后又被委任为6位宣传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运动事宜。

1925年春天，邓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共里昂区党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邓小平作为支部特派员，任共青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4月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邓同时在里昂做工。五卅运动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声援反对帝国主义；6月21日，几百名旅欧华人到达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随后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相继被捕；邓小平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

6月30日，邓小平与傅锺、毛遇顺三人组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局。8月16日，邓小平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此间邓小平还与傅钟等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主办的报纸《国民》的撰稿人。次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邓小平、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傅钟任书记。邓小平的频繁活动引起法国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在布洛涅-比扬古住，并侦察到邓小平领导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活动。

9月15日，邓小平参与组织召开1,000多旅法华人参加的反帝大会。11月6

日，为掩护身份，邓小平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分配在钳工车间，工号82409A；邓小平在雷诺学到一些钳工技术。“文化大革命”中，邓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时，重操钳工。

11月1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纪念不久前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的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法国政府监视会议。

1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主张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推进反帝反军阀斗争；法国警方掌握邓小平等人活动详情。

1月8日，巴黎警察局长发出命令搜查邓小平等人住处，并将邓小平等三人驱逐出境。法国警方在邓小平住处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传共产主义小册子、中文报纸及印刷设备。邓小平等已于前一天晚上离开法国去前往莫斯科。

早于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邓小平前往莫斯科，选送他们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一段时间，然后回国参加大革命。邓小平结束5年零3个月的旅法生活。邓小平旅法5年，喜欢土豆、奶酪、牛角面包，嗜饮葡萄酒和咖啡，同时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

职业革命者

邓小平一行在德国柏林停留一周，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热情接待，还参加德共组织召开群众会议。

1926年1月17日，邓小平等人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学

员证号码为233。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两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小平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邓小平曾和蒋经国分在一个团小组，不过蒋经国与邓小平不同班。邓小平开始被分在第9班，后来编入第1、2、11和7班。学校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军事课、俄语课。邓小平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邓小平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

3月，冯玉祥在李大钊安排下访问苏联，5月抵达莫斯科。在冯玉祥坚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商量选出邓小平等20多人。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1926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在法国五年和在苏联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邓小平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之工商业；邓小平在苏联一年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应对现代化。

渐露锋芒

1926年8月，冯玉祥同苏联顾问团和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一起从莫斯科回中国，之前所部已被直奉联军打败；9月，苏联顾问团和刘伯坚等帮助冯，率部脱离北洋军阀，在五原组建国民军联军并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任命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并聘请苏联顾问团成员乌斯曼诺夫为国民军联军政治军事顾问。

1927年春，邓小平由苏联途经蒙古回到中国。在库伦待一个月后，邓小平等人登程西安，是冯玉祥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

1月12日，邓小平和其他20名年轻共产主义政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

往冯玉祥那里。

2月，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中国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为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担任教官。

2月底，邓小平一行离开宁夏城，骑马于3月底到达西安。3月，邓小平被分配到刚成立之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书记；学校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创办，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中国共产党人帮助筹建。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7月间史可轩带领千余人离开西安，该校宣告结束。另外西安中山学院被誉为“西北革命学府”，邓小平一般在周六到学院作专题报告；西北军官学校后改名“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续范亭任校长，邓和刘伯坚等兼任过教官。

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将邓小平等遣送别处。6月，因中国政局发生突变，冯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

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去武汉。7月初，邓小平到达武汉，见到周恩来和聂荣臻，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秘书；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在中央重要会议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为适应秘密工作，把自己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当时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失去联系，中央机关工作不多。

8月7日，为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错误，制定新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之总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21

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10月，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邓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1928年1月，周恩来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列席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国内协助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为保证安全，中央负责人不断变换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邓单线联系；为适应秘密工作，并有效开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机关群众化、党之“负责干部职业化”，干部以某种职业为掩护；邓小平开过杂货铺作为党中央开会地方，后来又开过古董店作为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之联络点。

5月18日，邓小平等留守中央组织起草第47号通告，规定对党组织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并提出若干具体办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又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秘密工作守则。

6月底，邓小平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由于邓小平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

8月29日，邓小平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听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新中央组织机构设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

9月，在上海，邓小平与张锡瑷介绍张晓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晓梅被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为中央职工部整理材料，并担任中央翻译科的机要交通。

11月13日，向忠发主持召开六大后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计划，特别讨论中央秘书长；周恩来提出，中央

秘书长主要是技术、事务性秘书长，不一定要中央委员来做；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改称中央事务秘书长；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会决定邓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邓小平安排会议议程，列出讨论议题，会议后对决定事项检查作实。

1928年冬，邓小平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张锡媛结婚。邓小平和张锡媛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成为邻居，一起从事地下工作。

1929年，在一次讨论李立三主张夺取中心城市时，邓小平称：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邓去四川巡视一次，为期三个月。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赵容接替邓工作，后因故作罢。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四川问题委员会，由杨殷、邓等5人组成，8月24日杨殷和彭湃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晓野接替邓任中央事务秘书长。

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统战工作，并全面领导广西党工，准备武装起义，在龚饮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情况，然后到南宁。是邓小平开始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

8月底，邓小平化装成商人，匆匆离开上海，受命前往广西。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身份，化名“邓斌”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赶赴海防，由陆路潜入广西省。邓小平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与南宁市公安局长、中国共产党员龚楚住在一栋楼。在南宁，邓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广西党组织负责同志联系，传达党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国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邓小平奉命到广西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与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百色暴动政治活动。由于中央和广东省委受左倾情绪影响，对邓在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几次发指示信提出批评，但是邓小平坚持从广西实际出发，认为俞、李与蒋、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

9月1日，邓小平在南宁主持召开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武装农民、推翻国民党政权、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创立工农红军”。

9月10日至9月14日，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代表大会。

10月1日，俞、李率部出发，邓调遣部队作应变：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左江地区；派雷经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10月初，中共党组织按照预定计划，将留守南宁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邓小平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只，以备一旦有变，即把军械库几千支枪和弹药装船外运；又令在南宁受训之韦拨群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并派龚饮冰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行动计划。

10月13日晚，南宁市区内枪声大作，兵变部队搬走所有枪炮和弹药；10月14日，邓小平指挥部队将军械搬上船只。

10月17日，邓小平、陈豪人等带着警卫部队，指挥船队溯右江驶向百色，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在恩隆县平马镇，邓会合张云逸；10月22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进驻百色县城。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住在百色城内粤东会馆，10月23日邓主持会议，筹划起义。会后以俞作柏名义，宣布张云逸为右江清乡督办公署督办，利用旧督办机构通令各县上缴款项，作为起义经费。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

统一左右江之指挥，前委直属于省委领导，由邓担任前委书记。

11月初，中央电召邓小平回上海。邓小平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邓小平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在百色，邓亲自组织发展工会，发动先后建立各行业工会19个，在12月初还建立百色总工会，并组建百色工人赤卫营。

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小平分别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2月上旬，邓小平从龙州动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之“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作“补充报告”。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在龙州领导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和第八军总指挥。年初，邓小平回到上海，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难产而病故。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电告红七军停止攻打南宁，命红八军撤回龙州。

2月9日，邓小平在龙州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改组红八军军委为红八军临时前委，邓任书记，委员有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涂镜吾。2月下旬，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10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到达右江传达命令，要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攻打柳州、建立广东北小江根据地、阻止国军北上。

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周恩来、刘伯承、恽代英、李富

春等25人组成苏区军委。红七军在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为保存实力，绕过柳州、桂林，转战在粤赣湘桂边界地区。

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七军，奉命北上，此后转战桂、粤、赣、湘边境。

1931年1月14日，部队到达桂岭，全军仅剩3,500多人；部队整编后：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2月，邓小平从部队情况出发，决定取消红七军前委，成立团委，并任团委书记。3月，邓小平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等人诬陷为“逃兵”；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称“邓小平是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

6月，邓小平接到通知去中央苏区工作。7月14日，邓小平离开上海。经约10个月苦战，终于在7月到达目的地与中央红军会合。7月，中央将红七军调到中央根据地，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集团军。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

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小平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小平则去上海汇报。30多年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作为主要负责人，他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第一次下台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中共江西瑞金县委书记，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县和安

远县之工作。9月初到10月初，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代表赣东特委在会上宣布，撤销李添富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之职务并予以拘捕。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谢氏祠堂隆重开幕；11月20日会议选举产生由毛泽东、项英、朱德等54人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会昌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由邓担任书记。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极大崇敬。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冬，邓小平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由于反罗明路线运动开展以及寻乌事件，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邓下放几个月后把邓小平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邓到江西省委担任宣传部长。4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斗争》报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他们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发展敌人力量薄弱之广大农村；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削弱地方武装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发展各种武器力量；反对“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

邓小平受中共内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邓小平尽管承受着极大压力，被迫作检查，但没有丝毫放弃原则。李维汉等极左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毛、谢、古事件。

此后，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邓小平被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邓小平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加入批判邓。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

批判斗争结束后，邓小平受到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派到乐安县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邓小平回宁都后，到七里村监管劳动；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总政治部缺人手，临时负责人贺昌是邓老友，向王稼祥推荐邓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邓小平于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国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赶出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撤离瑞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决定，邓小平随军转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小平参加长征。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

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邓小平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原任邓颖超患上肺结核病，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邓小平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5月12日，邓小平出席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中央决定调邓担任红一集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由刘英接替邓担任中央秘书长。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小平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

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邓所在的红一军（7月21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一集团军改为第一军）被编为第一纵队。

10月19日，邓小平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严重疟疾，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

长征给中共造成重创，从江西出发时军队大约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开小差，1935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10,000人；据邓小平的女儿说，随着部队日益减员，邓小平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有不少机会与毛泽东交谈。直罗镇战役打响后，邓小平随红一集团军（由陕甘支队编成）政治部负责人到前线了解战况。

邓小平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红一集团军政治部宣传部最重要工作。1936年2月5日，邓小平随红一方面军东征。5月，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撤回黄以西的陕北地区。

5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罗荣桓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员，邓小平接替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5月19日，邓小平随红一集团军从延川地区出发，参加西征。邓小平曾亲自编写红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

7月9日至7月19日，邓小平受中革军委委托，到红十五集团军八十一师和七十五师巡视政治工作。

这年冬天，邓小平染上伤寒，长时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亏张学良部队给红一集团军慰问品中有一批罐装炼乳，邓小平靠吃炼乳支撑才恢复。12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调朱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红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

1936年12月，军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总司令，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良机；蒋介石为使自己获释，被迫同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邓在延安作为第一集团军宣传部长领导文工团，并通过演讲教育军政干部。

1937年2月10日，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

6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邓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8月15日完成改编，8月20日出动抗日；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指挥，彭德怀为副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为副主任。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赴南京参加蒋召开之最高国防会议，同时进行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同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其军队被改编为“第八路军”，成为全中国军队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蒋介石的统一指挥。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搞统一战线工作。

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革军委决定：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为副主任。

9月，邓小平奉周恩来派遣，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名义赴五台山动员蒲路东，正太铁路北各县民众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9月5日，八路军总部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举行，邓主持大会；朱德总指挥领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委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建立，国军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邓、彭雪枫为八路军代表。

9月21日，邓小平等到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太原成成中学。9月23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率领八路军总指挥部驻进五台县南茹村。10月，邓小平、傅锺、韦国清率八路军总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义县，开辟晋西地方工作；邓召开会议布置扩军、筹粮筹款和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等，同时派干部帮助县牺盟会训练抗日自卫队、建立抗日游击队，组建"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不久从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改名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张浩因患严重脑病回延安疗养。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邓为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1月初，邓小平写成《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使邓权力更大，有权判断部

队战前政治准备和周围环境。

1月7日，邓在洪洞参加北方局和集总（八路军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故八路军总部简称“集总”）召开的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1月18日，到达129师任职视事。实际上，邓小平在八年抗战时期为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2月2日至2月3日，邓主持召开129师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师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东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游击区。

2月6日，邓在辽县主持召开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2月25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副师长到拐儿村参加集总召开会议。4月26日，邓小平与刘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开辟冀南军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邓小平要建立自给自足之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和部队提供足够之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并使当地工业能够生产出足够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邓小平还要为正规军征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之政治意义；邓小平设计一种鼓励当地生产的税收制度：“向老百姓征税要根据当地最近几年的平均收成，超出这一平均数的部分完全归生产者所有。”

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5月以后，邓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挥129师主力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7月16日，邓小平与徐向前、宋任穷等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伊·福·卡尔逊，向他介绍冀南抗日情况。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伊·福·卡尔逊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as keen as mustard）。”

7月28日，邓小平亲自领导冀南抗日武装整编。8月14日，邓小平指导冀鲁

豫边区省委召开各地县代表会议，将冀南军政委员会改选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8月25日，离开冀南。

9月29日至11月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报告地方工作。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

11月23日，邓从延安到达西安，准备返回太行前线。12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全国我军中党务委员会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谭政、项英、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关向应、程子华、林彪、刘伯承、贺龙、萧劲光等26人组成。

随后13年，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刘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声，邓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在处决怀疑给中国国民党做奸细之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小平更慎重。比起毛泽东在延安远离敌人，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邓小平政委住在太行山区，更接近日本人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邓得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居民有关的各种问题。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小平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

1939年4月29日，邓小平抵达延安。7月，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同卓琳在延安结婚。卓琳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曾说过邓小平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中是个出类拔萃者。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

伯承、邓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8月20日，按刘伯承、邓小平部署，在正太路西段开始破路作战。8月22日，刘伯承、邓收到彭德怀、左权签发第一份战斗通报，首次使用“百团大战”一词。

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1942年，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一个教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温村会议”，由邓主持。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等，决定在彭德怀到延安参加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由邓小平任北方局代理书记。

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的工作；同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129师番号，另建太行军区；八路军总部机关和129师师部机关合并办公，全部合并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太行军区的后勤工作；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工作。

1945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8月20日，129师太行、太岳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因国民政府及中共政治谈判失败，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年冬，晋冀鲁

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1945年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副书记。刘和邓奉命率军进入华中平原一侧之大别山，毛泽东调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国军赶出西北地方，还希望在华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块根据地。

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小平与刘伯承矛盾严重，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刘邓的说法。刘邓大军很多人战死或饥寒交迫；幸存者处境艰险，极易受到敌人攻击，或因缺少给养而损失。

1948年3月，邓小平同刘伯承率主力出大别山与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集团会师中原。

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及晋冀鲁豫两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邓为政治委员。

9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委员、中原局第一书记参加会议。

10月22日晚，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邓小平和陈毅当晚赶到郑州，住大同路原国军郑州绥靖公署，立即指挥部队东进开封，国军弃城，第二天直取开封。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扩大，加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接受粟裕建议，11月1日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淮海战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还动员100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需，征用70多万头牲口作为运输工具；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下令成立总前委，将50万解放军纳入邓总书记的统一领导。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刘伯承担心部队安全，试图挖更多战壕以抵御国军优势火力，邓小平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危险，造成不必要伤亡，也没有挖筑更多防御工事。

1949年3月14日，中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4月21日，解放军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之长江，旋即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

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建国初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被选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10月19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为委员。随后，邓小平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

1949年12月2日，邓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实施土地改革等。

1950年1月8日，二野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由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中央肯定。毛泽东号召用15年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1951年，邓小平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控制西藏并建立秩序。

在回北京任职前，邓小平参加成渝铁路竣工仪式。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毛泽东下达书面命令：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小平过目。7月，周恩来提议邓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刘少奇提出希望邓将西南工作布置后即到中央。

8月7日，朱德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全家住进中南海。8月10日，周恩来提出政务院党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以周为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

8月13日，邓小平正式上任，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48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的命赴苏联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此时，邓小平作为经济专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会议，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把个体农业和小工商业集体化、把大工业国有化之“社会主义改造”方案。

10月2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结束”，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运动正式结束。通过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两位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邓小平也了解作出重大决定之理由，思考根本变革之大框架。

从1953年到1954年，邓小平不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而且担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稍后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邓小平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2月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3月3日，毛泽东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

3月10日，政府工作领导分工，明确邓分管监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分工，明确铁道、交通、邮电由邓小平领导。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邓小平主导与各省协商，以确定各省要上缴多少粮食和税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邓小平必须作出重大判断，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各省完成粮食配额和上缴税收之能力。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邓小平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邓小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名，大会决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名，大会决定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9月29日，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直到12月大区党政机构撤销，邓小平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12月28日，邓小平又根据他主持召开之会议讨论意见，向中共中央提交书面报告，提出撤销中央地区工作部，成立中央书记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个办公室帮助中央工作。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1953年，陈云、邓小平将高岗的活动情况向毛泽东反映，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警告。1954年发生"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按毛之意见，1月25日和2月5日，邓小平同刘少奇、周恩来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点出他的问题；2月3日，邓小平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起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的问题。

四中全会之后，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2月23日，邓小平和陈毅发言，邓小平希望饶漱石抱着抛弃错误的态度，在座谈会后向中央彻底交代，以便改正错误。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邓小平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1956年2月11日，邓小平同谭震林、王稼祥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少奇晓会合；邓小平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邓小平、谭震林于3

月3日回到北京。

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邓不大赞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

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的权威和权力。在开幕式上，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大会秘书长。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邓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

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内政，主张协商解决问题。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

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从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强民主、独立和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不

但有利于这些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团结”。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确定在1957年开展一次新全党整风运动。

反右运动

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之报告：“有时社会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运用得怎样”，“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经常注意到调整”；“对民主和专政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条件”；“总的趋势是，我们要逐步发展和扩大民主，否则要犯错误”。从1957年春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鼓舞下畅所欲言，批评的严重令毛泽东感到意外。

3月上旬，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企业中实行群众监督的指示》：“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毛泽东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资本家虽然已被消灭，但他们还是脱不掉自己之阶级本性。

5月，邓小平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准备反击右派进攻问题；5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整风运动部署的报告：“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尾巴上不带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的。”6月5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到各地指导整风运动；邓小平分别在沈阳、西安、成都和济南作4个报告，是在反右斗争正式开展之际所作，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对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形势和反右斗争的形势，估计过分严重。

毛泽东在1957年夏发动“反右运动”，羞辱所有严厉批评中共者。随后在

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毛泽东带头整大约55万知识分子，把他们划为右派，并吩咐邓小平具体操办运动。

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批评干部使邓小平感到恼怒。反右斗争出现严重的扩大化和简单粗暴的做法，使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批评意见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对扩大社会民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邓小平觉得应该做好善后工作，在报告中指出："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在八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主持起草《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草案），邓小平在9月23日之报告中介绍此文件时说：对于右派，"经常要排一排，开始斗争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对的，搞过了"；10月9日，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言："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央提出一个草案，不久可以发出。……这个标准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范围限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主要是大鸣大放时期，限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而把一般历史上的老账、个别问的问题的意见和学术性的问题撇开。"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作出更多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严重错误。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在通知中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分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分为右派分子。"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

是运动被错误扩大。由于在工作中普遍采取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造成主观把一大批人错误划成右派分子；许多正直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优秀党员、干部，还有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之爱国人士，长期受到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作用，是令人痛心的教训。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人数的一百多倍。在邓小平直接关心、指导下，到1981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得到彻底纠正。

藏区骚乱

1957年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经武汇报西藏工作情况；邓小平要求积极做好西藏上层人士之统战工作，说：“在西藏，分别左中右，以是否爱国为标准，不能以土改为标准。我们是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右派是分离派，只要没有叛国，对右派也要做工作。”

1958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同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谈话时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

9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张国华关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局部叛乱情况之汇报时，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冷静、理智处置，“在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线时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国外干涉势力相互勾结，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以拉萨地区为中心之武装叛乱；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邓小平连续参加刘少奇召集之会议，研究处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称：和平解放西藏

已经八年，我们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是为了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

出访苏联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宋庆龄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面。邓小平有理有据严辞反驳苏共理论家苏斯洛夫，令毛大为激赏，会议结束时毛指著邓小平说："看见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有见识，前程远大。"11月9日，毛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讨论关于和平过渡之提法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我们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共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

11月10日，中方和苏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邓小平首先宣读中方《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一提一种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五、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大跃进

1958年初，毛连续主持召开几次会议，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1月11日至1月22日，毛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抓石油工业。"大跃进"兴起后，很快便普遍采取革命战争

和政治斗争惯用之群众运动办法搞经济建设，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发展之客观规律，挫伤人民群众之积极性，从而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巨大损失。

3月25日，邓小平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党内围绕这个问题（反冒进）的思想斗争，“是关于建设方法和建设方针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内有一些人跟着反冒进，“有一些是属于对情况分析不够的方法问题”；“两种方法的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有区别的”；避免将问题再无限上纲，对于当时有重要作用。

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毛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对此赞成。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

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经毛审阅并修改之《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再加上党内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中央和国务院之综合协调部门再难以发挥作用。

6月，邓小平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毛也到会讲话，批评军事工作上之教条主义；7月，邓小平出来保护刘伯承，向毛建议保留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到北京，毛在邓小平陪同下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称北戴河会议）；毛要集中统一，保证重点放在工业上，工业主要是抓钢铁，“马克思和秦始皇要结合起来”；邓小平要求严格执行全国统一计划，并“先保证重点”，“其他零星的不搞”。毛说农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邓小平赞成毛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性质之意见。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办钢铁之高潮；同时，全国农村迅速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泛滥以高

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之“左”之错误。

9月至11月，邓小平考察东北、华北和大西南，是从1952年调中央工作后时间最长、接触地方和单位最多之调查考察。

11月6日，邓小平到达郑州，参加毛主持召开之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7日，邓小平在会议中说：“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12月9日，邓小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给的范围不宜过宽，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包下来。在集体生活中应当允许个人有适当的自由，也就是‘大集体、小自由’。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公开向群众宣布。”

1959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只破不立是不对的，破了旧的要立个新的，破了过于烦琐的要立个简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个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产，越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于重要环节的管理制度，改的时候要经过试验，不要轻易去废除。特别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操作规程，技术规范，没有把握随便乱动，对生产不利。不是说不可以动，有些是可以动的，但是要经过试验。”

2月27日至3月5日，毛在郑州专列上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第二次郑州会议”；邓小平向毛汇报关于人民公社之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

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根据毛意见，会议将“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上“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中共中央决定于4月初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讲话：“农业总是不稳，总有丰年平年。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下雨，这是人力没有办法的。风调雨顺之类不要讲多了。”

4月5日，毛谈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之问题：“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外，还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在党内，邓小平领导地位更为突出。邓小平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摔断腿，恢复了很长时间。

7月2日至8月1日，毛提议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一些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意见使毛不能接受，而改变继续纠“左”之初衷；根据毛建议，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全会最后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即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运动。邓小平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疗而没有出席会议，但他非常关心庐山会议；当时邓小平对批判彭德怀表示不同看法。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成为中心口号，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重新刮起来，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严重失调。

12月28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党的根本队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好的，要相信这一点。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则是不要比赛，划不划，都要慎重。”

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疑虑。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3月

24日，邓小平乘火车抵达天津，参加毛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天津会议”。

3月25日，邓小平主持会议说：“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因为没有解决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之严重问题，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后来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导致“左”的错误，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给中国造成损失。

5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说：“领导人要清醒，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把应该接受的教训忘了。各省也有这个问题，不踏实，搞大计划”。

6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称：“一切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搞得好一点，事情就搞得好一点。我们这些人注意的不够，影响是不小的。”

9月16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之中共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9月23日回到北京。9月30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再次飞赴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

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问题主动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邓小平在会上称“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气”，“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邓小平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会上，毛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之缺点和错误承担责任，对党之民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会议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没有根本改变“左”之指导思想。毛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关系开始破裂。

8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直到共产主义，消灭三个差别，都管用。”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之根源，使党之指导思想日益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左”之错误。会议还抵消七千人大会力倡在党内加强民主集中制之努力，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现象日益严重，破坏实事求是之作风。

1963年7月6日，中苏两党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担任会议主席，并作长篇发言。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与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9次会谈，苏方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也参加辩论，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

7月14日，苏方不顾中苏会谈前双方关于“在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之约定，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答复中共中央6月14日信。邓小平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

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

第二次下台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刘少奇、邓立即到杭州向毛汇报，并请毛回来主持工作。刘、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大字报只限于校内”、“校内校外有别”、“集会限于校内”、“不准示威游行”、“不准大规模的集会”等“八条决定”。并得到毛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几乎每个学校都分为两派或几派，互相攻击，乱揪、乱批、乱斗之风盛行，抄家、打人时有发生。

7月16日，毛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但被毛拒绝。7月19日，毛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扬言说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7月21日，毛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

7月24日上午，毛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决定撤销工作组。毛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7月29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邓小平、周派遣工作组。

8月1日至8月21日，邓小平出席在北京举行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讲话，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选举毛、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

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全会小组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攻击刘少奇，谢富治则攻击邓小平，说他在全国解放后变了。刘、邓小平被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受到批判，陈伯达趁机向毛揭发邓小平。邓小平由于被指责犯“路线错误”，实际上已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为贯彻全会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委托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受到批判，会后邓小平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联部、中调部等部门工作。邓小平事实上已被停止和剥夺职权，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看文件、写检查和接受批判。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国家主席刘少奇跌至第八位）。

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

10月23日，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邓小平。结果刘与邓小平作自我检讨。

11月7日，邓小平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内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

12月13日，毛指使“文革派”把邓小平与刘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邓小

平第二次被打倒。以后刘、邓小平就不公开露面。邓小平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邓小平。那时候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

3月15日，邓小平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

5月，汪东兴到邓家告诉邓小平，毛让他转告：一、要忍，不要着急；二、刘、邓可以分开；三、有事可以给他（毛）写信。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

8月5日，刘和邓小平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斗争。9月，刘与邓小平子女都被赶出中南海。毛把邓小平夫妇软禁在中南海之家中。两名年龄较小之孩子邓榕和邓质方（和邓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之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的继母和他在一起。

1968年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主管。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谈话：“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6月3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

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在10月13日会上，毛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随着邓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

1968年9月，邓小平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969年，邓小平子女被允许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邓小平夫妇，从邓楠口中知道邓朴方伤残；卓琳伤心难忍，哭了几天几夜，邓则依旧无言，只是不停抽烟。1970年，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林彪向全军发出“第一号令”，进入紧急战争状态。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10月20日，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坐车到南昌约20分钟路程。邓小平之宿舍为原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从1970年1月起不发工资，邓小平原来月工资402元，卓琳165元；改发生活费后，邓小平每月生活费120元，卓琳60元，继母夏伯根25元。夏天开始，根据本人申请，允许邓小平上午到拖拉机厂劳动。卓琳承担起洗涤工作，没有强制劳动。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发动武装政变未遂，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邓小平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林彪集团政变失败，邓小平写信给毛，叙述对林彪事件看法。11月8日，邓小平给毛写信，表示愿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在陈毅追悼会上，与陈毅夫人谈话时，曾表示过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王震曾向毛上书，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6月，邓小平夫妇接到通知，他们工资开始照发。

8月3日，邓小平写一封长信给毛："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

8月14日，毛对邓小平来信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运有转机。周恩来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邓小平可以做调查研究工作。年底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游历井冈山，凭吊遗迹，重访瑞金等地。

1973年2月20日，在周的力荐和支持下，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旧居。3月10日，根据毛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3月28日晚，周遵照毛之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要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之副总理。作为周之助手，邓小平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其他国家客人；邓小平还参加一些会见外宾之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之工作。

4月12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出席为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举行之宴会。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调动各大军区司令员，正式提议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12月18日，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提议，讨论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2月22日，邓小平代表军事委员会宣布各大军区司令员大调动。

1974年4月，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10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主张，指出：国家之间之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三个世界划分论"。由于在邓小平发言中关于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来自毛，也由于美国人并不喜欢有人把自己跟苏联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发言并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

1974年初，周病情恶化。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6月1日，周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治疗。当时周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着职务，在他亲自指导下，邓小平成事实上之代总理。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0月20日，毛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乘机前往长沙，与毛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毛同周、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此后，毛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

"三副一长"

国务院总理周病重住院后，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

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邓为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立即着手整顿全国范围内之极左浪潮。1月8日起，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周带病主持会议。会上选出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

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邓小平在幕后主持起草周之报告。会上通过周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会决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3月5日，副总理邓小平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会中，邓小平指出“必须反对派系斗争的发起者”。5月3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决定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5月12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国事访问法国。5月27日，根据毛之意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9月7日，周和邓小平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9月13日，代总理邓小平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会议中，与四人帮斗争已经白热化。邓小平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军队建设、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制定三个纲领文件，分别是：一、《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邓小平又提出要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即：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二、促进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由于毛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又说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遂于11月决定要解

决邓小平的所谓“右倾”问题。他在批评邓小平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又指出“有些人总是要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由此展开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极左派也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

第三次下台

邓小平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被称为“右倾翻案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第一副总理邓致悼词，并主持会议。在追悼会闭幕后，毛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软禁在中南海住宅里。邓小平与外界隔绝，只能与小外孙接触。而毛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小平和张春桥排除在外。

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中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中央政治局通过毛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对华表示：“你办事，我放心”。可以说，华的任命是毛力图调和“四人帮”与务实派干部、军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

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不过华国锋和毛一样，对批邓运动作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华国锋批评邓不坚持阶级斗争。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小平。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周悼念活动达到顶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华国锋攻击邓小平一派“是一批坏人跳出来，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很恶毒”。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会议指控邓小平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

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的“天安门四五”事件，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接班。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动民兵、公安清理现场所有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最后遭到镇压。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被指为这个事件“总后台”，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毛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邓小平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4月8日，《人民日报》批判天安门事件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然而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同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

8月，开展“批邓”运动；邓小平的三个“整顿”文件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9月3日，江青赶赴大寨，为批判邓小平作准备。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又指出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并没有争议性；第二，发动“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10月7日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十年动乱虽已过去，中国却面对“三信危机”（“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

10月10日，邓小平写信通过汪东兴交给华国锋。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

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小平。12月，华国锋在会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全国农业会议代表时说：“邓小平虽然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其本质仍是修正主义，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都具有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帮’后同样不能放过邓小平”。

文革结束后

拨乱反正与再次上台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小平恢复工作，引起争论。2月，华国锋支持《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正式提出“两个凡是”之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

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转发邓小平两封信。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后，入住位于米粮库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

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小平大力整顿军队，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抵制。

在1977年8月3日召开之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2月，邓小平极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1978年初，邓小平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此举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

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阶级斗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会议确认华国锋总理、邓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之人事决定。但邓小平在实施自己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路线分歧。

5月11日，《光明日报》转载由胡耀邦同意、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邓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之华国锋和汪东兴。

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转载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平反1976年4月5日发生之天安门事件，表明邓小平在现阶段之斗争中已占上风。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原则解决政治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在京西宾馆召开。是次全会上，邓批判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邓小平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就要执行）之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之指导方针；邓小平否定毛“打倒一切”之组织路线，为文化大革命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冤假错案平反（会议结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晚年错误之同时，邓小平着手改革毛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并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来，实行“摸着石头过河”。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发布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代替汪东兴一手掌管之“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务。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华

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会上批评华国锋之“两个凡是”，又批评他之“洋跃进”。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标志着华国锋过渡时期之终结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之开始。这次会议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陈云被推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后来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设计之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本属于“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迅速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城乡生活供应问题。农村改革从1979年开展，它体现于农村经济形态之根本转变，即由一个“指令经济”转化为一个以“承包制”为基础之经济。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邓支持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1979年至1980年间，中共中央创立4个经济特区，即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即中央用来试行特殊经济政策之区域，包括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试办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设想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首先解决十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9年中越战争后，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1980年2月23日，邓主持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恢复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就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5月17日，邓小平参加刘少奇追悼会并致悼词。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辞去副总理职位，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

1981年3月，邓小平点名批判白桦写《苦恋》，并指出“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亲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明报》社长查良镛，对查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胡耀邦六十六岁，不算很年轻，但他身体好，精力充沛。赵紫阳六十一岁。你也六十一岁罢？你们每天可以工作十二三小时，再长期工作一段时候没有问题。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的干部政策也要四个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制度化。这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那好得很，应当这样，是不是？但不是说干部老了就没有用，老干部有经验，有见解，还是宝贵的，但实际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又对查说：“中国愿意与外国发展贸易，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但中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不过在现代世界上，不能关起门来做人。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不向后倒退，但这不是片面的。美国如果看法错了，制订的政策也会错误。美国如果真的搞得中美关系倒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一九七二年以前的情形，中国也不会垮，那时候没有垮，现在更加不会垮。五十年代时，苏联对中国是有援助的，以后就没有了，我们还不是这样过下来了？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决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人所得到的教训难道还不够？美国国务卿海格到北京来，我也是这样对他说。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平等合作是很好的。但如美国搞得太不像话，硬要中国吞，那吞不下去，也没有理由要吞。”

改革开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0年的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有分别；改革目的并非要取缔现行之社会主义政体，而是要使它更趋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即外界所称之“行政改革”。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这也直接促成了后来《八二宪法》的诞生。

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4,000余人参加、9次大规模修改完善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确立毛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指出毛之领导以1957年为分界线：前期一贯正确；后期犯一连串“左”倾错误，包括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以及“错误发动”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

从1982年以来，邓小平致力于国内的改革。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邓小平希望中央顾员委员会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正式职务；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释之所以成

立中顾委，是因为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经验。邓小平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销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只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发出清污指示，于是展开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由胡乔木、邓力群和王震领导。邓小平因为担心继续批右会导致“左”倾回潮，严重影响快将上马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结束清污运动。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农业方面，在邓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习仲勋和广东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等人作讨论。广东之方案于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之“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按邓小平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广东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还视察中山和顺德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之县。邓小平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

范围；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开展。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虽然邓小平在1980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之调整取得一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之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之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腐败和贪婪之机，背离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之精神。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

1986年9月3日，邓小平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之迫切性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9月13日，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之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9月18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之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并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之职务；陈云获准取代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线工作则交给赵紫阳。

对外关系

对外方面，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出席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建国3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朝鲜方面安排邓前往参观金日成万寿台雕像，该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镀金。邓此时在国内正试图去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此感到极为震惊。据报道，邓小平“勃然大怒”，他私下对朝鲜人说这个雕像是他见过的最浪费的东西之一，并对金日成把中国给朝鲜的援助用在这样的事上深感恼火。10月，继续到日本。11月，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并且接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停止革命输出，不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

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

1979年2月4日，邓小平回国。2月17日，在云南、广西边境对越南反击，中越战争爆发。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五个省会。3月6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即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之基础设施。由于双方在战场上没有使用空、海军直接交战，仅限于地面部队作战，不同于一般战争，加之，中国边防部队已多年没有打过仗，部队绝大多数中下级指挥员缺乏实战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遭

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部队训练少，军事素质差，在战斗中也暴露诸如指挥失当，协同失调，编制不合理，武器装备不配套等问题；但通过实战，解放军在战役指导、战术运用、指挥协调、组织各种保障和民兵参战支前等方面，取得一些可贵经验，对加强解放军建设和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英香港主权移交谈判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并首次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于20年届满，中国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对香港的土地契约等安排十分关键。邓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人保留治权。邓小平则提出在收回主权和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于澳门，此政策被称为一国两制。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6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于9月22日抵达北京。9月24日，她在北京与邓小平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离开中国前，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广播公司之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随后，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并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其后，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管治香港的权利，但中方拒绝接受。

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中方团长为中

国副外长姚广，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

第12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佛瑞·贺维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小平会谈两小时。贺维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达成一个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楼会见香港和澳门政协代表，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席上，邓小平说：“中央政府有关香港发言，我和赵紫阳的是正式的，还有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是正式的。而黄华、耿飚二人所谓不驻兵香港简直是胡说八道”。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最后文件。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仪式上，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改革中的问题

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开始取得巨大成就。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大量流氓团伙出现、各类经济犯罪也开始显现，而当时中国法制尚处于早期建设时期（文革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及法治观念），1983年起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此次严打维持了3年5个月，在提升了社会治安、经济安全的同时，诸多冤假错案也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邓小平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6年12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后，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面对激烈学潮，邓小平遂于12月30日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李鹏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评他们未能平息学潮：“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继而作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指示：“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评胡耀邦后接受他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之请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职务；政治局又将一批进行“自由化”活动

之党内知识分子开除出党；到1月底，持续一个多月之学潮终于平息。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是时候递交辞呈，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1987年4、5月间，当邓小平觉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反资运动来攻击整条改革开放路线时，他便公开表示“搞四个现代化……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邓小平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邓小平再次当机立断结束反资运动，阻止“左”倾回潮；从5月开始，改革开放之言论又高唱入云。

1988年，邓小平之经济顾问警告说，物价改革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货膨胀压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应求。1988年官方之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之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26%。而1988年底政府之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严重通货膨胀引起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之广泛愤怒，邓小平之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

1989年政治风波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别向人大代表及总理李鹏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学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到西安、长沙等大城市。

4月16日，大约800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并未干预从大学前来悼念者。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数百名学生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并与警卫发生推挤冲突，当时围观者近万人。这便是当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赵紫阳、邓、杨尚昆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

出席。运动遂向社会蔓延，形势急转直下。

4月24日，即在赵紫阳出访朝鲜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学运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决定之精神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之社论。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更多学生加入他们行列。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决定，也有人认为邓小平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总理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

5月13日，数千北京学生藉苏联改革派领袖戈尔巴乔夫快将访华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借此行动向中央施压，以争取成立压力团体；尽管赵紫阳劝说学生必须克制，以免破坏中苏高峰会议之进行，学生情绪却转趋激烈，并否定所有妥协之主张。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5月16日，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公开表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发百多万人上街声援绝食之大游行，不少人将矛头直指邓小平。在邓小平的首肯下，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6月3日下午乔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场之最后方案；杨尚昆把方案交给邓，立刻得到批准；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大约4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约4英哩路程。即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之“十六字方针”，带领中共渡过难关。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

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邓小平称：“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据悉，正当邓小平考虑由谁来接替赵紫阳时，李先念和陈云一再向邓小平推荐上海市领导人江泽民，说江是坚持“两个基本点”之好干部，力主调到中央；邓小平很快接纳二人建议。

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议决撤销赵紫阳所有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惩治腐败，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

由于赵紫阳同情“六四民运”，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六四天安门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邓小平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

5月31日，邓小平对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

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久邓小平又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

退休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请辞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谈到：“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11月8日，85岁的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宣布退休。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任。199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江泽民接任，至此邓小平退出中国核心决策圈。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领袖。

晚年

九二南方谈话（南巡）

六四事件后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西方国家缩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长本国的中国留学生滞留期限；在中共内部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邓小平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基本上是因为它们推行经济改革失败，所以，中国若要避免遭同一命运，必须继续走改革开放之道路。1992年春夏，保守派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

当邓小平之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小平夫妇和4名子女（邓质方没有随行）及其配

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1992年春，邓小平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依靠昔日的威望，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邓小平还特地指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防“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的南巡与演讲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由于各地传媒纷纷发表支持改革开放，而与邓小平一起南巡之杨尚昆又在军中展开学习邓之南巡讲话，中共中央遂于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讲话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全体党员，由此结束历时3年半之“治理整顿”，并掀起新一轮的经济热潮。

邓小平南巡后不久，全国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谓“翻番”，即追求当地国民产值或工业产值成倍增长之高速度发展。中国十多年改革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尽管经历几次波动，但终于迈进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国刮起“邓旋风”的气氛中召开；江泽民在会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历史唯物论中是处于矛盾之对立面，“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挣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从实际意义而言，“十四大”标志着市场改革派之胜利——中共自此以“计划”和“市场”的不同“功能”来界定两者在经济发展中之作用，而不再把“计划”和“市场”看做

“主”与“辅”之关系；换言之，“计划”不再担当发展经济之主导角色，它只为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制定理顺战略目标而已；“十四大”可说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一个重要标竿。“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进中共党章。“十四大”确认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看齐；会议又提出要审慎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强调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销党组。

1992年刮起“邓旋风”，使沉寂3年多的中国经济再度活跃，并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大步迈步；然而，由于市场法规未能及时建立，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有效之调控经济措施，致使中国在1992至1993年间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及金融秩序混乱之失衡现象。南方考察后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并绝少在公开场合出面。但是邓小平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11月14日，中共中央通过由朱镕基制定之《（市场）改革五十条》，该文件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文件又为企业、金融、财税、投资及外贸等改革订下目标和策略，故可说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

邓小平因身体原因自1994年开始就不管国家大事；陈云也于次年8月动大手术，并于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国的“双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

逝世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因呼吸道疾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

房。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于1997年1月1日起播出传记纪录片《邓小平》，当时已患帕金森氏症晚期的邓小平本人在病房收看了全部12集描写他的传记纪录片。1997年2月春节前夕，病情略有平稳的邓小平向前去探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传达了自己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把今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2月15日，邓小平夫人卓琳及子女致信江泽民，向其转告邓小平的临终嘱托。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去世，享耆寿92岁。邓小平逝世，中国遂进入后邓小平时代。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联合国大会默哀。3月2日，遵遗嘱，骨灰撒入大海。其角膜亦捐出，他的殡车为双尾门的丰田Coaster。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

影响与评价

1997年9月召开“十五大”，该会肯定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明确写进党章。

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中，曾对自己评价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称：“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

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邓小平个性很强，不喜欢空谈，喜欢快刀斩乱麻，是一个作风强硬务实、急于抓出成效来之强人，故有“钢铁公司”之称；此外，他还是个意志坚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干；叶剑英曾评论邓小平：“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

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运动方式办事之一人专政之极权时代，那么邓小平时代可说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社会走向开放但仍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之专制时代。

正面评价

对邓小平的正面评价，是他执政后倡导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中国长期对外封闭，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国国民生活，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现代中国崛起贡献卓越。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

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说：“为什么小平同志在讲到警惕右时，特别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在建设和改革中要开辟新的道路，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阻力常常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由于‘左’的东西往往带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给人们以迷惑作用，这就更需要提醒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干扰。”

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

之功。”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邓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他说：“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马来西亚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邓小平对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就了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同时也使中国在工程、建筑、科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邓小平功不可没。马哈迪和邓小平有过两次会面，一次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另一次则是1985年他首次访华期间。

2011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邓小平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相继改革，而且他让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负面评价

批评者称，在邓小平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下，特别是

六四事件，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构陷下狱，造成了许多冤案。

1975年8月河南“75・8”水库溃坝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将险情报告给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纪登奎和李先念经短暂商讨后认为只有动用军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时任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想法，请求具体指示，邓小平当时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李先念向邓小平家打电话，邓小平女儿邓榕称邓小平身体不适，已经入睡，并坚持不肯叫醒父亲，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

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时期对拨乱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不许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于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并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上以及在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反思中也体现出了邓个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坚持要求对毛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要求拥护“毛泽东思想”。

此外，邓小平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角色和处理方式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提到，一些干部认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时，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是中国人民得以维护国家团结的唯一选择；香港媒体人林行止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包括自考）、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

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之领导下起步。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著变革之设计师；事实上，变革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之设计。不如说，邓小平是全面领导转型过程之总经理，梳理和总结各种想法，展示给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之步调和方式；邓稳定领导最高层，使人们保持信心经历巨变；邓小平选拔和指导团队，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邓小平解决难题，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之解决方案；邓小平加强统治，保持控制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

毛泽东加强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小平则将统治结构拉回来，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之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独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大胆取消“阶级出身好”选拔干部之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之办法；根据邓小平在1977年采取之新路线，很多“阶级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干部。不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干部，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考试，而是根据工作表现；邓小平的接班人也沿用制度。邓小平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之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来自城市之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青年之吸引力。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流动，与毛泽东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更加深远之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向以城市为主之社会之过渡以及传播共同之国家文化，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之最根本之社会变化之一。

邓小平很清楚，如果干部过于严格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一定之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说：“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邓小平需要敢闯敢

干之干部，他愿意承担苍蝇飞进来之代价；邓小平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为自己或家人敛财。

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挑战向个人捞好处之当权者；对于因建新项目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国所提供的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联合政府官员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筑商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为当地居民就业。

邓小平认为，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于激动，重要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1974年，作为首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帝国”，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之政变，邓小平回答：“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

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

中共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写进中共党章。“十四大”确认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看齐；会议又提出要审慎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强调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销党组。

一国两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与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葡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邓小平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

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1980年代其正式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蒋经国则以一国良制（One China, Better System）回应。

香港回归经验说明，可以用最低成本和代价，甚至零代价实现国家统一；要实现国家统一，同时保证任何一方没有损失，使香港得以继续维持繁荣，不能牺牲香港繁荣稳定，不影响国家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和特别行政区之概念是因应香港和澳门（以至台湾）之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况而设计，目的是在促进国家统一之同时，维持港澳之繁荣和稳定。“一国两制”之成功实施，有赖于“一国”和“两制”之间之适当平衡。在可预见未来，中国内地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无意继续消灭自己国内港澳台之资本主义，也无意消灭其他国家之资本主义，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红色革命。在相当长之历史时期内，中国之社会主义既要与内部港澳台之资本主义共存，也要与国际范围内之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存在；两种制度在国内和国际都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而不是人为拿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中国统一完全可以包容两种不同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中国不再主张把社会主义制度推行到全国，不再主张必须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国家，而是主张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与中国实现统一后，保留原有之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国内地主体仍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两种制度在一个中国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中央还要对特别行政区整个繁荣稳定负责，如果特别行政区搞得不好，人家不会说特别行政区人民没有治理好特别行政区，一定会说中国没有治理好特别行政区，国家逃不掉对特别行政区之责任。“一国两制”下，国家要增加国民对国家之认同感和向心力，必须：一、不断扩大公民权利，增加社会福利，减少乃至杜绝侵犯公民权利事件之发生；二、要使公民有国家主人之感觉，对国家大事有参与之机会，给人民享有政治权利；三、必须加强对公民和侨民之保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之政改或民主化过程中，中央政府和特区之行政

和立法机构都有其各自之角色，在有关角色和权能之设计上，体现出“一国”和“两制”，国家主权原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自治原则之某种平衡。香港安全和中国安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维护包括香港在内之全中国安全是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之共同责任。成就一件事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但是破坏一件事情只需很少人即可；对待很少人从事之破坏活动，绝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一国两制”一旦失败，中国损失很大，但主要是面子，香港损失既有面子，更多是里子，是全部；因此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中道尝试兼顾国家主权原则和港人民主自治原则，在“一国”和“两制”之间找到适当之平衡点；就特首普选之模式来说，中道便是同时承认、平衡和尝试体现香港市民就特首普选之选举权和中央政府对特首之实质任命权，并在普选制度之设计上，尽量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一个中央和港人两方面都信任和支持者。“一国两制”下，公民身份认同制度保障至少有几方面制度：一、统一身份证明，至少像美国之社会安全号码，全国统一身份证号码；二、统一公民权利；三、全民拥有同样经济权利，国家对公民之基本物质权利，比如最低生活保障权，对港澳居民，特区政府发一份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国家也发一份最低生活保障金；四、统一司法。在“一国两制”下，搞政治激进、发动“革命”几乎不要成本，唯一需要就是勇气；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勇气胆量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推翻以后有无能力建设？建设需要很多智慧和能力，需知用暴力手段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其最终结果也一定是暴力，极端行为结果一定不会是理性进步；真正推动历史进步是睿智理性、调和鼎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挽狂澜于既倒、救百姓出水火，不是不负责任、不顾他人死活、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逐渐确立法治思维，以此慢慢取代激进革命思维，法治方式取代暴风骤雨式之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法治终于成为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和政治新常态；发展民主并不难，难的是建设法治；发展民主有激情、勇气即可，建设法治要靠智慧理性和长期积累。人们学习如何仇恨，更应该学习如何去爱，因为爱更接近人心灵和本性；如果社会精英只会顺应“民意”，讨好“民

意”，是表现无能，不负责任，不是本事。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是国家对内对外之最高代表，是国家主权之象征，在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用重要：①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决定，批准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就香港、澳门问题所签订之国际协议，即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②根据全国人大之决定，公布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相关全国性法律；③接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述职；④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决定，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国家元首之一般职权。根据中国宪法，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执行机关，亦即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国务院很大权力，主要包括：①以中央政府名义与英国、葡萄牙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并签订有关协议，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②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有关决定，协助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可提出基本法修改议案，协助筹备特别行政区；③贯彻执行“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④统辖特别行政区政府；⑤负责与特别行政区有关之外交事务；⑥负责特别行政区之防务，承担驻军费用；⑦依照基本法规定任命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⑧接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述职；⑨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之事实问题应发出证明文件，之前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之证明书；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内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之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中国宪法规定之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文化方面，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一国两制”之方针和基本法之规定，特别行政区保持资本主义之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规定夫妇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之义务、公民有依法服兵役之义务，基本法则规定特别行政区居民有迁徙往任何地方之自由、有自愿生育

之权利、没有规定依法服兵役，体现“一国两制”之原则精神。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首长即行政长官，同时是行政机构之首长，特别行政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关系是保证司法独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中国一直实行单一制；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享有高度自治权大于一般地方、大于联邦制下邦之权力，与中央之关系要由法律明文规定，设立及其所实行之制度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各自保留自己之司法制度，不受内地司法制度之影响，自己拥有自己之终审法院，所有案件之终审不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一个国家，两种司法制度”；特别行政区之司法制度保留下来，对中国内地正在进行之司法改革发挥很大影响，成为内地司法改革之重要参照之一。根据中国宪法和有关选举法之规定，中国采用直接与间接选举并用、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并用之制度；特别行政区之选举和选举制度则十分复杂，可以采用不同于中国内地之选举制度。根据中国宪法之规定，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之执政党，其他8个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特别行政区本地采取何种政党制度，没有统一之模式，要由各特别行政区自行选择决定。基本法是授权法，是中央单方面授予特区各种权力之法律；联邦制下同样之法律往往是联邦和州双方讨价还价而达成之分权协议，因此联邦制下之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一般是分权法，即清楚界定国家机关之间职权之划分，尤其必须在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进行权力之划分；基本法不同于联邦制下之宪法性法律。基本法是授权法，也是限权法；换言之，特别行政区所享有之高度自治权以基本法明确授予为限，基本法没有明确授予特别行政区享有之权力，特别行政区就没有这些权力；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无限自治，是有法律上之界限，高度自治必须有基本法上之明文依据，只有当我们在基本法中能够找到明文之规定之时，才能说什么事情属高度自治。基本法不仅日确规定特区高度自治权之内容和界限，而且也规定不属特区高度自治、体现国家主权、应该由中央行使之权力，中央能够在特区干什么事情也必须

有明确之法律依据，也就是基本法之依据。根据“一国两制”之方针，中央依法行使之职权主要有两个方面：①根据事项本身之性质特点，在任何一个单一制国家都必须由全国政府（中央政府）行使之职权，包括基本法之制定、解释、修改权，国防权，外交权，紧急状态权，特区之创制权及其政府之组织权、主要行政官员之任命权；②根据一国全国政府（中央政府）和区域政府本身之职能来划分职权，属全国政府职能范围内之事项，例如捍卫领土完整由全国政府负责较好，社会治安之维持等由特区政府负责较为科学合理。中央对特别行区享有之权力可以分为：①有些权力完全由中央直接行使，如防务；②有些权力归中央行使，但中央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充分吸收特别行政区之参与，如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任命；③有些权力归中央，但中央也授权特别行政区行，中央监督特区行使这些权力，如中央在外交事务上有全权，但同时授权特别行政区以法定之名义、方式自主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央对此实施监督；④有些权力归特别行政区行使，中央只行使监督权，例如立法权归特别行政区行使，中央只用备案之形式起监督作用。有些与主权关系密切、十分重要之权力也授予特别行政区行使，例如司法终审权、发行货币权、征税权、独立之出入境管制权等；中央尽管保留“剩余权力”，但是特别行政区将来还可以取得中央授予之其他职权。基本法关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享有之权力主要有：①特别行政区之创制权：是其他一切权力之基础；②对特别行政区之立法管治权；③特别行政区政权之组织权；④宣布非常状态权：当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和安全之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⑤外交事务权；⑥防务权。

荣誉与后世纪念

邓小平曾两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分别是1978年和1985年。

为了纪念邓小平自1979年开始，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策划者和贡献

者，其铜像于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广场竖立。这座雕像除去底座高6米，底座为3.68米。雕像刻画了邓自信地大步向前走的画面。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曾参观此雕像。另外，在中国的几个城市里，邓小平的大型宣传幅甚至出现在了城市的主要道路旁或地标建筑附近，上面写着强调改革开放或一国两制政策的信息。

2001年8月，广安市设立邓小平故居保护区。为深切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让世人了解邓小平的生平事迹，2001年10月，广安市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工修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占地八百三十亩、总投资近亿元，园区集山、水、池、林、亭、路等于一体。邓小平故居、邓小平故居陈列室、邓小平铜像广场、翰林院子、神道碑、德政坊等旅游景点坐落其中。2003年5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对外试开放。2003年10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正式开放[223]。

2004年8月13日，为了纪念邓小平的百岁诞辰，于邓小平故里旅游区修建了邓小平铜像广场和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邓小平铜像广场的邓小平铜像，高2.5米，重1.2吨，基座是由黑金沙花岗石做成，正前方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邓小平铜像”五个大字。这尊铸铜座像坐北朝南，邓面容温和，两颊瘦削，目光敏锐深邃，身穿短袖衬衫、军便裤、沿口布鞋，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

坐落着邓小平故居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辖区的牌坊村，也作为一座讲述邓小平生平事迹的博物馆，同时也作为广安区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缩影，被保存下来。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有一条6车道，宽25米，长3.5公里的大道：邓小平大道。其于1997年6月18日建成。一座两迈克的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矗立在这条路线的东端，纪念邓小平的碑文以汉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三种语言书写。

中央电视台于1997年1月发行了一部名为《邓小平》的纪录片，讲述了邓小平从留学法国到1993年“南巡”的生活。2014年，中央电视台在迎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推出了一部纪念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家庭

祖父母、父母

祖父邓克达，勤劳、俭仆。祖母戴氏会纺纱织布。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出生时父母已年过。家里有一点田。邓绍昌12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独自挑起持家担子。由于时局不安，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一年多，便回到老家务农。邓绍昌接受过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加之为人豁达、讲义气，经常参与一些“场面上的事”，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和影响。早年曾参加“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会”），在协兴场“袍哥会”中先后当过“三爷”、“掌旗大爷”（即头领）。辛亥革命时期，率众参加过广安武装起义。邓绍昌后来又新置一些地，到邓小平出生时，已是一个拥有二三百挑谷之小地主。大多数时间都在协兴镇和县城度过。1914年，当上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在协兴镇开过一家小饭馆。传到邓绍昌手上时，有120挑谷地。最富有时，拥有近40亩地和几个帮他干农活及养蚕之长工。邓绍昌收入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任职不到一年半就被撤换。由于赌博输钱，卖掉一些田地，几陷破产，逃到外地。邓绍昌逃难在外，很少回家，家庭经济亦随之逐渐破产。1936年，邓绍昌客死他乡，不满50岁。邓绍昌对孩子严厉，动辄打骂，但有维新思想，力主把邓小平送到国外留学；邓小平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后生活窘迫，邓绍昌卖谷子、卖地寄钱接济。后来邓小平谈到父亲时说“进步党人”。弟弟邓垦评价父亲：“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護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邓绍昌先后娶过四任妻

子。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第一任妻子张氏，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无后而死。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是广安望溪家坝人，在当地算是富裕。据邓榕说，邓小平母亲十分疼爱邓小平；邓小平后来也回忆说，非常敬重母亲，父亲不在家时母亲总是悉心照料著家务。淡氏虽没有念过书，但贤惠通达，勤劳能干。淡氏于1926年病故。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当时家能够保持生活，全靠母亲。

第三任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儿。前夫病死后，她带着一个女儿邓先芙改嫁邓绍昌，生两个女儿。大女儿邓先蓉（10多岁时病死），小女儿邓先群。1949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到重庆后，邓小平把夏伯根从广安老家接到重庆同住，从此和邓小平一起生活，直到2001年去世。

妻子

邓小平一岁时，父亲邓绍昌按照当地习俗给邓和唐姓地主人家定下娃娃亲。

邓小平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于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张锡瑗又名西远、希园，河北良乡（今属北京房山区）人，比邓小平小4岁，父亲是良乡铁路站站长；1922年入保定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团组织负责人，参与学生驱赶校长，作为学生代表之一赴北京、天津宣传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中国国民党保定市监察委员；1925年随父亲到北京，入清明中学读书，同时任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妇女部秘书，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活动；受李大钊影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1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1926年回国，1927年在保定参与领导铁路工人罢工，后调到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处工作。1930年初，邓小平回到上海时，妻子张锡瑗临产住进宝隆医院；邓小平到医院照看妻子，张锡瑗生下孩子没过几天患产褥热去世，孩子随后夭折。

1931年7月14日，金维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与邓小平同行，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与邓小平同岁，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学生运动，毕业后任女校教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工作，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活泼开朗，果敢干练，风风火火。邓小平是在上海李维汉家中汇报工作时认识金维映，到中央苏区后不久结为夫妇。金维映在中央苏区曾担任于都县和胜利县县委书记；邓小平被审查时，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后嫁与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于莫斯科。

邓小平与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育有五名子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生于云南省宣威县一个工商业家庭；父亲浦在廷经营生产宣威火腿，是当时云南著名“火腿大王”，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军，1926年因生意上缘故全家搬到昆明。在昆明，浦琼英上小学，考入省立昆华女子中学；1931年9月北平举办全国运动会，浦琼英被选为云南省代表队少年组60米短跑代表，到香港时九一八事变，全国运动会停办。浦琼英决定只身往北平求学，到北平一个补习班学习，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外围组织成员。1937年11月，和三姐浦石英到延安，考入陕北公学，数月后毕业分配到陕北公学图书馆，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数月后选送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学习，改名卓琳。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邓小平同卓琳谈自己革命经历和前两次婚姻；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诚恳

说："我有意要和你结婚。在前方战斗很辛苦。我年纪是大了些，又不大会说话。年纪大，这是我的缺点，但我希望能从别的方面弥补。"卓琳"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是那么真诚，我就同意了。"1939年8月下旬结婚。

子女

长女邓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艺术家；丈夫吴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现任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长子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出生，邓小平夫妇在与麻田村一河之隔之云头底村找一位奶妈叫郭金梅，一年后邓小平率部转战河北；郭金梅带着孩子跟随邓小平夫妇到涉县赤岸村住些日子，刘伯承为孩子取名"朴方"。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妻子高苏宁，骨科专家。

次女邓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丈夫张宏曾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

三女邓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萧榕，小名毛毛，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丈夫贺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将贺彪之子，总参装备部少将，曾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次子邓质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

业公司董事长，1993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1993年5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妻子刘小元，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

孙辈

长外孙女邓卓芮，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邓楠之女。丈夫吴小晖，1966年10月18日出生；曾任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2018年5月1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外孙邓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邓林之子，公开姓名为卓溯，易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发作病逝。

外孙女邓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邓榕之女，在孙辈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读美国波士顿韦斯利女校，攻读心理学，学成回到北京，从事广告公关。其后随夫冯波到加拿大生活，2010年育有1子冯然。丈夫冯波，1969年10月出生，出身名门，冯波父亲是国务院参事和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1937年4月-2017年2月20日），冯波母亲董丽惠；冯波哥哥是著名投资家冯涛；冯波1987年18岁留学美国；1992年毕业于旧金山摩云大学电影导演专业；1997年回国,2004年合伙创建联创策源投资基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新浪、亚信融资。

孙子邓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原名邓小弟，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所生，曾拥有和使用过美国国籍，是邓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孙。2008年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曾任广西百色平果县副县长。他于美国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为“David Zhuo”。

爱好

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前喜欢打台球。1959年，邓小平在打台球时不慎摔伤了股骨，伤愈之后为了恢复脚力，他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锻炼方式，但从此失去了打台球的爱好。他散步每次都要走三公里左右，而且很少说话，目不斜视，抬头挺胸，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从此，邓小平与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邓小平打牌技艺精湛，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风度翩翩，一派大将风度。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聂卫平曾透露，邓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小平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邓小平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此外，邓小平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小平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

邓小平亦是一位资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访时表示邓最爱的是孩子和足球。早在青年时期，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花费吃饭的钱去购买球票。邓小平亦有要求工作人员录制重要的足球比赛，供他在公余时间欣赏。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并改组中国足协，提出"冲出亚洲"的目标。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突然在举行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出现，现场八万名球迷在赛前起身为其鼓掌致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7%AB%8B%E4%B8%89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男，湖南醴陵人，中国政治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

1899年，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乳名李凤生，小名狗妹仔。上私塾时，父亲李昌圭按照祠堂辈分给他取名李隆郅，毛泽东曾说他的名字难认难写，于是他在安源（今安源区）改名能至。1925年，李立三在上海市工作时，改名李诚。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懂得密电码的编制。

李立三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人运动。其中1922年安源大罢工中任罢工总指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委员会书记；1925年五卅运动中再次任罢工总指挥，建议发起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负责人。

从1927年起他任中共中央常委，1930年6月接替余泽鸿成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此时总书记向忠发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在他出任中央主要领导期间，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他在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1930年10月初，李立三因“立三路线”错误离开党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1930年12月赴苏，1931年到苏联。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完“立三路线”错误后，被安排在共产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一年后，共产国际东方局决定指派李立三到赤色职工国际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同时任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

1934年10月，共产国际中断了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讯联络后，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李立三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1934年冬，他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建立联系，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李立三曾经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建议，可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经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1935年春，李立三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阎红彦在新疆设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12月25日到达安塞找到党中央。随后，李立三又派刘长胜带上密电码回国。刘长胜先是到达外蒙古，再转新疆入境。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找到党中央。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外蒙古入境的，杳无音讯。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前，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林育英（在莫斯科已生活了三年，名叫李复之），这次回国临时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与密电员赵玉珍一起，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纵穿沙漠，于1935年11月初抵达陕西省的定边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11月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

所在地——陕北瓦窑堡。林育英先后会见了张闻天、邓发和毛泽东，在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上称之为瓦窑堡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准备以六个月（2月至7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因为当时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仍然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所致，于是又派出七人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他们于1936年4月到达陕西安边，但被反动民团发现，结果，六人牺牲，一人被捕。1936年6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电台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才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密电码本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莫斯科的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不久又兼任在莫斯科组稿、编辑、和排版的《救国时报》的实际主编，并负责起草了该报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救国时报》排版制成纸型后寄到巴黎，由吴玉章等人负责印刷成报向中国国内发行。

1936年5月，李立三与李莎结婚。1938年2月，李立三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1939年11月出狱。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当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托来苏访问的郭沫若带信给中共中央，一面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申请，请求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时他不知道中共七大竟然已将他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即中共首席代表）。1946年秋，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是负责同苏联的关系。后由于与之打交道的中长铁路苏方副局长迫害过李立三，双方产生矛盾，李立三调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

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建立了一个俄文编译小组，当时就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和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不久就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建国后就是在这个编译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译局。1949年2月，李立三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指示随同中央机关到北平工作。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立三当选为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政务院委员、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等多种职务。参加10月1日的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实职是主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因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而受到批判和撤职。1951年12月，几次检查批判会，就定下了李立三犯了“工团主义”、“狭隘经济主义”等“极右”错误的调子，李立三为此被迫离开总工会；1954年9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又被免去劳动部长职务还乡休假，1955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2年李立三直接给周恩来写信申诉，周建议让李莎转中国籍，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成为正式中国公民。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于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但安眠药的来源不明，验尸报告上死者身高同李立三不符，其死亡过程始终是悬案。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曾写道：“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这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平反。

家庭

李立三的父亲李昌圭，字镜蓉，晚清秀才，为醴陵县渌江中学的教书先生。1927年后，武汉传李立三的父亲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后来证明系谣传，于1941年去世。

李立三一生结婚五次。

1918年，李立三遵父母之命娶妻林杏仙。不久，林杏仙生下了李立三的长子李人纪。然而，此时的林杏仙已患有严重的风瘫，在儿子出生不久便去世了。

1921年冬季，李立三从法国回来，和李一纯（原名李崇英）结婚，1924年生下儿子李人俊，1925年两人离婚。

1926年，李立三和李一纯的三妹李崇善（1903-1972）结婚，两人育有李竞、李力、谢志佩3个孩子。1931年，因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学习，两人分离。

1932年，李立三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被派往苏联远东伯力，在华侨中间工作，这期间，他同李汉辅结合在一起。1933年李立三回莫斯科，李汉辅回国，两人分手，她在回国途中牺牲。

1936年，李立三与李莎（原名：莉莎·基什金娜，俄语：**Елизавета Павловна Кишкина**，英语：Elizabetha Pavlovna Kishkina，1914年生）在莫斯科结婚，中国籍俄罗斯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知名俄语教学专家，2013年7月8日北京友谊医院内接受由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军官勋位）。

李人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李人俊曾是一名海军，现在在湖南科研所工作。大女儿李竞，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士长；二女儿李力，是北京钢铁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三女儿谢志佩，是上海同济大学的系主任；四女儿李英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俄语学院院长；五女儿李雅兰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5%BE%B7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原名朱代珍，曾用名建德，字玉阶，四川仪陇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创始人及领导人之一，亦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朱德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亦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朱德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官至云南省警察厅长。1922年，他赴德国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1日，他参加南昌起义，此后率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毛泽东指挥中共军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59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受到冲击。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北洋政府时期，朱德曾被授予勋五位、三等文虎勋章、陆军中将军衔。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战后获抗战胜利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于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生平

早年经历

1886年12月1日（大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朱德生于四川省北部山区仪陇县乡间一户客家人贫苦农家。少年就读于私塾，1905年用“朱建德”的名字考中府试。次年清朝即废除了科举制度，于是进入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堂。1907年前往成都，进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就读，一年后毕业，回仪陇县当小学体育教员。1909年，朱德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加入反清革命的同盟会。

1911年，朱德从讲武堂毕业，被派到云南新建陆军任副目、司务长、队官。同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生兵变，反抗清政府，引起各地响应，即辛亥革命。10月30日，昆明新军发起“重九起义”，朱德率部参加攻陷总督衙门的战斗。后参加援川军支持四川。1912年起，任云南讲武堂军事教官，滇军营长、团长等职，镇守蒙自、个旧地区。1915年在蔡锷滇军中参加护国战争，担任第三支队支队长，在棉花坡战役中成名。1917年因战功升至滇军靖国军12旅旅长，军衔为少将，参加护法战争。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孙炳文，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1921年，在顾品珍的

提拔下，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宪兵司令。

1922年，唐继尧在这一时期云南政局的变乱中打败顾品珍，并想捕杀朱德等人。此后朱德离开军界，外出学习。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孙中山以十万元军饷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桂军、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认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对此表示婉拒。之后，朱德面见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态度冷淡，认为他军阀气息太重，不愿接收他为共产党员。之后，朱德又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社会科学。1922年10月，朱德在德国柏林见到了周恩来，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仍以国民党员名义活动。

1925年，朱德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1926年夏，朱德回国，受邓演达之命，利用旧有关系到杨森川军动员北伐。这一时期发生了“万县惨案”，他与陈毅等共产党人支持杨森与英国对抗。11月，与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泸顺起义，策应北伐战争，打击四川军阀刘存厚。1927年1月，朱德到南昌找老同学朱培德，在南昌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建国滇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多次派出学员帮助开展工农运动，并拨出枪支武装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1927年8月1日，朱德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南昌市公安局长身份参与指挥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国民政府方面则马上调集军队包围了南昌。8月3日，中共部队按计划撤离南昌。8月7日，张发奎率第四军入南昌，接着追击中共部队。而中共方面，蒋光鼐、蔡廷锴师在南进广东途中脱离了部队。又因天气暑热，长途行军，且未鼓动群众，后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南下中共部队在途中遭粤军和中央军夹击。在

部队到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主力南下进击潮汕地区，企图获得苏联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朱德率第25师坚守三河坝。

起义军主力于潮汕地区失败后，朱德率部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同时与陈毅在赣南天心圩、大庾、上堡对部队进行三次思想和组织纪律整顿，开展群众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建立统战关系，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政治工作。12月，率部投奔驻守韶关的滇军故旧范石生，以王楷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武力。1928年1月，朱德与陈毅在湘粤赣边境发动"湘南起义"，占领宜章县城，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月底在坪石战斗中，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接连打垮国民革命军许克祥部6个团。2月起。又率部攻克多座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将各县农军组编为3个师和两个独立团。4月，国民革命军发起进攻，朱德同陈毅率起义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

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灭国民革命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红四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这一时期，朱德率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后为毛泽东加以发展应用。1929年初，与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苏区。在此期间，朱德和毛泽东对许多问题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争"。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免去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担任。会后，朱德和陈毅成为了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但在朱德主持下，红四军在向广东和福建的两次突击中损失惨重。11月，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12月，在古田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订会议决议。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红一方面军，任红一方面军总司

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朱德与毛泽东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取得胜利。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历史任务和必须具备的6项基本条件，明确红军建设方向。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从游击战向大规模山地运动战转变。6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会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作战。6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8月，朱德离开中央红军，随张国焘左路军行动。其后，红军分裂，张国焘率部南下，另立中央，朱德对此表示反对。10月，他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绥崇丹懋战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对张国焘进行斗争，推动两军共同北上。10月，朱德、贺龙、任弼时、张国焘率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长征结束。12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任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37年8月，朱德与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主持的南京国防会议。会后返回陕北出席洛川会议，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8月25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并担任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书记，晋升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

1937年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五台，指挥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9月11日，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担任总司令。此后，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摧毁日军阳明堡机场等胜利，配合国民革命军组织的太原会战。10月，与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太原会战后，朱德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根据地。

1938年2月，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此后，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革命军开展晋东南1938年战役，击败日军九路围攻。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八路军各部挺进冀南、冀中、豫北和山东，开展游击战争，并扩大根据地。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和战略作用。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3月，与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先后进行了卫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击败国民革命军石友三、朱怀冰部。5月，从华北前线前往洛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之后经西安返回延安。

1940年8月，与彭德怀、左权共同部署八路军开展百团大战。同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垦荒屯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并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1941年11月起，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曾发表多篇文章，论述军队建设及战略战术的演变。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成员，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6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仅次于毛泽东。1945年8月，在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和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之后，朱德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队下令，向日军展开大反攻，要求敌后战场的日军绝不能向国民政府投降，要向当地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抗日战争结束后，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朱德与刘少奇在延安继续处理中共中央日常事务，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及早占领东北；参与制定和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现战略转变等决策。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同毛泽东指挥中共军队作战。1947年2月10日，开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1947年3月，由于胡宗南的军队进攻陕北，朱德参加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开赴河北西柏坡，负责中共占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工作。1947年10月，朱德指导华北野战军举行了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此后他总结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各战区迅速推广。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同朱德、刘少奇会合。随后，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前往濮阳地区指导华东野战军工作，作了中原会战动员报告，提出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问题。同年9月至1949年1月，朱德以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身份协助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1949年4月20日，国共最后和平谈判完全破裂；次日，毛泽东和朱德即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朱德在聂荣臻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参与制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致力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他重视部队训练和兴办各类军事院校，强调部队在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过程

中，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又要摆脱经验束缚。重视发展尖端武器，主张国防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1949年11月9日，朱德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直到1955年3月。1950年5月6日，朱德作《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反对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作风，强调党员在党纪面前一视同仁。1951年，参加三反五反运动。1月26日，向毛泽东建议加强纪检工作。1952年6月22日，朱德向毛泽东报告中建议健全党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进行遵纪守法教育。1954年4月25日，针对高岗饶漱石事件，朱德发表讲话，强调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

1954年9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作出世界战争短期内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主张抓紧时间尽快发展经济，增强国防事业的物质基础。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会后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3月，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军工、民用生产相结合。1958年1月，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

1959年3月，访问波兰和匈牙利。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参与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7月，出席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朱德在发言时肯定彭德怀的积极一面，被毛泽东批评为“未抓到痒处”；9月，朱德被迫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检讨，之后担任军委常委。此后，朱德到各地视察。1960年，提出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1961年，建议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集市贸易。

1962年1月，出席七千人大会。此后致函中央，认为对农民限制得过死，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3年，提出应当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

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应大力恢复和发展。1965年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称，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4日-26日，朱德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受到林彪、康生等的批判，把朱德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意见说成是“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是党内危险的定时炸弹”等等。会后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排名降到了第九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

1967年1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之后，在江青授意下，造反派称朱德是“大野心家、大军阀、黑司令”，朱德受到政治迫害，勒令交代反毛罪行。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不过，朱德因为毛泽东的有意保护，仍被列入中央政治局。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各军队将领被迫疏散离京。其中朱德去广东从化、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去武汉、陈毅在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在开封。10月20日，与张云逸、陈奇涵等同乘一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不许他们进入广州市，只在机场休息片刻就被直接送到从化。

1970年7月，从广东回到北京，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

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1971年10月22日，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1973年8月，出席中共十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1974年8月，到秦皇岛视察海军舰艇部队。1975年1月，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去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1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15日，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送了花圈。6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等候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在有冷气的房间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染上感冒。1976年7月6日15时01分，朱德因感冒、心脏衰竭、糖尿病多种病症并发，在北京逝世。

纪念与评价

朱德逝世后，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后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等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决定于7月9日至7月10日举行吊唁仪式。7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遗体火化后，骨灰盒存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妻子康克清骨灰盒边），骨灰盒编号。

朱德被誉为“红军之父”，雅号“朱老总”。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朱德对张国焘“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1946年朱德六十岁诞辰时，毛泽东称他为“人民的光荣”。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朱德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说：“有人说你是黑司

令，我不高兴，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你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啊！朱毛是分不开的嘛。”

1959年9月11日，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宣称朱德是“老野心家”、“想当领袖”、“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文化大革命时，朱德也遭到攻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张春桥等先后向朱德发难，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也说“朱德同志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刘邓、朱德、陈毅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不过朱德受到毛主席的保护，才不至于落得像刘少奇的下场。”

1980年7月7日，朱德故居列为四川省重新确定公布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朱德同志百周年诞辰纪念会”，胡耀邦发表讲话，赞誉朱德“注意深入实际，一贯主张：要实际，不要浮夸，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办好。他时刻关心群众疾苦，谛听群众的呼声，处处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他历来是我们党内军内遵守党纪、军纪、国法以及一切公共生活准则的典范。”1987年4月发行之第四套人民币100纸币（1980年版与1990年版）上，朱德成为纸币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余三位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1989年11月，朱德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

哈尔滨铁路局哈尔滨机务段自1946年以来，先后有JF1-1191、QJ-2470、DF4B-1886、SS4G-1886、HXD3D-1886共计5台机车命名为“朱德号”机车。目前的第五代朱德号机车是HXD3D-1886，于2017年9月被命名。此外，阜新矿务局配属的SY-1395，亦被命名为“朱德号”机车，以纪念1953年朱德到阜新矿务局海州煤矿视察一事。

家庭

朱德生父朱世林（1861-1920年10月27日），生母钟氏（1860年4月23日-1944年2月15日），两人共育六男两女。朱德为第三个儿子，两岁时过继于朱世林的伯兄朱世连（1855-1922）、刘氏（1860年4月3日-1938年9月14日）夫妻。朱德投身革命后，没有回家乡看望父母。抗战时期得知生母钟太夫人去世，在延安写下《回忆我的母亲》，该文还入选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

朱德一生先后有六个妻子。

元配夫人刘从珍，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刘家坝人。1905年，由朱德父母作主，把他大舅的女儿刘氏许配给他，并于这年9月完婚。1906年春，朱德外出求学，自此未归。刘夫人自此独守空房，1958年2月在家乡病逝，享年75岁。病逝后，朱德的子女还曾为嫡母送葬。

第二位妻子：1912年秋天，26岁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19岁的学生萧菊芳结婚。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萧菊芳生子，小名“保柱”谱名“宝书”，就是朱德的独子朱琦。生子4个月后，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于1919年6月病逝。

儿子朱琦：1918年6月出生。未及3岁生母病逝，由继母陈玉珍在泸州抚养长大。1937年被抓壮丁。后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设法寻到朱琦，1938年送朱琦到延安就读中央党校。朱琦毕业后赴华北抗日前线，战斗中腿部中弹致残。调回延安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48年从部队团职干部转业到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当练习生，后来又当机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文革”前夕，升任北京铁路局车辆处处长。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1969年年底，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汉沟站当仓库保管员至1972年。1974年6月10日突发疾病当天去世。朱琦妻子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1946年3月23日任晋绥军区司令部文书科参谋，经贺

龙师长批准与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朱琦结婚。赵力平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长达17年。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孙子朱援朝，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孙子朱和平，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孙子朱全华，任朱德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执行主任。

孙女朱新华，任解放军总医院干休所门诊部主任。

孙子朱国华，1983年严打时被捕，判处死刑。

第三位妻子：后朱德的挚友孙炳文把自己的外甥女陈玉珍介绍给他，是为朱德的第三位妻子。

第四位妻子：1920年，朱德在川、滇军战事后，率领部队移驻云南昭通。在盐津县遇到贺稚华。1922年8月，贺与朱德、孙炳文等人同乘法国“阿尔及利亚”号邮轮离开上海到法国。两人成婚，是为第四位妻子。1926年4月在苏联生下女儿朱敏。1926年5月，党组织决定调朱德回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贺稚华和女儿朱敏暂居苏联。后贺另嫁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何家兴。

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后，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出任院长。

外孙朱成虎，原名刘建，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

外孙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

外孙女刘敏，法语译员。

外孙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第五位妻子：1928年与伍若兰在耒阳结婚。次年，伍在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挺进途中，遭遇何键部队突袭，被捕后遭处决。

第六位妻子：1929年与康克清在赣南结婚，陪伴朱德，直到他逝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BA%E9%BE%99

贺龙（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贺龙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曾手持两把菜刀袭击慈利县长卫兵。曾任讨袁护国军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曾率部与北洋军阀及四川军阀杨森作战。1926年，贺龙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1日，他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此后回到湘西，组建红二军团，任军团长，并开辟洪湖苏区。1936年，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12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参加百团大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他任西北军区司令员，组织后方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1952年，任国家体委主任，开创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1954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9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时，被林彪和康生指控为准备推动“二月兵变”，于1969年6月9日遭迫害致死。1974年，中共中央宣布为贺龙平反。

早年经历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2月9日，贺文常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先祖原籍湖北省安陆府钟祥县贺家湾。远祖贺崇先，明末随农民起义武装余部来到湖南，在慈利县九溪卫落户。清顺治十年，桑植县土家族群众举兵起义，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桑植属九溪卫巡检司管辖。贺崇先被迫应征加入清军到了桑植，后来就在洪家关定居下来。桑植习俗将居民划分为“军、民、客、土、苗”5家，“军家”是指从军后在当地落户的人家，贺氏属于汉族军家。

贺文常五岁时，在本乡私塾读书。后因家境贫寒，在家从事辅助劳动，农闲时跟父亲学裁缝。十四岁时，与人结伴运盐谋生。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参与领导湘西暴动，发动群众攻打石门县城。3月，率领乡邻21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缴枪12支。随即，组织桑植讨袁护国民军并任总指挥，后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1梯团第2营营长。失败后前往长沙，改名贺龙。在此期间，贺龙因刺杀谭延闿失败被捕，后获释。1917年9月，贺龙回乡组织农民武装，参加援鄂战争，任湘西护法援鄂军民军第1路游击司令。12月，因受上级猜忌被解除武装。返乡途中在石门、慈利交界的两水井，与吴玉霖用两把菜刀袭击慈利县长卫兵，夺枪两支，重新拉起队伍。

1918年起，贺龙任湘西护法军第1营营长、湘西靖国军第3梯团梯团长、湘西巡防军第2支队司令等职。1920年，贺龙在驻防桃源期间与“进步人士”交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随援川军入川，同四川军阀部队作

战，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负责长江防务。1923年6月，被孙中山委任为四川“讨贼军”第1混成旅旅长，亲率部下在涪陵截获为吴佩孚运送军火的日本轮船“宜阳丸”。11月。后因“讨贼军”内部分裂，作战失败，这使他对孙中山依靠地方军阀能否成功产生了疑虑。1924年秋以滇川黔建国联军先遣队名义率部回湘，12月攻占澧州。1925年3月任建国川军第1师中将师长，4月任澧州镇守使。1925年年底，由于支持五卅运动，以及辖区内日本轮船贸易亏损，贺龙遭到赵恒惕进攻，被迫率部退到贵州铜仁。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贺龙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改任第九军第1师师长，通电参加北伐战争，并欢迎由共产党员周逸群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左翼宣传队留在一师工作。9月，在所部开办政治讲习所，建立政治机关，并任命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率部攻入湖北，激战黄金口、斗湖堤，连克松滋、沙市、宜昌。1927年2月，任独立第15师师长。5月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华逍遥镇和临颍小商桥两败奉军。6月，贺龙任第20军军长，奉命回师武汉。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上旬，贺龙在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分共前夕，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7月下旬，率部开赴九江，会见谭平山等共产党人。到达南昌后，被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委任为起义军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8月1日，贺龙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国民政府方面则马上调集军队包围了南昌。8月3日，中共部队按计划撤离南昌。8月7日，张发奎率第四军入南昌，接着追击中共部队。而中共方面，蒋光鼐、蔡廷锴师在南进广东途中脱离了部队。又因天气暑热，长途行军，且未鼓动群众，后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9月，贺龙在瑞金由周逸

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下中共部队在途中遭粤军和中央军夹击。在部队到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主力南下进击潮汕地区，企图获得苏联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朱德率第25师坚守三河坝。9月23日至10月2日，南下中共部队到达汕头。于潮安汕头战斗及揭阳战斗过程中，一度攻占潮汕，但最终于汤坑受到大败。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贺龙经香港转到上海。

湘鄂边苏区

贺龙到达上海后，向周恩来提出返回湘鄂西，获得批准。1928年1月，贺龙返回湘西，与周逸群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3月回到桑植后，组织起3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攻占桑植县城。4月初，在国军反扑时作战失利，队伍大部失散。7月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和重新组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9月，因叛徒出卖，部队遭国军多次袭击，损失巨大，被迫退入湖北鹤峰山区。在姐姐贺英指点下，贺龙决心创建新型武装。1929年1月，贺龙率部袭占鹤峰县城，创建湘鄂边苏区。此时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他谢绝了信中要他离开湘西到中央工作的意见，表示要在当地坚持斗争，并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等倾向，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不久，指挥红四军挫败湘鄂西民团联防的多路进攻，击毙总指挥王文轩，攻占桑植县城。7月，采取诱敌深入和伏击战术，歼灭国军向子云旅，使红四军发展到4000余人。随后率部向大庸、慈利发展，消灭地方武装和团防。

红二军团

1930年7月，贺龙率部东进，4日在公安县南平文庙与周逸群创建的红六军会合，任合编的红二军团总指挥，指挥所部攻占潜江等地。10月起，由于以邓中夏为首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命令红二军团南渡长江配合进攻长沙，部队接连失利，被迫退到鹤峰、五峰一带。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他任军长，率部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6月攻占房县，创建鄂西

北苏区。10月率部返回洪湖。1932年春，连获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使洪湖苏区进入全盛时期。但在夏曦左倾路线影响下，致使红三军第四次反围剿中陷于不利，被迫于10月退出洪湖，绕道豫西南、陕南、鄂川边转往湘鄂边。1933年，曾多次准备在湘鄂边重建根据地，但都未成功。期间，对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推行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进行抵制。1934年5月，率部进入川黔边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等地，创建黔东苏区。在此期间，蒋介石曾派遣熊贡卿前来劝降贺龙，但贺龙在报告湘鄂西分局后，将他处决。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11月，部队攻入湖南，在龙家寨歼陈渠珍2个旅大部，并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贺龙任红二军团兼军区司令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1935年初，国军以80余团兵力，分六路进行围剿，贺龙采取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战法，在桑植陈家河歼国军58师172旅；接着又在桃子溪歼国军58师师部及174旅，并乘胜东出慈利，连战连捷。5月，指挥部队转向湖北，以一部包围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区打援，歼国军41师师部和121旅，俘虏师长张振汉。8月在板栗园设伏，歼国军85师大部，击毙师长谢彬。随后又在芭蕉坨击溃国军陶广纵队10个团，彻底挫败国军围剿，并乘胜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1935年9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采用分进合击进攻湘鄂川黔边。11月，他与任弼时等从湖南省桑植县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突围国军封锁，开始长征。

1936年2月，在黔西县城参加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会议，决定两军团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之后与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与国民革命军周旋。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四川甘孜，与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期间与张国焘作斗争。10月，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

师，长征结束。11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12月，贺龙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8月22日，贺龙出席洛川会议，随后任命为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组成人员。25日，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贺龙任师长，率部参加抗日战争。10月起，在雁门关等地打击日军。在作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2月，指挥晋西北七城战役，收复七座县城，歼日伪军1500余人。同年秋，以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根据地。1938年12月，贺龙率师主力东进冀中，扩大冀中根据地并进行扩军。1939年4月，指挥齐会战斗，与日军激战三昼夜，期间遭日军毒气弹袭击中毒。1939年8月，因国共摩擦，贺龙率120师返回晋西北。10月，指挥陈庄战斗，歼日伪军1200余人。

主政西北

1940年2月回到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挫败日伪军扫荡。8月，指挥所部参加百团大战。11月，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

1942年，贺龙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陕甘宁边区面临日军和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贺龙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派359旅到南泥湾屯垦，使部队基本实现自给；统一边区财政，实行盐和土特产品统销制度，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1945年，贺龙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结束后，贺龙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指挥攻占文水等地。10

月，率部挺进绥南，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打击傅作义部国军。1946年7月，指挥晋北战役，攻克八座城市，歼阎锡山部8600余人。8月，同聂荣臻率部发动了大同集宁战役，因傅作义的巧妙救援，解放军的进攻以失败告终。1947年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部队及后方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保障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同时负责整个西北战场后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贺龙首先同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一起，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贺龙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并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主持了联防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将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指示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使野战军走到哪里，便可以在哪里得到供应，集中党政军民的力量，为前方筹集经费、粮草、被服、弹药，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加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地方兵团建设：压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升级为野战兵团。保障了西北野战军挫败国军重点进攻并转入外线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2月，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9月兼任西北军政大学校长。1949年2月，任西北军区司令员。5月，担任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主政西南

1949年10月，贺龙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率第18兵团翻越秦岭进入四川作战，以“先慢后快”的作战方针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迫使国军主力裴昌会兵团投降，攻

占西南全境。攻占西南后，他组织了一系列工作，包括整编国军投降部队，肃清土匪武装，恢复工农业生产等。同时，贺龙还部署昌都战役，促成西藏和平解放。

主持国家体委

1952年9月，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遵照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提出“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组织多种形式的全民健身运动，举办全国运动会，建设基层体育组织。1965年1月，向毛泽东推荐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他注重体育运动作风建设，提出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的“三不怕”和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五过硬”的口号，使中国体育运动水平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一些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乒乓球、举重、登山、游泳、田径等项目先后产生了一批世界冠军和世界记录，篮球、足球、排球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副总理

1954年6月，贺龙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当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此后又担任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主持机关精简整编。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3月，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巴基斯坦首任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的就职典礼。9月，出席中共八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主持国防工业

1959年9月，贺龙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国防工业，1960年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贺龙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狠抓军工产品质量，尤其重视飞机的生产；并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工业，完善国防工业体系。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63年9月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组织了大练兵、大比武等活动。1964年8月，在向毛泽东汇报军队减薪工作时，提出取消军衔制，获毛泽东认可。1964年11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后，贺龙随周恩来前往苏联访问，试图修复中苏关系。然而在11月7日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并与贺龙发生争吵。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则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来则认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未立即回应。周恩来随即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苏中关系因此继续恶化。

文化大革命时期

"二月兵变"

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贺龙对文革中无限上纲的作法表示不满。林彪和康生指控贺龙准备推动"二月兵变"，企图刺杀毛泽东，又指国家体委是"贺龙的独立王国"，"混进了大批叛徒、特务和走资派。毛泽东为了了解情况，在中南海游泳池邀约贺龙，对贺龙说："你不要紧张，我做你的保皇派！"他接着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9月6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打招呼"。9月10日，贺去见林。11月13日，贺龙在中共中央军委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要求军队院校师生发扬光荣传统，遵守纪律，不介入、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上街游行、炮打司令部等活动。

含冤受屈

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隔离贺龙，他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作了专门研究，要周亲自去落实。1月10日，贺龙在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安排，被转往西山，随即失去人身自由，被立案“审查”，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对贺龙不保了。”

去世

1969年6月8日，贺龙在糖尿病恶化的情况下并未使用胰岛素治疗，反而被注射高渗葡萄糖溶液，9日即因糖尿病酸中毒病逝于301医院。

平反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于1973年底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表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然而这一决定仍有所保留。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连鞠7个躬。后贺龙的骨灰由北京迁葬家乡张家界。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纪念与评价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为贺龙彻底平反时，称贺龙为“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并赞誉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顾全大局，豁达大度，平易近人，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1996年3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纪念贺龙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赞誉贺龙“多谋善断，沉着坚定，机智果敢，具有高超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实事求是，注重深入实际，讲求实效，勇于开拓，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贺龙除“贺胡子”的外号外，还有“岳飞岳鹏举”的别称。早在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就曾用“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激励部下。长征到达陕北后，毛赞誉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并对他率领红二、六军团低损失完成长征表示钦佩；此后还称贺龙为“老总”，而在中共将领中，只有朱德、彭德怀、贺龙三人被毛泽东称为“老总”。此外，贺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回忆说：“他为了把‘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搞上去，组织观摩解放军大练兵运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还请来世界女子排球冠军日本队的教练大松博文来帮助我们进行严格训练。采取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颇有起色。”1995年11月18日，刘华清为贺龙题词：“开国元勋，世人楷模”

1977年，由湖南省县两级政府拨款，将桑植县洪家关贺龙故居按原貌修复。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贺龙故居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11月，贺龙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2006年5月25日，贺龙故居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对于贺龙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他的旧军队出身。陈独秀在1930年认为“湘鄂交界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人数根本不能确定，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及农民组织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时期，贺龙则被冠以“大土匪”、“大军阀”等进行批判，最终被迫害致死。

家庭

贺龙家系

贺龙先祖原籍湖北省安陆府钟祥县贺家湾。远祖贺崇先，明末随农民起义武装余部来到湖南，在慈利县九溪卫落户。清顺治十年，桑植县土家族群众举兵起义，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桑植属九溪卫巡检司管辖。贺崇先被迫应征加入清军到了桑植，后来就在洪家关定居下来。桑植习俗将居民划分为“军、民、客、土、苗”5家，“军家”是指从军后在当地落户的人家，

贺氏属于汉族军家。据《贺氏家谱》载，贺龙的祖父、曾祖父辈，贺家均有人与谷姓和其他姓氏的白族人家联姻。因此，有人认为贺龙是白族血统。贺龙祖父贺良仕，武举出身，原有一定家产；然而到贺龙父亲贺士道时，家道中衰。贺士道娶鹤峰土家族妇女王金姑为妻，有五女二子，贺龙排行第四。姐姐贺民英（贺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

贺龙在家乡时曾经有一个童养媳徐月姑，生了一个女儿贺金莲。徐月姑在南昌起义期间病故。1920年，贺龙父亲被土匪截杀，弟弟被蒸死，族里按照桑植风俗，要丧事期间给贺龙续娶，以期生子，谓之“丧婚”。这样贺龙就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又纳了艺人出身的胡琴仙为妾。贺龙后将家眷接到上海。后来向元姑从上海回到家乡，1949年病故。胡琴仙和贺金莲被捕。国共合作以后，胡琴仙出狱，化名王琳回到家乡，晚年定居重庆。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分别娶了出身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蹇先任生有一女贺捷生，后离婚。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生有一子贺鹏飞，两个女儿贺黎明，贺晓明。

贺龙长子贺鹏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曾任海军副司令员。女儿贺捷生，少将军衔，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有谣言曾称贺龙之女贺捷生曾在文革中对父亲进行大字报批判，但贺捷生本人在2012年3月9日的全国政协讨论中对此否认，称网络流传为伪造，并呼吁彻查网络造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B0%91%E5%A5%87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谱名绍选，字渭璜，曾化名为刘卫黄、刘士奇、赵元启、陶尚行、胡服等，生于湖南宁乡，祖籍江西吉水，中国政治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第二任（第二至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6年至1966年间担任排名首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官方评价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早年曾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在上海、东北、浙江等地从事秘密工作，后前往中央苏区，领导职工运动，并参与长征。1936年，奉命前往天津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部署新四军开辟华中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参与重组新四军。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进入中共核心决策层。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刘少奇继续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主持土地改革运动，并曾组织"七千人大会"、领导中央经济改革，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来他反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且在四清运动时与毛不一致，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冠以"叛徒、内奸、工贼"进行批判。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刘少奇在放逐、拘禁中于河南开封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生平

青年时期

刘少奇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富庶的农民家庭。母亲鲁氏，为民国著名人物鲁涤平、鲁荡平姑母。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12年，刘少奇进入芳储乡小学补习班。期间，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很受启发，并剪去辫子以示坚持革命。1913年，其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又称玉潭学校），成绩优秀。1916年高小毕业后先后报考邵阳中学、长郡中学和一中，都被录取。1916年就读于宁乡驻省中学（现金海中学），插入二年级二期五班。1916年11月湖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从军队下级军官中招生，刘少奇借用六哥刘云庭的朋友刘少基的退伍军官执照考取。1917年5月1日湖南讲武堂开学，1917年9月湖南省督军谭延闿下台，傅良佐继任，湖南的南北战争爆发，该校解散。1919年初刘少奇插入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

1919年6月，刘少奇来到北京。这时五四运动已接近尾声。刘少奇经人推荐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在保定育德中学，刘少奇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东方》和育德中学自办的一些进步刊物，学习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这使他原定留学法国的想法开始转变，转而对红色苏俄十分向往。

1920年8月返回长沙。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在1920年的冬天，（我）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老先生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长沙，又由长沙到上海，进了当时青年团及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社。”

1921年夏初由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介绍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刘少奇等首批26名中国留苏学员于1921年8月1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登记注册，并领取了学生证。1921年，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刘少奇因国内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提前回国，在东方大学学时为8个月。

“当我提起笔来，我就回忆起46年前，我在苏联第一次见到的那个青年人（即刘少奇）的严肃面孔。当年，饥馑正席卷苏联，甚至一些共产党员虽然外表是气宇轩昂的模样，但私下却也嘀嘀咕咕，而这个高个子青年，长得瘦削白净，却能忍饥耐寒，没见过他有什么埋怨或沮丧的表现。在1922年时，当时的共产党人都充满着激情与狂热，而他却很少表现出那种兴奋若狂的状态。他颇具书生气，常深思不语。他的朋友很快就了解到这种真诚且有教养的品质是从小养成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他过于沉郁，缺乏青年人应有的朝气蓬勃。”

——张国焘

早期革命

1922年1月至2月，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处担任领导工作，数次领导铁路工人罢工，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年9月与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是此期间刘少奇与毛泽东相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刘少奇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在1925年至1926年间，刘少奇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领导政治运动和罢工，成为当地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次年4月，刘少奇与何葆贞结婚。

1925年12月，刘少奇在长沙被湖南省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妻子何宝珍（后改名“何葆贞”）、二哥刘云庭四处奔走托关系设法营救。请到同

县的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创办人）、省参议员朱剑凡作担保人保释；请刘家亲戚国会议员周震麟，周同时也与赵恒惕有亲戚关系，写信说情；请刘少奇母家亲戚、湘军师长鲁涤平给赵恒惕发电报说情。刘少奇于1926年1月26日被关押42天后获释。1927年1月领导了武汉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刘少奇在长期工作中逐渐总结出一套“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斗争方针，并对当时中共中央内部所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抵制，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策略不谋而合。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1929年夏，刘少奇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中东路事件中发动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同年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纱厂门口，因煽动罢工嫌疑与孟用潜一同被捕，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日后刘少奇成为“叛徒”的重要证据，即为此次被捕。

1930年夏，刘少奇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1931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处决后，成立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等九人组成。同年冬，刘少奇回国，任党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刘少奇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苏区，领导职工运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选为第一届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同年10月参加长征，担任红八军团的领导工作，后由于作战失利，红八军团撤销编制，其改任红五军团领导工作。1935年，刘少奇参加遵义会议，会上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之一。此后，刘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刘少奇和谢飞结婚，年底到达陕北，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12月，刘

少奇参加瓦窑堡会议。

1936年，刘少奇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领导中共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的抗日运动，并与国民党政界、军方、学生进行接洽。刘采纳柯庆施的提议，向中共中央请示，建议让被国民政府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的中共党员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反共发表的简单手续出狱，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刘的建议。关押在反省院的约六十名中共党员接刘指示，起草《反共启事》并登报发表后出狱。出狱的这批中共党员为北方局打开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此事因“手续问题”成为刘少奇的“罪行”之一（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把北方局总部调往山西太原，并与晋系军阀阎锡山进行沟通。此外，其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了开创中共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3月，刘少奇返回延安，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刘少奇与张闻天为反对最力者。

1938年秋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左起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

1938年11月，刘少奇参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以“胡服”之名挺进华中敌后，参与新四军在安徽、湖南、江苏一线部署工作。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

1940年初，刘少奇制定战略先集中发展苏北。在此战略指导下，陈毅、粟裕所部新四军从江南渡江北上，并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同时，黄克诚部八路军南下到达苏北，与新四军会合，将华北华中的中共根据地连成一

片。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指挥（陈毅代），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此后，刘少奇组织曹甸战役，进攻国军韩德勤部，但未能成功。

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的大发展以及该地区国共摩擦导致的直接后果即为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人经茂林北移。1月6日，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爆发皖南事变。新四军历经七昼夜激战，最终失败，叶挺被俘，项英被杀，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在当时局势下，刘少奇建议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告，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刘少奇当天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在苏北成立军部。18日，他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与陈毅等人重建了新四军，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其中首先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增建华中党校，以提高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能力；并组织温和的苏北整风，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及任务。在刘少奇的组织协调下，新四军也由重建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13.5万人。1941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讲演，提出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

1942年3月，刘少奇启程返回延安，参与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途中经过山东，处理了山东军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1942年12月2日，刘少奇返回延安，次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开始进入中共核心决策层，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整风运动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

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

章的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其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将“毛泽东思想”明确写入党章，并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中共七大选举的领导集体中，刘少奇名列中共五大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此后，刘少奇又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局势中采取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策略；同时，他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1947年3月，国军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国共内战，刘少奇则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董必武、康生等率中央机关一部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负责中共占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工作。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正太、青沧、保北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歼灭国军6.2万余人。同年7月至9月，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并颁布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同朱德、刘少奇会合。1948年5月，刘少奇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随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协助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1949年3月，刘少奇参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言。1949年6月至8月，与高岗、王稼祥率领中共

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徐介藩、翻译师哲陪同访问。6月27日，代表团下榻孔策沃别墅并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涉及向苏联贷款、派遣专家、上海等城市管理问题、新疆及少数民族政策、组建海军舰队、莫斯科与北京航线与配套设施、之后与苏共主席团召开中国政治军事的讨论会、国家机构设置和工商企业管理等。斯大林还决定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并决定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签订贷款协定。7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共举行了六次会谈（只有一次有会谈记录，两次会谈有确切日期）。会谈期间，刘少奇以电报的形式与毛泽东等人沟通。7月4日，以刘少奇的名义，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交一万余字的报告，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并向其征求意见。报告中提及中国将一边倒地倒向苏联，也提及了旅顺驻军、蒙古独立的问题和苏联从中国东北“搬走机器设备”的问题，认为“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9月，刘少奇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建国初期

土地改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出席开国大典。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其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农经济、团结和保护中农、没收地主土地，并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方法来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国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51年增长15.3%；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193.4%；农民个人生活也有所改善。1952年，刘少奇率领

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建国初期，毛泽东仿效苏联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将原属政务院的主管经济部门调走，总理周恩来被架空，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而高岗和饶漱石乘机夺位，刘高矛盾也恶化。于是刘少奇和周恩来联手，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于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批斗高岗，使之下台。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主张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下，应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随后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党主席毛泽东。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月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经济计划提得过大，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总理周恩来则说“用冷水洗洗”，刘也支持周说“现在有些人脑子太热了，提得太高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开始显现。毛泽东对于刘、周等人提的“反冒进”十分不悦。刘有一次将人民日报的内容为反急躁情绪的社论稿修改后交毛批阅，毛直接批示不看了。后来还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随即就是57年八届三中全会反“反冒进”，周恩来做了自我检讨，而刘少奇自忖“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支持毛泽东的一方占据主动，从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

1955年，毛泽东掀起农业合作社并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刘少奇作为一线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和具体的推进工作。3月份成都会议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4月底，刘少奇和周恩来等若干人一起开始“吹公社”、“吹乌托邦”，主张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搞供给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6月份，毛泽东批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之后，刘也紧跟精神宣称钢铁产量可以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并且和毛泽东一样，在实地考察农业生产的时候公开为浮夸行为加温。毛泽东曾经要求压缩一些过高指标，1958年底大跃进的弊病开始露出苗头之后，刘少奇承认“我的头脑也有些热，说过些过头话”，1959年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纠左”、“压缩空气”。

当选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指定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向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少奇接班任中国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作小范围吹风。4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自动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

庐山会议

7月2日-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左”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意见，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由此，参会的刘少奇等人开始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国防部长彭德怀，会议的主题

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2日—16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批判，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另一方面刘少奇为了维护毛的权威，仍然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

三年困难时期

196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汇报会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五次汇报会上发言：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 4月1日从广州到达长沙，开始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少奇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向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脱稿讲话：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

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了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要求全党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当前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

七千人大会期间，为了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同时针对代表们提出给彭德怀“下战书”事件翻案的要求，刘少奇在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主席写的信没问题，彭德怀的问题是“里通外国”。刘少奇还做了严厉的定性。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1959年彭德怀事件的定性

“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作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

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俩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提议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决定再版刘少奇在30年代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第二次修订。8月，《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此书。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到文革爆发前共发行1800多万册，党员达到人手一册。该书再版过程中仍保留了原先批判陈独秀的一些文字，如“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被毛泽东认为影射自己。文革期间，此次再版遭到严厉批判，被称为“黑修养”。

7月25日-8月24日，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开始十多天分小组讨论农业、商业等有关文件。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发言，批判所谓

“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8月11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上就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估计作了自我检讨，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全会肯定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的成效，决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26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少奇试图继续把中央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三年恢复时期与四清运动

1964年，刘少奇又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考察经济建设。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他和邓小平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1964年底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四清、五反问题进行批评，双方产生激烈矛盾，这使刘少奇、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同年年底，刘少奇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南海曾实行过高级干部自报口粮的制度，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均报每月13公斤，周恩来为每月12公斤，刘少奇为每月9公斤。刘是中南海所有干部中报数最少

者。

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中共党内的“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这“三风”与刘少奇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不但作了自我批评、严厉指责“三风”，还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然而此时刘少奇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看成是现实危险，他当时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对象仅仅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一类的社会性问题，这与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认识上有明显距离。

从1963年9月起，中共与苏共两党的论战全面展开，在国际“反修”、重点国内“防修”的大背景下，刘少奇开始把精力转移到正在全面铺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来。刘少奇主持修订了《后十条》，由毛泽东批准与《前十条》一起下达到全体人民，“四清”运动全面展开了。随着运动的进行，刘少奇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认为“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

1963年11月，刘少奇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指导“四清”，并将总结的的“桃园经验”作为“抓点带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蓝本。运动开始时，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过火现象不断出现，刘少奇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分歧逐渐暴露了出来。刘少奇认为“反修防修”的重点在基层，他主抓的四清运动以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和被认为变修的基层干部为斗争方向；而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出自党内上层，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把矛头指向基层；刘少奇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在会议上毛泽东占了上风，"四清"运动按毛的意见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过火偏向。然而，毛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为下一步发动更大规模的运动准备了理论前提。这时，毛泽东已经将刘少奇与"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内部以刘少奇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种方针，终于将不能再相容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

陷入困境

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在文革初期，刘少奇在某些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立场一致。 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与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结尾他说道："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然而两者矛盾逐渐扩大。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双方矛盾此起彼伏。 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北京后，拒绝刘少奇要求见面的请求，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 7月19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对于派工作组问题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表示反对。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局书记，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路，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同时其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虽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 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 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问题升级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966年12月，刘少奇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

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谢富治。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同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期间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选编委会主任职位，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之后几天内，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8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

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

1967年，刘少奇开始被软禁在北京家中。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学院群众到中南海西门驻扎，建设高音喇叭，称要把刘少奇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臭”，随后北京高校上百个组织前往声援，形成“揪刘火线”，围困冲击中南海，前后持续一个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对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头弯腰两个多小时并抄家。同年中共理论刊物《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矛头指向刘少奇：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同年8月8日，刘少奇再次提出辞职，但是之后的书信都石沉大海。刘少奇最终意识到，争辩无济于事，从此放弃书信和申述，并缄默不语，最终选择以沉默表示无声的抗争。然而批评之声并未随之减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布头版新闻，直指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撤职和开除党籍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持续遭到批斗。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人，达总数的71%。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包括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

的调查结果。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该报告，认为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并且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在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中，只有陈少敏一人反对该决议。刘少奇被罢免后，国家主席一职长期缺位，直到1975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废除。

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继续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11月27日，《人民日报》“揭露”刘少奇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病重去世

1968年初，仍然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刘少奇，精神和生活状态不断恶化。1968年起，他陆续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3月以后病情加重。4月中旬，他的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两脚移动吃力。7月上旬，刘少奇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但没有得到批

准，只能从医院借调医疗器械就地抢救。7月24日，刘少奇方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此事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并逐渐严重。

10月9日后，刘少奇后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10月14日的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中提出"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11月7日，他出现呕吐高烧病情病情。11月9日，高烧呕吐等病症再次复发。1969年1月14日，出现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缩以及大小便失禁。

1969年7月5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再次发作，医生会诊发现认为情况极为严重，后经紧急治疗病情暂时稳定。1969年10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做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因此决定进行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等人疏散到外地。10月17日晚，刘少奇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3284号）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医生董长城、护士曹兵、纪秀云、刘少奇原卫士长李太和随同前往。抵达开封后，他被囚禁于土北街10号开封市人委院的一个小套间中（原为开封银行的金库）。他的囚禁情况被数篇专文研究，包括后来的党史学术期刊、央视纪录片、新华网等。

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刘少奇抵达开封后病情继续加重。1969年10月24日、31日，刘少奇两次因支气管肺炎发作而病危，经随同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11月6日，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奉命返回，其监护医疗转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刘少奇病情再次发作，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按肺炎治疗。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出现异常症状，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呼叫其他医护人员。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71岁。刘少奇去世情报逐级上传，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人到开封处理后事。11月13日

午夜，专案组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冒用刘源名字申请，填写死者姓名为“刘卫黄”、职业为“无业”，并谎称此尸体为烈性传染病患者。11月14日，刘少奇遗体于开封市东郊火葬场就地秘密火化。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盒中，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平反、纪念与评价

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恢复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当天全国下半旗致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5月19日，遵照刘少奇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撒归大海。1981年，中共当局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其中江青、谢富治、陈伯达等人因涉嫌组织参与诬告陷害、迫害刘少奇致死等，被分别判处死缓、有期徒刑等刑罚。

随着刘少奇名誉和身份进行全面平反，相关的纪念活动陆续展开。刘少奇著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等多篇，收入

《刘少奇选集》，上下两集分别在1982年、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发行之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1980年版与1990年版）上，刘少奇成为纸币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余三位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1988年，其出生地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也重新修葺其祖居，并以刘少奇故居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00年，刘少奇逝世处被列为第三批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

2008年，中国大陆召开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的活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讲话上，评价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家庭与个人生活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为一位农民，为人忠厚，并不热衷买田置房，而是希望孩子多读点书。母亲刘鲁氏为普通农妇。刘少奇亲兄弟姐妹六人，大哥刘绍源，二哥刘绍远，三哥刘绍达，大姐刘绍德，二姐刘绍懿，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958年，当地政府把其故居修建成博物馆，刘少奇在1961年返乡时得知后，告诉当地党委秘书处取消这一安排，并把其房子分给当地农民居住。因为这一安排，刘在文革蒙难期间，当地民众隐瞒刘氏祖坟位置，使其祖居、祖坟都得以保存。其祖居现为刘少奇故居。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最后一位妻子是王光美。

元配周氏，无子，名字不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正月二十六日（1901年3月16日）亥时生，刘少奇家乡邻村的一个姑娘，包办婚姻。

二妻何葆贞（本名"宝珍"，1902年4月－1934年秋）：1922年与刘少奇结婚，三次忍痛将孩子割舍给别人。1934年死于南京国民政府监狱。有子刘允斌、刘允若，女儿刘爱琴。

长孙阿廖沙（俄语：**Алёша**，中文名刘维宁）是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时与俄罗斯籍同班同学玛拉所生。阿廖沙曾任职于俄罗斯国家航天指挥中心，2003年退役后定居于中国广州市番禺区，妻为冬妮娅。

一名曾孙和曾孙女刘丽达

一名玄孙

外孙女刘若楠，何宝珍之后。

三妻谢飞，无子，渔工的女儿。

四妻王前（新四军护士。曾与江青一同教唆已成年的亲女儿批斗刘少奇），有子刘允真（2019年病逝，享年72岁），女刘涛。

五妻王健，无子，由朱德夫妻介绍给刘少奇。因健康因素，婚姻仅维持几天时间。刘少奇将她送到中国东北疗养。

六妻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2006年10月13日）：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光学专业）与硕士学位，是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女硕士毕业生，并留校任研究生助教。王光美兄王光复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王光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士光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

长女刘平平（后改名“王晴”）（1949年5月13日－2009年12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食品教育博士。

儿子刘源（1951年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2015年12月19日官方宣布其退役。

二女刘亭（1952年4月1日－）：1986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就职于美国洛克菲勒公司，为联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北京联亚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小女刘潇潇（1960年－）：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1980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留德班学习。1981年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和卡乐斯堡工学院攻读生物遗传工程学。1987年获生物工程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创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5%BE%B7%E6%80%80

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原名清宗，后改德怀，字得华，小名钟伢子、石穿，湖南湘潭人，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彭德怀出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湘军，于1928年发动平江起义，建立红五军，任军长。此后，彭德怀与毛泽东、朱德等共同开辟江西根据地，并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参与长征。长征结束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抗日战争中，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发动百团大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后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攻占西北五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德怀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抗美援朝。1954年，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任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任内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制度

（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度）的确立。彭德怀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指出大跃进中的问题和弊病，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等，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首，后被撤销国防部长等职务，移居北京郊外吴家花园。1965年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押送回北京，遭到迫害。身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辞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宣布为彭德怀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生平

早年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农历七月廿三（公元1898年9月10日），彭德怀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的一个贫下中农家庭，为家中长子。彭德怀祖父彭安恭一辈有兄弟五人，勤劳耕种，家境尚好。到父亲彭民言一代，家道中衰。彭民言根据家谱，为彭德怀起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乳名钟伢子。彭德怀六岁启蒙，八岁时因母死父病，家境转坏而辍学，砍柴换米。据《彭德怀自述》中所载，其年少时，某年除夕，家无余粮，祖母叫他和弟弟彭金华往富家门第乞食，彭宁愿饿肚子，也不说自己是招财童子（乞丐）。因此彭一直说自己是贫下中农出身。

1913年，彭德怀受当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易华“打富济贫”传说和太平天国故事的影响，参加饥民闹粜被通缉，离家逃走。1916年，彭德怀加入汤芗铭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士兵，表现优异，授以军官训练，任班长。彭德怀此时与同连的黄公略、李灿等结为挚友，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1920年初夏，彭德怀参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战斗， 升为排长。11月底，参加湘军近10万士兵的闹饷斗争。1921年夏，彭德怀参加“援鄂自治”战争，湘军败退，随六团开赴南县，代理连长。同年秋冬，彭德怀为帮助

一个贫苦农民，派救贫会会员杀死华容县注滋口恶霸地主区盛钦而被逮捕，在送往长沙途中逃亡。

1922年初春，彭德怀到广东旧友鲁广厚独立营任连长。3月，彭德怀见鲁广厚胸无大志，便弃职回家种地。1922年8月，参加军校测验，保送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第三期入学，此时改名彭德怀。1923年7月讲武堂第三期毕业，回六团一营一连任连长。1924年4月，彭德怀代理六团一营营长。1926年5月，彭德怀实任营长。

1926年夏，广东北伐军进入湖南。不久湖南军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彭德怀任八军独立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此时，彭德怀结识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彭德怀在一营各连成立士兵委员会，以救贫会章程作为士兵委员会的章程。5月，彭德怀在岳州向师长周磐建议，攻击武汉的夏斗寅部，向长沙进军平定许克祥部，均被拒绝。6月上旬，为声援武汉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击败夏斗寅叛军，率部袭击城陵矶对岸的四川军阀杨森部。8月，参加唐生智第四集团军讨伐蒋介石的战争。1927年10月，彭德怀任一团团长。1927年冬，同中共南华安特委取得联系，要求加入共产党，并帮助段德昌秘密来南县养伤。

红军时期

平江起义

1928年2月，彭德怀支持师长周磐办师随营学校。推荐黄公略任副校长主持随校工作，按士兵委员会章程精神拟订随校章程 。1928年4月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团书记官共产党员邓萍主持了彭德怀的入党仪式，彭德怀正式加入中共组织。 6月19日，彭德怀率一团随独五师师部抵达平江。7月17日，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滕代远，奉湖南省委指示到达平江，与一团党组织取得联系。19日，正在三营巡视的彭德怀从友人的来信中获悉南

华安特委被破坏，黄公略等人的身份暴露，迅即返回县城。当晚，一团党组织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起义。 21日，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率部在嘉义起义，22日抵达县城。22日中午，一团士兵以闹饷名义，向平江县城进攻，解除了城内军警2000多人的武装，缴获步枪1000余支、子弹100万发，将县长刘作柱、清乡委员黄翰屏等人镇压 。23日，贺国中率随营学校从岳阳来平江参加起义。

24日，宣布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五军, 彭德怀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原一团团部书记官、共产党员邓萍任参谋长。全军共2500余人。不久，起义部队遭到湘鄂赣军的联合进攻，撤出平江东入江西修水、铜鼓、万载,转战于湘鄂赣边区，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

井冈山斗争

1928年11月，彭德怀与滕代远率红五军一、三纵队800余人向井冈山进军，并留三个纵队坚持原地斗争。12月上旬，彭德怀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随后，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

1929年1月1日，国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1月4日，中共在井冈山的领导人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留彭德怀守卫井冈山。随后，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和王佐部抗击国军向井冈山的进攻。然而由于国军势强，井冈山最终失守，彭德怀率部突围，途中损失惨重，仅存283人。随后，这支小部队突袭于都县城成功，又进一步攻占瑞金，并于4月1日在瑞金与红四军会合。毛泽东以国民党内争正酣，命彭德怀再返井冈山。5月2日，彭德怀抵达宁冈茅坪，此时红五军恢复至800余人。随后，为应对国军金汉鼎部围剿，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王佐特务营向湘东、粤北进行游击，先后攻占桂东、汝城、城口、南雄，缴获大量枪枝弹药。7月初，彭德怀回师井冈山，攻打安福城，战斗失利。8月下旬，彭

德怀率红五军返回湘鄂赣边根据地，与原红五军第二纵队（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全军已发展到3000余人。9月，出席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五军军部，将彭德怀率领的四、五纵队（原红五军一、三纵队）和湘鄂赣边支队（原红五军第二纵队）扩编为5个纵队，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国军对当地的进剿也逐渐停止，此时当地土籍和客籍两族矛盾开始激化，袁文才作为客籍一员掌握着当地的武装力量，枪杀了土籍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导致两族矛盾不可调和。10月，土籍控制的中共湘赣边区特委枪杀了与袁、王交好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并向上级报告袁、王二人可能叛变。1930年，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边区特委决定清除袁、王二人。1930年2月21日，袁、王抓住五县团总罗克绍不杀，作为绑票要罗交出兵工厂，被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认为是通敌。朱昌楷向彭德怀报告袁、王所为，朱还向彭提及袁文才偷看了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的内容，提出要立即采取行动。彭接受了朱的意见。2月24日，袁、王二人及其所部在永新县遭到湘赣特委指挥的部队与红五军第四纵队伏击，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亲手枪杀了袁文才，王佐则在逃出永新时落水淹死。同时杀掉了袁、王部“排长以上干部40余人，至于部下有1/3的人编入了红五军，其余的人则遣送回家”。这一事件带来的恶果是井冈山于1931年3月落入国军之手，直至1949年。

进攻长沙

1930年3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攻占袁川。4月下旬，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在长寿街与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会师，全军已发展到6000余人。5月6日，指挥红五军第二次攻占平江城。6月中旬，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遵照中央指示，扩编为红三军团，任总指挥。1930年6月9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计划，要“争取一省或数省

首先胜利”“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按照李立三的命令，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在攻占岳州、平江后，于7月27日攻占长沙。11天后，在何键的夹击下退出。

8月23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和红一军团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任副总司令。然而，李立三又急令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毛泽东只得从命，但是红军损失惨重，只好撤围。随后，毛泽东说服了李立三派来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决定返回赣南，攻占吉安。10月17日，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军委委员。10月下旬，出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新喻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并说服红三军团接受总前委的决定，东渡赣江。12月中旬，彭收到一封毛泽东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亲笔”信，信中让古柏审讯AB团时，逼供出彭德怀是AB团等。彭德怀看后，认定这是阴谋，便表态支持毛泽东。此后，彭德怀还在大规模肃反中保护了黄克诚等人。

江西反围剿

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彭德怀参与指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指挥三军团配合一军团在龙岗全歼国军近1万人，俘虏前线总指挥兼18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增选彭德怀为苏区中央局委员。5月16日至31日，彭德怀参加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一、三军团配合作战，全歼国军47师一个旅、28师大部和43师一部，取得中洞、白沙两战胜利。在红一军团配合下，红三军团在中村歼国军27师1个旅；在建宁全歼国军56师三个团。8月5日至9月15日，彭德怀参与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红三军团在其他红军部队配合下，于莲塘全歼国军47师一个旅，获得初战胜利。11月25日，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1月10日，彭德怀任攻打赣州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2月初，指挥主作战军（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四军）围攻、爆破赣州城，历时30多天未克，撤出战斗。3月中旬，出席在赣县江口圩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支持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途作战的意见。3月18日，任红军西路军总指挥。5月，指挥西路军红三军团占领湖南汝城。7月，参加红一方面军发起的南雄水口战役。8月19日，率红三军团参加乐安宜黄战役，主攻宜黄城，歼国军27师三个团。11月，率红三军团参加金资战役，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黄狮渡。歼国军五师十三旅大部。

1933年2月中旬至3月下旬，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此时，博古、李德等人掌握了红军领导权。博古等人提出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击敌人”，命令红三军团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7月19日起，彭德怀指挥东方军连克泉上、朋口、连城。8月，指挥东方军攻占闽江上游顺昌洋口和延平峡阳两个重要商港，击溃国军56师3个团。并包围顺昌、将乐，主力围攻延平。9月，驻扎福建的国军十九路军蔡廷锴部决定反蒋，彭德怀遵照中央指示先期与蔡廷锴代表在王台谈判。

1933年10月，国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彭德怀率东方军从福建回师江西，于飞鸢与国军周浑元六师遭遇，攻占询口，歼灭周师十八旅。11月闽变发生后，彭德怀建议中央令红军主力进军闽浙赣，支援十九路军，但彭德怀的建议反被斥为“冒险主义”。12月12日，指挥团村战斗。1934年1月，彭德怀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3月中旬，率红三军团前往泰宁堵击国军进攻，但未能达到消灭国军的目的。

4月中下旬，彭德怀被任命为广昌战役总指挥，此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4月28日晚，彭德怀与李德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期间彭德怀批评李德的错误指挥为“崽卖爷田心不痛”。随后，率红三军团于北线不断抗击敌军南进，指挥红三军团进行高虎堖、万年亭战斗，因孤立无援，阵地均被攻破。

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

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等地开往雩都县集结。

长征

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及一、三、五、八、九军团从江西雩都县渡过贡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林彪的红一军团作为红军的前锋。随后，红军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

1934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打开通向贵州的门户。12月28日，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1935年1月1日-1月3日，红军强渡乌江。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进行休整。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旨在研判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彭德怀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因军情紧急只参加了一天会议。

1935年1月29日－5月9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以摆脱国军的围追堵截。在二渡赤水后的遵义、娄山关战斗中，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担任主攻并攻占了两处，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1月30日（一渡赤水后的第二天），红一军团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致电总司令朱德，内容包括“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由于毛泽东来回调动部队，且红一方面军在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习水战斗等皆表现不佳，不少干部和士兵尤其对路走多了有意见。

5月初，中革军委决定分三路抢渡金沙江，林彪所部受令从龙街渡口渡江，其先头红一师在渡口折腾了两天因水流太急和无器材架桥设桥失败，由于林彪和师长李聚奎沟通不好，林少有的骂了娘，冷静下来听取报告后他向

军委反映。5月11日，林彪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的面打电话给彭德怀："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不答应。林又写了长信给中共中央"三人小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由彭德怀负责。林彪把信给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朱瑞和罗瑞卿看过后让他们签名，都被拒绝，他就签了自己的名发上去。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会理召开。会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和刘、杨的电报）是彭鼓动起来的。毛称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被关押后写的材料写道："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6月中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26日，出席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率红三军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进人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在此期间，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反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1935年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2日，彭德怀出席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被任命为司令员。随后彭德怀与毛泽东等率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11月3日，彭德怀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随后，协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直罗镇战役。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派遣

红军东征山西。1936年1月，彭德怀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然而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对此十分恐惧，并请求蒋介石调陈诚、汤恩伯、关麟征的中央军进行阻击。中共中央在红军获取物资后，随即撤回东征部队返回陕北，历时75天的东征结束。5月，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消灭马鸿宾主力，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

初期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并担任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副书记，被授予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9月5日，彭德怀与周恩来、林彪、徐向前抵太原，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红军参战问题。随后，彭德怀又协助朱德部署平型关战役和八路军配合忻口战役等行动。11月，彭德怀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

1938年1月15日，彭德怀与朱德、贺龙、刘伯承、林彪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干部会。会后应蒋介石之约在武昌与蒋会谈八路军支援徐州会战问题。2月，与朱德一起部署八路军各师主力破击正太、同蒲、平汉铁路和邯长公路，支援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3月2日，彭德怀任第二战区东路军副总指挥，并参与指挥东路军各部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消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随后，彭德怀又参与部署八路军第四纵队进军冀东、129师进军冀南、120师进军冀中等事宜。9月，彭德怀返回延安参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北方局常委。12月，彭德怀到西安、重庆等地会见蒋介石。1939年2月，彭德怀到冀南指挥反扫荡作战。

然而随着八路军武力在华北的发展，而冀察战区总司令、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又力图恢复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导致国共双方不断摩擦。1939年6月，为解决国共摩擦，彭德怀赴冀南同鹿钟麟谈判，提出解决河北八大纲领，但未得要领而返。之后，华北地区的国共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八路军在1940年采取全面行动，将国军逐出河北。1940年4月，彭德怀部署115师、120师、129师及各军区对津浦、同蒲、平汉、胶济等铁路干线及日军新修的公路、铁路、碉堡进行破坏。此时，朱德奉命返回延安，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便改由彭德怀主持。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彭德怀报告中央后，号令八路军各部准备针对华北日本占领军交通线、据点、封锁沟为主的进攻战役。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破袭战为序幕，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战役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战役”。至9月下旬为止，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井陉煤矿亦遭破坏。并占领娘子关的部分地区。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10月初，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暂告一段落。随后，八路军参战各部按照总部的要求进行休整，以利进行下一阶段的作战。为回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借以迫使八路军退出华北交通要道，先后对太行山地区、太岳地区、晋察冀边区、晋西北等地进行扫荡。此后由于日军大兵压境，各根据地的反“扫荡”战斗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国共关系特别紧张，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继续

对日作战。八路军随即展开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一方面以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骚扰游击战术）反击日军“扫荡”，另一方面抓住机会继续打破袭战和伏击战。到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击退日军扫荡，百团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按照中共公布的数据，八路军共投入105个团约40万人，取得了进行作战1,824次，攻克据点900余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和隧道等260多处，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的战果，史称“百团大战”；因此战役打响后彭德怀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事后还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奖章和蒋中正亲自发出的嘉奖令。但后来彭也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认为彭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为此彭在华北座谈会上被批了四十天。文革中挨批时造反派材料中出现了“彭德怀干这么大事也不和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是很坏”的说法。当代予以平反，不过现代报道有说法提到刘伯承对彭的“临机专断”有看法。

太行反扫荡

1941年4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华北军委分会，彭德怀被任命为副主席。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先后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为应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甚至时常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压力下，全军退入山区和乡村，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并积极开展山地及平原游击战迟滞和消耗日军锋芒。1942年5月，日军针对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区发动扫荡，彭德怀率总部机关在激战后突出重

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战斗中阵亡。

1942年1月8日，彭德怀发表《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一文，向华北抗日军、政、民提出实行精兵、简政、增加生产三项号召。1942年8月，彭德怀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年1月，彭德怀发表《关于敌战区与游击区的工作》一文，提出武装工作队的任务、组织和活动方式。

1943年9月，彭德怀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以后即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协助毛泽东、朱德指导华北敌后抗战。1944年8月，彭德怀对美军观察组作题为《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3次谈话，讲述了八路军七年抗战历程和战果。1945年6月，彭德怀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成为首批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的军事将领之一。

第二次国共内战

保卫延安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彭德怀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6年11月、12月，彭德怀前往延安南部和晋绥，指导保卫延安的若干事宜。1947年3月10日，各路国军20万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进行重点进攻。在此情况下，彭德怀主动向中共中央请缨，率领西北共军保卫延安。3月16日，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中国共产党调动5000兵力，凭借地雷和伏地堡垒顽强抵抗，国军19日攻入延安，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退。

随后，彭德怀利用运动战术与胡宗南在陕北周旋。3月25日，彭德怀指挥青化砭伏击战，全歼国军31旅旅部及九十二团，并俘旅长李纪云以下2900余

人。4月14日，指挥羊马河伏击战，歼灭国军135旅4700余人，俘虏旅长麦宗禹。5月2日—4日，又指挥蟠龙镇攻坚战，歼国军167旅旅长李昆岗以下6700余人，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号称“三战三捷”。5月下旬，彭德怀与习仲勋率主力进攻陇东，打击马鸿宾部，收复环县、定边、靖边、安边等地。1947年7月，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为引诱国军北上，彭德怀北上进攻榆林，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国军整编第36师师部及165、123旅6000余人，被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是西北战局从转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攻占西北

1947年10月，彭德怀发动延清战役，俘虏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随后，彭德怀第二次攻打榆林，未克。12月，彭德怀参加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同时开展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开展宜瓦战役，歼灭国军第24旅、第47旅、第53旅、第61旅、第31旅旅部5个旅29480人，击毙国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和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1948年4月22日，解放军收复延安。随即，彭德怀发动西府陇东战役，在第一阶段顺利攻占宝鸡，然而却在第二阶段在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夹击下遭受惨重失败。8月，彭德怀指挥澄合战役，歼灭国军9000余人，又在九月的荔北战役中歼灭国军25300余人。11月，为配合中共的“三大战役”，彭德怀发动西北冬季攻势，歼灭国军24960人。

1949年1月，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彭德怀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随后，彭德怀接替病重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于4月24日攻占太原，歼灭国军135000余人。之后，彭德怀率第18、19兵团加入西北战场，于5月20日会同贺龙部占领西安，并击退胡宗南联合二马的反攻。7月，彭德怀指挥扶眉战役，歼灭国军44000余人。8月，彭德怀指挥兰州战役，歼灭马步芳主力27000余人，攻占兰州城。随即，一野部队攻占西宁、银川，扫荡河西走廊，数十年据有

甘、宁、青三省的回军消灭。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在迪化分别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新疆不战而和平易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9月下旬，在北平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1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负责恢复发展经济和农业生产、交通建设、调查研究、团结少数民族等工作，并曾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朝鲜战争

1950年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9月15日联合国军在韩国仁川登陆，10月9日越过“三八线”，在北朝鲜和苏联请求下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半岛，林彪、粟裕因病未成为军队统帅，而10月8日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10月19日17时30分在安东入朝指挥作战。

10月，彭德怀利用美军及韩国军队分兵进攻的机会，发起第一次战役重创美国和韩国军队，美韩军队退回清川江以南。11月24日，志愿军在彭德怀的命令下主动放弃阵地，采取主动示弱，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故意采取“增兵减灶”的战术引诱美军深入，而误以为是对志愿军后方的空袭产生了效果，迫使志愿军后撤的麦克阿瑟命令美军和韩军展开全面进攻，以左翼的美第八集团军与右翼的美第10军为首发起了全线进攻。当美军进入志愿军的包围圈后，彭德怀下令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将美第八集团军击退至“三八线”。10月，毛泽东派其精通俄语、英语及法语的儿子毛岸英担任彭德怀的机要秘书兼翻译，任职于大后方的本部内。难料毛岸英到部方一个多月，即遭美军空袭而阵亡。彭德怀感到十分愧疚，但在毛泽东的

安抚下，彭德怀开始摆脱心结。之后志愿军又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攻占汉城，一直进攻至“三七线”。

此后，由于对前线情况了解不够充分，而前阶段又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命令彭德怀继续进攻，毛的这个判断后被认为是失误的。彭德怀多次陈述志愿军经过长时间的作战已经十分疲劳，加上后勤供给在完全没有空军保障的情况下遭受美军轰炸损失严重，前方战士的粮弹已经出现短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因为入朝鲜作战的仓促，很多士兵没有发到冬衣，在朝鲜的严寒环境下出现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导致战损比增大等实际情况，甚至亲自到北京向毛陈述不能继续深入的理由，然而被毛拒绝，要求必须继续进军，无奈之下彭只得命令志愿军继续深入韩国南部。

1951年1月志愿军发起第四次战役，横城反击战取得胜利，之后在砥平里战役中失利，为了避免陷入被动，志愿军开始主动后撤，联合国军取代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的李奇微发起反击计划，志愿军一面撤退，一面通过阻击战迟滞联合国军的前进，伤亡惨重，并退回“三八线”。4月，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向南进攻联合国军，歼灭8万多联合国军，为五次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但志愿军本身也承受了极大的伤亡，特别是在后期的撤退行动中。最终志愿军撤回“三八线”，在铁原一线经过与联合国军的血战阻止住联合国军。之后，双方转入了持久的阵地攻防战。

1951年7月10日双方停火谈判。

1952年4月6日彭德怀离开桧仓志愿军总部驻地去平壤与金日成会面，4月12日到北京当日住进北京医院准备手术。术后5月5日出院。中共中央决定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停火谈判持续长达两年时间，其间大小战役不断，均为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的拉锯战，包括白马山战役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美国称为三角高地战役）、金城战役等等，双方均伤亡惨重，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正式达成停

战协议。彭德怀于7月28日上午到开城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在《停战协定》和《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次日归国。

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说(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在停战后的1953年7月31日，由金日成主持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平壤召开，期间授予了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1953年8月11日彭德怀回国，取代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54年至文革前

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首任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朱德。1956年，彭主张建立专业化的军队，将主官的指挥权定在政委之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此反对，但是此时他的焦点放在刘伯承和罗荣桓两人身上。彭最终在毛的支持下击倒了刘伯承，但也使得军队中对他产生了怨气。而到了1958年毛也说服了彭确立主官政委并立的制度。

由于在战略预备队等问题上和粟裕累积起来的意见不和，彭德怀对粟裕每周向军委主席毛泽东汇报一次都不满，粟在报告写上“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彭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不写，又说粟是越级告状，粟的计划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曾经打算请辞总参职务未获准。1957年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被解职后，毛泽东也开始担忧将领拥兵自重，打算整顿军队，在这种背景下，195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彭德怀连同陈毅、聂荣臻、黄克诚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进行了极不公正的批判，粟裕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里通外国”的帽子，直到粟裕逝世十年后，于1994年才得以

彻底平反。至今《彭德怀全传》还说粟裕擅权布置打马祖列岛，是严重的错误。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与王树声、杨得志、肖华等20余人乘飞机从北京出发经莫斯科飞往波兰华沙，先后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5月29日至30日彭德怀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和赫鲁晓夫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出席了在地拉那的"游击队宫"举行的宴会。

彭德怀个性直爽、冲动，敢于毫无顾忌地发泄自己的不满，1959年7月14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写信给毛泽东。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接着彭德怀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7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发言，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主张发扬党内民主，支持彭德怀。

这封信遭到毛泽东估判与批评。彭德怀跟毛泽东起了冲突，忍不住回敬："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随后，原本主张"纠左"的毛泽东转而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林彪称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随后毛泽东对"冯玉祥式的人物"进行解释，对彭德怀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林彪）

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刘少奇以“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批判彭德怀。 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本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被严厉批判。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职务由林彪接任。

彭德怀被革职以后住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屯田六年，自食其力。1961年10月30日至12月26日到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将所写的5个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1962年6月16日，彭为了说明历史问题，写了《八万言书》，请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十中全会上，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毛泽东给彭德怀加了一个新头衔—“修正主义分子”。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撤销副总理职务。

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遂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

9月7日，康生在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时特别讲道：“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中央安排彭德怀工作的同时，专案审查委员会搞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认定“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黄克诚随即被安排任山西省副省长。

1965年9月23日，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谈话，毛对其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并对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称“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彭德怀）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彭德怀最终被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

1965年11月10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前一周左右的时间，毛泽东正式批准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12月21日，毛泽东公开出面讲话，进一步点透了他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关键意义。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文革身死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主管电力、煤炭、石油、燃气），其住处为成都市人民东路附近的永兴巷7号；1966年6月，在三线建委局以上干部学习《五・一六通知》会上遭批判。

1966年12月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王大宾等红卫兵在江青的授意下，前往四川成都把彭德怀强行绑架后，乘坐火车押回北京。

彭德怀在被关押期间，1967年1月1日，曾向毛泽东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简略地介绍了自己被关押的经过，并称“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这封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他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后，将信送请毛泽东、林彪和江青阅。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到了彭德怀这封信，拿起一支黑铅笔，在信上画了一个不规整的圈，没有批语，在毛家湾的林彪和江青同一天也都在信上画了圈。

在康生和陈伯达的支持下，1967年7月9日韩爱晶强行针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要彭德怀交待“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三面红旗’？”“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李钟奇还当众打彭德怀耳光。对于此前韩爱晶等指责他“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在华北搞‘独立王国’”，彭德怀打断韩爱晶的话予以反驳。对于“百团大战”因自己被批斗受牵连，彭德怀即使在狱中写“交代检讨”，也肯定了“百团大战”业绩和历史意义，只在具体的指挥上自己没有做得更好进行了严格的自省和检讨。

1974年9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去世前他希望见离异的妻子浦安修一面，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浦安修拒绝见他。10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三〇一医院”）因病去世，享年76岁。12月17日遗体进行火化，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写着化名“王川、男”三个字。彭德怀的骨灰盒被中共中央专案组派人送到四川省成都市，后保存在成都东郊火葬场。

恢复名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宣布为其恢复名誉，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邓小平称他是“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领导人”、“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乘飞机去北京。 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在“文革”中被迫害逝世的陶铸共同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后，其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

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彭德怀在狱中所写的材料后来被编辑成《彭德怀自述》一书出版。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

家庭

下中农家庭，8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而辍学学，此时“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

不满18岁入湘军当兵时“伯祖父已死，二弟当学徒去了”，家中“只有祖母、父亲和三弟3人”。

1918年，与表妹周瑞莲订下婚约。1920年彭德怀从军在外，周瑞莲在家乡反抗卖身抵债跳崖身亡。

1922年，娶刘坤模（原名：刘细妹）。1922年8月彭德怀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后，留妻子刘坤模在家侍奉年老的祖母和病重的父亲，直到1924年夏和1925年春，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才把妻子接至身边。平江起义时刘坤模回老家两人从此失散。1937年彭德怀在延安再次见到刘坤模时，她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

1938年10月10日，与浦安修结婚，无子女。1960年代初浦安修迫于政治压力，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临终前，希望见浦安修一面，浦安修终未敢同意。然而最终中央以离婚报告未批准为由，还是认定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

评价

1935年，毛泽东曾写诗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给彭德怀，评价了彭德怀的军事能力：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但是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的回忆录也记载，毛泽东也曾指责彭德怀“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1979年，杨尚昆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彭老总》；1998年，彭德怀诞辰100周年，杨尚昆发表了文章《追念彭大将军》，杨尚昆在评点彭德怀时说：“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扫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从1959年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德怀同志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在他的骨灰上种一棵苹果树，以此来最后报答养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

199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彭德怀的一生做了极高评价。

朝鲜战争时期，苏联驻朝大使兼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怀因为第三次战役是否要乘胜追击发生意见冲突，斯大林知道后马上调离了在

朝鲜战场的拉佐瓦耶夫，斯大林批示：“东方战场的指挥一切都听彭德怀的，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天才军事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D%AA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原名育蓉，字阳春，一字祚大，号育容、育荣、雨融、毓蓉、尤勇，乳名春儿。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林彪早年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届同学后名人尚有胡琏，戴笠，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他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转战井冈山，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等职，参加历次反围剿战争及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参加平型关战役，随后赴苏联养伤。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作战，平定东北、中南战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职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曾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及1970年宪法草案[a]，但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他的集团陷入与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权力斗争，而与毛泽东的关系破

裂，林旋即失势。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在山海关机场出逃，所乘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境内，机上全员身亡。

他在参与的抗日战争及苏德战争中均有出色表现。林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开国功臣，他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中国最北端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黑龙江一直打到最南端三十多摄氏度的海南岛，歼敌数量多于西北野战军及华北军区野战部队。

大革命时期

接受革命思想

林彪兄弟姊妹六个，除年龄最大的姐姐和年龄最小的妹妹外，中间是四兄弟，他们从大到小名字分别是庆佛、育蓉（林彪）、育菊（林程）、向荣。这四兄弟的字、号按照“正、大、光、明”四字排序，林彪字“祚大”，而其四弟林向荣的字“祚明”。林彪与林向荣都与其母亲容貌相似。林向荣不及两位堂兄林育英、林育南两位烈士著名。林向荣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太原战役时作为解放军第20兵团第66军第197师第590团团长，在战场上牺牲。

林育蓉9岁时父亲林明卿供其读私塾，其私塾老师李卓侯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思想开放、知识渊博，李说：“育蓉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

林育蓉的堂兄林育英和林育南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1919年7月，林育南、恽代英筹资创办的浚新学校，林育蓉入读，期间五四运动使各种进步思潮兴起，林育蓉也受到影响。

对联：

读书处处有个我在，

行事桩桩少对人言。

《上巳祀孔记》

孔子为我国周时代人，仁义爱民，为我国之伟人焉，故至今我们人尤敬祀之。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初五日，为仲秋上丁，全国各学校于此时祀孔，遵古礼也。吾校师生亦祀孔，同学高初共百余人，皆敬祀孔子。因孔子圣人，为我中华教宗也。

1922年3月，在林育南的动员和帮助下，小学未毕业的林育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董必武等创办的武昌共进中学，其入学考试作文《论男女同校》受到阅卷老师钱介盘的赞赏。林育蓉经常接触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

当时林明卿办的布厂陷入困境，在无钱供林育蓉上学的情况下去信叫林育蓉回家种田。1923年1月，林育蓉选择休学半年赚够钱再读书，在林育南的帮助下在小学当代课教师。1924年，他成为共进中学学生运动的领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被中共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1925年秋，五卅运动中林育蓉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经林育南介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夏，当选湖北省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林家大塆和回龙山一带中学毕业的人很少，林明卿来信要已经毕业的育蓉回乡办私塾当教师，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他没有回信。

投笔从戎

1924年底，根据陈独秀、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组织迅速在内

部选派优秀青年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为中共培养军事人才。林育蓉想投考的想法得到两位堂哥的赞许。他写信告知父亲，林明卿跑到武汉阻止不成，最终选择放手，还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林育蓉很感动。后林育蓉在上海考试通过被录取。

林育蓉到广州后，由于早就不满名字像女孩子，于是自行改名为林彪，别名尤勇。由于有林育南的引荐信，受到萧楚女、恽代英的照顾。1926年1月，进入黄埔军校入伍生团学习。3月8日，经甄别考试，升入第四期学生总队，被编入步兵科第2团2营3连，他是少数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担任3连中共党支部书记。

黄埔四期学员誓词：

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谨誓。

1926年12月，林彪被教官聂荣臻分派到第4军叶挺独立团2营7连任见习排长，后升任排长。与林彪同连的易水秋回忆：林彪很聪明，连长组织射击训练，他经常帮忙出点子，想办法。他在小铁桶装入白灰做为靶子，铁桶中弹喷出白灰，大大提高了射击趣味性从而提高了训练质量。

1927年5月，林彪升任73团3营7连连长，后所部历经上蔡战斗、临颍战斗。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南昌、湘南起义

1927年4月，蒋介石宣布清党后，林彪依然选择跟随中共。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2日，林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到达加入暴动。

“（林）带领的那个排在这场战斗中打得异常勇敢，林彪始终冲在士兵们的前面”。

26日，会昌战斗。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军队进攻拦截的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部万余人，7连一进入阵地，只有20岁的林彪发现面对的国军正面的火力很强，两侧较弱，果断指挥一个排沿着一条干水沟从敌人侧翼进攻，国军招架不住后撤，共产党军队一直追击进会昌城，曾是林彪老师的钱大钧吓得警卫都不要，扔下轿子只身骑马逃走，团部、营部均表扬了7连。

10月，南昌起义的主力几乎覆没。下旬，林彪所在南昌起义一部到达江西信丰镇城西（天心圩）。由于途中部队人数锐减且不少高层离开（林彪曾下令用石刑处决逃兵），朱德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并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干的可以回家，来去两便，绝不勉强”。陈毅、粟裕、陈士榘和萧克描述，林彪和一些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找到陈毅劝他一起走，陈拒绝，林等留下枪后离开，后遇到困难又归队，陈当着官兵面狠狠地批评了林，但仍让其担任七连连长将功补过，林彪后来指那是战略转移。

1928年1月，朱德所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林彪任1团2营2连连长。1月12日－3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发动湘南暴动。期间国军桂系李宜煊师一个团进攻耒阳，朱德率部撤出耒阳城，国军2月26日占领，林彪率领2连在几百农军的配合下，在附近的敖山庙伏击国军陈壁虎营，歼敌100余人（一说400余）。

3月1日，朱德率部攻打耒阳城，受挫向郴州方向退却。是夜，白天没参加战斗（可能是没赶到）的林彪在3000农军的配合下，指挥2连突然发起攻击，守军混乱中略略抵抗一下，伤亡了五六十人就开始败退。12日，朱德提拔林为1营营长。

井冈山会师

1928年4月28日，林彪随朱德、陈毅部与毛泽东秋收起义所部等会师井冈山。毛下山迎接时见林在路边给部队讲话："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红军也能坐天下。"次日，毛让林给井冈山红军做《红军能够坐天下》的报告。5月25日，会师的部队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林任12师28团1营营长。

6月，江西的国军对井冈山发动第四次"进剿"。6月23日，红28团发动七溪岭战斗，采取林彪的"从全团连排干部中，挑选一部分骨干组成冲锋队，配备短火器，每24人为一冲锋集群，编成十余个集群，轮番向敌人猛冲猛打"战术，取得胜利。8月25日，林彪代理红四军第一主力红28团参谋，11月升任团长，这时候他已经成为红四军的四号人物。

冬，林彪提出的"买东西要付钱"和"要讲卫生，盖厕所离家要远"，使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扩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林彪早期指挥部队的两、三次后撤在九一三事件被揭发批判，陈士榘则指这种为保存自己部队实力而后撤的"山头主义"情况中共军队出现过不少。

1929年1月，工农红军第四军错误地决定彭德怀部留守，主力离开根据地，导致连连败仗。2月10日－11日，大柏地战斗。红四军在军队每人只有20发子弹的情况下做出"最后一掷"，伏击了冒进的刘士毅部，战至第二天上午弹尽粮绝，许多士兵用树杈、石头、空枪与刘士毅部搏斗，获得胜利，俘800余国军，毛泽东表扬红28团战斗力强，能打硬仗。

3月，红四军将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编为3个纵队，21岁的林彪任主力第一纵队纵队长（又称司令，师长级），陈毅任党代表。

这时的林彪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1929年夏，闽西虎冈纵队司令部一勤务员拿了平民一点财物，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枪打死。当年12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一炊事员偷了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

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

5月23日至6月19日的龙岩战斗中。红四军三次攻占龙岩，第三次时的突袭将守城的陈国辉旅2000余人歼灭，毛泽东、朱德表扬红一纵队在龙岩的两仗打得十分漂亮。

6月22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朱德两人由来已久红军的建军问题的分歧爆发，朱德反对毛的“党管一切”观点，林彪支持毛的观点，会议上支持朱德观点的人占多数，毛被选下前委总书记的位子，会后毛离开红四军“养病”。12月29日－30日，古田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毛泽东获得红四军领导权，重新当选前委总书记，林彪当选总前委委员，进入红军决策层。

反围剿战争

10月－次年1月，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调集10余万人，在鲁涤平的指挥下，进攻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毛泽东在作战会议上问林彪：“红四军这次又是啃的硬骨头，你对粉碎蒋介石的反围剿作战有信心没有？”林彪和罗荣桓同时答道：“有信心！”。12月30日，龙冈战斗，红四军作为主攻，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围歼了国军突进的张辉瓒部，歼灭国军近万人。

1931年4月－5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调集20万人进攻红一方面军，林彪指挥的红4军在富田战斗、白沙战斗、中村战斗皆表现出色。7月－9月，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调集30万人进攻红一方面军。林彪指挥的红4军在良村战斗、黄坡战斗、方石岭战斗皆表现出色。

1932年3月12日，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25岁的林彪升任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4月，漳州战役。红一方面军歼国军两个旅大部，俘2300人。7月2日－10日，南雄水口战役，击溃国军15个团。8月16日－23

日，乐安宜黄战役，歼国军3个旅，俘5000人。11月16日－次年1月8日，金溪资溪战役，歼国军一个旅又一个团，俘4000余人。

1933年2月－3月，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调集约50万国军在何应钦的实际指挥下，进攻约7万红军。2月27日－3月1日，黄陂战斗。林彪首次指挥大兵团作战，统一指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21军取得胜利。3月21日，草台岗战斗，林彪指挥红一军团消灭了陈诚赖以起家的王牌11师。两次战斗歼灭国军1.9万人。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得到红军新领导博古等的支持，执行"王明路线"，毛泽东失去了指挥军队的权力。李德一改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改以阵地战、堡垒战，要求红军在战略上采取"堡垒对堡垒"、在战术上采取"短促出击"对付国军"第五次围剿"。12月－次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调集100万国军，并以50万重点进攻中共中央苏区。国军用重炮炸掉红军简陋的堡垒，而红军采用李德的战术在阵地战中攻击国军堡垒，因缺乏重武器连吃败仗。

8月31日－9月3日的温坊战斗，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和兄弟部队采用运动战，毙伤国军2000余人，俘2400余人。但这次"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胜利并没有扭转整体战局。

随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博古、李德等率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共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以向西突围离开根据地，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方式对付国军"第五次围剿"。林彪率红一军团1.8万人和彭德怀所率红三军团负责开路。

1935年1月15日－17日的遵义会议上。聂荣臻描述林彪无论在会议前和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伍修权、李富春也说林一言不发或没有讲什么话。但《林彪日记》描述："林彪即席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重申他的观点，批评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

及因指挥失当而贻误战机的战例。林彪列举温坊战斗未执行中革军委错误的作战方针，而坚持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正确。”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林彪在给中央“三人小组”写的信中建议变动人事，要求撤换毛泽东，但未被采纳。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后，林彪率未渡河的红一方面军一部奔袭泸定桥，先头部队红4团强行军，历经数场战斗于25日到达泸定桥一侧，后到的林彪迅速开会研究部署夺桥方案。红4团经2小时成功攻占。对此毛泽东说：“过大渡河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在那里失败了，它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

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

刘忠回忆：“林军团长在长征中经常生病，健康情况不很好。当红军翻过几座大雪山，要进入草地的时候，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有些草吃了会中毒，大家 把找到的大部分野草拿去给林彪看），凡是没人吃过的草，他都要亲自尝尝，亲自试试，并且还常常骑上骡子亲自到野外找，找到能食用的野草，就拿到各单位去介绍，或用文字通报全军”。

1935年6月16日－17日，林彪指挥了腊子口战斗。11月20日－23日，直罗镇战役，林彪指挥红一方面军毙伤国军约1000人，俘5300余人。1936年2月20日－5月5日，东征战役。林彪亲自在一线侦查地形为部队选择好强渡黄河的渡口，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西阎锡山等部，歼灭国军约7个团，俘4000余人。

这时包括林彪等人向毛泽东提议成立培养红军干部的大学获批准，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成立，林彪调任校长进行教学，不再任军团长。次年1月学校更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林兼任学校政委。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参与抗日战争

1937年7月28日，日军对华北发动全面进攻，中日全面战争爆发。8月25日，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林彪任师长。

1937年9月，在与国民政府军合作的平型关战役期间，林彪预判日军进军路线及视察相关地形后，决定不采纳毛泽东五封予以阻止电报意见，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为由回拒，他当时用湖北腔叫通信员回报只一句话“偕(湖北话读作ha，意为‘都’，下同)是中国人，有么事(什么)把戏(花招)看的，偕有义务打日本矮子”。其设下埋伏后放过日军的先头部队。

9月25日，林彪指挥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数十公里处，全歼日军板垣征四郎师团第21旅一部及辎重部队，115师余部阻碍了日军在两个方向上的增援部队，其中独立团在腰站战斗中击退了第九旅团一个联队，并对其追击，合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此役取得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战斗后林彪名声大噪，但他家里也因此被日军报复烧毁，林明卿举家逃难三年，逃到湖南，程潜得知，立即着人寻找，并且给林明卿盘缠，使得林明卿顺利到达重庆，并且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林明卿，还送给他一套棉衣，林明卿逢人便说这是毛主席送给我的。林彪的母亲和四弟的妻子、女儿等五人死在路上。

10月17日，林彪总结了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发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

林彪统一指挥所部及129师一部进行作战。11月2日，日军第20师团40旅团（旅团长山下奉文）79联队逼近昔阳城西马道岭，林彪指挥一个营节节阻击迟滞日军，掩护主力完成伏击部署，日军日行程仅7公里。11月4日，第一次广阳战斗。林彪指挥115师仅343旅在广阳至松塔镇地区伏击日军一个

步兵大队和辎重大队，4小时歼灭日军近千人结束战斗，343旅伤亡200余人。11月7日，第二次广阳战斗中129师3个团伏击歼灭日军250余人。

12月5日，林彪写出《抗日战争的经验》，总结了十五条打击日军的经验。12月22日，林给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写信：

我对时局很想了解全般情况，但苦无材料，同时自己分析力量更缺乏。我近来在抽象设想中也得到一些感想，故以姑妄言之的方式向你陈述如下……

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不是一举灭亡全华的，而是逐步鲸吞的。盖如此才便消化与对付国际上的嫉妒。

林彪分析了世界形势，认为各强国皆不会对日主动战争，指出：

中日战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中国应坚持打到底的方针，使此战蔓延成为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大战时，中国才更能胜利，世界革命也乘机发展与胜利。

此后林彪任内的115师还经历了冯家沟战斗、曲阳战斗、晋察冀反八路围攻战役、温塘战斗。

1938年1月13日，林彪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赴洛阳，出席由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以上将领会议。

赴苏联养伤

1938年3月2日，115师师部行军经过阎锡山部第19军（军长王靖国）第70师（师长）隰县北部千家庄村的防地，尖兵已经通知晋军班哨，但班哨还没来得及向连哨通报，骑马走在前列的林彪（身穿灰色面料、丝绵里子的八路军干部大衣）被晋军连哨王潞生开枪击中，背部脊椎左侧一寸远中弹受了贯通枪伤并打断半寸长的一截肋骨。115师司令部卫生所长彭芸生为林彪

止血包扎。晋军军长王靖国派参谋长曾当面向林彪道歉并表示慰问。115师师部按照预定计划继续行军，政委罗荣桓安排师卫生部部长谷广善护送林师长回延安。谷广善要求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同护送。最终朱涤新率一个警卫连，谷广善带两名医护人员和一名勤务兵当日就离开师部护送林彪西行。伤后六七天背部的伤口已经愈合可以下地行走几步。渡黄河时遇上延安专门派来迎接的医疗专家江一真，谷广善把林彪移交给江一真后就东返追赶师部。林彪此次受伤留下了困扰终生的植物神经紊乱症而后终生常注射麻药止痛，故林身型颇瘦。林彪被送回延安治疗，毛泽东罕有的骑马15公里迎接。林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发表《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关于军队领导问题的报告》等文章。毛说："我们的抗大，要培养出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像林彪同志那样的干部来"。

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后，林彪赴苏联继续就医。据称因苏联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林彪的神经机能，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后遗症。这种病病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重，根治的方法是手术把疤取掉，可这种手术非常危险，九死一生，最终手术没做成。病情被加重后林彪开始不信西医，自己研究中医书给自己开药。

参与苏德战争

据陈士榘在延安听到的传说，林准确地判断德军会绕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进攻法国，林彪又向苏联将帅解释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中国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1939年9月，据《林彪日记》记载："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大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但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高加索方向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全线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乌

克兰，但不幸被林彪言中。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林彪接替任弼时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1940年7月抗战三周年之际，《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林彪等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约9月，被编入苏联红军参加战争。刘亚楼描述，战争爆发后，“对于希特勒的某次行动，他有一个估计告诉了当时苏方相当重要的军事当局，以后敌人的行动，证明他估计中了。”

回延安及重庆谈判

1941年底，林彪回国，1942年1月5日，飞抵兰州，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会谈。1月16日，林彪抵达西安，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会谈。2月8日林彪返回延安，惯于晚睡晚起的毛泽东破例起个大清早去迎接（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从前线或苏联回来时毛都没有迎接）。回来的林彪继续任“抗大”校长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参加了当月毛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作家舒云指林一向对“抢救运动”敬而远之，没有整过一个人。

1942年9月14日上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见蒋。由于连日暴雨，道路被冲坏，交通受阻，直到17日下午才到西安。此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9月29日林彪乘汽车赴重庆，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10月13日，他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下去见蒋介石。林彪表示：“毛泽东一再告学生（林），今后两党应当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精诚合作，更求将来永远团结。......中共虽奉行共产主义，但绝不能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具体办法......依样行之于中国。目前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吾人唯依三民主义与抗战纲领努力......盼于委座领导之下，奠立巩固基础。以底于最后成功”。

12月16日下午，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第二次去见蒋介石，要求解除对陕甘边区的封锁，接济中共军队军饷、弹药、药品，没有结果。至次年6月28日，他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再次重庆谈判，期间蒋多次指示戴笠争取将林拉到国民党阵营，未成。1943年6月7日，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和林彪，同意他们回延安。6月28日，林彪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1943年7月16日，林返回延安。1944年10月18日，发表《今年怎样练兵》。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赴东北挂帅

1945年6月，鉴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总负责人罗荣桓得了严重的肾病，中央决定派林彪到山东出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如罗荣桓因病休养则由林彪代理罗荣桓的职务。1945年8月25日，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杨得志、肖劲光、邓华、宋时轮、李天佑、王近山、傅秋涛、黄春甫(江华)、聂鹤亭、邓克明等20多名高级干部乘坐美军运输机从延安飞抵黎城县长宁机场。林彪在太行山八路军前敌总部和早几天到达的叶群会合，住了一周左右，继续往山东走。1945年9月上旬，在豫北越过平汉路走了七、八里地与一股日伪军遭遇，夜间战斗中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差点丢了，同行的陈毅急忙布置人回到铁道附近去找。第二天，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汽车来接，到了濮阳的冀鲁豫军区驻地，休息了几天。

194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决策抢占东北。9月12日，中央从延安致电正在重庆的毛泽东：是否考虑派一个得力的军事指挥员去东北？1945年9月17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9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重庆致电中共中央转张云逸（新四军代军长）、饶漱石：同意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越快越好。9月19日刘少奇负责的中共中央发电："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

9月22日，林彪在濮阳致电山东分局、华中局并转中央：

为坚决执行军委的意图，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的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军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萧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

9月24日，林彪致电军委，表示将以最大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并告动身的具体时间：我与萧等现在濮阳军区，拟25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曹里怀率冀鲁豫第21团和少数干部编成的干部队，从濮阳出发，护送林彪、萧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江华等首长离开上拐村，经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南宫县、冀中的河间、霸县等地转道前往热河赴东北。1945年10月17日，林彪在冀中接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电报，"由于东北情况紧急，林彪及到冀东的部队决定速开东北。"

林彪一行于10月18日夜越过京山铁路，10月19日上午抵达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香河南部。10月19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了《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宁、安东的方针》。10月2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致林彪、萧劲光电："（一）你们两人均赴沈阳，愈快愈好。"10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高岗说："'勾子（屁股）'靠着苏联，只要把脸面前海上陆上几个口子一堵，东北就是我们的了！"。林彪10月25日到山海关，东北局派火车迎接，于28日到锦州，10月29日到沈阳与彭真的东北局会合。

1945年10月30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国军最高统帅（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并陆续调来国军精锐挺进东北，这些国军大部分美式装备，经过美军训练。

1945年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真：″林彪现在何处？″ 同日，刘少奇起草签发的中共中央致林彪、肖劲光电：“你们现在何处？中央前电要你们即速赶到沈阳，收到否？你们意见如何？久未得复，甚为焦念。现美蒋军急于在营口、葫芦岛登陆，苏军恐怕难以拒绝，我军必须坚决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在此情形下，冀东战略地位已不如沈阳重要，望你们星夜赶去沈阳指挥作战。”因而，拟定的中共冀热辽中央局实际未能成立。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决定我党部队及东北抗联部队正式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11月21日，林彪表示“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1946年2月13日－14日，林彪指挥身边的东北民主联军1师和3师7旅发起秀水河子战斗，部队首次运用他发明的“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歼灭冒进的一部全美械国军1600余人，自伤亡946人。

失利及逆转困境

1946年4月4日，进至东北的国军精锐进攻10万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第二次四平战役及本溪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像以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一样，打起了阵地防御战。在孙立人指挥的国军的攻击下，民主联军连连失利。5月18日，见势不妙又迟迟得不到毛撤军指令的林彪“私自”下令撤退。之后蒋介石非常有争议的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6月7日－10月下旬，东北战场双方一直无战事。

6月16日，林彪升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七七决议”，所部逐渐

在东北农村生根，加上后来开展的诉苦运动，军队实力大为提升。

12月17日－次年4月3日，“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役。林彪针对杜聿明“先南后北”的战略，在国军进攻南满时则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进攻国军，国军调转枪头进攻北满时则南满进攻，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南北呼应，使国军顾此失彼，加上中共的士兵吃苦耐劳能强行军的特性和林彪出色的战术等因素，杜聿明的进攻计划以失败告终，毙伤国军23,900余人，俘5.4万余人。

三季攻势及辽沈会战

三季攻势

1947年5月13日－6月30日，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反攻，发起“夏季攻势”进攻48万国军，针对国军分散守点的特点，以围城打援主要战法，毙伤国军2.3万余人，俘虏6万余人。其中的第三次四平战役失利后，林彪、刘亚楼吸取教训总结出“四快一慢”战术，林又总结龙书金的作战经验总结出战术“四组一队”。

9月14日－11月3日，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以远距离渗透奔袭为主要战法，毙伤国军3.6万余人，俘2.6万余人。12月15日－次年3月15日，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歼灭国军15.6万余人。把东北的国军压缩包围在长春（郑洞国部约11万）、沈阳（卫立煌、廖耀湘部共20余万）、锦州（范汉杰部15万）等几个互不相连的据点中。东北的国军以大城市的工事抗衡，希望重蹈第三次四平战役之胜。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林任司令兼政委。8月14日，建立了单独的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林任司令。

1948年，5月24日，东北人民解放军1纵和6纵试打长春城仅占一机场。基于长春城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做为关东日军司令部苦心经营多年，工事甚好且外有援兵，29日，林彪发电中央军委：“……24日战斗结束以后，连日我

们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个纵、师首长对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甚高”，建议以部分兵力围长春，主力转至外线。30日，林彪召集东北局、东北军区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6月1日，林彪签发“东总”电，决定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粮禁入”和“人禁出”，以期民兵争食，使城中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这个方针加上国军抢夺平民粮食等因素，最终导致大量平民被活活饿死。10月16日－19日，城内国军倒戈、投降。

辽沈会战

拖了许久的林彪决定采纳毛泽东先攻锦州的方案，而非自己先攻长春的方案。毛方案风险较大，其弊端是锦州如短期不能攻克，国军东西兼内外夹击，解放军无法带走重炮，形势将大为逆转。林彪的迟疑之举在九一三事件后受到中共党内多番抨击。

9月12日－11月2日，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70余万和民兵进攻55万余国军，发起震惊中外的辽沈会战。10月24－28日，辽西战役，林彪充分发挥他发明的“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和“三猛战术”战术中的“猛追”，大胆让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迅速缠住要撤走的廖耀湘兵团，结果东北野战军两昼夜歼灭国军10万余人。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歼灭国军47万余人，自伤亡6.9万余人，占领全东北。

平津战役及南下作战

1948年11月29日至次年1月31日，林彪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发动平津战役，他先是利用刘亚楼与国军守军将领陈长捷的代表谈判的机会，制造攻城指挥部及主力部队都在城北的假象，诱使陈长捷将主力部队调往天津城北，使天津中部城防空虚，再利用天津沿铁路南北走向的特点，指挥各主力部队在天津中部东西对进，29个小时攻占天津。平津战役

歼灭国军52.1万人，自伤亡3.9万人。

1949年3月11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4月到次年6月，林彪统一指挥四野大部及兄弟部队，对剩余多在中国南方的国军主力参与或发动了安新战役、宜沙战役、湘赣战役、衡宝战役、广东战役、鄂西战役、广西战役、海南岛战役，攻占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衡宝战役后期林病倒，在担架上指挥。

作家张正隆表示：以前大陆的历史书说到四野南下就“摧枯拉朽”之类的几句。“可是我在采访中发现，真实的历史是很残酷的。”“中暑、打摆子、生疥疮、烂裆、夜盲……这些情况非常多，有的部队的非战斗减员竟有一半之多。这种残酷有时比战争本身还可怕，有的战士不怕战死，但受不了水土不服之苦。”“在一次强行军中，有一个战士用尽最后的力气冲出队列，拉响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痛苦了”。但林也说过：“不要怕疲劳而累死人，因为疲劳而累死人总比慢了而受伤损失小得多”。

1949年7月1日，针对之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工作重心在乡村的时期已经结束，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而又兼顾乡村的新时期”林彪作报告给出了不同的意见，李先念、黄克诚和杜润生都对这个报告评价甚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林彪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建国后林一直离群索居从不介入将帅圈子，“他不串门，不见客，登门来拜访的人多数也被叶群挡驾”。

跃升政治局常委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提议林彪挂帅入朝军队，多次劝说下林都称病推辞，并坚持反对出兵，认为“国家刚刚解放，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不如美国，不能引火烧身”。林彪还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在挑拨“美国已经给我们信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立即与中国建交。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但不失为一个机会”。之后林去苏联“养病”。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况进入拉锯战。1951年6月18日左右，林彪回到国内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的工作，但不久又由周接替。11月5日，林被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林彪任国务院副总理（位于陈云之后，邓小平之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4日，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邓一起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27日，林被授予元帅军衔，他和刘伯承没有到场出席毛泽东的授衔仪式。9月15日－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全票少一票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而那一票是他投给林彪的。28日，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林彪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25日，在五中全会上，毛提议补选长期养病的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帅中仅朱德当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通过，从此林进入中共最高层，名列第六。

林彪没有因为获得晋升而掌握大权，“在此期间，他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休养为主”。

1959年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5日，

林彪被毛泽东召上庐山，林跟大多数与会者一样不光彩地对彭德怀进行言辞激烈的攻击，但当彭因林彪会理会议前的信被毛攻击时，林澄清：“我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会议后彭德怀等人被打倒。9月17日，由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成为国防部长。26日，林彪、贺龙成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一、二副主席。这时开始，林彪将其部下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黄永胜等人安插在中共军队的重要位置。

促进国防现代化

1960年2月，林彪把毛泽东在1939年对“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八个字串联成“三八作风”。

这段时间的林彪，坚持军队建设必须向高科技发展，并对军队的科研工作大力支持。1960年2月27日林彪在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提出：“1、将来的战争是要按电钮的。2、战争准备中间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我认为就是解决武器，特别是搞尖端武器。3、今后的战争已不只是靠步兵，而靠空军，导弹。空军在战场上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成为致胜手段。应当优先发展空军。”指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等。

1961年10月、11月，张爱萍向林彪汇报不少中央领导人要求原子弹下马，林指示：“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错误并希望结束。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检讨三面红旗

的问题，刘在台上讲，毛泽东不断插话。在一片检讨的声音中，林彪于29日抛开军委办公厅为他准备的讲话稿，脱稿发言：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大部分与会者认为林彪的讲话非常之好，毛泽东更当即鼓掌叫好（唯一称赞的评论），并要求刘少奇整理记录下来。3月20日，毛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教导罗要向林学习。

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如果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不正视几年来国民经济遭受的重大挫折与‘三面红旗’的关系。比如‘总路线’，一直强调‘速度’是灵魂，只强调‘快’，忽视了好和省。‘大跃进’，顾名思义也是强调高速发展，因为中央下达的指标过高，下边就开始浮夸，浮夸上来的数字，又被中央接受，在虚幻的高数字下构造经济计划，反过来又指导地方工作，以致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经济全面崩盘，农业上使人没有饭吃，工业上劳民伤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大跃进’，大跃退还差不多。”杜润生在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感觉到林彪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当时就有人这么说”。

文化大革命的五年

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中共官方称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以“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等罪名诬告罗瑞卿，毛泽东信以为真打倒了罗。但林彪女儿林立衡和作家舒云认为这与林彪无关，是毛要打倒刘少奇的前奏。 5月18日，在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并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匆匆召开。4日、5日，毛两次要林彪回北京出席，他都说有病不能出席，周恩来赶来亲自请林彪。6日上午，毛以休会的办法“等”林来（以后叶群不到会毛也用这个方法）。6日晚上，林一到毛便来迎接与他“说事”。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正式开始。由周恩来提议，全会通过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且林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跃升至仅列毛之后。全会上刘少奇做检讨完后，林说好，并站起来与他握手。

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李文普也表示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去看望，说了一句：“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后林在中央专案组关于审查刘的报告中回批：“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

致敬"。有人认为这是暗示专案与他无关。

8月18日－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以表示支持，林彪每一次都能站在毛身边出席，林喊道："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林彪"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陪又不行，有时也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

9月9日，林彪以国防部长身份成为美国杂志《时代》美国版的封面人物，照片右上注脚写着"中国人的噩梦"。当月，毛泽东让林彪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的《范晔传》。郭嘉是曹操的功臣，38岁就去世。范晔因"谋反"被宋文帝杀掉。二人的关系终于首次响起警号，向来对形势能够精确预判的林彪显然已对未来之事心中有数了。

不同于文革时期毛泽东要别人不要对他搞个人崇拜多是停留在口头上，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指示停止最近又弄起来的《林彪语录》（以前禁过）。同年夏季，他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出版物，不要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怕禁不了他就把文件印发了几千份发下去要求照办，此后报刊上基本再没有这样的宣传。之后他知道因庆祝他的题词的庆祝方式分歧引发一起武斗后，他干脆从此不再题词。

贺龙、杨余傅事件

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打招呼"，他说："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溷乱，企图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要有所警惕。"，到会的几位老帅纷纷表态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作家舒云认为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贺龙被打倒也是毛所为，与林彪无关。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军队干部大会上讲话，传达中共中央3月22日的命令："……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职务，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

学者王年一认为，事件是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的，与林彪毫无关系。这件事保密程度非常高，林彪、汪东兴、陈伯达毫不知情。甚至奉命去抓杨成武的李作鹏、邱会作也对此一无所知。

成为毛泽东接班人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破天荒地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加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作家高文谦总结："（林）当甩手的二掌柜，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不主动表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则总结为'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这样既可免遭毛泽东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以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

约9月，林彪接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对于越南战争他不断强调："面对强大的美国，你们的办法就是熬，熬就是胜利"。

庐山事件

林彪在文革期间，重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杨成武倒

台后，他们四人掌管军委办事组，实际操控军队。1970年3月开始，毛泽东针对宪法草案问题，多次提出反对设立国家主席，遭到林彪，周恩来，康生等诸多政治局委员的集体反对。

1970年8月13日，在宪法草案起草小组讨论会上，吴法宪就起草宪法草案中是否加入"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南"的字句与张春桥激烈争执，张春桥借苏联吹捧"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讽刺林彪，引发吴法宪强烈抗议。此事升级到了林彪处，引发林彪关注。张春桥与林彪集团矛盾公开爆发。

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三次庐山会议），林彪首先发言，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这次谈话成为整个林彪事件的导火索。随后的小组讨论会上，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陈伯达、汪东兴的带动下，公开批判张春桥，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支持。众多中央委员误以为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张春桥，并积极向毛泽东和林彪效忠，许世友甚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将张春桥劳改。引发了毛泽东震怒，从而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林从此分裂。会后毛泽东采用了"抛石子"，"掺沙子"，"挖墙脚"等手段针对林彪集团的主要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林多次求见毛不成，两人关系急转直下。

林彪讲话之前是否请示过毛泽东成为焦点。官方尤其是毛泽东认定林彪事前没有商量（毛泽东南巡讲话），是突然袭击；然而陈伯达、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均作证林彪事前请示过毛泽东，而毛泽东要求林彪讲话时不要点名（张春桥）。

毛林决裂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发起批陈整风，矛头直指军委办事组四人和叶群。至1971年4月，五人先后多次给毛泽东写检讨。毛泽东态度多有反复，时而说"问题不下（庐）山"，时而说是"突然袭击"，"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

员”，毛远新甚至用“未遂的军事政变”这样严厉的字眼（而吴法宪等人认为这个说法不是毛远新发明的）。终于在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他们的检讨在这里已经“算完了”。然而经过五个月短暂平静之后，1971年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沿途经过各省市，与地方负责人谈话，“下毛毛雨”，公开他与林彪的矛盾，宣布“第十次路线斗争”，为斗倒林彪作准备。毛泽东要求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保守谈话秘密，但又说可以透露给常委，刘丰不置可否，最后告知了邱会作，并辗转传到了林彪耳中，林立果的“小舰队”在恐慌之下试图反击。

1971年3月22日－24日，据中共官方描述，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9月8日－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刺杀毛泽东，毛对此有所警觉，突然改变南巡行程，乘火车提早返北京，并沿途加速不停站，最终安全回到北京。

出走与坠机身亡

9月12日十五时，毛泽东抵达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吴忠等人。除周恩来等人外，在京中央委员对毛泽东突然返回均不知情。当天下午，因不明途径林立果得知毛泽东返京，他从西郊机场乘坐256三叉戟赶回山海关。当天晚上，林立衡密告8341部队，叶群企图劫持林彪。消息传至毛泽东处，引起周恩来警觉。随后周恩来与叶群通话，询问飞机，周恩来劝林彪不要夜航，并说要去北戴河看望副主席。

二十三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突然乘车从北戴河闯出，警卫李文普从车上跳下受伤。此时，周恩来通知吴法宪前往西郊机场指挥；李作鹏则转达周恩来指示，阻止飞机起飞（但事后李作鹏暗示周恩来无意阻止飞机起飞）。汽车经国道抵达山海关机场，随即林彪等人乘机，在机场熄灯，导航关闭，飞行员得不到位的情况下强行起飞。飞机先向大同方向飞行，后转向进入蒙古，随即因不明原因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丧

生。

林彪死后被中国驻蒙大使馆草草土葬，后苏联情报人员察觉将其挖出，头盖骨送往苏联检查，确认死者身份为林彪无疑。目前林彪遗骸仍然未能回国。

身后

林彪死后，受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指示，相关人员对其抄家时搜出的各种书上有林只言片语的手笔：

他先为你捏造出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再来驳你的意见。并不，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对苏联，做绝了，绝则错。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向县团级以上的中共干部，印发声称是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全部的影印。后又将抄家得到的只言片语部分置于“批林批孔”材料中公开，曝光林彪反对毛泽东。

1972年1月，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时表示，“林彪是反对我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197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次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展开。

林彪反党集团案

林彪死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尚未解除职务，甚至还协同周恩来参与了对林彪座机的跟踪和事件处理。十天之后，9月24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在人民大会堂以召集政治局会议的名义诱捕了四人。四人被转移至京郊军营接受审查。1973年中共十大，四人被定为林彪集团成员，永远开除出党。

林彪倒台之后，除了林立果的“小舰队”和林彪的“大舰队”相继倒台外，很多原红军时期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解放军东北四野和空军系统的人受到了牵连。另外江西革委书记程世清，浙江省革委书记陈励耘，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甚至自杀的公安部长李震，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也受到大小不一的冲击。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四人非但未能释放，反而被转移至秦城监狱。1980年，四人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判刑。

文革后期对林彪的批判

林彪以突然出走的方式结束了政治生涯，中共中央对此采取了保密措施，短期内严禁泄露。随着国外媒体的披露和林彪长期不出面，国内民众逐渐得知了这一消息。从1973年开始，毛泽东发起了批判林彪的斗争，在中共十大上，林彪集团成员被全部开除党籍，林彪被定为“叛徒”“叛党叛国”。据当时尚未倒台的政治局委员吴法宪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记载，林彪出走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就商讨草拟了林彪的十六条罪名，包括了长征期间顶撞毛泽东，辽沈战役不听中央号令等。后来直接将林彪和陈伯达放在

一起，发动批林批陈，称作“林陈反党集团”。而陈伯达的一系列罪名也罗列到了这个集团的头上。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对林彪的早期批判集中在“唯生产力论”，陈伯达的九大报告等角度。1971年9月中旬中共经内部通知向高级干部通告林彪情况，10月后逐级传达，12月中旬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三批材料。

1973年9月，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列举了林彪的罪行：“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1971年3月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9月8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9月13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1974年，在毛泽东授意下，江青等发起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又将林彪与孔子并列批判，罪名是“批判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其后又将批林批孔演化成了批大儒，最后成了批周公。

文革结束后对林彪的评判

邓小平在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掌权，作家舒云描述，胡耀邦、陶铸夫人等人曾向邓建议给九一三事件平反，但邓拒绝并下了死命令禁止给林彪翻案，他强调要把林彪和江青绑在一起。1980年11月20日－1981年1月15日，中共组织特别法庭“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中共中央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

……这次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刑事犯罪，不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解决敌我矛盾，处理路

线错误是解决党内是非。这两个方面，必须明确地、严格地区分开来。决不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牵连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过错、失察等。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文中虽然指出毛泽东应为他的“错误发动”的文革负主要责任，但描述“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文中林彪的名字稳居毛泽东夫人江青之前。 12月底，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在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1990年代及之前，中共提及十大元帅往往会隐去林彪。近年来评价渐趋客观。2007年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林彪的照片30年来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并正确按照十大元帅排序（林彪排在第三）。中国军事博物馆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一身戎装的林彪像，赫然现身。官方媒体报导时，用“实事求是”、“客观态度”、“尊重历史”等词汇予以诠释，展览馆处长也明确表示：“以后不再丑化林彪”。其名人故居也已被开放为民间旅游纪念景点。2013年后湖北省黄冈市黄冈博物馆新馆第六展厅展线开始陈列林彪铜像，这也是官方博物馆中首次单独出现林彪铜像。中国大陆的历史剧中，林彪也经常以正面形象出现。

个人生活

饮食起居

根据林彪的秘书谭云鹤的口述：林彪生活简朴，没有特别要求。林彪没有

玩儿，也不玩儿，也不讲吃穿，林彪的厨师是冀东人，同时是个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技术却不行，但林彪从来不说。林彪最大的苦恼是睡不好觉，失眠。林彪喜欢腊肉，因为他在书上看到吃腊肉可以帮助睡眠，但是实际上吃腊肉也没什么辅助睡眠的效果。林彪在生活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开上电灯，林彪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林彪不爱运动，不会跳舞，也不爱玩，他的运动就是偶尔到外面散散步。林彪的另一个兴趣是喜欢游车河，经常调车四处转，而他则静坐在车中思考一些问题。

读书生活

根据林彪的秘书谭云鹤的口述：林彪脑子不停地想事琢磨，每当打仗要发电报，他躺着说，在行军床上根本不起来看地图，他都装在脑子里，敌我两军态势、敌我的情况、地形他都很熟悉，都非常用功地记在心里。行军打仗，他的小手提箱，没有锁，里面装的都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矛盾论》、《实践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红蓝铅笔。书上画了好多勾勾圈圈杠杠，旁批、密批都好多。

评价

正面评价

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评价林彪时说："当代韩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评点林彪时说："林彪这个娃娃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不仅能打巧仗，还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

文革中，负责中共军队高级将领医疗保健的军医张愈和粟裕谈到林彪时，粟裕说："学术也是政治。林彪摔死了，陈年旧帐都折腾出来了，连什么'短促出击'也用上了，把人搞糊涂了。一个战术的具体动作，绝对化地、笼统

大否定，一旦把人思想搞乱了，那以后就打乱仗吧”。

1979年，陈云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时说：“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

1984年初，黄克诚在阅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发现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只有林彪条目的释文光写了简历和罪行，就对编辑者说：“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令人置信”。

1986年，拍摄《大决战》时，杨尚昆指示拍摄组：“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

2011年9月，林彪政务秘书谭云鹤在接受《男人世界》的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知道你们想了解什么，好多对林总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就连电视剧里演的林彪就更不真实了……”

负面评价

1973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评价林彪集团的主要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说：“绿林大盗，蛇鼠一窝。”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中评价林彪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

1975年，江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大寨生产大队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评价林彪说：“林彪就学冯玉祥啊！他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6%AF%85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原名陈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祖籍湖南新宁。中国共产党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诗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

陈毅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于192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文书和中共党委书记。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他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政委、红二十二军军长兼政委、江西军区总指挥，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代理军

长，参加开辟华中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历任上海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等职，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牵扯进“二月逆流”案。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

生平

早年经历

1901年8月26日，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一个小地主”家里。5岁读私塾，9岁上小学。1916年考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现名成都工业学院）。1919年春，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结识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冬，加入“工学世界社”。1921年6月，北洋政府专使朱启钤来到法国巴黎，他以中国的筑路权、采矿权、税收作抵押借款3亿法郎，用来购买军火。 6月30日，旅法学生召开了第一次“拒款大会”，并且在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抗议。7月25日，中法借款条约签订，共计借款5亿法郎。8月13日，陈毅等旅法学生召开了“第二次拒款大会”，并且痛殴中国驻法公使馆秘书王曾思。不久，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失败，陈毅于10月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秋，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春，陈毅到重庆，任《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10月赴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11月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法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4年，加入茅盾等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并当选中法大学学生会主席。1925年，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并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参与组织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和示威游行，在三一八惨案中幸免于难。8月，受中共北方区

委书记李大钊委派，回四川从事兵运工作，结识朱德。同年12月，与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发动泸顺起义。1927年春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文书和中共委员会书记。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7日，陈毅在抚州赶上南下的起义军，被任命为第11军第25师第73团政治指导员。进入广东后，奉命留守三河坝，归朱德指挥。起义军主力于潮汕地区失败后，他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同时对部队进行思想和组织纪律整顿，开展群众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建立统战关系，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政治工作。

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3月兼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4月，在宁冈砻市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第12师师长，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5月，出任四军军委书记。7月受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率第28、第29两个主力团前往湘南。后在国军围攻下遭受损失，撤回井冈山。1929年1月，随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任第1纵队党代表。6月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主持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随后当选前委书记。

1929年8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向中央提交《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文件，对红四军的发展历史、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等作了详实介绍，受到中央重视。随后，被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带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同时请回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12月，协助毛泽东召开古田会议。1930年2月，被任命为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政治委员、军委书记。6月，任红二十二军军长。10月初，率红二十二军北上，配合攻

打吉安。富田事变发生后，陈毅受命前往处理。

1931年4月起，陈毅在赣西南特区委支援反围剿作战，并率领地方武装配合作战。此时，赣西南地区和红一方面军大打AB团，陈毅对于一些查无实据的在押者批准释放，以致被李韶九等怀疑为AB团首要分子，但得毛泽东保护。1932年1月，任江西省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从江西军区陆续动员大批赤卫队和民工支援作战。8月，组织江西军区所属部队配合第一方面军进行乐安宜黄战役。1933年2月，配合主力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陈毅任西方军总指挥，率所部转战赣江两岸，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4年1月，出席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8月28日，陈毅在江西兴国老营盘指挥作战时负重伤。10月，长征开始后，他因腿伤未愈被留在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1935年3月，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红军和游击队突出重围，转入分散游击作战。此后，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国军进行频繁清剿和严密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率部周旋于油山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被国军四十六师围困，写下《梅岭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9月6日，陈毅出山，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政府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期间，险遭湘赣边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错杀。新四军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1938年5月，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进行新丰、新塘、句容、珥陵等战斗。1939年起，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南京、上海之间先后取得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11月，组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

挥。

1940年7月，陈毅率江南主力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并任指挥。陈毅制订并贯彻了“灭敌、反韩、联李”的策略方针。10月与粟裕等指挥黄桥战役，歼灭韩德勤部主力1万余人，随后在盐城与南下八路军会师。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同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呈送《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得到肯定并转发全军。12月，短暂兼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一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理军长，同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将华中9万兵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陈毅先后发表《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推动部队以加强中共领导为中心环节的全面建设。1941年2月，国民革命军李长江部投奔汪精卫，陈毅组织指挥讨伐李长江战役，攻占泰州，歼李长江部5000余人 。7月，领导盐阜苏中战役，反击日军扫荡，歼3800余人。10月，组织指挥程道口战役。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陈毅代理军委分会书记，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指挥各部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发展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由重建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13.5万人。1943年10月，在军委分会会议上，遭受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的批判，此即“黄花塘事件”；11月，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当年，陈毅与小自己21岁的张茜结婚，战争期间，长子陈昊苏、次子陈丹淮先后出生。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10月，指挥所部发起津浦战役，歼国军2.8万人，迟滞国军北进。1946年6月，指挥部队先后攻占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城镇。7月起，率领山东野战军南

下，取得朝阳集战役的胜利；但之后在泗县战役中失利。1946年9月，国军攻占淮阴、淮安，此后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和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集中行动。10月11日，毛泽东专门给华野发电报称："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复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在此以后，同粟裕、谭震林等一起组织指挥了宿北、鲁南等战役。

1947年1月起，陈毅任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建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主要负责大政方针定夺，具体作战由粟裕负责指挥。次月，组织莱芜战役，歼灭李仙洲部。同年5月，指挥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进行运动作战，引起张灵甫的国军精锐整编第七十四师突进，华野决定围歼该部，即孟良崮战役，最终张灵甫阵亡。同年8月，陈毅与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进攻豫、皖、苏等地，取得沙土集战役的胜利，随即挺进豫皖苏地区。11月，赴陕北参加中央会议。11月赴陕北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途中应邀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晋绥等地作报告，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1948年5月，陈毅调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保留在华东的职位，组织巩固中原解放区，保障中原野战军的后勤供应。11月，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为总前委常委。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陈毅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作战，攻占南京、杭州、上海及东南广大地区。在上海战役前，于丹阳主持军政干部训练班，提出"军队不入民宅"等入城纪律。5月下旬，攻占上海后，陈毅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上海战役结束后，因上海面临煤炭粮食短缺、金融物价波动，加上十五万国军投诚，上海经济面临崩溃。为此，中财委召集的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会议在上海开幕（即上海财经会议），陈云主持会议，着手重点解决上海经济。当时尽管解放军占领上海，人民币仍然无法在上海金融市场上立足。为贯

彻中央政府推行人民币为法定货币的指令，陈毅和陈云发动了著名的“银元之战”，即最初采用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等方式打击投机，但效果甚微。银元对人民币的价格仍然高增不止，为此华东局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经济及政治兼顾的方式稳定上海金融市场。之后上海商人恶意囤积粮食、棉花和煤炭，为此又组织“米棉之战”，转移华东地区的储备，彻底稳定了上海市的物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同时，又开展平抑“七月涨风”、“十月涨风”、1950年“春节抢购风”的斗争，基本打垮投机势力，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上海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并调整工商业。此外，他还主持共和国建国初年的历次运动，包括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1953年，领导全市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维持利用、调整改造”建设新上海的方针；年底，出席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作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会后，与罗瑞卿、谭政一起主持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1954年初，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前后，在派系斗争中反对高岗、饶漱石，支持毛泽东。

1954年6月，陈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1955年4月，陪同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9月27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2月，任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1月4日，与罗荣桓、邓子恢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发海南岛的意见》。12月18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军民用工业结合问题，明确主张军事工业宜加以掌握和提

高，而不应减弱，即只宜在不妨碍军工的条件下作些民用产品。1961年3月，陈毅与周恩来谈人民公社问题。陈主张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管理体制多样化，以鼓舞群众积极性为主。1962年3月上旬，在广州向全国科学家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作“广州会议讲话”，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

1958年2月起，陈毅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1961年，又兼任外交学院院长。陈毅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划分了边界。陈毅多次陪同周恩来等出访亚非国家，与法国等西方国家建交，发展与日本民间关系。在1961年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和1965年9月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

与此同时，陈毅仍继续参与军队事务。1959年9月，陈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6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原子弹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陈毅明确表示“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66年1月8日，陈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革时期及逝世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6月，出席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会议的决定向外交系统派出8个工作组，支持工作组的工作。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撤消工作组，并于次日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8月，出席外交系统各单位批斗工作组的大会，为各工作组承担责任，并教育造反派。

11月13日，与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在工人体育场和8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见面。发表讲话，教育学员们听从党委领导，学好路线斗争，并批评极左的思想行动。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接见上访军校学员，发表讲话。

1967年1月24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向学生和群众作了检查，恢复工作。1月28日，林彪与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泽东审批八条命令。2月16日，军方与文革小组的冲突达到顶峰，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纷纷发言怒斥文革小组。会后中共文革小组向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表态，文革小组开始制造“二月逆流案”。8月7日，文革小组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讲话（王八七讲话），煽动夺取外交部权力，支持揪斗外交部长陈毅，此后不久造反派冲击外交部，以外交部的名义对驻外机构发号施令，造成外交混乱。陈毅一再受到批判。周恩来对此公开表示：“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1969年1月3日，毛泽东表示为二月逆流案平反。然而在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徐向前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

1969年2月初起，陈毅被下放到京郊南口车辆厂蹲点。3月5日起，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每周一次举行国际形势座谈会。陈毅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同年10月，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各军队将领被迫疏散离京，陈毅去石家庄。1970年8月，陈毅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发言中维护毛泽东是在实践中群众中锻炼出来的天才，被指为“二陈合流”。10月，因病返回北京，入住三零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1971年1月，初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1月16日，在手术中被确诊为肠癌，已有局部转移。

1972年1月6日，逝世于北京。1月10日，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临现场。1月，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2月12日突然休克。8月，周恩来同回国述职之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1977年，其遗作专集《陈毅诗词选集》出版。

家庭

陈毅结过三次婚。

另外，1937年在筹组新四军途中，陈毅在南昌遇到了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的胡兰畦，二人早年就是相识相知。此次相见后订下婚约。然而中共党组织上不同意二人结婚，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找胡兰畦谈话，要求胡兰畦隐蔽共产党员身份，以国军部队少将身份继续做统战工作对革命更为重要。陈致信胡兰畦："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第1任妻子：萧菊英，1930年在江西信丰，陈毅与当地19岁女学生萧菊英结婚。1931年陈毅外出开会，返回时发现萧菊英坠井身亡。

第2任妻子：赖月明1932年重阳节，经李富春、蔡畅介绍，与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结婚。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留守江西中央苏区，劝赖月明疏散回乡隐蔽、打游击，以后二人失去联系。

第3任妻子：张茜（1922年6月11日－1974年3月20日），本名张春兰，1940年结婚。

长子：陈昊苏（1942年5月－），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俄友协会长；

次子：陈丹淮（1943年9月－），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少将军衔；

三子：陈小鲁（1946年7月－2018年2月28日），北京标准国际有限公司、上海标准基础设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

份有限公司、安邦保险的董事。

三儿媳：粟惠宁，粟裕的女儿，1975年结婚。

孙子：陈正国，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现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

女儿：陈珊珊，现名丛军，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沙尼亚特命全权大使。

女婿：王光亚（1950年3月－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爱好

陈毅喜好围棋，对围棋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曾获颁日本棋院的名誉七段、名誉八段称号，并于2012年入选了日本围棋殿堂，成为了第一位入选围棋殿堂的非日本籍人士。

纪念

在上海市的外滩和平饭店旁设有陈毅的塑像，该地名为陈毅广场。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电影《陈毅市长》纪念。

评价

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其追悼会。追悼会前，毛泽东同张茜和他们的子女谈话中，称"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并肯定陈毅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够团结同志的。"毛泽东还向在场的一位外宾说："陈毅是支持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跑了，摔死了。他也是反对陈毅同志的。"周恩来在悼词中，颂扬陈毅"一生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朱德哀悼陈毅："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董必武在挽陈毅中写道："栋折吾忧压，伊谁继直声"。

1989年11月，陈毅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

2001年8月23日，中央军委召集“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发表讲话。江泽民评价陈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并赞扬他“密切联系群众，处处廉洁奉公。他把人民比作“重生亲父母”，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他把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心实意地与各阶层人士交朋友，受到他们的衷心爱戴。他从不向党和人民伸手，始终保持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
+++
+++
+++
+++
+++
+++
+++
+++
+++
+++
+++
+++
+++++++++++++++++++++++++++++++++++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统治时期内，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不公、不义、腐朽、败坏、堕落、欺压、迫害、惨无人道、生灵涂炭之事。但是，直至今日的2020年，由于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中国大陆掌权，因而，在中文世界中，以中国大陆文人为主、大陆出版物为主的、大量的中文文字资料仍然是在千方百计地为中共统治涂脂抹粉，或是为中共历史中的罪恶、错误、愚昧之事千方百计地开脱、辩解、等等。虽然，本书中根据公开文字版权条例、非赢利版权使用原则、所引用的中文维基百科资料，是来自于海外的自由平台，但是，由于维基百科平台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写作，因此，不可避免地，维基百科内容受到中

国大陆的大量“翻墙”作者【这些人，往往是中国大陆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院所、或官办大学文科院系等等之中的御用文人，或是各种各样的所谓“五毛”们】的严重影响。在本书上文所引用的维基百科内容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上述特征。

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些“五毛”们所影响、所写作的维基百科内容就一定是彻底虚假、虚谎的。而是说，在上述维基百科文字内容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政策以及统治群体们，往往是“为尊者讳”，只说好不说坏，仅仅“片面”地去讲述一些看似“好”的事情，而对坏的、罪恶的事情【例如，数以千万计人口被饿死的大饥荒，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阶层被流放，整整一代人上山下乡、无法接受高中与大学教育，以及，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朝野上下的、指鹿为马的、欺谎政治文化，尔虞我诈、首鼠两端、阴险诡诈、一环套一环、套中套、计中计、等政治权谋与政治斗争，等等等等】，却故意无视、忽视、扭曲、开脱、强词夺理、等等。

在上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部分群体简历中，我们在这里暂时不进行更进一步的剖析，而是仅仅引述维基百科表面文字内容。本章的重点是在于，1911年至1937年的中国历史。而在本书后面章节中，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和讲述1938年至2020年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将会再进一步进行省思。

本书并非是要在这里对那些历史人物进行针砭、甚至人身攻击，而是为了要，从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中，思考真正信仰的价值，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真理。事实上，在本书上文中所引述的那些中共领导人的人生经历中，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巨大的悲剧。这悲剧正是在于，那些1920年代、1930年代、以及后世中的无数抛头颅、洒热血、投身于理想与革命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初衷、真正动机、以及后来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最终，他们所看见的，都不过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各种各样"主义"的巨大幻灭。他们想要悬壶济世，想要拯救被压迫者，想要推翻一个旧国家体制，想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平等之国、一个共和国、一个所谓"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一个受压迫者得解放的国家，然而最终，无论是最高的领袖还是最忠诚的革命战士，他们最后在良心中所看见的是：————他们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情，充其量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更在其中隐藏着那些难以隐藏的罪恶，掩盖着那些难以掩盖的愚昧、荒谬与欺谎。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均贫富、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等，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了呢？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愚昧、罪恶、欺谎、口是心非、指鹿为马、等等，究竟在于什么呢？

本书将在后面章节的反思与讨论中，继续深刻省思这些问题。

+++
+++
+++

引述罗马书1-3章：

罗马书.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

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

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

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

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

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

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

母的、

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

2.

你这判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

我们知道， 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

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 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

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 神的忿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忿怒。

神必照各人所作的报应各人：

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

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

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　神并不偏待人。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

因为在　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　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你身为犹太人，倚靠律法，仗着　神夸口，

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

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

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

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

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

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　神吗？

正如经上所说的：〝　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

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

了。

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

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人。

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

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　神来的。

罗马书.

3.

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

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

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原文作"蔽罪所"），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

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

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

++

++

++

++

++

++

++

+++
+++
+++
+++
+++
+++
+++
+++
+++
+++++++++++++++++++++++++++++++++++

长征以及毛泽东的地位确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5%BE%81

长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称为流窜或西窜，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期间 （八年抗战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控制的地方割据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从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开始的战略转移与逃亡，其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这些军队到达陕甘苏区后，于1935年12月，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报告中使用“长征”一词，是为该党的党史上的首次。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余华里，在其党史中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距离合万余公里。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中共红一方面军在其368天的战略转移与逃亡期间，每一两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且共有15天大决战。白天行军235天，夜间行军18天，休息共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红一方面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进攻占领了62座县城，红军牺牲的营以上干部有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武装击溃了中国国民政府正规军数百个团。此次战略转移，这些军队穿越大面积的雪山、高寒的高原草甸、永久冻土带和无人区，共经过11个省、18座大山、24条大河、5座连续的雪山。

背景

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优势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运动战方针，国民革命军均以撤退告终。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人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顾问李德支援中央苏区，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让他参与军事决策；然而参与过欧洲战场的李德却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遂与周恩来等人无法合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博古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主张坚守阵地。这一主张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上书反对，认为民众没有实力抵御长期的阵地战、应

当继续游击战，且直言中央局的决议“空洞说教”。博古读后起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罗明主义），并随后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被牵连撤职。在这些运动中，包括张鼎丞、刘晓、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牵连。

在第五次围剿战争前夕，柳维垣首先提出改变国民革命军的战略，他反对围剿，提出改变围剿为追剿。此一新战略为蒋介石所采纳，国民革命军改变作战策略，战法步步为营。国民政府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并组织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顾问对军官进行培训。1933年9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黎川，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同年冬，福建发生以十九路军为骨干的李济深、陈铭枢、陈公培、蒋光鼐的“福建事变”，中国政府之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派遣十九路军镇剿红军，部分十九路军将领认为因此无法立即与日军对战，招致部队不满，遂成立中华共和国，并与红军将领彭德怀、朱德密切联系。蒋介石遂率中央军抵达福建镇压，当时本用于第五次围剿战役的部队抽调福建，红军部分将领彭德怀建议出兵支援福建。然而当时博古、李德则认为蔡廷锴等人不可信，遂颁布《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拒绝支援，因此坐失良机。福建事变被平定后，蒋介石重新整理部队，由何键、陈济棠、顾祝同、蒋鼎文率四路军一百万合围红军，逐步缩小包围圈。而李德则主张部队在广昌与国军决战，导致红军损失惨重，彭德怀与李德发生尖锐对抗，张闻天也激烈反对博古的军事策略，核心领导的冲突已经公开化。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李德开始制定计划。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派遣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后这支部队与赣东北地区红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于1935年1月失败。8月，红六军团奉命从湘赣苏区西征，以作为中央红军的探路先锋。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

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称“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为战略转移释放信号。此时，周恩来在南昌行营的情报系统透露国军将要发动最后总攻击，中共的主要中央领导人于是决定，于10月中旬放弃中央苏区。“长征”的目的在于求生存。

经过

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的中央领导人和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该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等地开往雩都县集结。1934年10月17日傍晚，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及一、三、五、八、九军团从江西雩都县渡过贡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等人领导下进行游击战，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国军统帅蒋介石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红军以一、三军团作为先锋，两个军委纵队居中，八、九军团分居军委纵队左右掩护侧翼，第五军团作为后卫。早在红军长征前，中共就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地方首领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为红军突破封锁线创造有利条件。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桃江，携大量辎重沿信丰油山、大庾、南雄之间的粤赣边界缓慢西行。尽管事先达成了协定，但由于陈济棠并未及时使粤军前方部队知情，红军仍遭受了一定

损失，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阵亡。11月5日至8日，红军突破了广东仁化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并占领了宜章。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西进企图，任命何键为追剿军司令，指挥部队尾追红军。11月15日，红军继续西进，攻占临武、蓝山、道县等地；25日，红军全部渡过潇水。同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此时由于蒋桂矛盾，桂军撤出湘江防线，但中央红军并未有效利用这一机会，仍然携带大量辎重缓慢前进。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湘军刘建绪部占领全州，形成对红军的夹击态势；红一军团部队抢占了界首一带渡口，红三军团也前出至湘江。27日，蒋介石下令进攻，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展开惨烈的阻击作战。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至全州之间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红三军团十八团、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红八军团由于损失惨重，番号撤销。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从广西龙胜翻越了老山界（即越城岭）。此时，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前往湘西，但政府正规军对此已早有准备。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通道会议，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主张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获得了大多数红军领导人的认可。12月13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发展川黔边区。1935年1月，红军开始强渡乌江，突破黔军的防线，向遵义地区进军。

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中共的“中央红军”武装进攻并占领了遵义县城，在城内休

整。1月15日至17日，该党的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党史称为遵义会议，旨在研判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和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已暗自结成同盟，试图共同反对博古、李德。会议上博古率先作报告，检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军事指挥错误，但主要是客观条件的困难。周恩来随后做副报告，称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紧接着，张闻天在会上作反对中央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随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保守主义。随即，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纷纷表示赞同。会议召开三日，最终决定取消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政治和党务，军事上则由周恩来为主、毛泽东为辅进行总指挥。

1月19日，“中革”的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同日，红军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前进，24日攻占土城。28日，红军向位于土城以北的青杠坡的国民革命军郭勋祺部队发起进攻，激战一日，双方损失惨重。此战红军损失上千人，夺取赤水县和渡江的计划均未能实现。次日，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地区。2月5日至9日，红军进抵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 地域及云南威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即扎西会议，会议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常委分工中负总的责任；暂缓执行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整编部队为十六个团。此时，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等部队协同川军试图在川南地区歼灭中央红军。2月10日，毛泽东等红军领导决定东进，二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

193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统一负责军事指挥。

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开始进攻桐梓地区。2月25日，经过激战，红三军团夺取娄山关，并击败国军随后的反扑。随后，中革军委指示红军部队继续向遵义追击。2月28日，红军再占遵义城。在进攻遵义作战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此时，国军吴奇伟纵队开始进攻，并夺取了红军控制的老鸦山。中革军委决定围歼吴奇伟纵队，吴奇伟纵队被红军击溃，其司令部遭到长途迂回的红军突袭，吴奇伟逃过乌江后，命令士兵立刻摧毁渡桥，结果未过河的一千余人被红军俘虏。吴奇伟战败后，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督战，调动黔军、川军、中央军围堵红军。3月4日，红军成立前敌总指挥部，朱德、毛泽东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对于是否围攻打鼓新场的薛岳部一个师的问题，红军内部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对进攻打鼓新场的主张表示反对；为统一军事指挥，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总负责军事。

3月15日，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的国军周浑元部，经过一天激战，红军最终以失败告终。次日，为避免不利态势，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蒋介石此时判断红军意欲北渡长江，命令国军部队予以截击，毛泽东当即决定回师东渡。3月21日，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牵制国军，其余部队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史称“四渡赤水”。3月29日至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了国军的包围圈。负责掩护红军主力的红九军团部队由于渡口被阻断，被迫独立行动。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泸定桥在四川省泸定县的大渡河上，1935年5月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

1935年4月2日，红军主力逼近贵阳，并直接威胁贵阳机场。当时蒋介石正

在贵阳督战，为安全计，蒋介石飞离贵阳，并命令滇军孙渡等部火速驰援贵阳。4月8日，红军突然南进，从贵阳、龙里间突破国军防线西进。4月23日越过平彝黄泥河，分两路进入云南。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将主力部队收缩至昆明防守，为中央红军打开通道。5月1日至9日，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皎平渡渡过金沙江。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会理会议，会上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领导提出批评，并决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独立行动的红九军团在贵州、四川和云南边境地区活动52天，行程1000多公里，最后在四川西昌境内与红军主力部队重新汇合。

红军攻占泸定桥后，陈云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认可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5月20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冕宁。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名义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号召彝民与红军协同作战。同日，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沽基族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在袁居海子（今冕宁彝海子）结为兄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24日晚进至大渡河西南岸的石棉县安顺场。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十七勇士”自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然而，由于掌控的船只有限，红军无法从安顺场迅速全部渡河。因此红军在安顺场兵分两路，红一师及干部团在原地渡河，其他部队北上进攻泸定桥。5月29日，红二师四团占领泸定桥，与安顺场渡河部队会合。攻占泸定县城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陈云离开红军部队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向东翻越二郎山，突破川军杨森部六个旅的阻击，于6月7日占领天全。随后，中央红军在飞仙关前转而北上，经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海拔约45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天气变幻无常。除了雪山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外，饥饿和寒冷也给红军带来严峻考验，一些红军死于冻、饿、无力。6月12日先头部

队在懋功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6月26日，张国焘从茂县赶到懋功两河口，与在此等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同时，两个方面军进行编制调整。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马尔康卓克基。由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战略争论，红军在此长期滞留，导致松潘大路被国军胡宗南部占领，红军只能穿过松潘西部（包括今红原、若尔盖）的草地北上。

7月21日至22日，中共在黑水县召开芦花会议。8月，中共将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毛儿盖召开毛儿盖会议，决定占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依据此地区向东发展。随后，红军右路部队通过松潘草地。由于草地一带荒无人烟，无法就地补给，结果红军面临极限危机，包括严重高原反应、饮水中毒、饥渴、湿冷、天气变化极端、缺氧、缺盐，有不少红军为此而死，或是陷入泥沼。8月26日，走出松潘草地的红军发动包座战役，击溃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北上陕北

然而，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反对中共的毛泽东等人的“北上路线”，冒险度过大草地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又被迫分裂。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团驻地若尔盖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巴西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南迭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单独北上。9月17日，红军攻克腊子口天险，进入哈达铺。在哈达铺毛泽东得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的相关消息后，哈达铺会议最终将陕甘根据地定为目的地。

9月23日，陕甘支队通过国军在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渡过渭河，于9

月27日到达通渭榜罗镇并召开榜罗镇会议。此时，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前往陕北的方针。9月29日，陕甘支队继续东进，10月7日翻越了六盘山。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陕西保安吴起镇（今吴起县），21日击溃尾追而来的东北军和马家军骑兵部队。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1月初，陕甘支队在象鼻子湾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此时，红一方面军不足八千人。之后，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组建新的红一方面军。11月23日，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围歼东北军第109师，师长牛元峰阵亡。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工农共和国” 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2月起，红一方面军发起了东征、西征战役，将陕甘根据地扩展为陕甘宁根据地。

红二方面军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第十七、第十八两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于8月11日进至桂东县寨前地区。在这里，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正式成立，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12日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出发，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县境，于23日到达零陵东北地区，准备西渡湘江。由于国军封锁湘江，红六军团再次改变渡江计划，迅速向东转移，进至阳明山区建立根据地。之后由于战术考虑，由嘉禾折转西进道县，于9月4日在灌阳县界首地区渡过湘江，进占西延。9月8日，中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坚持至9月20日，并打击湘军，但红军未能得手。

此时，湘桂两省国军主力已进至绥宁、靖县地区，阻止红六军团北进。红六军团随即转兵向南，袭占通道。19日，在靖县新厂给尾追之湘军补充第二总队的两个团以歼灭性打击后，又于10月1日袭占贵州的旧州老黄平，随后又转向黔东北的江口前进。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西南甘溪同桂军第十九师遭遇，红六军团损失惨重，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部队被国军截断，一部由参谋长李达率领到达沿河地区，后与红三军会合；主力被迫向

东南转移，10月24日到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

两军会师后，军委命令两军分开活动，红二军团留在黔东地区；红六军团单独西进。但两军将领讨论后，决定西进难以发动群众、留守难以补充给养，双方决定合力东入湖南西部桑植，由任弼时、贺龙分管政治与军事。11月，部队攻入湖南，在龙家寨歼湘西军阀陈渠珍2个旅大部，并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贺龙任红二军团兼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935年初，国军以80余团兵力，分六路进行围剿，红军采取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战法，在桑植陈家河歼国军58师172旅；接着又在桃子溪歼国军58师师部及174旅，并乘胜东出慈利，连战连捷。

5月，红军部队转向湖北，以一部包围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区打援，歼国军41师师部和121旅，俘虏师长张振汉。8月在板栗园设伏，歼国军85师大部，击毙师长谢彬。随后又在芭蕉坨击溃国军陶广纵队10个团，彻底挫败国军围剿，并乘胜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1935年9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采用分进合击进攻湘鄂川黔边，红军未能突破围剿。11月，贺龙与任弼时等从湖南省桑植县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突围国军封锁，开始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留张正坤第十八师坚守老根据地。红军经溪口、洞庭溪向南渡过澧水、沅江，到28日，两路红军分别占领溆浦、辰溪和新化、蓝田、锡矿山等地。国民政府集中12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分路追击，企图将红二、六军团歼灭于沅江和资水地区。红二、六军团一部由溆浦出发，向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之势，吸引追兵。之后，趁着国军东调之机，大部转向西进，再向北转，于1936年元旦进到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摆脱追兵。1936年1月9日，在芷江便水发动战斗，随后占领了石阡。此时，第十八师返回原建制。

1936年1月，红军到达黔东地区，由于国军围攻，红军向黔西转移。2月2

日，红军在修文渡过乌江，进入黔西，攻占黔西、大定、毕节等地，并进行扩军。2月，在黔西县城召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会议，决定两军团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之后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与国民革命军周旋。在此期间，红军联合原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周素园，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3月12日，红二、六军团在云南镇雄得章坝设伏，伏击国军万耀煌纵队第十三师，缴获大量辎重弹药，险些俘虏万耀煌。3月下旬，贺龙、任弼时接到朱德、张国焘来电，建议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同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红军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经云南寻甸、富民渡过普渡河，经过普渡河和六甲战斗，进占楚雄、祥云、宾川、丽江。4月底，红军在丽江渡过金沙江，攻占中甸，翻越玉龙雪山。7月2日，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同时，在和朱德、刘伯承沟通后，贺龙、任弼时等人了解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矛盾，并与张国焘作斗争，力促中国工农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此后部队北上，红二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

红四方面军

"长征"前的准备

1934年红四方面军击退了四川军阀刘湘组织的对川陕苏区"六路围攻"，但红军也损失惨重，根据地被严重破坏。10月，蒋介石派出"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督导川军作战，并专门为刘湘拨款，补充川军兵力和装备。不久，又命令中央军胡宗南派兵进驻广元、昭化地区，采取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战术。11月，红四方面军组织连级以上干部参加毛裕镇会议，徐向前制定向川陕甘发展的新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进攻甘肃南部，主攻胡宗南部；以控制嘉陵江、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12月19日，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来电报，要求四方面军重新组织进攻，配合中央红军进军。

随后中央又要求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高层经过讨论，决心围攻进入四川的胡宗南部队。

1935年1月22日，广昭战役展开，徐向前率领主力围困广元、昭化，计划围点打援。不过胡宗南并未派援，而红军亦无法攻克广元、昭化，徐向前于是撤兵。而此时共产党中央已结束遵义会议并开始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并命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同年2月，红四方面军经宁强北上进入陕西南部，攻占沔县。

同中央红军会师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令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将近十万人放弃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4月，红四方面军攻下剑门关，前后共击溃川军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在当地进行休补装备，并扩员至八万余人。

当时蒋介石为防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调遣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唐式遵、李家钰等部围攻；张国焘在江油附近召开红四方面军会议，决定撤出川陕根据地，进攻北川、茂县、理县等地，建造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5月12日，徐向前率领红九军、红三十军由北川西进，在土门突破北川河谷；15日，占领茂县；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随后红军一部攻下理县；李先念西进小金川、攻下懋功，迎接中央红军。6月13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

北上抗日战略

两军会师后，确定统一的战略方针成为首要问题。6月16日，中央红军主张总方针为占领川陕甘三省，以岷江、嘉陵江上游地区为立脚点，伺机进占甘南和陕南。而张国焘和陈昌浩则主张暂时南下攻岷江以西的地区，以解决部队给养。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

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开会，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徐向前率领一部进行战斗。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军已经占领毛儿盖，两个方面军进行编制调整，以加强团结；徐向前兼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此时蒋介石指挥胡宗南部坚守松潘，并派遣王均、于学忠、马家军、薛岳等参与围剿。因为国军在松潘固守，于是红军改为执行夏洮战役，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进攻洮河，创建甘南根据地。此外，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指挥；以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了在两河口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并增补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张国焘此时主张解决战略政治问题，并坚持红军分左右两路军，于是中共召开毛儿盖会议，会中徐向前、陈昌浩支持毛泽东北上东进路线。会上并确定：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彭德怀负责右路军北上，并率先进入若尔盖大草原，进攻包座；而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进攻阿坝后，过草地后即与右路军靠拢会合。8月26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徐向前率领红三十军、红四军发动快速战攻下包座，击溃胡宗南部第49师大部，击伤师长伍诚仁，歼灭四千余人。

然而，左路军则迟迟不肯北上离开阿坝、与右路军会师，张国焘与毛泽东在红军主力进军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河水上涨，命令左路军按兵不动。9月8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率原红四方面军南

下，张毛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徐向前与陈昌浩只能向中央汇报；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与徐向前联合致电左路军要求北上。9日，张国焘则致电继续坚持南下，这时徐向前与陈昌浩亦犹豫南下事宜。当晚毛泽东亲自到徐住处，问徐意见。徐向前表示，两军既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也不宜再分为两半。

南下川康作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张浩）。1935年12月回国后，在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9月10日，党中央决定独自北上，并于夜间带领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红一、三军团离开甘南，次日凌晨红四方面军才知道消息。为了坚持红四方面军的完整性，徐向前率余部南下，再过草地，在党坝与左路军会合。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自任党主席，并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会上表示反对的刘伯承亦因此降职，主张团结的朱德与徐向前只能主张先打开局面。10月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随后红四方面军攻占崇化、抚边、懋功。之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攻占宝兴、天全、芦山，击溃国军五千余人。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在百丈进行决战，之后国军攻占百丈。该战役后，国军死伤一万五千人，红军伤亡亦近万。此时，薛岳、李抱冰从南部、东面进行出击，红四方面军只能转为战略防御阶段。

12月5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等人将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从莫斯科抵达陕北，向张国焘发电通报消息。张国焘借机致电林育英，贬低陕北红一方面军，并寻求支持。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要求注意控制争论。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再次以“党中央”名义致电林育英，继续抨击中共中央，但表示服从共产国际指示。1月16日，林育英回电，没有直接抨击

张国焘，但表示共产国际要张国焘与中央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勒令张国焘立即取消第二中央，并在党内公布《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表示张国焘可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中共中央保持同等地位。随后还向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变更新政策的经过、建立统一战线的各项细则和《八一宣言》的要点。

此时，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南下作战中损失惨重，被中央军、川军压缩在芦山、宝兴地区，粮弹匮乏，张国焘的威望开始动摇。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纷纷要求北上到陕北。1月27日，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谋求党内统一。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发展，并表示此方针受到共产国际同意。南下红军部队决定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3月，红军攻下这些地区，并就地整编补给，以等候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此时，部队仅剩四万余人。6月6日，张国焘决定取消第二中央。7月初，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并决定北上。

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4年8月，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奉周恩来指示到达大别山，向中共鄂豫皖省委传达建立新苏区的指示。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行动。随后，省委同意徐海东的提议，由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4人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对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发表宣言。红二十五军在信阳柳林和双河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红二十五军领导层认为该地区无法建立根据地，决定继续北上，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

挺进。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向枣阳县城佯攻，形成进攻武汉势态，随后调头东进，进入驻马店西北山区。

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遭遇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阻截。经过激战，红军击退国军，进入伏牛山区。随后，红军继续西进，到达了陕西洛南县庾家河。12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师和两个骑兵团向庾家河发起进攻，红军经过终日激战，将国军击退。在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1935年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6座县城。2月5日，在蓝田县葛牌镇以南的文公岭歼灭国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五个营。3月10日，在洋县华阳镇歼陕军警备第二旅五个多营。4月9日，在葛牌镇歼灭陕军警三旅。7月2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俘虏旅长唐嗣桐。同时，红军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部队扩大到3700余人。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进甘肃东部策应中央红军。8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开进甘肃境内，相继攻占两当县城、天水县城北关、秦安县城，切断西兰公路。由于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因战略纠纷滞留川西，徐海东、吴焕先决定放弃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计划，改为进军陕北。8月17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隆德县城，翻越六盘山，歼灭马家军35师105旅一部。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泾川县城以西四坡村渡河，遭遇马家军208团攻击，红军歼灭208团。在作战中，吴焕先阵亡。随后，徐海东兼任红二十五军政委。8月31日，红二十五军在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9月3日进抵合水板桥镇。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合水东北的豹子川，决定由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9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于陕西延川永坪镇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共约七千人。在红一、三军团到达陕甘苏区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会宁会师

到达陕北后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战略计划》，决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并率主力向兰州、天水方向前进。8月5日，徐向前率领部队攻克漳县。由于陕北根据地经济情况艰苦，该根据地无法容下三个方面军。于是中央决定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行动，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进攻胡宗南部。之后因为战术考虑，中央及西北局纷纷表示放弃该计划，而改为《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在西兰通道以北阻击胡宗南部，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进军宁夏"。

9月23日，张国焘突然决心西渡黄河，占领兰州以北地区。2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西进的困难。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电，要求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而此时西渡黄河也于红四方面军不利。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西渡黄河，按照中央指示北进。此时，红一方面军也展开策应行动。10月2日，红十五军团攻占会宁。由于当时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签订密约，红二、红四方面军在行军中未有大型交战。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界石铺，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9日，徐向前率部抵达会宁，红四方面军长征结束。

8月下旬，红二方面军通过草地，进抵甘南哈达铺地区。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红二方面军从9月11日至20日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9月下旬，国军发起反攻，企图围歼红二方面军于陇南地区。10月4日，红二方面军经中央同意，放弃甘南地区，开始渡渭河向北转移。由于红四方面军单独北进，红二方面军侧翼暴露，在渡河时受到严重损失。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宣告结束。此时，红一方面军约为21000人，红二方面军12000人，红四方面军33000人，合计约66000人。

在会宁会师前后，中共中央制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红军内部、联合国民党部分友军、逼蒋抗日及停止内战。而西北局势则是红军占领宁夏与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而此时蒋介石刚处理完两广事件，随后制定新的剿共计划，即命令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筹备通渭会战。1936年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徐向前与陈昌浩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红三十军负责造船强渡黄河，并先行渡江；红三十一军、红四军、红五军抵挡南部国军进攻、掩护红三十军，跟随渡江。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以国军第1军、37军、3军分兵进攻。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同日，国军占领会宁。24日，红三十军强渡黄河，并击溃马家军防线。之后红九军、红五军向河边开进，跟随过河。28日，红四方面军军部渡过黄河；而本打算渡江的红三十一军却被临时取消计划，致使渡过黄河的红军部队无法展开进攻。30日，国军关麟征部进攻靖远，致使河东河西两岸红军被割断。11月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第九、三十军加上第五军组成“西路军”，约2.18万人，在虎豹口度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1937年3月，在打通对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失败后，全军仅剩四百余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到达新疆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收容。

而此时，河东部队即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则回师陕北。国军继续进攻，此时东北军王以哲部队前进比较迟缓，第三十七军仍在黄河以西，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因军长王钧病故而停止前进，唯第一军紧紧尾追红军，进至豫旺堡地区，这为红军创造了有利战机。11月21日，红军发起山城堡战役，将第一军七十八师大部歼灭。山城堡战役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一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第一次国共内战就此结束。

红军各部队实力统计

长征期间，红军各部队实力统计如下：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

时间　兵力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　　　86000余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 37000余人

1935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20000余人

1935年9月单独北上 14000余人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7000余人

1936年10月会宁会师　　　30000余人

红二、六军团（二方面军）

时间　兵力

1934年8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9700余人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　　3300余人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　　4400余人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　　　17000余人

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14300余人

1936年10月会宁会师　　　13300余人

红四方面军

时间　兵力

1935年5月嘉陵江战役后　80000余人

1935年6月同中央红军会师 80000余人

1936年4月甘孜整编 40000余人

1936年10月会宁会师　33000余人

1936年11月抵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部队　11000余人

红二十五军

时间　兵力

1934年11月开始长征　2980余人

1935年7月从鄂豫陕北上　4000余人

1935年9月到达陕甘苏区　3400余人

史实争议

长征是中共的转捩点，中共从此踏入“延安时期”。由于长征已经过去多年，许多幸存者都已不在人世，外加回忆的不准确，关于长征的历史事实留有争议。

长征的距离

红一方面军长征经历25000里（12500公里）的说法，出自毛泽东，埃德加·斯诺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记》引用此说。根据红一方面军1936年的详细路线图，距离是18,088里。 2003年，两名英国研究人员花了384天重走长征路线，估计长征实际距离不到25000里的一半，约6,000公里。

北京日报对这些质疑做出了回复，并提供了2005年张小艾和武大卫走长征路走了46000多里的数据作为参考。

“飞夺泸定桥”

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泸定桥战斗是22人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攀踏着泸定桥铁索强攻前进。邓小平1982年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会面时说，“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边是使用老式步枪的军阀部队，而且人数也真的不那么多，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将此戏剧化。”旅英作家孙书云在2006年出版《长征》一书，曾来到了泸定桥现场考察。她对当地的一位老铁匠做了采访，老铁匠的证言如下：“桥的另一端只有一个中队。那天在下雨，当他们看到红军士兵的到来，他们惊慌失措地逃走了——他们的官员早已抛弃了他们。并没有太大的战斗。不过，我仍然对爬上铁链的二十二名士兵致敬。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和我一起检查过了桥，但我们坐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人很勇敢，他们过得很快。”

草地密电

根据中共自身的党史认定，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中共中央在四川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即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但对此，有大量学者表示缺乏事实依据。

徐向前说：“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

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芦笛因此指出，如果真有专给陈昌浩一人的“密电”，则参谋长叶剑英看不到，更不可能送达毛泽东手中。中国官媒新华网2013年10月转载《南方周末》文章，表示不管“密电”是否存在，叶剑英都是“立了大功”。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战争

1934年10月红军撤退开始

10月21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11月5日一8日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3日一15日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11月27日一12月1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黎平

1935年1月1日一3日强渡乌江

1935年1月7日中共召开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一3月四渡赤水

3月29日一31日南渡乌江

5月9日渡金沙江

5月25日渡大渡河

5月29日飞夺泸定桥

6月12日－7月7日红一红四会师

8月29日－31日全歼胡宗南第四十九师

10月7日翻越六盘山

10月19日红一抵达吴起镇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与红一会师

长征结束

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此次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与逃亡，即“长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在新成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任的主要领导人和将领，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经历了“长征”，十大元帅中有九位（除陈毅）经历了“长征”。

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载称，长征其实是他的计谋，剿共为名，收复西南是实，国家团结了，才可以抗战。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与日军装备及训练间差距太大，蒋九一八事变期间写道：“中日之战必不可免”，若开战，“倭三日可亡我矣”。又说：“不可贸然而战”。期间，蒋考虑到中日若开战，上海必先沦陷，南京亦将失守，国民政府势必迁都，期间蒋考虑了洛阳、西安等地，最后选定重庆；中国那个时候是个军阀割据的时代，蒋介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整个中国，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几个省而

已。所以他在日记中就说我怎么进入四川呢？特别是四川、云南和贵州都是军阀势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并跟德国的军事顾问商量。有一天就是“得一计”，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借剿共以收复西南”，故意把红军留下一小股，把他们往西南赶。 所以红军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从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这是他的一计。 而另一方面，蒋当时认为红军势力微弱，并不足以对其政权发生威胁，所以在日记中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领导国军追击红军的薛岳，在其所著的《剿匪纪实》中对“长征”评价非常之低：“三民主义，适合国情，吾人黾勉奉行，即足以救国建国。乃共匪故腾其阶级斗争邪说，洪波四溅，逋毒十省，所过焚杀，川原以丹，至是狰狞面目，暴露无余，政治立场，全告消失，民众益视之若蛇蝎，盖失民者亡，叛国者灭，理固宜然，然连岁驿骚，国家元气，亦因之而斲丧，不禁感慨系之矣。”

中共方面的评价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提出“长征精神”为以下五种精神：

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

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中共自身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说："（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其它正面评价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评价"长征"："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

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唐德刚认为长征绝非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黄巢起义、太平天国都比红军早，而且时间更久。此外，他还认为蒋介石利用中共长征借机“削藩裁军”。当时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军阀割据，湖南也不是嫡系，蒋借追缴红军，把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地方。“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会议

中共的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召开的会议，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包括它的常委会和扩大会，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比较重要的有20多个，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9个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泸定会议。这些会议主要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7个会议：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三是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中央红军在单独进军陕北过程中召开的6个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等。这些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随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

名称　举办地　　　时间　主持人（开幕式主持人）　内容　会议性质

通道会议　　湖南通道　　1934年12月12日　　周恩来　　　会议的决议是中央红军向西进入贵州。

黎平会议　　贵州黎平　　1934年12月18日　　周恩来　　　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后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中央政治局会议

猴场会议　　贵州瓮安　　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　-　　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中央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　　贵州遵义　　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　　博古　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该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并于2月16日由中央油印印发。《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

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扎西会议

（含鸡鸣三省会议）　　云南威信扎西　　1935年2月　张闻天　　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会议

苟坝会议　贵州遵义苟坝村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　　张闻天　　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会议　四川会理　1935年5月12日　　毛泽东　　张闻天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泸定会议　四川泸定　1935年5月31日　　　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派陈云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两河口会议　四川懋功　1935年6月26日　　张闻天　　通过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

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　　　中央政治局会议

卓克基会议　四川马尔康卓克基　1935年7月3日　　　　　　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确定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还讨论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革命的民族。　政治局常委会议

芦花会议　　四川黑水　　1935年7月21-7月22日　　张闻天　　　张国焘作关于四方面军发展历史情况的报告。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作了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补充报告。会议讨论了报告并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　　　中央政治局会议

沙窝会议　　四川松潘　　1935年8月4-8月6日 张闻天　　　张闻天作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吸收4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1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儿盖会议　四川松潘毛儿盖　　1935年8月20日　　　毛泽东　　　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中央政治局会议

巴西会议　　四川若尔盖巴西乡　1935年9月2日-9月9日　　-　　　讨论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中央政治局会议

俄界会议　　甘肃迭部　　1935年9月12日　　　张闻天　　　毛泽东作了

《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并作会议结论。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将原有1、3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组成编制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会议

哈达铺会议　甘肃岷县哈达铺　　1935年9月22日　　张闻天　　讨论研究干部问题和部队整编，决定将红一 、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整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并代表党中央向全军正式发布了 “到陕北去”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

榜罗镇会议　甘肃通渭　　1935年9月27日　　毛泽东　　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铁边城会议　陕西赤安吴起镇西北部　　1935年10月18日　　　重申了榜罗镇会议“在陕北创造苏区” 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吴起镇会议　陕西赤安吴起镇　　1935年10月22日　　张闻天　　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报告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并作会议总结发言。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中央政治局会议

下寺湾会议　陕西甘泉下寺湾　　1935年11月3日　　张闻天　　指出

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粉碎敌人三次‘围剿’”，提出“中央分两部分”，“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后方做动员工作”。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并赋予军委决定军事指挥问题的全权。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瓦窑堡会议 陕西瓦窑堡 1935年12月17日-12月25日 张闻天 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纪念

“长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重点宣传内容，并得到该党的高度评价。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自主研制的航天运载火箭以“长征”命名。196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史上的第一种燃气轮机车，亦被命名为“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核潜艇舰名也以“长征”为前缀来编号命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B5%E4%B9%89%E4%BC%9A%E8%AE%AE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占领了贵州省遵义，于是顺道于当地举行会议，地点在遵

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新领导集体，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背景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苏联派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实际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此后，毛泽东被夺取了军事领导权，其军事战略被放弃。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惨重失败，几乎被国军消灭。中央红军8.6万人被迫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并不清楚红军的具体情况，指挥能力也并不出色，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红军初期的失利。在强渡湘江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在此影响下，红军内部产生对博古及李德的不满，一些支持苏联派的中央领导人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挥，改向国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一方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参加人员

根据陈云的文章，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为：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中央政治局委员

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总书记）、三人团成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首脑）

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任中共中央国统区工作部部长、兼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政治局候补委员

刘少奇：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红八军团中央代表、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凯丰：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到底是当选为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在1980年代公开出版的书籍多认为其为政治局委员；在1990年代出版的权威著作认定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

李富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军委纵队政

委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列席人员

李德：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伍修权：李德的俄语翻译。属于会议的工作人员。

邓小平：《红星报》主编，可能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存疑。有资料提示其未列席会议）

刘少文：长征开始前不久到遵义后这几个月时间，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担任遵义会议记录和秘书工作。

其他人员

董振堂：红五军团司令员。董振堂在会议快结束时，才到场与会。出处为1957年3月6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孔宪权带着资料员国瑞臻赴北京采访时杨尚昆的回忆。1980年代初李卓然谈到，在1935年1月遵义城看到过董振堂并有董振堂与会的印象。

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周恩来通知其与会，但未能去。当时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后卫任务，分驻湄潭一带，九军团主要领导开会研究，蔡树藩、罗炳辉留下，着尹自勇随凯丰赶赴遵义城开会。

罗炳辉：红九军团司令员，周恩来通知其与会，但未能去。

尹自勇：红九军团党委委员、军团青年部长，据1954年6月25日凯丰给尹自勇亲属写信，凯丰携尹自勇赴遵义会议。

董必武：1950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被列为与会者。1960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查询，回复是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林伯渠：1950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被列为与会者。

经过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

会议决定

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

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

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过会议的问题：根据陈云于1935年2～3月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清楚记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

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杨尚昆同志提供的遵义会议与会人员18人的照片，陈列展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有人提出董老与林老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的疑问。经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查询，回复是没有参加。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查出林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样，遵义会议的与会人员，便由18人减为16人。

1958年11月，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议室向陪同人员谈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他具体的坐位。事隔几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将小平同志列为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又将邓小平同志从遵义会议会议室开除出去。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又由17人变为16人。1958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回答“对此事记不清楚”。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函中称“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位列第六的领导人）。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记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称七十年代初（杨1966年后被监护审查（软禁），直到1975年）曾听周恩来说邓临时做过会议记录员。八十年代，根据邓小平（时为实际的最高领导人）的暗示（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贵州日报》），此后出版的书刊都在正式参加人员名单中增加了邓小平（如伍修权所著《我的历程》）

影响及意义

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是组织上仍保留了亲共产国际的势力，废黜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以洛甫负总责（中共中央从1935年1月到1945年6月没有选举总书记或主席，有时为了工作方便对外称洛甫为总书记到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____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正面与负面内容和影响意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相关内容 】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经济的本质

在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有三个人的三本书，起到了重要的支柱性、启迪性作用，就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三本书，分别从法治、民主、经济三个角度，勾画出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架构的蓝图，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践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各国政治建制与运作，广泛地影响了许多现代人心中的人文政治经济思想。当然，在他们出版了那些相关著作以后，后人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又进行了许多细化、深化、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建树。但他们三个人的著作都具有代表性、革命性、原创性、开启性的意义。

但是，我们想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整个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如果除去了圣经、除去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影响与深刻的文化土壤，那么，所谓《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等等思想所代表的现代法治、民主、经济架构中，就只有的是贪婪、争斗、战争、私利、一盘散沙、与慵懒、拖沓、低效。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简单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经过、结果，或是研究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喧嚣混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曾经试图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但很快国家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导致许多内战和屠戮；最后，法国领导人认识到宗教信仰对于国家社会稳定与道德状态的重要意义，才努力地重建曾经被短暂抛弃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今日法国、希腊、意大利等等政府的腐败与低效，或是环顾一下今天世界上的诸如华尔街、伦敦金融区的无休无止的贪婪与明枪暗箭，或是西方世界里民主政治中的剑拔弩张、互相吵骂，那么，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所表达和代表的法治、民主、经济制度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世人生命与心灵之中的真实光景是什么，世人是否在内心中有敬虔、诚实、恩慈、寻求公义的立场。

在本章，我们简要地讨论现代社会中经济运作机制与民主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____

在英国崛起之前，欧洲曾经先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依次成为海上强国。在英国之前的海军大国西班牙，尤其看重世上的黄金，因此，西班牙的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之一，就是想要在世界各地寻找黄金等物质财宝、财富。

然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间接使得英国的崛起走上了一条与西班牙等海上大国之崛起非常不同的经济道路。

亚当斯密的最大的启迪性贡献，就是正确地指出，所谓物质性、经济性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根据亚当斯密的定义，所谓经济性财富是指，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与能力。

换言之，财富并非是有形的黄金或是土地等等，而是一个人、团体、社群、社会的劳动创造能力、生产率。

更进一步，根据亚当斯密的思想，真正地增进财富的途径，不是在于囤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贸易；因为人们在贸易中通过彼此交换商品，从而达到"术业有专攻"，生产能力与技术精益求精；从而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所最擅长的那一种工作。这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就能够走上不断进步、繁荣兴旺的道路。

在亚当斯密的贸易经济思想中的本质是，人类应当、也可以通过相互协作、分工合作、社会化大分工，来共同增进富裕程度。这种思想，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基础和精髓，也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过去两百年内、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所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自由贸易经济思想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性前提条件，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各个国家、世人心中，人们愿意敞开心扉地、没有嫉恨地、彼此信任、通商贸易，彼此平等地互相对待、相互合作、共同富裕。

如果这个假设性前提条件不成立，那么，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平、平等、公正的贸易法规环境，人们彼此之间也无法互通有无、进行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

自由贸易必须需要一个公正、成熟、稳定、可预期的、透明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如果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动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猜忌、甚至剑拔弩张、发动战争、互相好勇斗狠、争强好胜、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那么，从根本上说、从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就不可能进行。

而显然，这种公平正义而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唯有是建基于世人心中的公义、正义、平等、诚实、信实，以及对于法律、秩序、规则的遵守和敬畏。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政治法律环境往往是在民主制度的政治框架下所提供的。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一个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法律规则秩序环境，从长期而言，唯有是建基于整个国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境况、以及内心深处的真诚信仰。

如果人们在信仰中是虚伪的、轻轻忽忽的、玩世不恭的；如果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羡慕嫉妒恨；如果人们藐视规则与秩序，既贪婪、又喜欢偷窃；如果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诚信，而且蔑视那些说话算数、老实巴交的人；如果人们凡事都用计策，不是三十六计，就是孙子兵法的"兵者，诡道也"；如果世人的心中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虔的信仰，信奉"人至贱则无敌"；如果在人间道德世界中，真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所谓的自由贸易，不但不会大规模地发生、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反而，会激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仇恨甚至战争，进而导致生灵涂炭的灾难。

____

在现代经济学理念中，人常常被看作是自私的、为了谋求自己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经济动物。

但是，从整个国家、社会、国际的层面而言，上述现代经济学理念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盲点，即，它看不到，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待在秩序规则的笼子里面，以诚实守法的辛勤劳动、以宁可吃亏也不说谎的诚信态度，来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不是以狂野不羁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见缝插针的方式，来取得财富。

在一个秩序规则法治体系运转良好的国家社会中，或许，那些狂野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行为，会很快受到惩罚；因而，这样的犯规行为并不常见。

然而，随着人类的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随着秩序法规越来越疏于坚守，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社会中许多人信仰越来越不敬虔，越来越虚伪、徒有其表，终有一日，秩序规则体系就会岌岌可危、甚至崩解，从而，自由贸易也会随之消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或是在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敬虔信仰、没有对于法律规则秩序的遵守和敬畏、没有诚信与

真挚的道德品格，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就不会有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式的自由贸易机制。

————————

在一个自由贸易体制环境中，从国家、社会、国际层面而言，人们必须认识到、并深刻地尊重两点。

第一点是，人们必须由衷地、从心底深处，真诚地尊重、遵守、敬畏秩序规则体系，而不是——处处喜欢耍小聪明，把别人的诚实和诚信，当作是愚蠢；把自己的诡诈，当作是智慧。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也应当是如此。

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从根本层面、终极意义上而言，人们不应当把人类世

界看作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所主宰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世界，而应当是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诚相处、公义、正直、恩慈的世界。

第二点是，在国际关系之间、国家内部关系等等之中，大多数人们必须有一颗诚实的、信实的、“爱人如己”的心灵。

所谓“爱人如己”是指，在人类中间，在人与人之间，应当彼此有博爱的心。这种博爱的情感是，每一个人在心灵中应当关爱他人，就像关爱自己一样。

请注意这里，并非是否定、放弃我们自己的正当、合理的利益，而是强调，我们应当关爱别人，正如同我们关爱自己。换言之，这正是我们在本书开始之处所引用的圣经话语：“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

弥迦书6章

6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当献上甚么呢？

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

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

7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油河吗？

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

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8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甚么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么；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谦虚谨慎与你的　神同行。

马太福音22章：

37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　神。38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39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40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____

上述两点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宗教信仰，其中又有许多迷信【即，以占卜性质观念看待世事与自然世界，并试图从中操弄、筹划，以期得到自己的属世利益；例如，风水、算卦、趋吉避凶、生辰八字、占星术、炼金术、交鬼、画符、拜拜并给神灵烧金纸、等等】以及偶像恶俗【即，把神灵物化为人手所作的偶像，例如金、银、石、木、泥像等等；或是用雕像来代替上天、神鬼；或是把信仰的对象当作是人臆想出来的、属世性质的对象、或是人出于自义自傲而杜撰的、没有诚实完整事实根据的玄学深奥之理，例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玄学主义，等等；即，人以属世之利或是自己的自义、自己的心思意念为偶像】。

在这个世上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中，只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有着强大的历史渊源背景、相对而言完整的理论支撑、比较完全的组织体系、以及正

规宗教经典系统为核心内容。它们是，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可兰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系列佛经为核心的佛教信仰体系。以下我们引述一些简单的比较和反思。

++
++
++
++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前言】】】

前言

世上的宗教有很多。然而，在世上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千差万别的宗教

信仰、以及相应文化传统中，成体系的、有详尽而系统化的宗教经书与教义为支撑的，有强大理论背景支撑的，能够构成一个相对而言完整神学、信仰理论体系基础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宗教，或三个宗教体系，即，以圣经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及，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还有，一系列佛经为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

在本书中，我们以佛教经典中的一本最重要的核心教义性书籍《金刚经》为聚焦点（以后，我们也会讨论佛教经典中的其它重要典籍、书籍），从中分析、评介、剖析佛教的教义与思想，以及它在社会中、世人生命之中产生的相应影响。

无论是世上哪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试图回答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

所以，如果，我们要分析、评介、剖析一个宗教的精髓与核心体系内容，那么，我们就应当来仔细地、认真地看一看，它们在关于上面五个方面的观念中，是如何阐述的。

正如《世界佛教共识宣言》中所说，也正如几乎每一本佛教经典中的思想核心所表达的，——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创造宇宙天地的、终极的造物主。

由于在佛教中没有造物主、或不相信有造物主，因而，这一特征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等领域中的一系列深刻的理念与观点。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往往是泛神主义哲学所共有的。

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观上，它们往往把世界看作是无珍贵价值、无隽永意义的，而不是把世界看为瑰丽、奇妙、意义深刻的。它们往往强调，世事无常，人不应当被世事羁绊，而是应当醒悟，看清世界与世事的虚无等等。在人生观上，它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心灵、位格等等看作是并无深刻价值意义的。

这种泛神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没有造物主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总是会指出，物质世界的虚浮性、不可倚靠性。然而，即使，这样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错，并且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缺失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它们不能看见世界被造的奇妙性、美丽性、智慧性，也看不见世人生命的珍贵与独特、心灵的奇妙、思想的可贵。人的这种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是宇宙世界中一种最为独特、奇妙、珍贵的能力与品质，是来自于造物主、创造生命之主自己的无限能力与完美品质；这样的能力与品质，正是道德的基础，是爱的根源。

总而言之，它们把人生、世事、价值等等，往往都看为羁绊人的东西，提倡要离弃、舍得、放下，而不是要有满腔热忱的、执著的向往、盼望与信念。

究其原因，无论是人们在思考世界观、还是在思考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的时候，如果离开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世界就是冰冷、荒芜、混乱、无意义、虚浮的，而人生也就在本质上是苦的；因而，根据泛神主义哲学，这些就都应当被看破、看空、舍弃，放弃执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

在本书评析《金刚经》的过程中，我们会清晰地看见上述特征。

+++

+++

+++

+++

+++

+++

+++

+++

++

【【【引述 关于伊斯兰教的综述】】】

《关于基督教信仰证据的反思》

世上存在的谎言，并不能证伪真理。许多人相信谎言，这恰恰证明了，世人生活在轻忽、自私、满了罪性与罪行的生命之中。世上存在许许多多的骗子，这并不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诚实”这件事。

世上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们，常常用伊斯兰教为例，以此说明——：“一个广泛传播、被许多人相信的宗教信仰，并非只有基督教信仰一个宗教；因而，人们就并不能说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仰或者都是真实的，或者就都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在本章这里，仔细分析，看一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我们承认，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也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就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我们也承认，穆罕默德的确是可兰经的著者（他或许有一两位助手帮助他写完此书）。我们也进一步承认，

穆罕默德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以至于他能够以非同寻常的决心和毅力，把他的事业一直进行到底。我们也不否认，可兰经中讲述了很多关于上帝的完美性等内容，以及教导人应当道德高尚等。可兰经的语言看似优美，具有阿拉伯语的纯粹风格；这一点，许多伊斯兰教学者都同意，很多基督徒学者也都不反对。但是，穆罕默德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天的特别启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任何外在证据能够证实；并且，从可兰经的教义内容中，我们能够看见大量的证据，显明了，伊斯兰教绝非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为了让这一点能够得到更加清楚的说明，让我们公正无偏地考虑以下几项事实：

1. 关于穆罕默德的自我宣称，既没有任何神迹的支撑，也没有任何预言的证明。

事实上，穆罕默德经常性地被他的反对者要求提出确凿的证据，来显明他的身份与使命的真实性；但是，他总是以轻蔑的语气拒绝，并用一系列理由来推搪。可兰经里面写道：“真主对穆罕默德说：——完全可以差遣你，让到地上来行神迹；但是，以前的国家民族用谎言败坏了神迹，所以，你只是一个传道者。”“如果你行神迹，百姓不会相信你；因为从前摩西、耶

稣、以及众先知行神迹的时候，百姓也弃绝了他们；所以，你不要行什么神迹。”

PALEY博士曾经列出了可兰经中至少十三处不同的地方，都以与上文相似的理由，来解释穆罕默德为什么没有行神迹的能力。的确，穆罕默德用很多华丽的辞藻，讲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任何能力，来施行哪怕一点神迹。所以，他一生的传道都是空口无凭的。

在穆罕默德去世几百年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假意讲述了一些穆罕默德所行的神迹；但是，这些事情不但没有任何见证（即，在事情发生的当时，见证人的见证），更是与可兰经的内容直接违背的；因为可兰经多次重申，穆罕默德没有行神迹的能力。并且，那些几百年后追随者们所编造的神迹，本身也没有任何深刻或重大的价值与意义，而仅仅是一些虚浮的、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事情；这些类似的事情，世上有很多迷信的风俗与赝品；比如，树木可以行走，石头可以向他打招呼，水泉可以说话，骆驼可以抱怨，羊肉说自己里面有毒，等等。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中，并没有任何神迹的内容，而仅仅是一个自我谎称者的、空口无凭的宣称。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有着深刻而本质的区别，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建基于耶

稣基督的复活的神迹（这是整本圣经内容的核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教义的中心与基础；此事有着深刻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斩钉截铁的、令人无可置疑的历史见证；基督使徒们为此而甘洒热血，走遍天涯海角传这和平的美好福音；整本圣经旧约，在跨越上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以令人无可推诿的清晰预言，证明了这件事情的历史真实性）；后者则没有任何证据的痕迹和影子；没有任何人能够显明，伊斯兰教教义是来自天上的启示。

2. 我们也可以从道德教导与特征的角度，来比较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不同。对此，我们有充足的历史和文献证据，能够显明我们的比较结果。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无害的、毫无罪污、毫无瑕疵；在他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罪性与罪行。基督的生命是纯洁的；即使基督的敌人，也无法找到他的任何罪与错。基督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完美生命的榜样；他有着热忱的信仰，纯洁的爱心，柔和谦卑；这些无限美好的品格，都是世人所从未见过的。

穆罕默德的生命品格则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品格完全不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穆罕默德的生命中，充满野心、淫欲、残忍、不公不义；他的生命中充斥着许多最血腥、最残暴的罪行。亵渎、撒谎、谋杀、通奸、淫欲、掠夺，等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几乎都是每天发生的家常便饭之事。而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避免其他人的效仿，他谎称自己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真主的直接启示、旨意。他无耻地宣称，是真主给了他那些特权，使他可以随意行那些丑恶的罪行。这些事情的数量如此大，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我不愿在这里过于详细地谈论它们的细节，免得它们玷污了本书的

纸张，也免得玷污了读者的情感。

3. 对于一个公正不偏、心态诚实的人来说，可兰经本身的内容，与圣经新约的内容根本无法相比。可兰经的内容，基本就是一些所谓高尚情感、道德教导、宗法礼制的大杂烩、堆砌；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匪夷所思、荒谬的故事；处处显出谎言与自相矛盾的特征。穆罕默德自己也承认其中的内容包含许多矛盾；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他的真主就是这样告诉他的；所以上一章的内容，有时在下一章就被否决掉。这种矛盾的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很难向一个穆斯林证明可兰经的内容是错的；因为他常可以找到相反的内容来为自己辩护。

可兰经的内容，并非是超出人的想象；它巧计地融合了当时阿拉伯地区流行的宗教信仰观念；它激励人心中的最强烈的、最暴戾的情感；它鼓励人的野心、权力、复仇、战争；它打开淫欲的大门；它宣称人们在天国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属肉体的奖赏；这些，都是为了引发人心中不洁的动机。它不鼓励、拒绝、甚至禁止人们自由地发问；它禁止人们进行任何教义上的反思、思索、自由讨论。可兰经中的那些优秀的部分，都是由于抄袭、模仿了圣经；而可兰经中那些不同于圣经的部分，即，那些穆罕默德按着自己的判断或想象而添加的内容，则充斥着虚假、敬虔、荒谬。

4. 穆罕默德传教的方式，与福音传播的方式完全不同，天壤之别。

如果，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就是，这两者都在刚建立的短期时间内，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两者都自从建立以后，就一直持续地存在下去，直到今日。

但是，当我们仔细认真地考察两者的传播方式的时候，就会更加惊讶地发现，两者之间不仅一点相似性都没有，而且甚至是完全相反，互相形成了鲜明对比。

穆罕默德在一开始传教的时候，的确想用劝服和计谋的方法；但是，他这样持续进行了十二年以后，收效甚微。前三年，他只有十四个门徒；七年中，他只有八十多门徒；十二年后，他从麦加逃走的时候，跟从的人数很少。

在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基督教信仰的早期传播根本没有可比性。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极其迅速的，如同闪电爆发一样，从

天的一边照到另一边。在短短数年之内，没有什么属世的势力与权力的帮助，面对着重重阻力与反对的势力，基督教信仰却很快就传遍了罗马帝国的疆域，甚至传遍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许多角落。但是，伊斯兰教却在十二年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而且，与基督教信仰所针对的、文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罗马帝国内的各地百姓（即，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不会轻信一个外来的信仰）不同，伊斯兰教在公元六世纪，即，在其开始建立的时代，所针对的是无知、轻信、没有什么文化的阿拉伯地区人民。然而，在这个期间，伊斯兰教的拓展却极其缓慢。

事实上，若没有刀剑，这个宗教信仰根本就不可能在人类的社会与历史中泛起一点涟漪。当MEDINA的居民开始支持穆罕默德以后，穆罕默德改变了他的整个计划；他正式宣称，要用武力的方式开始传教。从这时起，穆罕默德就变成了一个军事战斗家。他开始频繁地袭击、劫掠商队；当武力增长以后，他开始征服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部落、国家。有时，他会大规模杀死战俘，或是把战俘卖为奴隶。起先，他的命令是杀死一切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后来，随着他武力征服的区域越来越多，他的命令逐渐变为："可兰经，或死亡，或上贡"。

不过，我们不要产生误解，不要错误地认为穆罕默德的征服区域极广；其实，在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他的统治区域从未超出过阿拉伯地区，除了叙利亚的一两个省份之外。是他的后继者、哈里发们，用刀剑与火，把伊斯兰教的疆域扩展到亚洲以及埃及的部分区域。在这些拓展过程中，除了血腥的杀戮，还能有什么事情呢？

因此，虽然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很快、范围很广，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刀剑、杀戮、血腥、征服而达到的；这与基督教信仰的和平温柔的传播过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凭靠野蛮的武力，后者是来自天上的祝福。

5. 伊斯兰教的教义内容，及其在人生命中所带来的影响，与基督教信仰内容和影响相比，完全不同、天壤之别。

不论基督教信仰传播到哪里，它都给所到之处带来祝福与温馨；那些真正贯彻实施基督教信仰教义原则的人，以及受到这些美好教义原则的影响的人们、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得到了极大的益处。如果我们放眼查看世界地图，就会清楚地看见，世界上的真正文明的国家、民族和地区，那些科学与文化发达、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的区域，都在哪里呢？什么地方，有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气象呢？相对而言，什么地方，有良好的道德风貌、和谐的社会秩序呢？穷人和受苦难的人，在哪里会得到最好的帮助、救济呢？人民在哪里能够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享有自由呢？妇女在哪里受到尊重，在社会中享有应得的、受尊敬的地位呢？针对年轻人的普及教育事业，在哪里得到最好的发展呢？人们在哪里最恩慈、良善、幸福呢？

显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以上问题的答案：——是在那些基督教信仰发扬光大、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相对而言的很大影响力的地区。并且，在那些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当地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全、自由、和平程度，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实质情况、敬虔的景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相反，我们如果仔细考察当今那些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地区，就能够清晰地看见，满目苍夷、民不聊生、极其荒凉的景况。在今天的中东地区，那曾经是艺术、文学、精致工艺都很繁荣的地区，现在早已凋零破败。许多古代的良好礼制都已经无影无踪。在中东各个国家中，到处是暴君与专制政权的铁腕统治；那曾经的安宁社会生活，已经变成了无知与奴役制度遍地的境况。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各地禁止、或不鼓励教育、学识、做学问。人们不能自由地探索真理；国家的统治政权、伊斯兰教的统治，所要求于人民的，就是要像奴隶一样顺服。社会中没有正义；或是，正义常常被人们忽视。没有人享有生命与财产权的安全。伊斯兰教任何所及之处，人民就立刻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与此同时，整个伊斯兰教的传播运动就完全成为一个战争扩张的行为。根据可兰经，一个人最好的行为，就是为了伊斯兰教的扩张而投入战争；最高的荣誉，就是那些死于战争的人。无疑，可兰经的这些内容，直接导致了穆斯林的圣战士的战争原则，使他们在战争中不

怕死亡；使他们期望在战场上战死，然后进入那个充满肉体血气满足之乐的“天国”。穆罕默德在可兰经中说道：“刀剑是进入天国的钥匙。为了真主而流出的一滴血，在战场上睡的一晚上觉，超过两个月的禁食和祷告。死在战场的人，罪得赦免。审判日的时候，他的伤口将要铺满玫瑰，香气扑鼻；他的残臂断腿，将要换成天使的翅膀。”

然而，当穆斯林在各个地区的征服战争取得胜利、结束以后，他们的生活就成了慵懒、愚昧、昏昏欲睡的样子。当别的国家在艺术、文化、科技方面取得进步的时候，穆斯林各个国家始终陷入停顿的状态，停滞不前；甚至常常倒退。他们在文学、文化方面，在绘画、科学探索、文艺等方面，再也没有优势。他们的人民常常俯伏在暴君政权的统治之下，没有自由与个人的权利。

+++

+++

+++

+++

+++

+++

+++

+++

++

【【【引述 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信仰的比较，以及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生活与体制的影响】】】

《基督教的证据》

基督教信仰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什么

本章的题目主要局限于基督教信仰在人类社会道德方面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力。关于福音对于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另外，关于福音对于人生命更深层次问题的深刻作用，我们则将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专门论述。在本章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福音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社会整体的生机勃勃、自由而团结的状态。这个题目虽然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讨论，但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广泛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在很漫长的历史中都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深思。在这里，我只想进行一些言简意赅的、初浅的论述。我的这些论述其实相比于前人的相关著作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如果说与前人的著作有什么稍微不同，那么我想，本章的文字大概更专门地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缺乏以及所经历的很多具体事情。

我想要论述的一个重点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乃至整个社会之团结状态的概念，在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群，与一个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在后者而言，这些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所能够在一起组成的最好的团结状态，就是一个无中心的、散漫邋遢的“共和国”。在前者而言，那些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群在一起则会构建起一个“有坚固根基的城”、一个有良好核心、众志成城的“上帝的国度”。

在我们考察基督教信仰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来注意看一下基督教信仰中一些重要的抽象原则，然后再看其在基督徒们的教导中、以及生命中的应用与体现。

当我们讨论基督福音中的抽象原则、及其与人类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立刻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而言，我们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福音的最根本层面的真理中，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之所需，如何得到了满足？

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需要，取决于构成社会的所有组成分子的需要。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能够单独地站立，面对自我，面对上帝。然而这些个体性的人却生活在一个社会中，通过一个心灵的网络纽带，彼此连结在一起。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通过一些外在的言语行为来彼此影响生活习惯，而且他们在内心的许多观念上也会受到整个社会群体的相当程度的影响与改变。他们互相影响的程度和力量，取决于社会的团结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一个社会的良好而健康的状态，取决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自由程度与群体的团结程度之间的平衡。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难于达到的。即使在理论上，我们也很难判断，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之间的完美平衡点到底应该在哪里。如果个人自由太多，则社会的状态会变得道德堕落、生活散漫邋遢。如果群体团结程度太多，则每一个人在其中的生活可能会非常压抑、束手束脚，人的幸福与创造力也会大大下降。当社会无法达到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两方面之间的平衡的时候，社会就往往会陷入周期性的动荡。个人自由散漫现象如果普遍地在社会中发生，社会就会逐渐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堕落状态，并最终导致暴君专制主义的盛行，然后暴君专制又被新一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推翻。这样，社会就会如此周而复始地陷入动乱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政府的统治机器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手术刀。但是，这个手术刀总是在病人的伤口上刻下更深的伤痕，使病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于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福祉而言，必须同时需要有两个原则得到满足：自由的原则，与团结的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建立，部分地取决于政府的官方治理，部分地取决于人民的自由意愿。

一方面，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人们需要自由。自由的意思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内、一定的范围内采取自由的选择和行动；以及，社会中的每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社团、群体能够自由地行动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的团结状态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性是社会长久存在、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社会团结状态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则。社会稳定性的原则独立于、或先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原则。

如果没有自由原则，就不可能有人的社会生活，因为人人都成了奴隶，自由思想也更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稳定原则、或团结原则，社会就不可能延续下去。

一个完美的、或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社会形态，我们称之为“文明”。这个词本身就蕴涵着这方面的意思。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处事“文明”，享有自由、但要为集体做贡献，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社会的团结而愿意牺牲自己。

现在我们来思考，基督福音与上述两个根本性社会原则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换句话说，福音向我们启示的社会生活之真正原则是什么？

无疑，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敬拜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的永生真神。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生命隐藏在他那里"。上帝的圣洁道德律法，要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人类的最好状态、最高理想、最大幸福，就应当是像上帝那样圣洁、公义、恩慈。显然，基督教信仰为上述社会两原则中的稳定性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真理层面的支撑：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需要一个先于其自由意志之上的、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道德基础。

有人会就此争辩说："即使社会中的人们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会看见我们自己的良心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随从自己的良知，就足以维护社会的基础了"。

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社会"律法"的现实性。不论我们所说的律法是什么，总之，社会需要这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治理，而这些律法、或规章

制度总是要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意志。这种社会统治的权柄与社会个人自由意志之间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张力，不论两者之间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对于无神论主义者或泛神论主义者而言，这种社会律法的来源是宇宙自然世界，或者基于人性自身的光景。事实上一般而言，无神论主义与泛神论主义【译者注：泛神论主义是指，认为世界本身就是神；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终极的、有着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的、自有永有的上帝、造物主。因而，在泛神主义者眼中，人在这个宇宙自然世界中，并没有什么终极层面的高贵性；人的自由意志、自我认知并没有什么本质层面的高贵源泉和永存价值】的理论家们，都往往是王权、专制政权的坚决推崇者、坚定拥护者、热烈鼓吹者，因为他们推崇社会的稳定要胜过社会的自由。在他们眼中，个人自由并没有那么珍贵，思想自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甚至，这些个人自由都会被看作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这些都可以为了社会稳定的原因而被裁减、践踏。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人生命的意义并没有本质上的终极高贵性、尊贵性；在人与自然界宇宙之间的关系上，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译者注：人的尊严，按着圣经中所述，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尊严与荣耀，因为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他们的所谓和平与稳定，是压制自由的结果。他们所推崇的统治常常导致社会中属灵状态的荒凉。他们的和平往往是一种扭曲的、徒有其表的外在和平。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无疑，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上来分析，敬拜

全能、全知、公义之上帝的信仰体系，能够给社会带来最坚固、最安全的稳定性环境因素。对于个人自由与意志的所划定的界限："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向前逾越"这样的律法，必须是在终极层面意义上来自那位有位格的、能听能看的全能者上帝自己的话语。个人思想与生命就像是大海中匍匐向前的海浪潮水。对这潮水的限制力量，必须是来自天上的力量，来自那位创造和管理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天、独一的真神。

然而一神主义本身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社会在稳定原则与自由原则之间达成平衡。【译者注：一神主义是指，信仰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独一的真神所创造和掌管的。在人类历史中，一神主义的宗教信仰有三个主要宗教形式：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后两者的起源都与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经典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否定旧约圣经的主要部分，认为犹太人的祖先篡改了上帝的启示，于是穆罕默德就另起炉灶，另外创建出了伊斯兰教信仰】。这是因为，一神主义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苛刻的管理，以至于达到完全排他主义的程度。比如，伊斯兰教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王权和专制政府的特点。在犹太教的社会中，这种专制倾向不那么严重，因为根据旧约圣经，"耶和华所膏的"人有君王、先知和祭司。君王负责国家政事，先知把上帝的启示向世人传讲，祭司则负责全国百姓与政府人员们的敬拜信仰和仪式。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时代，这三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重合，结果导致百姓担负很重的轭。在地上的国家政权体系中，当君王、祭司、先知三个职事高度重合的时候，社会的统治权力就会很大，而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就会受到很大挤压与压制。

而在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一神主义中，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个人完全沦为绝对命运下的被动受体，因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要无条件地完全服从于穆罕默德在国家政权中的统治权力。在伊斯兰教的一神主义下，"一神主义"的概念就成为完全的"真主凌驾世人"。在这样的统治下，每一个个人都是微小的、盲目的、软弱的、罪恶的。真主是至高无上的律法颁布者，是全能的法官。在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一切都要绝对服从真主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质疑的权力。在这种一神主义统治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在外在言语行为上的服从与顺服，看起来是最重要的。人们不应当有，也不需要有任何自由。在这样的一神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生活无法在社会的纽带关系中立足。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在政府绝对统治权力之下往往失去了权利与自由的空间，不再有活力和创造力。整个社会变成了一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状态，直到下一次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政府权力与国王被推翻。然后社会进入下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周期循环。

有时，上述弊病也成为一些现代人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基督教信仰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国家社会也会像伊斯兰教社会那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社会大众就会失去个人生活的自由以及思想上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与简单的、伊斯兰教那样的一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中，上帝的启示表明了，上帝与世人的关系不是"上帝凌驾世人"，而是"上帝与人同在"，即，"以马内利"。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使人有

思想、有自由、有意志。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人的自由才有了真正高贵的、终极的、本质性的根基。虽然人是软弱的，虽然人应当谦卑地承认和悔改己罪，虽然人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在人的生命本质当中，应当本有自由的属性。正是在这样的、与生命自由息息相关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上帝才真正是世人的天父，人才真正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作工，不是把人当作无意识的机器，也不是把人当作被压制的奴隶，而是，圣灵净化我们的心灵与灵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由内而外地、由衷地、忠心地、自由地来到公义圣洁之上帝的面前。福音的奥秘在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赎罪之祭。在福音中，包含着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与真理。保罗把这福音看作是上帝的奇妙大能，看作是基督教信仰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刻的内容。人与上帝是朋友、是同工、是亲人、是至爱。这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的哲理，而是真实的、热忱的、生命的信仰。

这正是福音的奥秘与最迷人、最甜蜜的精髓，正如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世人的救恩，是使人得到自由的恩典之约，而不是使人处于被奴役之境地的律法之约。恩典之约使人真正地、衷心地愿意来寻求上帝、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圣洁的律法典章，因而真正成就了、完全了上帝的律法。这恩典之约使人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人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优点，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白白地赐下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和接受他救恩之人的罪债被偿清，使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和饶恕，因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恩的人是谦卑的，因为我们真心地承认自己本都是该死的罪人。这

样的人是诚实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悔改自己的罪。这样的人是真诚而热忱的，是自由的，因为不再有灵魂之中、罪恶权柄之下的奴役和羁绊。

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当拥有之自由的价值。这自由是尊贵的，是高尚的，而不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在欧洲古代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被逐渐废除了，中世纪的农奴制度逐渐消失了，以及在我们当代，美洲境内的奴役制度也这样被最终取消了。

请注意，圣经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解放人类奴隶制的“解放神学”，而是指出世人普遍的罪的光景，指出世人对于上帝的背离，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救恩与大能。人灵魂所处的被奴役光景，真正根源不是外在的奴隶制，而是内在的、人生命处于罪的奴役之中的光景。每一个世人在其生命的本质中都有着倾向于罪的性质。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所在。他使我们的生命脱离了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们的真正自由，其核心不是在于外面的、肉体上的自由，而是在于里面的、灵魂之中的、脱离了罪恶捆绑的自由，是脱离了死亡恐惧、有永远生命、天国盼望的自由，是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之生活的、热忱地爱上帝、完全地归向上帝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福音之中所包含着的这种最根本的关于人生命之真正自由的思想，的确对于社会学中的个人自由具有重大影响和价值意义。这以生命自由为中心实质的教义，这以自由为基础的信仰、思想、行为、规范，是对任何专制政权、暴君统治、强迫压制、寡头政治、强奸民意等等社会暴虐法权机制的本质性的反对。

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特点，正是导致世上的那些想要奴役人民的政权讨厌、排斥、压制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比如，TRAJAN以及MARCUS AURELIUS等等专制政权，都极力想要反对和排挤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历史上，在历世历代中，在各个国家的历史里面，都曾经有许多基督徒殉道者。这些殉道的事情，尤其发生在福音刚刚传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或是那里正在经受信仰上的逼迫的时候。每一位基督徒殉道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自由而死的殉道者。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谦卑而和平的信仰，为了心中所敬畏的上帝，为了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恩典，为了对于上帝的爱，而宁肯丧失性命，也不愿放弃这宝贵的信仰。他们愿意在一切世事上温和地、和平地、恩慈地、勤劳、谨守地生活，愿意在一切世事上遵从在上掌权者，尊重政府权力和法律，遵守社会中的一切法律典章制度。但是在信仰之事上、属灵之事上，他们却绝不愿意在任何属世的权力面前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绝不愿意听从人而不听从上帝。他们知道，有一个属天的、终极的律法赐予者，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立法者；上帝的典章，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的规章制度与法律。

这种既谦卑温和、又坚毅稳定的信仰，不仅仅是历史上那些无数基督徒殉

道者们的信仰，也更是历世历代以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平凡而真诚之基督徒的信仰。每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都应是如此。这种信仰中包含着一种与世俗中的好勇斗狠的英勇主义完全不同的、谦卑温和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中，有着对于人灵魂自由的高尚本质的追求和尊重。在人的心灵土壤上，在人的信仰之中，只有上帝自己才能亲自来掌权。上帝以道成肉身的、舍命牺牲的、救赎性的爱，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以任何属世的人为我们灵魂之主。

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革命；但至少在名义上，这些革命更多地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要真诚地、按着圣经所教导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为了信仰的自由，而不是完全为了属世的政治权利的自由。在一个国家的基督教信仰中，如果没有对于个人自由的尊重和重视，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就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

所以，我在这里想要提出这个论述的结论和论点，即，基督教信仰是最适合人类社会健康蓬勃发展的宗教信仰，因为它不仅满足了一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团结稳定原则，也满足了这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个人自由原则。正是因着基督教信仰，社会才能够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因为人们在其中的生活可以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勤奋谨守、享有自由和尊严，但却不会滑入道德堕落、无政府主义、刁酸尖滑、彼此猜疑、毫无信任、好勇斗狠的混乱与败坏的深渊。当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渐渐失去基督教信仰、沉迷于饮酒宴乐、骄奢淫逸、彼此争斗不休的时候，就是他们逐渐走

向败坏与崩塌的时候。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在社会团结稳定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两者之间试图进行某种调和，或是给出某种明确的界限和公式。圣经福音书中，当有人来问耶稣基督是否要纳税的时候，耶稣给出了一个在历世历代以来非常著名、人所熟知的回答。他并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在什么是属世、什么是属天的事情上，划出一个明确的、楚河汉界一般的界限，而就是说："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要归给上帝"。当然，耶稣对那个具体问题的回答意思是说，应当纳税。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说，在这一点上、在这方面的本质性问题上，耶稣基督的有限度的沉默，以及有限度的澄清，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

无疑，在历史上我们常常会看见，基督教的教会、团体、会众要起来，以和平的精神，为社会公义而发声；在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上，常常需要挺身而出、为弱者呼吁、秉公行义、抵挡罪恶，无论这罪恶是来自高举稳定大旗的政府权力、还是来自高举自由主义的社会个人、甚至暴民。然而，无论基督教信仰、福音针对社会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具体立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种具体立场本身，并不是永恒的价值原则，而仅仅是此时此地的、福音之永恒价值与原则的一个具体应用。只有福音原则本身才是永恒的。在福音中，既包括了对于自由主义的强调，也包括了对于集体主义、团结主义的强调。这两者虽然看似矛盾，但却都是重要的、高尚的，因为都是来自上帝的律法："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们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更进一步说，究其本质，基督徒们的真正终极的归宿和盼望，不在于这个地上的繁荣与富强、或是公义与和平，而是在于天上的永远国度，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那没有死亡和眼泪、没有痛苦与别离的属天国度，那个与上帝同在的、永远的、真实的家园。所以，无论是贫是富、是显赫还是卑微，基督徒们都能在这个世上和平地、谦卑地、忍耐地度日。基督教信仰不是遁世的信仰，而是积极入世的信仰；基督徒们要在这个世上作光和盐，发光发热，竭尽全力、毕其一生爱上帝、爱世人。然而同时，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归宿、倚靠、终极价值的思想体系。

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中，基督教信仰都会把真正的福祉带给那个社会，并渐渐地也把个人自由和长治久安带到那里。无论是在稳定不动的东方，还是在活泼变化的西方；无论是在早期的、以家庭为单位与核心的、简单社会中，还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纽带所连接的、庞杂社会环境中；基督教都能够把人心灵所饥渴的、渴慕的信仰与精神支柱带给人。并且，因着基督教信仰的广传与普及，社会道德风貌得到大大提高，社会更加稳定和谐，人民同时享有更多丰富美好的自由。

如果，在历史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基督教只强调稳定原则或是自由原则

中的一方，而不强调另外一方，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特定社会形态中，稳定与自由这两个原则因素之间不平衡，一方太大太多、而另一方太小太少。

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许多国家的社会随着个人主义的解放而导致道德失序、社会混乱。但是，当那些国家的社会从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中经过重整、进入法律秩序状态中的时候，结果往往是，专制主义政权上台，公民自由被一扫而光。当今，在许多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或是许多明确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专制极权主义常常被当成针对社会淫乱放荡、混乱、失序、道德败坏的解药。他们的国家社会形态如同钟摆一样，在极权与放荡之间摆来摆去，总是不能停歇、不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在他们的社会中，或是没有自由，或是没有稳定，二者总是不能兼得。

综上所述，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益处。从久远的历史层面来说，从漫长的时间见证来说，在人类历史中，只有真正的、以圣经为唯一根基的基督教信仰，才能给人类带来一个这样的社会：——既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自由、充满温馨博爱、同情弱者、鼓励强者、彼此平等、满怀热忱情感的社会；又是稳定繁荣、长治久安、和平安宁、不断奋进地进取的社会。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如此独具特点的基督教信仰，居然成为了千古以来无数哲人志士所苦苦思索的、一直找不到答案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极其惊奇诧异的事情。关于人类究竟应当怎样才能彼此和谐相处，历史上无数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曾经对此思索不已。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这方面有汗牛充栋的著述。世上也有许多流派和学院，不断在探讨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或是流于一些象牙塔内的文字游戏、而对真实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或是导致一些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做出来却尽是假冒为善的虚伪之辈所组成的社会。而基督教从诞生到发展，从卑微的开始到逐渐的增长，看似平淡无奇、和平温柔，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无数世人的生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国家、民族、与文化，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没有什么，比这些历史更加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救恩，我们永生与天国的盼望，等等这些教义，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文盲，最简朴的公众也都能够理解。我们如果否认这些教义，就不能理解基督教信仰在人类历史上的奇妙作为，不能理解教会的永存性，不能理解圣经的教导。

+++

+++

+++

+++

+++

+++

+++

+++

++

+++
+++
+++
+++
+++
+++
+++
+++
++

让我们继续讨论和阐述，在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其中重要的两点前提性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秩序法规法律体系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以圣经为核心基础的基督教信仰，对我们的教导是：——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慈爱恩典、无限智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并且，我们应当爱人如己。

人与人之间的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的根基与源泉，是来自于神。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爱里面，既应当包含着，对于良善、公平、正义、公义的追求和秉持，也应当包含着，对于罪恶的憎恶和离弃。我们的爱的本质，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

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

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什么是良善？遵从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良善。

什么是罪恶？悖逆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罪恶。

上帝自己是分别良善与罪恶的根基与基准。分别善恶的终极权柄，唯有是属于神。他是道德律法的终极颁布者，更是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谦卑顺服，就也不会在他人的面前诚实、信实【宁肯吃亏也不愿说谎；宁肯吃亏也不愿违反规则与承诺】，也不会在秩序、法律、规则、法规面前由衷地顺服、敬畏、谨守。【许多世人在这个世上之所以暂时表面上遵纪守法，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世上法律的惩罚。如果有法律的空子，或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违反法律规则、撒谎、占便宜、玩弄规则等等不会受到立刻的、严重的惩罚，——那么，我们就会看见这世上许许多多人的内心真实光景如何；看见他们以欺谎、虚伪度日；看见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玩弄秩序，毫无真诚敬畏之心。】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倚靠、热忱，就也不会真正地爱人如己。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切被造的世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没有瑕疵、没有罪污的。在我们的生命与心灵深处，充满着深刻的、本质性的罪性与罪行。我们对于他人的真诚之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首先的、对于上帝的爱中。这正如，在一个大家庭中，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着许多的缺点）之间的爱，首先是建基于他们对父母的爱。只有在我们心里对于上帝的热忱真挚之爱，才使我们有力量去真诚地饶恕别人、接纳别人。

____

在现代的世界，自由贸易是经济的基础与根本支撑。自由贸易的本质是整个人类进行社会化大分工、大生产；在人类社会中间，各样不同的人群各司其职、各专其长、各尽其事，从而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大的、最高效的贡献。

在各种不同的、五花八门的劳动生产活动中，都往往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熟能生巧；即，如果我们大批量地专门做同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人类）就能够便于发明出极其快捷甚至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从而使得商品的成本变得极低、价格变得非常便宜。例如，今天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线工厂，可以平均不到一秒钟就能够生产组装完成一辆汽车，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正是在此。

在过去五百年来，近现代化工业文明，除了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以外，其巨大成功的奥秘就是在于，自由贸易所导致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

____

但是，上述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必须依赖于良好运行的经济秩序与规则体系。否则，从长期而言，所谓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不可能的。

现代经济学中所常常忽视、甚至无视的，就是我们在本章前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前提性假设。那就是，在整个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所涉及到的人们、社会、各个国家，必须应当有着谨守和敬畏秩序规则法律法规体系的心灵，以及，必须应当有着爱人如己的心灵【在这些背后，就是公平、正义、公义、顺服、谦卑、敬畏与敬虔的信仰】。否则，所谓自由贸易，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反而会引发巨大的冲突甚至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和许许多多的直接间接因素，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体系与英法体系等等之间因贸易冲突而逐渐激化所导致的深刻结构性矛盾。今天，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随着中国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而得到飞跃性发展、但却不愿意遵守许多承诺和世界贸易规则秩序，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战争。这种冲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政治经济背景环境，在某些角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源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经济理论与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在一百年前开始在俄国付诸实践，并直接导致了世上许多的专政暴政，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因专制统治者人为谬误国家政策而引致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数以百万计人被关进劳改营、集中营、监狱、强迫下放劳动、甚至被直接屠杀等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直到今天，在中国、北朝鲜、以及南美等国家地区，这样的思想仍然还很有市场、很有号召力，仍然得到许多人在内心的真诚信从。

那么，社会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什么呢？为什么它这样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在二战以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鼎盛时期，曾经席卷了世界上俄罗斯、中国、东欧各国、越南、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南美洲【当然，许多东欧等国家往往都是在苏联的武力逼迫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内部、包括曾经的东德内部，都有很多真心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们】、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呢？甚至，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西方高等学校的文科院系中，在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中，甚至在西方（包括美国）的选举政治中，仍然很有市场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于什么呢？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真理吗？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想的致命性错误是什么？

____

有人说，在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间，有以下两个共同点。

____

第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否认、或远离对于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它们都推崇人自身的伟大性、光辉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在纳粹主义中，日耳曼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上，由于它们所推崇的劳动人民或是日耳曼人民需要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代表、反

映者，于是，它们就必然推举出一位伟人，来真实地体现它们的推崇对象。因而，它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都聚焦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不可避免的专制暴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金日成等领袖独裁人物。在纳粹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希特勒这样的领袖独裁人物。

它们所诞生的文化土壤，都与其文化思想氛围中的无神主义影响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纳粹主义思想的兴起，是德国十九世纪无神主义哲学兴起的直接结果。在十九世纪，当年在德国最优秀的大学中，盛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思想、无神主义思想；以至于著名哲学家尼采在著作中写道："上帝死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德国主流哲学界，盛行着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思想【即，否定上帝的位格性，否定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否定上帝的自由意志，或是把上帝与世界本身看为同等，或是把上帝看作是无知无觉、没有意志的一种超自然之理、意识流、规律、因果逻辑、等等；或者，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除了用自然规律管理世界以外，上帝并不干预和涉入这个世界中的事务和自然现象；等等】。这些思潮【也包括德国以外、诸如法国思想界许多学者、英国学术界的一些教授，等等】，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突然流行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

正是因为他们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创造世人生

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那生命之主，那无限全能、全知、全在、全备，那能听、能看、能言的，那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那圣经中所启示的救赎主；——所以，他们才把心灵的眼目转向地上的被造之人，把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己的生命的倚靠、心灵之锚、心灵的归依。

在世人的心灵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然而可叹的是，世人却常常离弃和悖逆那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道德律法的根源与终极颁布者，那对于世人生命之道德价值的终极鉴察者、终极审判者。这正是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充满的、本质性的、普遍性的罪性。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1章

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2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3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4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7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为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8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9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10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11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12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13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14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15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20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22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23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24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

身体。25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26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27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29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30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31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32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伟大劳动人民，还是纳粹主义所推崇的伟大日耳曼人民，都显明了，世人在内心深处的自以为义、自高、自傲。

我们绝不是在这里说，劳动人民就不好，或是日耳曼人民就不好。固然，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在日耳曼人民的身上，从世事的角度而言，有着许多美好的优点、品格、道德素养、聪明、富有才干、智慧、勤劳、等等。但

是，我们必须清醒而谦卑地认识到，从根本的本质层面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人群、任何团体、任何阶级、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完美至善的，都不可能是没有瑕疵与本质性罪污的；也都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心灵的偶像，供世人来顶礼膜拜。恰恰相反，在人类中间，我们彼此之间在本质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彼此是弟兄姐妹，应当一同地把我们的心灵归向那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天父，应当单单地仰望和敬拜事奉他。

凡自高的，必降卑

马太福音23章

1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2“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3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4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5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繸子做长了；6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7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8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10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11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12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

————————

第二个共同点是，关于人类社会事务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之事，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都认为，人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可调和的、不可原谅的矛盾；这些矛盾，只能通过一方彻底地消灭另一方，来得到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纳粹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种族斗争的矛盾。因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联合起来，进行本质性的、暴力性的社会政治革命，彻底地、暴力性地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正如毛泽东先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画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行动以及专制暴政就更加令人震惊、举世皆知、臭名昭著，我们就不在此赘言。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世上其它思想体系、伦理系统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例如伊斯兰教等）中，我们也常会见到，——这种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消灭敌人、打倒敌人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就像是在中国共产党员中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

样残酷无情。”

上述思想文化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特征，即，在世上的许多道德伦理体系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中，往往是“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的。

所谓“因行为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是通过他的外在的、言语行为等等来决定的。

所谓“因信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不是因他外在的言语行为而决定的，而是因他在心灵与灵魂深处、对于上帝之救赎恩典的信靠，而决定的。

因行为称义与因信称义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在于，人究竟是自以为义，还是以上帝（以及他的救赎恩典）为义。如果人自以为义，即，人自己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力、道德、品格，而得到正义，甚至成为正义的化身，——那么，在这样人的内心深

处，就必然是骄傲自高的。当人信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文化、伦理体系的时候，人就会在行为上互相攀比、比较，并进而俾倪他人、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互相争斗不息。

相比之下，因信称义的思想，不是以人自己的义为中心，而是恰恰相反，从谦卑承认和悔改人自己的罪性为基点，寻求和倚靠上帝的救赎恩典，完完全全地信靠上帝的救赎、饶恕与赦免。

罗马书3章

9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10正如经上所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12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14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15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16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17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18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19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20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21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22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23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24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25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26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这样，有甚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甚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28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29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30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____

请注意，因信称义的教义思想体系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正是我们内在真实信心的写照与表现。然而从根本上、终极角度说，我们的义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更不是由我们的外在行为所决定和体现【否则人就在心中自以为义，自高自傲，俾倪、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争斗不息】。我们的义，唯有是建基于上帝自己所赐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之人的永生恩典。

雅各书2章

14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甚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5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16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甚么用处呢？17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

18也许有人要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连鬼魔也信，却是战兢。20愚昧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

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21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22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23这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也被称为　神的朋友。24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25照样，妓女喇合接待了探子，又从另一条路把他们送走，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正是由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义，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在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地是出于他的圣洁无罪，出于他为我们而死、承担了我们所本应承受的罪债与刑罚、所成就的赦罪之恩典。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对我们的饶恕，所以，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才得到赦免，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因此，我们在任何世人面前，就无以自夸，更无法自以为义。因而，我们才深刻地知道，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应当以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人。

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____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两点共同点的比较中，我们能够看见，其根本性的、本质性的症结就是在于，人在心灵与灵魂深处，背离、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背离了那道德法则的终极基准与颁布者、那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因而，人在内心中自以为义；从而，人在面对世上他人的时候，————（1）或是以之为自己心灵生命的归依【即，对于领袖、对于权力的无限个人崇拜】，从而不可

避免地导致专制独裁；（2）或是以之为自己的敌人、死敌，甚至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彻底消灭对方，而心中没有本质性的谦卑、饶恕与恩慈的态度。

____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应当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消极遁世。恰恰相反，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倚靠那天地之主、我们生命救主的人，应当以热忱而勤勉的人生态度，在这个世上努力地生活、去做好一切当作之事，而不应当慵懒懈怠、更不应当唯唯诺诺、胆小懦弱。我们应当努力地秉公行义，寻求正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我们应当憎恨罪，但是要爱罪人。我们所争战的对象，不是世人，而是罪。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爱的对象，不应当是罪，而是罪人。

以弗所书6章

10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11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2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13所以要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14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15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16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17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18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

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与精髓，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建基于无神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人类共同享有和均分财富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地上的财富和国度为世人生命与心灵的终极归依；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阐述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之间的异同与关系。】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子集，所强调的是：——社会经济财产分配原则，倾向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分配、劫富济贫等等特征。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并非是完全彻底错误的。其所重视的关于社会财产尽量平均分配、避免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等等，是有其道理与价值的。事实上，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就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极其强调了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福利政策等。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直到今天，一直有着强烈的造福于大众的主旨和内涵，这并非是受到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是受到自古以来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巨大推动和深刻影响。

公道地说，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内容，并非是错误的。

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体制的致命错误在于，（1）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否定人的生命独特价值与人的生命自由；（2）思想控制与言论控制；（3）专制主义思想，邪恶与欺骗；（4）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国家经济道路的荒谬性；（5）无神主义内核；否定公平竞争；平均主义、大锅饭；丑恶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控制；思想层面、理念层面的空洞、荒芜、荒谬、谎言；统治者的自私、腐败、欺谎。

———————————

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制中，通过经济资本的置配、自由流动、分配管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与高效化，从而为人类社会整体创造更大的物质性财富。

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大一些范畴的政治经济词汇，因为它不仅包含了经济运作思想与原则，也包含了政治思想理念、社会思想理念体系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由于其对于集体主义的强调、对于个体主义的践踏和压制，因此，其政治思想理念与社会思想体系往往是专制独裁的，因而往往是邪恶、欺骗的；并且，它会千方百计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消灭个体的生命与思想自由，试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国家机器上的某一个无知无觉的零件与螺丝钉。所以，社会主义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强烈的姻亲关系。

资本主义则往往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尽管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严格划等号。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术语，仅仅包含经济运作范畴的含义，而不像社会主义这个术语那样，既包含了经济、又包含了政治性意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由于其对于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公开竞争的鼓励，因此，资本主义往往最终会强烈地倾向于民主主义制度，倾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开化、自由化、民主化、去中心化、平民化。

然而请注意，正如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本身一样，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具有道德好坏、善恶的意涵。

正如本书所开宗明义地指出的，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人民。譬如，在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述的所多玛、俄摩拉，虽然看似是由主流民意所驱动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们所行的事情却是恶事；他们所作的，在耶和华永生之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换言之，如果人民、百姓不是自由而圣洁的，如果人民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寻求真相、渴望真理，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心灵，那么，在这样的人民中，所谓民主制度并不能长期地存在；在这样的人民社会中，即使短暂地出现民主政治制度形式，也会是昙花一现、很快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喧嚣状态、并很快会因此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革命、篡权、推翻。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鼓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机制和经济制度，与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一样，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也应当是建基于自由圣洁之民所组成的社会体系之上。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大多数成员在社会事务上、公共世事上都没有正直之心，不愿意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若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利用、欺压、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贫富严重不均。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不能长久而稳定地运行；饥饿之民就会常常起来造反、打家劫舍，或是像马克思主义所煽动的那样，——政治集团利用所谓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

————————

这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句话，虽然是夸张的、偏颇的、别有用心的；但是，却也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马克思本人的不道德的私生活，也不说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所推崇的狂风暴雨般暴力革命中的不义、不公、欺谎、罪恶、甚至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所引致的数以亿计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苦难。而是，我们在这里指出，仅仅作为一个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暴力征服与谎言欺骗的形式达到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意义上的影响性】了人类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思想家，马克思【以及他所代表的、启发的无数后世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的致命性漏洞和谬误。

的确，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但是，他却无视、甚至故意忽视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到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和福祉。

马克思的思想既是浅薄的【因为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的真正病根与医治之法】，也是偏颇的【因为它忽视、无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益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也并不深刻理解，这种巨大益处是来自于何处以及为什么，其本质原因和机理究竟是在于什么。换言之，它并不真正理解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体制的本质精髓与益处所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性谬误，也正是它邪恶所在之处，就是在于，它完全地误解了、谬解了、错待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在于什么。

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是一个庸医，看见战场上一个战士的胳膊上中了箭伤，箭杆露在皮肤外面，箭头插在肉里面；于是，这个庸医拿出剪刀，剪断箭杆，并用一个锤子在那受伤的胳膊上狠狠地砸下去，让箭头在肌肉里面陷得更深；然后，庸医自豪地大声宣布说，这个人的箭伤被治好了，因为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已经看不见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地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彻底地扭曲了、玷污了、糟蹋了文明的真正价值，彻底地毁坏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本身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人的个体生命和价值，唯有能够在集体中体现、实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独裁主义、甚至纳粹主义异曲同工的本质原因】。

马克思主义决绝地宣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它公然地、厚颜无耻地宣告，无神主义思想是伟大的、光辉的。它欺谎地、诡诈地对世人说，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然而在政治现实主张中，它却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的高

贵价值，把人置于思想奴役、身体奴役、经济奴役的铁链之下。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不好的。事实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重要优秀道德品质之一。但是，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建基于公平、正义、平等、公义、良善的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公义圣洁的道德法则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我们对于那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的基础之上。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造物主、上帝的时候，人就会迷失在世事的喧嚣之中，就会看不清人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于何处，看不见人的心灵与灵魂的隽永价值和意义。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永生之神的时候，世人良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失去了隽永的价值和意义，真理就成为了强权的丫鬟，政权就成为了枪杆子的机器，国家就在本质上与黑社会无异。在死亡面前，任何以属世之事为根基和归依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甚至是滑稽的。

只有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与无限智慧，看见他的公义圣洁与恩典慈爱，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在于什么。

我们都不仅是被上帝所造的，而且是被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在人的里面，有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有心灵和灵魂，有思想、智慧、意识、理性、情感、爱、等等的美好能力。

正是因此，人的生命与自由才是高贵的。

人的生命与自由是珍贵的，因为那本是能够指向永远的、圣洁属神的生命。

在这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上，在世人生命的里面，都普遍性地、本质性地遍满了罪。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都是背离神、不愿意寻求公义的；都是自以为义的，是自高而自傲的；都是在为了属世之利而活着，以属世之事为自己生命与心灵的归依。但是，那内心谦卑、看见己罪、承认己罪、并

真诚愿意悔改己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马太福音5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如果人们都是敬虔而真诚地信靠上帝，倚靠他的救赎与恩典，饥渴慕义，勤勉而公义圣洁地生活与工作，——那么，这样的国家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眼中所看见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缺陷。

然而，在这个地上的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世事中，常常看见好坏参杂的因素、泥沙俱下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是如此。

一方面，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在思想与文化上，对于西方各个国家产生的深刻影响，早已经在许许多多历史记忆与文化土壤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包含着深刻广泛的博爱之心，包含着对于社会全体大众、乃至全人类的巨大福祉。任何看不见这一点、或是故意无视、忽视、蔑视、否认这一点的——人、思想、主义，就像是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但是浅薄的、虚伪的、欺谎的、自私的，而且是罪恶的、邪恶的。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利益与许多精神文化方面的福祉，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近现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乃至现代民主主义制度，并非是终极的真理，并非是我们心灵的归依和倚靠。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近现代科学技术、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或是自由贸易经济，当被应用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敬虔、没有敬畏的社会大众文化土壤中的时候，那么，它们所带来的，就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甚至是巨大的灾祸。

在满清末年、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曾经喊出“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的口号。他们以为，用民主和科学，就能拯救中国脱

离愚昧、落后、黑暗、败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局面。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民主与科学本身，并不能向我们指明，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它们本身，也不能带给我们敬虔的信仰、良善的道德、恩慈的心灵、公义的信念。固然，现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一样【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们本身却不能代替：——那真正的、诚实的、真挚热忱的，对于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上帝的敬拜与信仰。

____

单从经济制度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是好的，但它们必须应当被置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之下。

这样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应当是保障和重视人的生命与自由的。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是鼓励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的。但同时，它不仅是应当“行公义”的，而且更应当是“好怜悯”的；应当是注重避免社会贫富严重分化，避免贫穷百姓得不到照顾。

————————

当年，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及十七世纪，那些伟大的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正是认识到了科学【即他们当时所说的自然哲学，或第二哲学】的内在局限性【即，科学本身，应当是人以谦卑的心态对于自然规律与现象本身的、基于客观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应当是：——（1）人凭着自己的骄傲自义之心所进行的主观臆想、（2）或是牵强附会的关于人生意义与自然现象之间关系的生搬硬套、生拉硬扯、人为地进行瞎联系，（3）或是占卜性质、“万物有灵”性质的臆测；——就像是占星术、炼金术、星座性格属相、或是亚里斯多德的主观臆想之宇宙论，或是中国的风水、算卦等等。————因为，关于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在于上帝自己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之中，是在于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之救赎恩典之中，是在于上帝所放置在世人良知之中的圣洁公义的道德律法之中】，从而深刻地批驳了罗马天主教廷所秉持的、与圣经本身没有关系的、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与托勒密等人的主观臆想、玄学主义等等试图在自然世界中赋予臆测性、占卜性、万物有灵涵义【就像占星术、炼金术、星座属相、或是中国的风水与算卦那样】之系列思想的根深蒂固的谬误，进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诞生和爆炸性发展。【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

简言之，现代科学之开启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于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内在局限性，才纠正了从前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根本性错误与方向性偏差，从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起源、诞生与成功发展。这个重要原因，正是来自于、建基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正是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巨大而深刻广泛的影响，才使许许多多的世人认识到，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应当到哪里去寻求；同时，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研究自然世界，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导致了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成功与发展。

与此类似地，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以及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它们的诞生、成功与发展，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功原因，正是在于它们首先认识到了它们自己的局限之处的本质在于什么。

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在制度体系化设计中，不是假设人是无罪的、无辜的，而是恰恰相反，它清醒地看到，在世人的心中，普遍地存在着罪性。因而，它在体系设计与规划中，处处尽量实现和体现权力分散化、制衡化、去中心化的原则，同时尽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尽

量保障政府行政部门的有效性、有力性。

请注意，这并不与我们在本书的主旨中所反复申明的内容——“民主是圣洁自由之民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相矛盾。

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人心中普遍的罪性，并从而在制度体系设计上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权力制衡的规则化设计。

另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建基于人民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体系中，虽然，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被罪所羁绊，但是，在人民大多数成员心中，必须愿意寻求真理和公义，必须愿意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必须有饥渴慕义的心，有真诚与敬畏的情感。

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公平竞争制度，也是同样如此。

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

一方面，它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世人心中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所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规则秩序体系与制衡机制框架】。另一方面，它们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和意义【所以，尊重和推崇人思想与生命的珍贵价值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没有看到上述两个方面的精髓本质，因而望文生义地、彻底地误解了、扭曲了、歪曲了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出发点，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上述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

系与现代民主等政治经济制度完全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假设人性是无罪的、无辜的，劳动人民是伟大光荣的；它们看见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不完美，于是提出，彻底砸烂那些制度，重新建立一种建基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所谓完美制度；然而，在这样的所谓完美制度中，却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意义，也不明白，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珍贵意义，究竟来自何处。

上文所述，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之中，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心灵中普遍存在的罪性）；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愿意寻求公义的心态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所本来应有的高贵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关系，是直接地来自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应当认识到，在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也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心灵本所应有的高贵价值和隽永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创造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都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人的生命在这个宇宙天地之中，是最高贵的、最奇妙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的生命本所应有的圣洁与高贵价值意义，所以，我们才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世人常常说谎、占便宜、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没有信仰与敬虔人生态度、等等，从本质而言，是多么地污秽鄙陋、罪恶不堪。

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良心之中都无可置疑地知道自己在本质上的罪污、欺谎、不义，所以我们才珍视那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救赎恩典、圣洁信仰，更在内心深处为罪而忧伤痛悔、饥渴慕义，真心真意地愿意悔改己罪、完全归向我们的生命之主、救赎之主，得着那真正圣洁没有瑕疵的、能够直到永远的属神生命。

———————————

因此，我们在这里清晰地指出，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样，——它们之所以诞生，正是由于直接地受到了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它们是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那真实的、指出世人生命之罪、并赐下救赎恩典的信仰。

然而，我们却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是我们思想的偶像，而是恰恰相反，应当深刻地、清醒地认识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和隽永的意义。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的心灵所期盼、归依和倚靠的终极真理。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我们的生命、心灵与灵魂所期盼、归依、倚靠的对象，应当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就是那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至善至美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

够找到真正的良善与公义。他是我们的永生之神，是那属天国度的君王，是把饶恕与赦罪恩典赐给我们的伟大救赎者。他就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伟大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永生真神。圣经是他的完全而全备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谦卑诚实地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真挚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属乎天国的百姓，必将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永生国度之中。

=================================

自由贸易与社会分工

自由贸易经济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协作、共同生产、共同致富。自由贸易经济的成功正是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化的大分工、大生产。在今天的经济产业链中，有数以亿计的、甚至更多的不同产品、零件、食品、用具、硬件、软件、服务。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一般性而言，每一个人都勤勉地工作，并专注于各自擅长的事项，从而在国家社会整体上，乃至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国际合作中间，人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精细分工、深度协作。

这种大规模的、大分工的社会机制所必需的，正是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固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也没有什么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是完美的，但是，一般性而言，就主流性质来说，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秩序，应当是基本上公平正义的，是互助互利的；一般性而言，人们应当基本上彼此诚信、信任、以善相待；人们应当以宽容良善的心、而不是仇恨的心态看待彼此；——否则，从长期性、根本性来说，自由贸易制度就不会真的成功。

===

财富的定义

在人类经济体制中，如果人们在心底以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为心灵的终极性归依，那么，人们就往往会为自己积聚财物、金钱、房屋等等；而不愿意走出去与人交换商品、或是消费商品、促进商品经济流通。从而，繁荣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就往往不会发生。如果人们的心灵沉浸于积聚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与黄金等等，如果人们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中自满自足、裹足不前，以之为自己的心灵的归依、生命的归宿，而不思进取，那么，除非迫不得已，人们就往往不会愿意主动地去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更不会想

到去与异国他乡的人进行大规模产业协作。

因而，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现代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划时代贡献，正是让世人看到，财富的定义，不是在于有形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生产物质商品的能力、生产率、知识技巧。换言之，财富不仅是一件关乎身体的事情，更是一件关乎心灵的事情。

正如本书上文所言，现代经济制度本身并不应当被我们看作是终极真理，因为它是有所局限的。如果说，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人类社会有益，那么，它之所以有益，其益处正是因为它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并深刻地受到了基督教信仰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某些正面性的、积极性的影响。正是因此，现代经济制度虽然是讲述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但是，从一般性、整体性、主流性而言，它迄今为止并没有把西方世界拖入自私自利的彻底混战局面之中，而是相反，通过国家社会的大规模协作，使数量巨大的世人脱离贫困之境。

然而如果有一天，当人们忘记了上述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们离弃了敬虔真挚的信仰的时候，当人们心中的罪愈来愈泛滥，而不是谦卑真诚地悔改己罪、寻求公义、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自由贸易等等现代经济制度，就会显明其深刻内在局限性，显明人心中之罪的丑恶，甚至给许多国

家地区带来更深的冲突、混战与灾祸。

____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那地上的财宝、那些必朽坏的东西；而是我们生命、心灵、灵魂中的那属天的品质，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与幸福，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悦纳与恩赐。

+++

+++

+++

+++

+++

+++

+++

+++

++

【引述圣经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

马太福音6章

19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20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23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9-24节

除了虚伪之外，另一个常常在人的灵魂中得逞的撒旦试探、诡计是——贪恋世界。没有什么其它事情，比“虚伪”和“贪恋世界”这两件事情，更能够

经常地掩藏在表面敬虔信仰的面纱之下。所以，基督在上文中警告了我们关于信仰虚伪之人的事情以后，在这里继续警告我们，不可贪恋世界。我们必须不可像那些信仰虚伪之人一样；他们的根本性错误，其实就是：——他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他们的奖赏；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世人的称赞，就是属世的利益和好处。在我们选择财富、目标、主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里的这两个罪——虚伪的信仰，以及贪恋世界的心。

I。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一个人，总会在生命中、在心底深处，把一些东西当作是他的财富、他的份、他的倚靠。他会尽力地去积累这些财富，并把这些财富积累当作是为未来所需而进行的预备。传道书2章3节："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在我们的灵魂中，总会把一些事情当作是最好的事情；总会把那些事情当作是我们的喜乐、满足和倚靠。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话，并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财富，而是要指教我们，应当选择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

1. 这里警告我们，不要把那些可见的、暂时的东西，当作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要把那些东西，当作是我们幸福的所在。不要为你们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基督的门徒们已经抛弃所有、来跟随他；他们应当一直持守着这样的心态。财宝，是那些丰富的、在我们眼中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不能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就是说，——（1）我们必须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最有用处的东

西：——我们不能称这些东西为“荣耀”——就像拉班的儿子们那样。而是，我们要把它们看成是没有荣耀的东西。那真正的荣耀，远远超乎它们之上。（2）我们必须不能贪图这些东西的丰富，不能无止境地、没完没了地搜刮这些东西、加添这些东西。一个人如果把那些东西当成是心里的财宝，就会这样贪婪地去做。（3）我们必须不能信靠、倚靠这些东西，把它们当成是为我们的未来遮风挡雨、给我们带来安慰与安全感的东西。我们必须不能对黄金说：——你是我的盼望，是我的心系所在。（4）我们必须不能在这些东西中得到满足；必须不能把它们当成是我们的渴望与祈盼。我们应当安于简朴，但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分。这些东西不能是我们的慰藉（路加福音6章24节），不能是我们的喜笑和饱足（路加福音6章25节）。我们真正需要积攒的，不是这个世界中的繁华与财富，而是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东西。在我们的面前，面临着抉择；我们努力积攒的东西，就是我们看为至宝的东西。我们应当智慧地作出选择；因为无论你为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己也就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知道、明白、思想，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大，我们的生命是何等长久，那么，我们就会看见，在地上积攒财宝是一件多么愚妄的事情。

2.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不应当在地上积攒财宝：——因为这些都是将要丢失和朽坏的东西。（1）这些地上的财宝，会从里面败坏。世上的财宝总是这样，被虫子咬，从里面锈坏。那些我们以为储藏得最稳妥的属世财宝，最后都会变得破败不堪。路加福音12章16、17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传道书5章10-12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

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雅各书5章2、3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注意——世上的财物，在它们之中，有一个朽坏与败坏的律——它们总是逐渐枯萎凋残。（2）这地上的财宝，也会面临暴力的抢夺而失去。贼进来，会把财宝偷走、抢走。强盗、小偷的眼睛，总是会盯着那些积攒财宝的房屋和家庭；在这世上的任何属世的财宝之中，没有什么是真正能够安全稳妥的。我不应当把我的信心和倚靠放在属世的财宝上，即使它们看起来华丽炫目；不论这世上的财宝、虚荣、繁华，似乎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属世的暂时好处，我都应当轻看这一切——因为它们都是必将朽坏、轻易失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那些属世的、轻易会失去的、随时被抢夺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财宝，那么，我们就真是太愚妄了。

3.我们应当把那些永恒的、属天的、不可见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真正财宝，当成是我们最美好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幸福、喜乐与荣耀。你们要在天上积攒财宝。（1）是的，在天上的的确确有财宝，是比地上的财宝更真实、更美好、更久远的。我们在天上的拥有，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宝、富足、荣耀、与喜乐。我们的财宝，在神的右手中；神使我们成为圣洁与完美，也使我们的财宝成为圣洁与完美。（2）只有真正智慧的人，才知道应当在天上积攒财宝；勤勉地为天上的财宝而努力地劳作；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的确据，并把我们的幸福完全地倚靠在他的身上，仰望他的名；用圣洁的心，轻看这世上的一切——因为，这世上的一切，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基督美好的救恩相比。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在天上有我们永远的幸福和盼望；并且，以那里的一切为我们的满足；不以这世上的任何事物为我们的满足和慰藉。如果我们是以那天上的东西为我们的财宝，并且勤勉地为我们自己积攒那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信靠神，相信他会安全稳妥地保守着我们的财宝。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渴望、情感、努力、勤勉，都应当是以那里为目标。我们不要被世界的钱财所缠累；那些东西只会欺骗我们、压垮我们；而是应当积攒那真正稳妥的财富。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每一个真诚信从基督之人，在天上都有丰富的财宝；这是关乎我们的未来的永久归宿。（3）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我们在天上的财宝，是安全的。只有我们天上的财宝才是安全的。在那里，没有虫子咬；财宝不会朽坏；我们不会被欺诈；也没有人来偷盗或是抢夺。这是那天上的幸福，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的；是不能朽坏的基业。

4.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因此，我们对财宝的抉择，必须是正确而智慧的。我们的心意，生命的意义，都是取决于此的——或是属世的，或是属灵的；或是属地的，或是属天的。心总是跟随着财宝，正如向日葵总是跟随着太阳。财宝，是我们的价值和眼目的归宿，是我们的恋慕和情感的归宿（歌罗西书3章2节），是我们的渴盼与追求的归宿，是我们的目的与意图的方向，是我们的心所属的地方。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关切和顾虑也在哪里——是我们急切恳求、期望、相信、喜悦、朝思暮想的；是我们心里牵挂、割舍不下、得着慰藉、专注凝思、常常挂念的事情。箴言18章10、11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诗篇119篇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箴言23章26节："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我们的心，应当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财宝，必须是在神那里；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归向他。

这里所教导的关于财宝的事情，是与前面的警告教诲紧密相连的。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真正的、真诚的；必须是寻求真神的，而不是寻求人的赞誉以及属世的好处。我们的财宝，就是施舍奉献、祷告、禁食，以及这些事情给我们所带来的赏赐。如果我们做奉献、祷告、禁食这些事情，仅仅是为了人的赞誉和称许，那么，我们就是在积攒地上的财宝，因为我们只看重这个世界中的利益与好处。这样做的人是愚妄的，因为，我们所贪图的别人的赞誉，就像是那些地上的财宝，很快就会朽坏，被虫子咬，（传道书10章1节），被别人偷走、夺去。诋毁和谤渎就是像小偷强盗一样，偷走我们为自己积攒的财宝——我们在别人眼里的名誉地位。若我们把心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的努力就终将是徒劳的。虚伪的人，在天上没有任何财宝（以赛亚书58章3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当他们的灵魂被收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资财能够带走，没有任何价值能够存到永远。（约伯记27章8节："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但是，如果我们以真诚而正直的心，来奉献、祷告、禁食，并仰望神、渴盼他的悦纳，那么，我们就是在天上积攒财宝；在神那里，有记念册记录我们的一切（玛拉基书3章16节）；而且，将要有我们的赏赐。当我们来到死亡与坟墓的另外一面的时候，我们就必会得到安慰。虚伪之人的分，是在这个世界上（耶利米书17章13节）；然而属神的信实百姓，他们的名要记

录在天上（路加福音10章20节）。神对我们的悦纳，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这财宝是不会朽坏、不会被偷抢的。我们的财宝如果是积攒在神那里，我们的心如果是系在神的身上，那么，还有什么其它地方能更好呢？我们必将在神那里永远站立。

II。在我们的信仰中，必须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这里有两种人的眼睛，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22、23节）。眼睛是身体的灯——因为眼睛寻找、发现对象，并引领着身体的行动。如果没有身体的灯，那么，外面世界的光就对我们没什么用处。箴言15章30节：眼 有 光 使 心 喜 乐 。 好 信 息 使 骨 滋 润 。

1.你 的 眼 睛 若 了 亮 ， 全 身 就 光 明 。如果我们的眼目看重的，是良善之事，那么，我们的心就趋向于那些事情，我们的生命，就会在基督里有完全的光、确据和真诚；我们就会有良善的行为，如同光一样照在人前；我们的信仰在天父的面前，就是纯洁、没有玷污的。但是，如果心里面是罪恶、贪婪、苦毒、嫉妒、怨恨——这些东西常被描述为罪恶的眼目（马太福音20章15节）（马可福音7章22节）（箴言7章22节）——那么，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就会是黑暗而昏花不明的；我们的言语行为中就会充满罪恶。以赛亚书32章6-8节：“因 为 愚 顽 人 ， 必 说 愚 顽 话 ， 心 里 想 作 罪 孽 ， 惯 行 亵 渎 的 事 ， 说 错 谬 的 话 ， 攻 击 耶 和 华 ， 使 饥 饿 的 人 ， 无 食 可 吃 ， 使 口 渴 的 人 ， 无 水 可 喝 。吝 啬 人 所 用 的 法 子 是 恶 的 。 他 图 谋 恶 计 ， 用 谎 言 毁 灭 谦 卑 人 。 穷 乏 人 讲 公 理 的 时 候 ， 他 也 是

这 样 行 。高 明 人 却 谋 高 明 事 ， 在 高 明 事 上 ， 也 必 永 存”。　　如果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如果，在我们里面的、本应该引领我们的那些良知、情感完全败坏了、失丧了，那么，我们的生命该是多么黑暗而可怕！

2.我们的眼睛，对应的也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明白——我们的认知、判断、引导，等等。如果我们的眼睛了亮，如果我们有真诚而正确的判断，如果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尤其是能够辩明，我们真正的财宝应该是在哪里——那么，我们的情感、行动就会得到正确的引领；我们就会有完全的、恩典的、安慰的光。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败坏的、被世俗所羁绊的，那么，我们的世界观就会是错误的、昏花不明的；我们的心与生命就会充满了黑暗；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诗篇82篇5节：“你 们 仍 不 知 道 ， 也 不 明 白 ， 在 黑 暗 中 走 来 走 去 。 地 的 根 基 都 摇 动 了 。” 人的灵本应是为主燃亮的蜡烛；但是，生命如果昏花了，将是多么可怕。 以赛亚书5章20节：“祸 哉 ， 那 些 称 恶 为 善 ， 称 善 为 恶 ， 以 暗 为 光 ， 以 光 为 暗 ， 以 苦 为 甜 ， 以 甜 为 苦 的 人 。”

3.我们的眼目，也对应了我们人生的目的与目标。我们用眼睛来为自己设定当前目标、寻找前进方向；并专注地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们的眼目，引领着我们在信仰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追求的，总是我们眼睛所瞩目的什么东西或是事情。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单纯而明亮的，那么，我们就能诚实地设定正确的目标，并正确地向着那个目标努力————我们会

纯洁地、单单地仰望神的荣耀，寻求神的名、神的恩惠，在一切事情上都单单地倚靠他。这样，我们的眼目就是纯洁的。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而活。这样，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是在完全的光中；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就会充满了恩典，讨神的喜悦，也令我们自己得到安慰。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单单注目于神的荣耀，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会看重人的称许与掌声————甚至，即使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表现得想要荣耀神、寻求基督之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也仍然是寻求我们自己的荣耀和属世利益。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不安稳的；我们的根基就摇曳不定。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迷乱和罪恶的心思意念。如果你里面的光昏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在你的生命中，会有根本性的错误；你所作的一切，都会被这根本性的错误毁掉。目标，决定了行动。在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正确的目标——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 来 我 们 不 是 顾 念 所 见 的 ， 乃 是 顾 念 所 不 见 的 。 因 为 所 见 的 是 暂 时 的 ， 所 不 见 的 是 永 远 的 "。信仰虚伪之人，就像是风筝，虽然飞了上去，但是却被地上牵着，随时要落到地面。真诚的基督徒，就像是美丽而自由的云雀，在天空中飞翔得越来越高，把地上的事情放在脑后。

III。我们必须要小心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我们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主（24节）。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服事两个主的人，眼目不是单纯的。一个信仰真诚的人，会像诗篇123篇1、2节所讲述的那样——"坐 在 天 上 的 主 阿 ， 我 向 你 举 目 。看 哪 ， 仆 人 的 眼 睛 怎 样 望 主 人 的 手 ， 使 女 的 眼 睛 怎 样 望 主 母 的 手 ， 我 们 的 眼 睛 也 照 样 望 耶 和 华 我 们 的 神 ， 直 到 他 怜 悯 我 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严厉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虚伪之人

的欺谎。他们以为，可以在神与世界之间骑墙——既有地上的财宝，也有天上的财宝；既讨人的喜欢，又讨神的喜欢。这些虚伪之人说：为什么不呢？一石两鸟总是好的。他们期望，他们的信仰既可以给他们带来属世的利益，又给他们带来天国的利益。正如那个伪装的母亲，愿意把孩子分成两半；或是，像那个撒玛利亚女子，在偶像与真神之间踌躇。但是，基督说，不，这样绝对不行。提摩太前书6章5节："他 们 以 敬 虔 为 得 利 的 门 路 。"

1.这里，有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根本性的原则：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假如一个仆人有两个主人，那么，当这两个主人彼此一致的时候，仆人会高高兴兴地跟随着他们；但是，当这两个主人彼此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仆人到底是属于谁的。他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主人、遵从两个主人、忠诚于两个主人。不 是 恶 这 个 爱 那 个 ， 就 是 重 这 个 轻 那 个 。——这就是真实而实际的局面。

2.你 们 不 能 又 事 奉 神 ， 又 事 奉 玛 门 。 玛门代表的是财利等一切属世的利益。腓立比书3章7节："只 是 我 先 前 以 为 与 我 有 益 的 ， 我 现 在 因 基 督 都 当 作 有 损 的 。" 在这个世界中，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生命的骄傲，等等，都是玛门。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就是肚腹；这就是他们服事的对象（腓立比书3章19节）。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则是安逸、睡眠、运动、消遣（箴言6章9节）。有的人把世上的财富当作玛门（雅各书4章13节）；有的人把荣誉和进阶当作玛门；有的人把别人的赞扬和掌声当作是玛门，就像法利赛人那样。总

之，自我、感官、世俗、等等，就是这个世界的玛门。我们不能同时又事奉这些，又事奉神。否则的话，世界的利益一定会与神相冲突、相争竞。基督没有说，我们必须不要，或是不应该事奉神和玛门。而是，基督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可以事奉这两个主；我们不可能两者都爱。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雅各书4章4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我们不可能两者都遵从、都服事、都信靠、都事奉。因为他们二者是彼此矛盾的。神说："把你的心给我"。玛门说："不，把你的心给我"。神说："你要满足于你现在已有的东西"。玛门说："你要利用一切机会去抓取。钱，钱，你要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财富"。神说："不要欺谎，不要欺诈，不要说谎言。在你所说所作的一切事情中，都要诚实"。玛门说："如果你能够得着什么利益，那么，连你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欺骗"。神说："要有慈善、慷慨的心"。玛门说："你要抓紧自己的东西，不要给别人"。神说："不要为各样事情而忧虑"。玛门说："你要为每一件事情忧虑"。神说："要谨守主日、安息日"。玛门说："你要利用每一天来为自己赚取利益"。在神与玛门之间，是有着本质性矛盾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两个主都事奉。让我们不要在神与巴力之间骑墙，而是要作出选择；你要单单地遵从神，并事奉他。

++

++
++
++
++
++

================================

经济贸易与民主社会

在自由贸易经济体系中，往往需要的是自由、开放、平等、公平竞争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样，世上的人们才不会被人为的、逼迫性的政治权力所羁绊，而是各自发挥主动积极性，把自己所擅长的生产劳动、工作技能、服务技能做到最好。因此，自由贸易经济体制常常是与民主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

================================

信仰，政治与经济

如本书前文所反复重申指明的，在一个公平、公正、平等、公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背后，——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之主的上帝的敬虔信仰，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上文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和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处于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中，但是，我们的心灵的真正归依，应当是上帝，而不是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属世之利。我们所真正服事的对象，应当是神，而不是玛门。我们所应当事奉的，不应当是自己的财物，而应当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真正的财宝，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那永远的天上。我们的生命，应当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九一八与满洲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0%E5%85%AB%E4%BA%8

B%E8%AE%8A

名称

又称沈阳事变；欧美称奉天事变、盛京事变（英语：Mukden Incident），其中盛京、奉天为沈阳旧称，Mukden为满文转写，音译谋克敦，意译天眷盛京，简称盛京，或译奉天；日本称满洲事变（日语：滿州事変〔滿洲事變〕/まんしゅうじへん Manshū Jihen），其中满洲即中国东北；因由柳条湖事件引发，又称柳条湖事变。

背景

在1905年日俄战争击败俄罗斯帝国后，日本拥有中国东北地区境内的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政府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初期东北的统治者、奉系领导人张作霖为获得日本的支持，同意日本修建铁路。后来迫于民意压力，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军暗杀，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引起日本的不满。同年12月29日，在第二次北伐战争末期，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废除五色旗，归顺国民政府。

1929年3月1日奉天省政府改称为辽宁省政府，并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租界与南满铁路。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军队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此役张学良大败，暴露了其相对虚弱的军事实力。东北当局对俄力抗无功，俄亦知难而退，中央政府对俄宣布绝交。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日本关东军从上到下则变得极为急

迫。

1930年5月，板垣征四郎表示满蒙问题非外交手段所能了，惟有诉诸武力，驱逐张学良，石原莞尔拟有“攻沈要领”。关内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9月率领其主力进入山海关，支持蒋中正中央军。东北军入关后，东三省驻兵减弱，张学良长期留在北平，注意力转向关内，日本军人认为此时夺取东北，可不费吹灰之力。关外防备空虚。自东北易帜归服中央后，日本人既嫉妒中国之统一，复羡慕东北三省之资源，发动侵略日趋积极。

1931年5月，汪兆铭、李宗仁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派遣陈友仁赴日本接洽援助，并策动石友三叛变、出兵北伐同时以武器资助江西南部的红军。

5月以来，日本军人复认外在形势于日本有利，广州、南京之争方急，江西红军势张，长江水灾严重，欧美经济恐慌，确为对东北行动之少有机会。石原莞尔提出关东军应为解决满洲问题主动制造机会。

6月，日本陆军与参谋本部拟成一“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关东军加紧制造中国内乱。日军相继挑起“间岛事件”，军部和政府趁机在国内大肆渲染“满蒙生命线的危机”，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此时，虽然中华民国形式上实现统一，但当时国民政府仍忙于平定中国各地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红军势力。

7月，日本关东军煽动河北之石友三叛乱，以飞机送流亡大连之阎锡山重返山西，命与石友三合攻北平、天津，使张学良无暇顾及东北；同月，长春万宝山韩侨与当地农民冲突，朝鲜发生排华暴动。及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发生，7月6日，张学良命东北政务委员会，力避与日本冲突。蒋中正正于第三次围剿江西红军，及应付两广军事，7月12日，致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

7月23日，蒋中正通电全国，宣布“攘外应先安内”：“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日自京入赣以来……与赤匪作殊死战之际，忽于军中接读朝鲜华

侨惨案（万宝山事件），与石友三叛变，暨粤桂诸逆进犯湘赣之报。中正星夜驰回南昌，总阅各方报告，乃知石友三叛变是受粤中叛徒五十万收买，且有日本之军官及赣匪首领出入其军中，隐与帝国主义（日本）者之侵略及赣、鄂赤匪之扰乱，彼此遥想呼应。又于宁都（江西南部）赤匪之总部搜获毛泽东致彭德怀之电文，内称两广月内出兵湘赣，接济子弹五十万粒，即日可由嘉应解来。”8月中旬，得知关东军有意启衅，尚不了解其最后企图。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

当时东北军共有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总兵力约18万人，枪支96,897枝。空军4个大队，飞机262架。海军船舰约3万吨。

经过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下午，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抵达沈阳。傍晚，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兵营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离开原驻地，在中队长川岛正雄大尉率领下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到文官屯一带实行夜间演习。晚上10时20分左右，以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军曹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日本关东军并将3具身穿奉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奉军破坏铁路的证据。晚上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满铁路柳条沟铁桥炸毁，诬指为中国军队所为，开始进攻沈阳北大营。

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

垣征四郎早已等候在沈阳特务机关，岛本正一中佐赶到报告时，板垣征四郎下令向奉军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在文官屯一带的第三中队向南移动进攻北大营，设在虎石台第三中队驻地里的火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和奉天机场。

奉军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9月6日，张学良命沈阳军事负责人谓，“无论日人如何受寻事，须万分容忍，不与抵抗，以免事态扩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当时驻防沈阳，接到张学良命令。经过反复研究，第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镇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9月11日，蒋亦命其避免与日本冲突。

东北军共约20万人，半数驻于关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及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居辽西锦州，仅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事先皆无警觉，丝毫未作准备。在沈阳东北军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第六二〇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进行自卫抵抗，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直到次日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双方军队展开巷战，激战到三点多钟。在王铁汉团长率领下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

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经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提议的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同意了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辽宁、吉林陷落

9月18日，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驻军在睡梦中惊醒，死300余人。驻军因长官正滞留于关内，闻变无法应付，奉命取不抵抗主义，日军遂占领北大营、东大营，以及兵工厂。时张学良方滞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事变之日，蒋赴江西督师剿共，兼防广东、广西。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沈阳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关东军一万余人于8小时内，占领沈阳城、军营、兵工厂、飞机场。日军遂于9月19日上午6时占领奉天。日军大队入城，完全占领奉天。劫中国兵工厂存储步枪8万支，机枪4,000挺，飞机200余架。长春、营口、安东等地一一陷入关东军之手，朝鲜日军分向辽阳、吉林出动。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四平等地。至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东北军自发反击。9月20日，关东军占领长春，9月21日占领吉林省城。

9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项基本外交原则：一、坚决抱定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维持东方平和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三、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是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日本新闻记者谈话说："据昨夜接到辽宁之报告，关于沈阳中日不幸事件之情形，早已知矣，惟因对此不独无抵抗之能力，且又无交兵之理由，是以绝对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为，此种严命，余早已发出"。同日，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投降，日军遂不费一弹，进入吉林永吉，占领吉林全省。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安俊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全省。

9月22日，蒋中正于南京市党部：

"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

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9月23日，日军进至新民。日军扩大占领区，5日之内南满要地相继陷落。自9月18日至9月23日，5日之间，辽宁、吉林两省全失，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纷向日军投降，在沈阳建立“政权”，仅荣臻率军退守锦县。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但蒋中正仍然希望张学良前往南京商讨外交应变的方法，张却表示拒绝并改派万福麟入京。

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歪曲事实，表示必不使事件之扩大。实则增兵不已，并继续扩大占领区。

齐齐哈尔沦陷

日本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后，即着手谋取黑龙江。1931年10月8日，“东北国民救国军”成立，高鹏振任司令。10月13日行政院大会，日方则借口中国抵制日货，拒绝撤兵。日本又提出直接交涉之议，为国联所否决。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驻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1日，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10月24日，行政院除重申9月30日日军撤兵外，并决议：一、要求日军在下次开会前完全撤退；二、中国保证日侨生命安全。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占领四洮铁路（四平至洮安）沿线主要城镇。

1931年11月嫩江桥抗战

1931年11月，日军以伪军张海鹏部为前导，进攻黑龙江。是月初，日军运动胡匪张海鹏起事，在嫩江与马占山大战，张部失败。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日人鉴于取黑龙江计划实现不易，遂调军攻齐齐哈尔，马占山在嫩江铁桥一役，大胜日军，全国纷起援助。江桥抗战，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指挥3个旅，5个团共1.3万余人，战至11月18日，毙敌2000余人但终因不敌日方新式武器，率队

退出苦守20余日之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1月19日，龙江失守。马占山撤往克山、海伦。至此，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

锦州、哈尔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仅两个月，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各地诸多主要城市。事变之后，辽宁省府迁至锦州。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沈阳，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严重挫折，主战主义在日本占了上风。

日军攻占黑龙江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初，日本借口剿匪，不顾英、美、法照会，向锦州进攻，并分兵威胁天津、山海关；张学良之荣臻所部，力量不够，向关内唐山、滦州、昌黎退却。12月中，别路日军自旅顺北犯。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军撤入关内。1月3日，日军攻陷锦州，关外要地尽失，未及撤出国军及义胞，乃从事游击战争。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张军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4日，黄显声在热河北票设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进犯哈尔滨，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为转移国际社

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1932年2月6日，日军攻陷哈尔滨。2月14日，马占山同意与日本人合作。

后续

先弃锦州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张学良始终倾向于"直接交涉主动撤军"，11月28日，日本驻平参事矢野真前来与张学良商洽双方解决方案，张表达"虽未获训令，但本人对此赞成"日方进一步希望："地方局部问题就地解决，锦州冲突攸关东北军切身利害"，随后更请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12月7日，张学良首肯将自锦州撤兵。但张学良对外界都坚称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

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于12月15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洲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中正电：“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当时的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张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张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发出三次请援，内容超乎寻常，目的在给粤方难堪。请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应激起前线部队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张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我军牺牲，故置我军于死地”。

讽刺的是，12月25日日军总攻锦州，张学良撤军主动放弃。1月2日锦州失守，当日陈铭枢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自12月30日以后就没有前线消息”。放弃锦州的消息是经由外国通讯社报导传回中国，当时张学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放弃热河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6月，日军全部退回日租界。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汪精卫对军队系统内部过节不甚明瞭，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的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不拨分文，却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张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战，显示其实际目的在于以东北军之牺牲赚取政治资本和舆论支持。调兵入热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演成一场意气之争。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通电请求辞职，并逼张一同下野：

“北平绥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张学良嗣后引咎辞职，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则联名愿与其共进退。汪精卫声言抗日，却在热河抗战前夕掀起政坛风波，蒋介石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3年1月11日，日本发表声明：“热河省系满洲旧四省之一，与其他三省有不可分之关系”。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热河抗战爆发。中国守军在朝阳战斗、凌南战斗、赤峰战斗中节节败退。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中国守军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通往华北大门。

3月7日，张学良上呈中央辞职：（节录）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3月10日保定会议，张学良辞职照准。因热河失陷，张下野赴欧洲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满洲国成立

1931年，由于受到国际舆论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日本人善于利用傀儡，取得东北三省后，土肥原贤二把清逊帝溥仪从天津运到旅顺。土肥原贤二大佐时任特务机关负责人，游说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谎称表示满洲本为满族故土，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留在旅顺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3月9日，在日人牵引下，正式成立“满洲国”傀儡政府。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由驹井德三任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总揽大权，日本人分任次长及司长把握主权，各机关均有日本人参加监视，共达3,000名之多。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他于是时外国干涉提出威吓。6月14日，日本政府对“满洲国”予以承认。日本当时对国际外交之阴谋，是藉“满洲国”来搪塞国际责难；一切劫夺行为也可委诸“满洲国”而自享其利。

8月8日，日本派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其权力等于总督。

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于新京签订《日满议定书》。武藤信义在“日满”议定书中说：“兹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思，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限，即应尊重之，满洲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为协定如左：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款约之前，在‘满洲国’领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华两方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在这议定书下，辽、吉、黑三省，就为日本所劫夺，予以“独立”，成为中国无比之创伤。关东军并借口“日满亲善”继续向南扩张。

中国国内反应

国民政府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1931年9月21日，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照会国联秘书

长埃里克·德拉蒙德七世爵士（时译德兰孟）："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对此强暴行为，并未抵抗，以避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1932年1月2日，蒋发表"独立外交"演讲，痛切指陈宣战之弊害。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以在野身份就一二八事变发表通电："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

蒋事后在1934年10月检讨：中国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胡适等人甚至不惜主张依据日方所提〈币原五原则〉进行直接交涉。中国中央政府却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王禹廷认为，当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雄踞东北，举足轻重，中央政府对他极尽拉拢。张挥军入山海关，协力靖难，东北边防空虚。日本军阀乘隙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初起，不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中央政府未能妥善运用，一心寄望于国际联盟调解，未作直接交涉之折冲，时间蹉跎，冲突扩大。

中国共产党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提出组织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12月6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北大南下示威团由中央大学集结出发，沿途散发"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传单，行经成贤街浮桥时打伤警官2名，警员7名，宪兵1

名。12月11日，中共带领北大南下示威团继续发动示威暴动，并拿出“打倒国民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争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各类油印传单或标语。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团手执红旗直捣国民政府外交部，数名职员不来及逃出遭殴打成重伤；一部分学生约200名左臂红布赴中央党部，以木棍击昏陈铭枢并绑架蔡元培，党部卫士鸣枪示警营救追回，由于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胁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红肿，头部亦受击伤送医。

张、蒋与不抵抗政策

9月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19日通电，其中转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中“我军抱不抵抗主义……”；“不抵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后成为各方集中声讨的目标。

“不抵抗”一词，最早出现于1928年“五三惨案”后5月10日的蒋介石日记的文本中。而18日前日军和东北军的相互谍报刺探，和18日前后东北军与南京政府的反应，是致使日军3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后推出傀儡皇帝溥仪成立满洲国的主因；当今各方谓“不抵抗政策”，实际上没有这个“不抵抗政策”的文本。后张学良承认于9月18日在电话中向沈阳东北驻军下达了口头的不抵抗命令，亦没有“不抵抗命令”的指令文本。现以“不抵抗政策”谓当时因“安内攘外”导致的对日军一味退让，这个战略策略却不是张一个人制定的。

事变前，据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处机要室主任”洪钫载，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携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

’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

还有其它论述张学良一生都带着蒋中正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报文随时放在身边。刘维开称，除了洪钫的回忆外，包括其他相关人的回忆档案馆库藏的档案及蒋中正个人资料等，几乎没有其他资料证实此电的存在，而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

时任东北军第七旅（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军）参谋长赵镇藩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厅（厅长荣臻）副官处处长杨正治（别字安铭）载：

在“九一八”之夜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假三经路蒋斌家召集高级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张偕于凤至和赵媞正在前门外中和茶园听梅兰芳唱《宇宙锋》。当告以日军侵

占沈阳，张始从戏园赶回来接了电话。张重申了蒋介石“铣电”（同年八月十六日蒋拍给张的电报）的内容，大意是：如日军侵入，应避免冲突，一切忍让，勿逞一时之愤，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以待“国联”处理。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但同时张学良对日本步步紧逼深感不安，多次向蒋请求对策。1931年8月24日张学良未直接向蒋寻求指示，而是致电陈群请其代呈。陈当日将张电文中公事部分完全转发蒋：

特急南昌蒋总司令钧鉴。密顷接汉卿电称，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9月8日张学良又直接向蒋介石发出齐申电:

限即刻到，不得停留，南京总司令蒋钧鉴。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

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对张的屡次询问，至今尚未发现蒋电文回复，而东北步兵第二旅旅长何柱国称：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于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刘维开称，9月12日蒋中正如果到石家庄见面，仅有餐后六时前约五六小时的空挡可以行动。不过以吴忠信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行程需要5个小时，五六小时是否能够来回南京与石家庄，值得怀疑。而何柱国言明，蒋张会晤于12日上午，并在《忆张学良将军》中又载：“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张回到自己的车上，蒋的专车即开走了。”蒋会晤完毕从石家庄返宁至晚6时会吴忠信至少有6个小时，与吴忠信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行程5个小时何干。由蒋秘书编纂的蒋介石《事略稿本》亦载：

（1931年9月）“十二日 上午。批阅。会客。后天保城浙军纪念塔前。与夫人及孔氏甥等野餐。……下午（6时）。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复电来见。”

在1947年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称：

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

事变时，张学良承认在九一八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总结九月十八日深夜的报告：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上午同记者谈话时表示：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同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于1951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交代材料，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应变："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容臻急电北京，想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求应付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张学良则是在1991年重获自由后对电报论接决否认，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且郭维城在1934年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渗透至张学良指挥体系担任侧近，要“回忆”1931年的往事不会是亲身经历。而透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

张学良在战后曾解释：“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

在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称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事变后，9月19日夜间蒋介石致电张学良：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9月20日蒋介石电令烟台驻军第一十七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

烟台，刘师长勋鉴。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中正，养午。

9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12月15日，蒋介石因自九一八以来施行"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之"不抵抗政策"，至三个月后东北大量国土被日军占领，在倍受粤系指责的压力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遂"宁粤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中央政府，孙科赴南京出任中央政府行政院长。自12月15日东北军开始守锦州，失去地方资源的东北军只得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孙科由于从南京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旋辞职下台。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继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不出一个铜钱，虽然张学良表面同意抗日，实际东北军无法组织起大规模抵抗，只能逐渐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

最终，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和南京政府的隔岸观火，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

争，短短半年便将东北军势力全部驱逐。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事变前，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1930年7月23日，蒋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提出“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还建立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中统”和黄埔系“军统”，专事破坏中国共产党，并防范中国国民党内反蒋派系。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3次向中共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前2次均以直接失败告终。

事变期，九一八前夕，蒋自任南昌行营主任，集结30万兵力，正在江西亲自主持对共产党中央红军的第3次围剿，8月连遭败绩，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返回南京，第3次围剿亦失败。

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

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升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

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其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至12月15日，东北大量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被迫辞职。

事变后，次年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驻沪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面对日本节节

紧逼，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之一，蒋复出。

蒋坚信“将来中日必有一战”，遂由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2月10日王俊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约，来自日方的军事压力减弱。

蒋即重拾攘外安内政策，“雪耻”变为对江西工农红军继续发动围剿，1933年2月蒋亲自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实际指挥官，集中50万兵力开始了第四次围剿。

国内舆论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迨热河失守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众及驻军纷纷奋起抵抗，较著名的有如国民政府黑龙江代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领的江桥抗战（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于各自为政，遭到日军一一肃清，东北三省遂于民国二十一年初全部沦陷。东北沦陷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此

后，当地一些民众自发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等组织抵抗日本军阀侵略，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九一八后，由东北地方警察和保安团自发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初受国民政府排斥；后在1933年起转为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等；至1934年因日军围剿瓦解。部分并入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亦几经几乎灭绝，在中共和苏联的支持下，自九一八起至日本投降，在东北坚持抗战十四年。

民间游行示威

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民众激昂，各地自动抵制日货，作抗日之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收复东北。而一般青年基于爱国之心，自动组织抗日团体，或捐献财物，或前往东北实际参加抗日工作。

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12月爆发珍珠桥事件。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马路交通，上海市长张群遭群众包围，上海市区戒严。12月5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长顾维钧遭到华侨、民众殴打侮辱请辞。广东、浙江、山西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大学校长，相继被迫请辞。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行政院、中央党部遭到罢课学生瘫痪，人员几无办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会见学运代表时，遭到学生批斗殴辱。

日本反应

1931年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林铣十郎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并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国民政府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满洲国”的计划----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然而随后日方又在东北发起更猛烈的攻势，全然表明日本代表所说与日军方所做言行不一。

日本内阁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由于犬养是孙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所以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泄露（据说是电报被军方截获），激怒军队内的激进派，这对于当时暗潮汹涌的日本军界无异于火上浇油。

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而与此同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以后的文职内阁政

府变成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军国主义道路。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内阁就已成为军部的傀儡。

上海日本侨民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侨民连续在上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以强硬措辞声称要惩罚“暴戾”之中国。日本浪人复在中国各地寻衅，捣毁商店，击伤民众。

国际反应

1931年9月19日下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与会人士作出决定“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求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外交部随即电告“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国际盟约促使日军退出占领区。

9月19日、9月20日和9月22日，中国政府先后向日本严重抗议，指责日军应负事变责任，要求日军从速撤退。

9月21日，由中国出席国际联盟行政院第六十五届代表施肇基，根据盟约第十一条，向行政院常会申诉，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场扬言“日军以地方情形改善为比例撤退至铁路线以内”，9月30日大会随其声明作成决议。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吊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应，国联理事会作出要求日本迅速撤兵之协议。其时国际间一致不满日本之行为，9月30日国际联盟行政院通过限日本撤兵期限不得超过10月13日。日本内阁有所顾忌，颇有妥协之表示。其外相币原屡次覆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照会，有日军将撤至南满铁路附属地的表示。因不能约束其少壮军人，至10月13日，日军不仅扩大东北占领区，且派军舰炮击长江口，空军轰炸辽西一带。日本非但不撤

兵，反扩大侵略，指使土匪，破坏交通，轰炸锦州。

10月1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复开特别会议，至10月24日以13票对日本1票，限令日本于11月16日再次会议前完成撤兵。

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又决议，派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

届时国际联盟行政院改在巴黎开会，至12月20日，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件之真相。由5个委员国组成，中日两国各派赞助员1人参加。

美国虽非国际联盟会员国，国际联盟讨论日本侵略东北问题时，为表示同情中国，特派日内瓦总领事吉伯特列席。

日本之横行一时，列强之放纵容忍亦有很大关系；九一八事变时，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曾向英国提议，须制裁日本侵略，而英国外相西门，反在国际联盟为日本张目，将九国公约、国联盟约、非战公约置之度外。英国祗求保持自己利益，在没有受到直接损害前，不愿采取任何行动。同时英国认为日本侵略满蒙，可以使日本与苏联发生利益冲突，而减少进攻南洋群岛之可能。所以英国不肯制裁日本，祗愿派出一个李顿代表团。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发表宣言，声明凡违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条约义务所造成之情势，所订立之条约合同等，美国概不承认。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侵略是干涉中国领土内政，违反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强烈谴责日本政府行为，指出日本发动事变是侵略中国。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这时正当国际联盟派李顿来华调查，日本带着既成事实之威胁，要求国际联盟承认。李顿调查团之报告，虽然承认日本侵略，但还是主张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之特殊地位。

由于国际联盟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日本表示抗议，并且退出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际联盟谴责，继续侵略中国。

国际联盟此时姑息退缩，对中国影响很大，也直接威胁国际和平。因为日本侵略行动没有受到制止，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深受鼓励，自此以后，并吞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跟着侵犯阿比西尼亚；苏联入侵波兰、芬兰共和国也是受此影响。

纪念

2020年9月18日 江苏4755台警报器鸣响 纪念“九一八事变”89周年。

1991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从1995年始，沈阳在每年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成都、昆

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作家沙泊柳在关于长春的城市散文作品《关于一座城市的沉重记忆》中写下："每一年的9月18日对东北人民来说算是一个悼念日的。长春的城市上空也会在那天的9点18分响起防空警报。人们会在那一刻肃穆地听，然后互相说道被侵略的那些故事和感受。他们忘不掉沦陷的记忆，那些悲痛的历史早已经铭记在每个人的心中，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近代对事变起因的探究

史学家唐德刚在《书缘与人缘》一书曾评论："张少帅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于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不见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而张学良之所以能有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系'，也就是为着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的必要。"

李宗仁将军则认为"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因为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不相上下，东北军入山海关与否，自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随后张学良入关内，东北空虚，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机。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

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1931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6%B4%B2%E5%9B%BD

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是前东北亚国家，1934年改名为满洲帝国，又称大满洲帝国。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于当地制造之傀儡政权。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控制中国东北后 ，拉拢部分前清宗室及汉人将领权贵而建立此政权。首都设于新京（今长春市）。领土包括今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全境（不包括关东州，即大连地区），以及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省北部的原热河省地区。东与朝鲜半岛（此时朝鲜半岛因日韩合并而属日本帝国殖民地）接壤，北与苏联接壤，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相邻。

满洲国1932年3月9日在长春成立，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号称独立国家。同年9月和日本政府签订《日满议定书》，使该地区事实上成为日本之殖民地。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又称大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满洲国政权随之终结。

承认满洲国的国家并不多，以日本盟友德国和意大利为首的欧洲轴心国成员为主，但身为同盟国成员的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实际占据外蒙古）、以及部分国家在事实上也承认满洲国。中华民国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不承认满洲国的地位，故以伪满洲国称之（“伪”在此作“伪冒”和“未获承认”解）。

历史

背景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取得南满洲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并以护路为由组建关东军，驻扎在奉天、旅顺、长春等铁路沿线。

1906年，日本建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不仅参与铁道业务，而且其经营几乎涉足所有工业领域。

1908年，清末代皇帝溥仪登位，年号宣统。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洲贵族为主的清廷被推翻，北洋政府成立，民国法理上继承清朝版图。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于1912年2月退位。不废帝号，仍居宫禁。1915年年底至1916年，因大总统袁世凯觊觎天子宝座，而发生的“洪宪帝制”事件，先是激起各地势力发动护法战争讨伐袁世凯。最终袁世凯因帝制失败郁病交加而死，导致权力真空。此后，由北洋军阀、护法军及其他地方军阀经过各种分化组合而形成的地方势力崛起，使民国北洋政府基本失去对地方的有效统治。张作霖势力最初只及奉天省（1928年改称辽宁）一地，后于1918年击败吉林督军孟恩远、赶走黑龙江省巡按使毕桂芳，控制吉黑二省，统一东三省。此后东北大部分地区一直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势力统治，其间行政、军事等均有较大独立性。

在清朝灭亡之后，仍有各种清朝的复辟力量活动。在1917年5月，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张勋（时任长江巡阅使，当年6月双方争相拉拢他进京“调停”，随即联合康有为等保皇党人于6月30日夜发动政变，次日迎溥仪复辟）率兵进京，扶溥仪复辟，旋即失败。复辟11天后即遭段祺瑞“讨逆军”讨伐并很快被推翻，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宣统退位。这出复辟事件史称“张勋复辟”。

在复辟失败后，原先认同清朝的部分人士，转向满蒙独立运动，希望在满洲建立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家。

1924年10月23日，西北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控制北京。11月4日，在冯支配下，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驱逐溥仪出宫的议案。11月5日，正式下令溥仪被废除帝号逐出宫。溥仪及其家族成为中华民国的普通公民。1925年溥仪移居天津租界。后为日本情报机构关注。

此后，日本开始策划控制中国东北。1925年5月，日本少壮派的“一夕会”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日本要设计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内满等问题。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以制定“满蒙政策”为目的召开“东方会议”，最后以《对华政策纲领》作为结论。《对华政策纲领》提出将“满蒙”（即中国东三省及内蒙地区）与“中国本土”分离对待的政策，试图将内满洲主权“剥离”出来，并指出“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和权益有遭侵害之虞时，不管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要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之思想准备”。然而，日本军部强硬的少壮派军官却认为日本首相在“满蒙问题”上过于软弱，主张采取军事手段。

1928年，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在少壮派支持下在皇姑屯刺杀不与日军合作的张作霖。张作霖长子张学良很快回到奉天接替其父执掌大位，控制住东北局势，继掌虎符。河本被日本军部解职。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改用青天白日红旗，名义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达成中国统一。

1930年9月始陆续有13万东北军主力部队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张学良大部分时间驻守北平，导致关外守备空虚。

1931年6月，日军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采取军事行动。8月4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要求军人善尽“应变责任”。

前奏

1931年，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又称满洲事变）。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守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溃不成军；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年底前占领东北三省。两个月内，关东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行省，并在各省扶植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但其中马占山只是表面上同意服从，暗中策划武装反抗，不久就打响江桥抗战。

建立

日本关东军一直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亲日本的政权。起初，日本寄望于掌控东北军阀张作霖，发现张难以驯服之后将其暗杀（见皇姑屯事件）；后又试图控制接替其父掌握东北的张学良，又告失败（见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终于完全占领满洲。1931年底，因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1932年1月28日，返回日本

的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名为《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满洲建立“新国家”。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可借由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得到足够的资源，亦可透过向满洲移民，解决日本地狭人稠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前清朝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之后，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以已经升任吉林省代理长官的熙洽为首的前满洲贵族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仪至满洲、建立君主制的国家。日本关东军方面也早已认定溥仪是合适的执政人选。战后，城野宏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为：

首先，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

第三，“一般的农民……对由满洲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天津事件”，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监控，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1931年底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1932年3月为“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召集张景惠、熙洽、马占山，及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漢、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各人在这个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板垣在抚顺与溥仪会面，告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只能接受。据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所说，“他（板垣征四郎）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2月，日军“对热河开始进攻”。“国联决议不承认伪满”。

此后，大日本帝国在华北等地挑起长城抗战，将热河省并入满洲国，吞并了热河省。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策划下，满洲“建国”，发布《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首都”为长春（后改名新京），“领土”包范围包括现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全境（不含日据关东州，即今日大连），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承德。

3月6日，溥仪从旅顺出发。3月9日，在长春的原吉长道尹公署旧址大堂举行仪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同时任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至此，满洲国正式建立。

国民政府对日本策动满洲独立并建立满洲国提出严重抗议。但此时，国民政府刚签署淞沪停战协定，避免对日冲突扩大，同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内战，无力处置东北事态。4月，日军“谋与伪满联合进攻多伦”，察哈尔省危急。

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满洲国执政府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并在满洲国驻军担负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此外，还约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发布日人代拟之“满洲国组织法”。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之后，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

在1934年之后，吉冈安直作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一直跟随溥仪，直到1945年8月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拘捕。

国民政府的外交抗议

1931年9月19日，国民政府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满洲事变，请国联主持公道；9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9月23日，国民政府政府就满洲事变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国际联盟调查团

1931年9月19日，满洲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传至国际联盟。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在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的建议和中国代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联盟理事会议在12月10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到满洲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1932年9月4日，李顿调查团在北平签署调查报告书，将其送回日内瓦。9月18日，国联公布调查报告的内容。

李顿报告书详细地叙述1931年9月以前满洲的局势，描述中国行政当局抵制日本侵略的活动，例如抵制日货运动，描述日本在满洲的各项侵略要求和不满。报告书随后根据满洲事件日方主事者和目击者的证词，描述满洲事件的过程及随后事态在全满洲的发展。李顿报告书指出，日本陆军在满洲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做是正当防卫的措施。报告最后结论说，"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是不可能成立的，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出于真正的和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

国际联盟在1933年2月24日大会上以包括波兰的40票对1票（1票为日本，另有暹罗(泰国)投弃权票、智利未参加投票）通过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该声明指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满洲事件中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满洲由国际共管。

为此，日本极为不满，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政权的终结

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于夺回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于使日本放弃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之主权。日本亦将被驱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在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会谈中，确定将当时尚不在中华民国管辖下的大连作为国际化自由港转交给苏联，并由苏联使用满洲铁路。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红军攻入满洲，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8月9日，日本关

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软硬兼施威逼溥仪迁都通化。8月11日，溥仪及满洲国政府官员开始乘火车撤退。8月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今临江市）大栗子车站。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在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今临江市大栗子镇伪满皇帝溥仪行宫博物馆）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8月17日午夜，溥仪在吉林通化临江县宣布“退位”，“满洲国”存在不到14年灭亡。满洲国政府解散。8月18日，山田乙三下令满洲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原属朝鲜军，1945年改隶关东军，38度线以南的朝鲜军改隶国内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满洲国政权彻底终结。

满洲国覆灭后的中国东北及满洲国要人结局

1945年8月20日，苏军占领新京、奉天、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接收东北。

苏联拒绝中华民国政府使用旅顺港运送人员接收辽东半岛的要求，扶助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地区取得政治及军事优势，将缴获关东军及满洲国军的一些装备和人员转交给共产党。194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在山海关一线与准备出关接收东北的国军发生激战，八路军失利，国民政府接收满洲。

1946年8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溥仪作证叙述日本关东军在满洲所有的军事活动以及对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目的，并指控日本战犯应为所有战争责任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策划成立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死刑，判处同为策划者的南次郎和操纵满洲国的小矶国昭无期徒刑。溥仪1950年8月移交给中国，1959年被特赦释放；1961年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我的前半生》。

1963年3月30日、1964年12月12日和1966年3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三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决定特赦全部满洲国在押战犯。

地理与人口

满洲国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但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县长在营子乡的清风岭，因当地民众在王老凿（真名王文福）的率领下，不承认满洲国的统治，在清风岭据险坚守，坚持抗争14年，使该地成为唯一一块日军从未占领暨满洲国从未真正统治过的地方，有“中国地”之称。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关东州之主权由满洲国所有；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战争后期日本逐步放开关东州控制，故后期属满洲国行政区划，但是日本享受名义管制权。

行政区划

满洲国行政区划（1934-1939）

满洲国行政区划曾多次调整。1934年划为14省、2特别市：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

新京特别市（即长春）、哈尔滨特别市

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

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

新京特别市

人口

1932年满洲国建立时总人口有3千4百万人，当中汉人占百分之83，满洲人与蒙古人合计占百分之15，日本人和朝鲜人则合计占百分之二。满洲国的居民除汉满蒙等主要民族之外，也含其他通古斯民族（如鄂伦春、赫哲等）、朝鲜族、俄罗斯族与和族。到1945年终战之际，满洲国已有150万日本人。

下表罗列1940年满洲国人口普查有关结论。

行政区划	人口(1940年普查)	面积(km^2)	人口密度 (人/km^2)	省都
新京特别市	555,009	438	1,268	—
吉林省	5,608,922	83,207	67	吉林市
龙江省	2,093,500	68,028	31	齐齐哈尔市
北安省	2,318,957	76,183	30	北安县
黑河省	149,887	118,899	1	黑河
三江省	1,415,633	90,418	16	佳木斯市
东安省	512,240	41,397	12	密山县
牡丹江省	688,424	32,975	21	牡丹江市
滨江省	4,234,206	63,860	66	哈尔滨市

间岛省	848,197	30,134	28	延吉县
通化省	982,387	31,705	31	通化县
安东省	2,231,507	26,506	84	安东市
四平省	3,005,070	30,401	99	四平市
奉天省	7,565,599	49,632	152	奉天市
锦州省	4,317,822	40,162	108	锦州市
热河省	4,553,228	103,062	44	承德县
兴安西省	763,701	73,934	10	开鲁
兴安南省	1,026,635	76,866	13	王爷庙
兴安东省	199,530	109,107	2	扎兰屯
兴安北省	132,426	156,230	1	海拉尔市
满洲国	43,202,880	1,303,143	33	—
关东州	1,367,334	3,462 395	大连市	

排序	城市	省	1940年普查
1	奉天市	奉天省	1,133,710
—	大连市	关东州	661,354
2	哈尔滨市	滨江省	660,756

3	新京特别市	（吉林省）	555,009
4	安东市	安东省	315,032
5	抚顺市	奉天省	269,622
6	鞍山市	奉天省	213,740
7	营口市	奉天省	181,350
8	牡丹江市	牡丹江省	178,363
9	吉林市	吉林省	172,935
10	阜新市	锦州省	143,046
11	锦州市	锦州省	142,258
12	齐齐哈尔市	龙江省	133,138
13	佳木斯市	三江省	128,552
14	辽阳市	奉天省	100,032
15	本溪湖市	奉天省	99,875

民族国籍	1940年普查	
	人数	%
汉人	36,870,978	85.3
满洲旗人	2,677,288	6.2
朝鲜人	1,450,384	3.4

蒙古人　1,065,792　2.5

日本人　819,614　1.9

回民　194,473　0.5

其他满洲籍　49,942　0.1

其他日本籍（台湾人等）　1,497

外国籍　3,732

无国籍（白俄）　69,180　0.2

总计　43,202,880

日本国策移民

1910年代包含满铁职员1至2万人、关东都督府3,000至6,000人、领事馆数百人，在满日本人全部加总也不到3万人。1915年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后，日本人得以自由移动，居住于南满洲。1921年在满日本人有16万6千人，1926年增至19万人，其中满铁职员及其家人有6万8千人、关东厅2万2千人。满洲国建国之后，日本人推行日本人移居满洲之国家政策，共移居130万人到满洲。日本政府订立“满洲移民百万户计划”，并交由满拓（满洲拓殖公司，为满洲拓殖公社前身）全权负责，是日本开发业者，承包开拓业务、收购土地、召集拓垦人群。为达到使满洲最终成为日本国土的侵略目标，日本“国策移民”活动计划20年内从日本向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移民会议，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截至1944年9月，居于满洲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共1,662,234人。在1945年后，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返，见葫芦岛日侨大遣返。但另有日本遗孤的问题。

满洲国国旗是五色旗，据1933年2月24日公布的满洲国国务院布告中所示，五色旗中，青色代表东方，红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黄色代表中央，寓意以中央行政统御四方。后来也解释为“红、蓝、白、黑、满地黄”象征满、汉、和、朝、蒙五族协和。国歌为满洲国国歌。

皇帝和皇族

满洲国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满洲国皇帝为国家元首，仅溥仪一人。1937年，满洲国国务院通过《帝位继承法》，若溥仪无子而逝，其弟溥杰是帝位继承人。但满洲国国务院只承认道光帝以下的皇族。

政权机关组织

满洲国中央统治机构进行过多次的改组。执政（1934年后为皇帝）行使国家统治权，其下设的国家机构有执政府（1934年后为宫内府）、尚书府、祭祀府、参议府、侍从武官处；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军事咨议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

满洲国的行政机关为国务院，其首长为国务总理（1934年后称国务总理大臣）。国务院下设总务厅、兴安局等机构，并辖有军政部（后为治安部、军事部）、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实业部（后为产业部、兴农部）、交通部（辖邮政总局）、财政部（后为经济部）、民政部（后为民生部、又拆分为厚生部和国民勤劳部）、新京特别市公署及首都警察厅、各省公署（各市．县，旗公署）。各部长官为总长（1934年后称大臣），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总务厅为国务院的政务中枢，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1937年后称总务长官）总揽满洲国的行政，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厅长（总务长官）召集国务院各部的日本裔次官于每周二，即火曜日举行会议，按关东军的意志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但从未进行过选举。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

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满洲国没有成文宪法，只有各项专门法律。行政监察机关称监察院（1937年撤废）。皇帝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满洲国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院院长是林棨。最高检察机关是最高检察厅，首任最高检察厅长为李槃。

满洲国宫内府、尚书府、军事咨议院、祭祀府和侍从武官处由皇帝直辖。宫内府在帝政实行之前称作执政府，负责掌管宫廷事务；尚书府负责保管玺印和宫廷文书；军事咨议院负责皇帝对重要军务的咨询；侍从武官处负责管理皇帝的随行侍从武官。

满洲国的日本人

大部分生活在满洲国的日本人仍然保有日本国籍。

板垣征四郎，满洲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2年8月8日晋为陆军少将，并被任命为满洲国执政顾问。1933年2月，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参谋本部部附，在天津设特务机关，策划收买段祺瑞、吴佩孚等未果，同时策划日军侵占热河省。1934年8月1日，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2月10日复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1936年3月23日，升任关东军参谋长，4月28日，晋升为陆军中将。1948年12月23日，坂垣征四郎在东京都丰岛区池袋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

土肥原贤二，满洲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3年任沈阳特务机关长，1935年10月进入北京进行分裂中国的“华北自治运动”。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甘粕正彦，甘粕事件的主谋，满洲映画协会负责人，在满洲国灭亡时服下氰化钾自杀。

南次郎，满洲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2

年1月28日，南次郎以军事参议官身份，为天皇作了《满洲的近况》的专题报告，说服天皇默认了关东军建立满洲国的计划。1934年12月，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满洲国大使。1946年5月3日被定为甲级战犯并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获假释，次年在家中病死。

川岛芳子，实为满洲人，其父是前清肃亲王善耆，1907年生于北京，后移居日本，长期为土肥原工作。1945年11月11日在北平家中被国民政府反间谍机关逮捕，1948年3月25日枪决；另一说为1978年在长春市逝世。

驹井德三，曾任关东军特务部长。首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任职7个月后被罢免。

远藤柳作，历任日本朝鲜总督府事务官、东京府产业部长及青森县、三重县、神奈川县、爱知县的县知事。1933年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任职1年4个月。

星野直树，曾在日本大藏省工作，任税务署长、税务监督局的部长，到满洲国后任财政部总务司长、财政部次长、国务院总务长官，1940年回日本，任无任所大臣兼内阁书记官长、企划院总裁等职。他策划成立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中央银行，控制满洲金融命脉，并鼓动日本国内财阀到东北投资。1937年，日本公司垄断和控制整个地区的工业。1945年被判无期徒刑，1958年获减刑被释。

武部六藏，曾任日本的县知事、关东局总长、内阁企划院次长、企划院代理总裁，满洲国末任国务院总务长官。1950年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1年患脑溢血瘫痪，1956年遣返回国，1958年病死东京。

古海忠之，满洲国首批日系官吏之一，曾在满洲国政府多个部门任职，1940年任经济部次长，后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在沈阳对其进行审判。他的最后陈述是："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所犯下的重大罪行，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

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6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阳光下的审判》，郭晓晔，1995年）。1956年7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徒刑18年。1963年2月提前释放回国。1983年去世。

吉冈安直，满洲国“帝室御用挂”，自1934年一直跟随溥仪，直到1945年8月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拘捕，后死在苏联。

小泽征尔，世界著名交响乐指挥家，出生于满洲国。

与满洲国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

久野宁，满洲医科大学教授，1936年、1938年、1953年被提名角逐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满洲国最初诺贝尔奖候选人。南极洲的库诺角（久野岬；Kuno Point）以他命名。

白川英树，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幼年曾在满洲国定居。

根岸英一，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是唯一出生于满洲国（新京）的诺贝尔奖得主。

下村脩，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幼年曾在满洲国定居。

警察

最初，在民政部设警务司。1937年转为设于治安部警务司。

各省设警察厅。特别市设警察局，内设警务科、特务科、保安科、司法科、卫生科以及警备队（相当于武装警察，执行“讨伐”任务）等机构。各市设警务处，县旗设警务科。在基层设警察署，署下设“分所”（分驻所、派出所）。

警衔自下而上为：警士、警长、警尉补、警尉（1937年前称巡官）、警佐、警正。

警察大盖帽的帽墙上的警衔标志：帽带为黑色皮制。冬季黑色，夏季草黄色，中缀警务司帽章。帽墙上按简任、荐任、委任三级各附三条、二条、一条金线。

警察常装袖章：袖线冬季用蓝色，夏季用黑色。按简任、荐任、委任三级各附三条、二条、一条袖线，下附该员阶级所含的梅花徽。

警服肩章为横式，质地为呢料，底板为该季衣色，外缘裹以金丝，按警阶具体分为： 警士：一枚梅花星章 警长：二枚梅花星章 警尉补：肩章中央附金色纵线一条，上缀一枚梅花星章（注：1945年后改为事务警尉） 警尉：肩章中央附金色纵线一条，上缀二枚梅花星章（注：1945年后改为监督警尉） 警佐：肩章中央附金色纵线一条，上缀三枚梅花星章 警正：肩章为满地金，上缀一枚大型梅花星章。

警察制服夏装为草黄色，冬装为黑色。戴大盖军帽，后改戴日本式战斗帽（前面齐眉，后面露出后脑勺最突出处）。上衣：冬季黑色，夏季草黄色。式样为立领对襟式，衣前上下各有贴袋两个，单排五粒金色金属扣。警裤：质地同上衣，警长以下配布制裹腿穿皮鞋，警尉补以上配皮制、呢子裹腿或大马靴。警察的帽徽样式为茶褐色桃形，金色高粱围绕着一个黄色盾牌，盾牌上有红蓝白黑四色的四角星，其颜色出自红蓝白黑满地黄国旗。

外交

关内外关系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虽然被迫退出满洲地区（中方称东北），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但在1935年之后与其建立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国际承认 / 外交关系

满洲国于1932年成立后，日本和萨尔瓦多两国最先给予承认。1933年1月15日，美国通告世界各国不要承认满洲国。1934年3月13日，英国表示永不承认满洲国。1937年德日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王国承认，随后有更多欧洲轴心国成员及反共协定签署国承认满洲国。1939年2月24日，满洲国加入反共协定。1941年，泰国、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汪精卫政权）相继承认满洲国。苏联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承认满洲国直到1945年8月8日。至1943年，承认满洲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23个。国际联盟也认为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并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支持中国政府主张满洲国管辖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主张由国际共管。

根据1943年由满洲国政府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当时世界上约有80个国家或政权，承认满洲国的共23个，包括：

承认满洲国的国家及政权（1943年）

满洲国

大日本帝国

受日本控制的国家及傀儡政权（泰国为日本的盟友，是独立国家）

其他国家

轴心国（以及受纳粹德国控制的一些欧洲傀儡政权）：

大日本帝国

意大利王国及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1943-1945）

纳粹德国

罗马尼亚王国

保加利亚王国

匈牙利

克罗地亚独立国

斯洛伐克

法国 维希法国

《反共产国际条约》签署国：

西班牙（佛朗哥时期）

芬兰

丹麦（丹麦保护国政府）

泰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汪精卫政权）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蒙疆自治政府

印度 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缅甸 缅甸国

菲律宾 菲律宾

同盟国和其他国家：

苏联

蒙古人民共和国

多米尼加

波兰（1942年波兰流亡政府取消承认）

萨尔瓦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萨尔瓦多改变了与轴心国结盟的立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1941年12月8日，萨尔瓦多对日本宣战）

与日本的关系

1932年6月14日，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政权，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政权，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承认满洲国，日本代表、关东军司令陆军大将武藤信义，满洲国代表、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任命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

1935年2月12日，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关税协定。

1935年4月6日，溥仪首次访问日本东京府，驻日大使谢介石陪同。

1935年5月2日，溥仪颁布《回銮训民诏书》，表示自己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形成“不可分”的关系。

1937年11月5日，日本与满洲国缔约，日本撤废在满洲国领土上的治外法权。所有以往根据日清政府条约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管辖权均转交于满洲国政府。

1940年6月26日，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东京，日本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溥仪。溥仪此次访问东京的主要目的是供请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带回满洲国供奉参拜。

1940年7月15日，溥仪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宣称满洲国的建立是和日本一样，都始于“天照大神”，并把“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参拜。

1942年3月1日，溥仪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自此，满洲国对日本的称谓，从之前的“友邦”，“盟邦”改称为“亲邦”，即以日本为父母之国。

1943年4月1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访问满洲国，溥仪亲自迎接。

其他

苏联：1932年9月23日，苏联同意满洲国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天主教廷：尽管圣座从未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两国于1934年建立了外交关系，此观点部分是由于对贝纳多·贝托鲁奇1987年的电影“末代皇帝”的错误参考所造成，电影描述了圣座在外交关系上承认了满洲国，然而高德惠主教是被罗马教廷九圣部中的传信部（一个负责宣教工作的纯宗教性质部门）委派为“天主教满洲宣教团与圣座驻满洲政府临时代表”，而不是被负责处理国家级外交关系的教廷国务院委派。

有关教宗庇护十一世时期是否“承认满洲国问题”的历史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段琦引用了国内青年学者刘国鹏博士的观点，即“梵蒂冈事实上授意吉林代牧高德惠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上的名义，而非圣座的名义与伪满政府交涉”，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只是日本侵略者的一种宣传手段，与历史事实不符，从而首次否认了中国大陆学者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一贯学术观点：“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因此在中梵关系交往上背负着难以挺胸抬头的历史污点。”

此外，相关根据也可见于天主教会内外以及2006年发表在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的《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Santa Sede e Manciukuò（1932-1945））一书中的大量一手历史档案文献中。

萨尔瓦多：1934年5月24日，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萨尔瓦多政府改变了与轴心国结盟的立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1941年12月8日，萨尔瓦多中断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并对日本宣战。

意大利：1936年11月28日，意大利与日本签署协定，承认满洲国。

德国：1938年2月20日，德国承认满洲国。5月12日，德国与满洲国在柏林签订友好条约。1939年，满洲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波兰：1938年10月19日波兰承认满洲国并建交。中华民国政府与波兰为此断交。1942年2月24日，波兰流亡政府宣布取消承认满洲国。

丹麦：1940年8月，丹麦保护国政府承认满洲国。

军事

满洲国军事力量由"满洲国家军队"、"后方警备"、"治安维持"三部分组成，由日本关东军控制，起初作战力量薄弱，主要军事任务由关东军实行。后来由于关东军主力南下，兵力不足，加之满洲地区抗日武装遭到镇压而削弱，"满洲国军事力量"才更多地独立承担军事任务，从兵源上而言其中有很多是日本从朝鲜半岛征召的朝鲜籍日本兵。满洲国军事权力为关东军所控制，其军队的调动、演习、装备更换、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

满洲国军衔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3年进少校。少校满3年进中校，

中校满3年进上校。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最高军衔为上将，为终身职。1937年6月，上将之上又设立将军，仿照日本的元帅，为荣誉军衔。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于琛澂五人获得将军军衔。上将有：马占山（1932年3月授，8月褫夺）、张景惠（1932年3月授）、张海鹏（1932年3月授）、于芷山（1934年7月晋）、吉兴（满族，1934年7月晋）、于琛澂（1934年7月晋）、王静修（1934年7月晋）、邢士廉（1935年7月晋）、王殿忠（1936年10月晋）、巴特玛拉布坦（蒙古族，1936年10月晋）、郭恩霖（1938年4月晋）、王之佑（1942年9月晋）、张文铸（1942年9月晋）。

军衔：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官：准尉（分7等）

军士：上士、中士、少士；

兵：兵长、上兵、中兵、少兵。

少尉候补生相当于准尉，军官学校生徒，军士候补生相当于上兵

满洲国全境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区首长称司令。

第1军管区：驻奉天。辖区奉天省。

第2军管区：驻吉林市。司令官吉兴/王济众/吴元敏/关成山

第3军管区：驻齐齐哈尔。司令官张文铸/李文炳/朱榕/王之佑/吕衡/赵秋

航。

第4军管区：驻哈尔滨。司令官于琛澄/郭恩霖/于琛澄/邢士廉/应振复/张文铸/李文龙。

第5军管区：驻承德。司令官张海鹏/王静修/邢士廉/应振复/吕衡/吴元敏/赫慕侠

第6军管区：1936年7月设立，司令部设于牡丹江，管辖间岛省与绥宁省（牡丹江省）。司令官王殿忠/王静修/张益三/美崎丈平/李文龙/贾华杰。

第7军管区：驻佳木斯，管辖三江省。司令官张文铸/赫慕侠/吕衡

第8军管区：驻通化，管辖安东省、通化省。司令官王之佑/吴元敏/王作震/周大鲁。

第9军管区：驻通辽。负责兴安南省、兴安西省。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1940-1941.3）/郭文林(1941.3-1943.2)/甘珠尔扎布（1943.3.1-1945.8）

第10军管区：驻海拉尔。负责兴安东省、兴安北省。司令官乌尔金（1940-1943.2）/郭文林（1943.2-1945.8）。

第11军管区：1941年10月由第6军管区划出东安省设立。驻密山。司令官于治功/王济众/关成山/郭若霖

1937年（康德四年），“满洲国家军队飞行队”成立。太平洋战争后期，即1944年4月以后，隶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指挥，参与太平洋战争。装备机种有“九七式战机”、“一式战机”、“二式单战机”等。其兵力最多时有含运输机在内约110架飞机。

满洲国海军成立于1932年2月15日。起初拥有5艘舰艇。1933年4月1日日本

成立“驻满海军部”，办公楼位于长春市西广场的西南角。满军海军从此逐渐发展。1938年日本“驻满海军部”废止，翌年11月海军被编入“满洲国陆军”，名称改为“江上军”，人数约为2000人。主要是协助关东军和满洲国陆军执行河川警备任务，在河川冻结期成为陆战队或国境警备队。在南满的渤海另有一支海上警备部队。

根据1932年签订的《日满议定书》，满洲国的对外国防由日本关东军负责。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续抽调关东军前往中国战场，满洲国国境防务日益空虚，于是在1938年颁布《国兵法》，规定全国20至23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主要是充当工兵，修筑军事堡垒，或者协助警察维持地方治安。不适合服兵役者要参加为时三年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土木工程徭役。到1945年夏天，关东军要对25万在满洲日本人实施彻底动员计划，同年7月底关东军兵力提升至24个师团，兵员70万人，由于大部分都是新设立部队、装备也不齐全，其实质战力只相当于8个师团。

1945年8月23日，斯大林下令移送日本军俘虏、强制劳动而开始“苏联滞留”。日本俘虏受命撤除满洲产业设施各种工作机械，搬送至苏联。并在8月下旬开始，日俘也被移送至苏联领地内；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总共55万5千日本人遭移送，一说将近70万人，有6万人在恶劣饮食及重度劳动中死亡。

经济

满洲地区物产丰富，有广阔肥沃的可耕地，丰富的林业、渔业资源，煤矿、铁矿等多种原材料储量丰富。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控制这一地区之后，为满足其战争经济的需要，实行“日满一体”政策。满洲国成立后经济增长较快。1933年至1936年为满洲国发展第一期，日本对满洲投资总计11亿6千万日圆，当中有百分之80都是投资满铁。1937年至1941年为第二期，进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本投资达到50亿日圆。1941年满洲国强

制推行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产业发展重点为钢铁、煤炭与农产品。在1945年时，由于中国和日本都已基本被二战摧毁，偏安一方的满洲国的工业规模事实上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工业国。

农业

根据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满洲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万顷（4亿亩），其中已耕地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700万顷。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农产品分配采用食品配给制辅以棉织品特别配给制。

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分配方面，必须优先供应日军和满军的军事用粮、日本与朝鲜移民的口粮以及对日出口。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除去来年的种子之后，中国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允许运输、食用大米、白面，违者按照“经济犯”治罪。中国人主要配给杂粮，包括糜子、高粱、小米、莜面、荞面、玉米面等，有时还配给极少量的白面，分劳需、一般居民和农村人口三大类进行配给。到了后期，则实际上只能食用由玉米、小米、甚至榆树籽和锯末混合磨成的“协和面”。而日本开拓团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满洲国政府自1939年起实施“粮谷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强制性的全面管制和掠夺。1940年起在国内全面实施，并开始采用奖励金制度。在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日本粮食需求量急剧上升，满政府开始变本加厉地掠夺。首先合并中央采购公社，成立“满洲农产公社”以总管农产品；其次则废除奖励金制度，采用预购契约制度，将农产品的征收计划性提高。1943年则进一步，废除预购契约制度，在年初的省长会议上确定各县责任量，并下达各项指标，使粮食掠夺面积

和品种大幅增加，哈尔滨当年的出荷率竟高达89.9%。1945年满洲国末期时，农民需要上交的“出荷粮”占全国总产量的51%。

鸦片在满洲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关东军将热河省（位于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并入满洲国的1933年，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本来就有种植鸦片的行为，并入满洲国后此一作物之种植得到扶植。约1936年左右，在满洲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鸦片的专卖垄断。1942年，日本“兴亚院”召开“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满洲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鸦片产业达到鼎盛。

工业

满洲国建立当时具有亚洲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铁道、航空、航海、钢铁、煤炭、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当时原日本商工省官员、时任满洲国国务院实业部总务司长岸信介向关东军说，“要是没有财阀、资本家，就无法进行初期建国工程”，而从日本引入财阀投资。此后，日本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满洲国。例如，借此进入满洲之鲶川义介之日产财阀，旗下拥有日立制作所、日产汽车、日本矿业、日本化学工业等130家公司，是拥有15万名员工之大财阀。满洲国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特殊会社”——即垄断性的公司。满铁之所以接受改组，时任满铁总裁之松冈洋右是岸信介叔叔之妻舅，和满业之鲇川义介为姻亲。由于战争的进行导致物资奇缺，满洲国末期时国务院制定《金属类回收法》。

分布

满洲国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湖、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

中心为奉天（今沈阳），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资源

满洲地区矿物资源丰富。据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煤炭储量约为30亿吨，铁储量约40亿吨。其他矿物有黄金、菱镁矿、铝矾土、油页岩、金刚石等。满洲国建成的丰满发电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1943年的发电能力为22亿度。

由于满洲国政府内次官级官员都是日本人在负责汇整会议，所以当日本要和满洲国政府合办产业时，无论重工业或轻工业，都能简单达成一致意见。在日本推行的“日满一体”的政策下，满洲的工业生产完全从属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以钢铁为例，由满铁完全控股的昭和制钢所理事长小日山直登明白无误地指出“日满一体”政策下满洲钢铁生产的殖民地属性：

“如从国家（日本）政策角度考察满洲炼铁事业的特点，则在以开发满洲钢铁资源为重点，将其生产的生铁和钢，尽可能多地输往日本，以加强和扶植日本产业。……满洲……从通常的炼铁技术和炼铁企业的经营上来看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划，也是一种畸形的炼铁方式。……这也是满洲为了日本所不得不忍受的畸形经营方式。 ”

——昭和制钢所理事长小日山直登《从钢铁国策方面来看的满洲与日本》昭和14年，第7-17页

满洲大量的煤炭、木材等工业原料被输送到日本。大部分生铁被运往日本炼钢。在满洲炼制的钢材除了少量在本地使用，其他都以钢坯的形式运往日本轧制。昭和制钢所理事长久保田省三在《满洲国和铁》一文中明确表示，满洲国炼铁业有着丰富的原料和特殊的优越性，担负着“大东亚战争”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垄断部门

满洲国原有的工业垄断企业为跨行业经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根据“一业一社”政策，满洲国还设有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电电”）、满洲机械制造会社、满洲炭矿会社、满洲航空会社、满洲人造石油会社、满洲纺织会社、满洲毛织会社、满洲化学工业会社、满洲林业会社、满洲采金会社、满洲畜产会社、满洲水产会社、满洲烟草会社、满洲农产公社、满洲开拓公社等四十多家特殊会社。特殊会社由日本投资者和满洲国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满洲国政府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另外还设立六十多家类似于特殊会社的准特殊会社。

1937年，日本投入税金26亿日圆，启动《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培育满洲国重工业。经济统制政策从依靠以国家资本为主的满铁，转向技术与资本全面依靠垄断资本集团（即财阀）。通过“重要产业统制法”而开始社会主义式计划经济统制，大致区别出38家特殊公司、21家准特殊公司及其他自由企业，对于重要产业实施“一业一公司”制度。11月20日，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日产）决定将总部迁入满洲国新京，12月27日改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日本财阀出资2亿2千5百万日圆，满洲国则从满铁取得之工厂和矿山，以相同金额之实物出资，日满双方各出一半资金，其半官半民之型态和满铁相同；经此，满铁仅辖有铁路部门和抚顺煤矿，其调查部门则因此缩减。

满业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掠夺中国东北工矿事业机构，名为日本与“满洲国”合办，实为日本产业股份公司（通称“日产”）所控制。1937年在长春成立，接管原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的重工业。满业从满铁手中收取重工业，向满洲国政府保证一年付予6分利息，而一跃成为满洲产业界中心。经过重新组合，发展成为庞大的康采恩。满业并创设新工矿事业，拥有钢铁、煤矿、汽车、机器、飞机制造等众多子公司。满业的目标

是实行从钢铁、煤炭等基础工业，到飞机、汽车（年产10万辆）以及其他制造工业的一条龙综合经营，但终未完全实现。当时，满业几近垄断满洲国境内所有的钢铁、轻金属、化工、电力及煤炭采掘业（抚顺煤矿除外），成为超越满铁地位的最大公司。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机构瓦解，所属厂矿大部被毁。自此，特殊会社制度从“一业一社”转向“一业多社”和“一业一社”同时并存。

产值

满洲国工业产值在1936年为8.07亿日元，1940年达到26.47亿日元；生产力指数上升幅度超过60%，形成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满洲国曾经是亚洲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制造业在二战末期一度超越日本。

劳力及其待遇

1937年满洲国实施“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1939年5月又推出“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工程、建筑工程、军事工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然而自从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原来满洲地区的主要劳工来源之一的华北成为战场，由华北入满的劳工急剧减少。由于劳动力的匮乏，日满当局开始考虑“打破惯例，刻不容缓地从（满洲）国内招募男工、杂役”。

1941年9月10日，满洲国政府颁布《劳务新体制要纲》，10月22日又颁布修改的《劳动统制法》，将劳动力的征募和配置置于国家的直接统制之下。从此满洲国劳务政策由依赖华北劳动力的进口，向国内自给体制转变。进而强制人民服劳役，实现“全民皆劳”。

早在1938年，满洲国协和会就以“奉公”或“奉仕”为名强制人民徭役，以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1942年5月4日，满洲国政府设立的“勤劳奉公”制度审议委员会通过《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提出以“勤劳奉公队”实施“勤劳奉公制度”，强迫被征兵者以外剩余的青壮年劳力以“勤劳奉公”名义

无偿为日满工矿、军事工程劳动。

强征的劳工按户籍摊派，不限于汉族平民，满洲人聚居地区也不能幸免。

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日本人分职员、雇员、佣员和准佣员四个级别，其中职员、雇员和佣员每年收入164元、109元和80.99元。而满洲本地人则分佣员、常雇方、常雇夫、承包工和临时工五个级别，最高的佣员年收入也仅仅15.73元，远低于日本人。（《满洲统计年报》，昭和6年度，第738—741页）

满洲国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满洲国时期。

交通运输

满洲国境内铁路线稠密，铁道运输较发达。铁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1935年，东清铁路由满洲国向苏联收购，再由满铁继续铺设铁路。满洲国以1.6亿日元的价格收购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新京（长春）至图们的京图线、四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到1939年，路线全长已超过一万公里，1945年达到11479公里，成为当时世界铁道运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相较之下，1949年时全中国铁路总里程仅22000公里。在大连与哈尔滨之间运营的“超特急”列车“亚细亚号”为当时满铁的象征。

1943年满洲国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1949年，中国（含东北）公路总里程仅有8.09万公里。

航运部分，主要港口有大连港（属关东州）和营口港；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流域。

空运部门则以满洲航空株式会社为主要经营者。1932年航空线总里程为1.5万公里，当时中国航空线总里程无数据可以参考，而1950年的中国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1.14万公里。

财政与金融

满洲国的财政收入，1933年为6亿满洲元，1944年为21.5亿满洲元。在1944年的财政收入中，鸦片税为4.3亿元，占第一位。烟草税占岁入第二位，其后依次是农业税、牲畜税、营业税、关税、户口税。

满洲国的中央银行为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国货币单位为圆。1圆分为10角，1角分为10分，1分分为10厘。满洲国货币本来采取银本位，1935年起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货币在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1945年8月发行额高达136亿元。

邮政

满洲国邮政归属满洲国交通部邮政总局管理。

满洲国于1932年7月26日接管在东北的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系统（原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东北邮政系统之延续），并于同日开始自主发行满洲国邮票。至1945年满洲国灭亡，共发行37次159枚邮票。根据与国民政府达成的《通邮办法的谅解事项》，自1935年1月10日起，关内的中华邮政与满洲国邮政互通邮件。从1935年至1937年间，满洲国邮政特别发行与关内通邮的满华通邮邮票。

满洲国邮票在设计风格上糅合满、日两国的因素，政治意味比较浓厚，见

证满洲国政权的兴亡历史。邮票的图案及标语体现满洲独特的自然和文化、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也担负起宣扬政治理念及意识型态的作用。

文化及教育

满洲国建立了具有殖民色彩的普遍教育体制，施行义务教育。在各级学校中以“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为口号进行教育，大量将日本神道教的宗教仪式融入学校教育：中小学每天早上须向新京作“满洲帝宫遥拜”，再向日本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满洲国规定在学校每届春丁仪式和秋丁仪式举行祀孔，日本式的祀孔，是人数众多流程复杂的宗教仪式。多是在朝礼时由一位老师介绍孔子生平。学生同时须以日语背诵皇帝诏书《国民训》。

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

宗教

满洲国官方早期实行所谓孔教之王道教育，“行王道，乐天命”。全面恢复礼乐，大排祭孔典礼，并有“关岳祭”（祭祀关羽和岳飞）。但是郑孝胥曾指出，“关之配岳，自民国始，为古之无”。

满洲国直接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是文教部礼教司宗教科。1937年7月，文教部撤销，这一职能转到民生部社会司礼教科；1943年3月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又恢复文教部，宗教事务再次被挪回其礼教司。间接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包括满洲国协和会、警务系统主要是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各省与直辖市警务厅特务科、各县旗警务科特务股派遣密侦监控佛道回等教，警务系统的外事科监控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中的外籍教士活动。例如，吉林省公署民生厅文教科礼教股，有工作人员专责给省内省的佛教、道教、天主

教、基督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圣母会等六个宗教团体的宗教人员发放身份证，需要把起草的公文和所附拟发放身份证的宗教人员登记表送到吉林省警务厅的特务科和特高科分别审批、会签。

1932年12月24日，兴安总署对兴安四省颁发《关于禁止喇嘛干政之件》的训令，取缔喇嘛对蒙古各地的行政与司法权力。

1933年11月，成立满洲国理教总会，脱离原北平总会，管辖东北地区300多个在理教公所。

1934年3月2日，罗马宗座发布敕令，委任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法国人）为"驻满罗马教皇代表"，在长春东四道街天主教堂内设立圣座"驻满代表部"，管辖满洲国境内11个教区。

1936年，文教部确定设立满洲国佛教总会计划，1939年5月正式成立，与日方长期合作并鼓吹"日满亲善理想"的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如光被推选为会长。

1936年，指示万国道德会东北分会改名为"满洲帝国道德会"，满洲国司法部大臣冯涵清为董事长，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翻译桔光三任顾问。该会各市、县分会均由地方官员任会长。

1938年，一贯道开始传入东北，由点传师点道，传播速度惊人，传播范围广泛。

1939年农历九月初九正式成立满洲国道教总会。总会成立的第二天，便举办祈愿法会，内容是祈祷"国运昌隆"，并为死亡的日满军警举行慰灵祭等。

1940年12月5日，成立满洲帝国喇嘛教宗团，总负"兴法护国"之责。

1942年3月，满洲基督教会本部成立，日本人石川四郎任总务部长，颁布实

行"五个统一"，即"组织统一"为单一的"满洲基督教会"，"指挥统一"于本部发号施令，"信仰统一"为日本长老宗，"思想统一"于日本天照大神，"行动统一"到响应当局一切号召。

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为市立或县立，分为初小（称"国民学校"）、高小（称"国民优级学校"）。完小即两级小学校（称为"国民、国民优级学校"）。学校的主事为日籍，掌握实权。开设"满洲国语"（简称"满语"，实为汉语东北官话）、算术、国民常识、手工、体育、音乐和图画课。还设立"协和少年团"。

中学教育

初期仍沿袭初级中学（初中）三年、高级中学（高中）三年，以及招收高小毕业生的四年制实业学校。1938年1月实行彻底改革，普通中学教育基本上全部取消，设省立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实为职业学校。男校学制一律缩短为四年一贯制，分为商科、工科、农科、林科、医士等。取消初师与中师，设"师道学校"，学制四年。女高重点培养的是"贤妻良母的天性"，开设课程包括妇德教育、修养情操、家庭生活技能等，一般都是三年制，而四年制学校中增加的一年"师道科"，招收女高毕业生，目标是培养小学初等教师。

满洲还开设具有殖民色彩的"国民道德"课，推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日本友邦"、"日满提携"、"大东亚共荣圈"教育。"国史"课只有东北地区的肃慎、挹娄、勿吉、鞣鞨和渤海、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和元、满族和清的系统历史内容，没有中国历史朝代内容。设军事教练课，穿着军事化的国防色学生制服，戴日式"战斗帽"、打绑腿。建立"协和青年团"，戴红色袖标，图案是象征"八纮一宇"的黑色圆火轮，手持一根木棒叫做"建国杖"。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初期共有14所高校，每年招生一千多名。国高毕业生须经过省公署民生厅文教科的“铨衡”（政审）才可以报考。

日语教育

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日语课，必修。设“日本语语学检定”（日语等级考试）制度，分为特等和一、二、三等四个等级。“国高”毕业生应达到日语三等的水准，大学生应达到二等水准。

教师培养

满洲国专门培养政府中枢高层官僚的大同学院和建国大学，延长学制两倍为6年，招收学生以日本人为主，亦有少数中国人。除人文、科学的教育外，重视学生的品格与体魄的培养训练，乡村学校注重学生对农业知识与科学耕种的训练，女学生还有家政训练课程。借此意图培养轻人文，重技能的供驱使满洲国民。满洲国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

解体后

在满洲国解体后，很多满洲国军人（包括部分日本人）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所歧视，认为他们曾接受“奴化教育”。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很早就重视在东北三省展开“地下活动”，如1921年-1934年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管区，1935-1949年属于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管区，因此这些投降的军人和许多技术骨干人员投奔当时正在扩充力量的中共军队。其中的某些技术兵种人员日后成为中共军队相关兵种如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等的骨干力量之一。

电影

1937年8月，“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在新京成立，简称“满映”。在满映存在的八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纪录片189部。著名演员有李香兰（山口淑子）、李明、孟虹、刘恩甲、浦克、张奕、于洋、凌元等等，导演内田吐梦、朱文顺，摄影师王启民，以及后来从影的方化等。著名影片有《碧血艳影》、《迎春花》、《蜜月快车》、《白兰之歌》等。

文学及出版业

著名作家有梁山丁（山丁，1914年—1995年）、古丁、梅娘，和后来移居中国内地及其它地方的萧红、萧军等（萧红、萧军并不认同满洲国政权），以及一些倡导满洲本土文学，出生在满洲并认同满洲的多位日裔满洲作家。著名作品有山丁的《绿色的谷》等。满洲国文学虽受到政治牵制，但仍有多元性。出版物大多使用汉文、日文及俄文，亦有部分英文出版物。

体育

“大满洲国体育协会”在1932年成立的基础上于1934年4月重新建立。1938年，满洲国开始实施新学制，规定体育课是各类学校的必修课。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由于对体育教育的重视，满洲地区成为亚洲体育发达地区。

民间组织

1932年成立的满洲国协和会为协助满洲国政府的民间组织，在满洲社会生活中有重大的影响。

1934年，世界红卍字会满洲总会成立，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组织。

1938年，满洲国红十字会建立。

种族主义

满洲国作为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傀儡政权，虽标榜“民族协和”“东亚共荣”，但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均实行日本人优先、歧视和奴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政策。

满洲国演员李香兰（山口淑子）曾记载：“在满洲的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上，从未停止过对中国人差别待遇。就连同桌吃饭，吃相同的料理时，日本人吃白米饭，中国人吃的却是高粱饭。”

在满洲国军官学校也有以下情况：“军官学校的学生，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占一半，课程和教材虽然一样，但生活上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在服装上，日本人学生从上到下全部都是新品，中国人学生除了外出服之外全都都是旧的，寝具或其他生活用品也一样，中国人学生也是用旧的。”日本学生的主食是米饭，而中国人学生的餐食只有高粱，而且还是给牛马当饲料的红高粱。另外，日本人以外的民族吃了白米饭，会被当成经济犯受到处罚。

以下为满洲国日本人经营企业不同民族男性的薪资差距：

工场的薪资差距

	实收薪资（日圆）	与日本人的薪资比率
日本人	3.78	100%
朝鲜人	1.52	40.2%
中国人（包括汉人和满人）	1.09	28.8%

矿山的薪资差距

实收薪资（日圆）		与日本人的薪资比率
日本人	3.33	100%
朝鲜人	1.30	39.0%
中国人（包括汉人和满人）	0.98	29.4%

满洲国的电车座席也分等级，特等为日本人搭乘的车厢，而著等为中国人搭乘的车厢，而中国人不许进入特等车厢。

日本史学家山室信一说："茶与饭是日常生活中的必备要素，而满洲国所谓的民族和谐，却连在最日常的地方都存在民族差异。……当时吃了粗劣餐食而背上胃痛或胃溃疡的学生，数十年后仍然受到这些胃疾所苦，如果这些不是民族压迫，那什么才是？"他指出，由日本人所倡导的民族协和，其实是'协即协助'，'和即大和'，'协助大和民族侵略中国'的意思——这是中国东北地方的人对满洲国的揶揄。

评价

有"议会政治之父"之称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在满洲国建国后不久断言："如果让住在满洲的三千万人举行自由投票，大概绝大多数都会反对成立满洲国吧。而且，如果缺乏日本的武力与财力援助，满洲国恐怕坚持不到数月便会倒溃……果真如此，满洲国便如世间认定一般，仅为日本的傀儡，绝非独立国家。"日本历史学家山室信一认同此番断言。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国民经济与文化情绪状况

1911年至1937年，是近现代中国史里重要的一页。在此期间，发生了——1919年的中文圣经和合本的正式翻译完成、出版发行、大规模广泛传播【中文圣经和合本对现代汉语白话文产生了很深的、至今不常为人所知的、巨大影响，正如16世纪的圣经翻译过程对于现代德语、现代英语、等诞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基督福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反基思想运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民国成立以及参众两院民主制度的实行；袁世凯复辟失败以及北京权力真空状态导致的袁世凯旧势力在各地的军阀割据，以及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一盘散沙；孙中山借用苏联的资金、人员、物资等帮助而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以北伐军司令的身份在政治上崛起；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壮大，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追击下以“长征”的名义逃亡到陕北，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命运，但却因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而起死回生，并终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从而使得全体中国大陆人民处于奴役与欺谎之中，失去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长达七十年之久，直至今日。

1911年至1937年，对于中国而言，既是一个伟大的、激动人心、朝气蓬勃、生机盎然、建设中国的黄金时代，又是一个喧嚣混乱、尔虞我诈、危机四伏、剑拔弩张、军阀混战、人心动荡、摇摇欲坠的时代。在此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人心的罪恶表现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许多政客一盘散沙、唯利是图；许多百姓纸醉金迷、或是鼠目寸光、蝇营狗苟、胆小懦弱；许多文人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自傲自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高举所谓"劳动人民"的旗帜，欺谎地对所谓"无产阶级"进行偶像化，但自己却在内心中充满了争权夺利、阴险狡诈、自以为义、双手沾满了鲜血；许多民族主义者在混乱的动荡局势中、义愤填膺地拍案而起，把自己当作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但心中却没有公义、饶恕、谦卑、圣洁。

在1911年至1937年期间，尤其是在1920年代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国政坛以后，中国经历了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的时期。以江浙等沿海地区为经济发展中心，这种黄金建设时期，辐射、遍及到中国沿海与内地的绝大部分地区。中国各地都经历了工业、农业、商业、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长足进步与发展。在纺织、印染、机械、冶金、交通、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文化行业、金融行业、化肥、化工、等等，中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这种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巨大发展，与其说是由于政治文明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给人类物质生产经济生活所带来之深远影响的原因。

———

信仰、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文明、堕落、进步、积极、消极、善恶

当1930年代来到的时候，中国也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中日全面战争的暴风雨，将要临到整个中华大地。四万万中国人，将要面临战争年代所带来的无数苦痛、泪水、别离、生死患难。甚至，千千万万人将要面临战争中的生灵涂炭、屠杀、强暴。同等重要的是，1930年代开始的中日战争，——因着中国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崩塌、上层建筑的损坏、政治与法律体系的瓦解，——将要间接地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后来的彻底胜利。——中日战争结束短短四年以后，中共将要彻底地战胜蒋介石国民政府、取得全国统治政权。中国亿万人民所将要面对的，是中国历史上一种从未曾有过的政权；它将要不仅统治人的身体，更要统治人的心灵；它将要大规模、全方位地、360度无死角地、管理每一个个人、团体、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不仅将要以铁拳、铁蹄、铁幕统治人民，而且更将要极其地擅长于政治性宣传、鼓动、欺谎、煽动。它将要不仅长于“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人民民主专政”、暴力镇压、武力统治、以“枪杆子”“刀把子”系统性地统治人民、奴役人民，而且，更长于理论建设，有一整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光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等等等。它将要不仅善于奴役，而且善于征服心灵。它将要正如圣经旧约中所记述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样，打碎全地的偶像、众神，然后树立起自己为世人的偶像之神。在它的彻底无底线的统治之下，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引述 圣经 箴言28章等】

箴言.

28.

恶人虽然没有人追赶，仍然逃跑；义人却像狮子，放胆无惧。

国家因有过犯，领袖就经常更换；依赖聪明知识俱备的人，国家才可以长存。

穷人欺压贫寒人，就像暴雨冲没粮食。

离弃律法的，称赞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知公正是什么，寻求耶和华的却完全明白。

行为完全的穷人，胜过行事狡诈的财主。

谨守训诲的，是聪明的人；与贪食的人作伴的，却使父亲蒙羞。

凡是借着高息厚利增加自己财富的，就是为那恩待穷人的人积蓄。

转身不听训诲的，他的祷告也是可厌恶的。

诱惑正直人走上邪路的，必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完全人却必承受福气。

财主自以为有智慧，聪明的穷人却能看透他。

义人得胜的时候，有极大的荣耀；恶人兴起的时候，人就躲避。

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亨通；承认并离弃过犯的，必蒙怜悯。

常存戒惧之心的，这人就为有福；心里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残暴的统治者辖制贫民，就像吼叫的狮子，又像饥饿觅食的熊。

昏庸的君主必多行强暴，憎恶不义之财的，必享长寿。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逃跑至死，人不可帮助他。

行为完全的，必蒙拯救；行事狡诈的，必立刻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有充足粮食；追求虚幻的，必饱受穷乏之苦。

忠实的人必有大福；急于发财的，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是不对的；但有人为了一点食物，竟然犯法。

吝啬的人急切求财，却不知穷乏快要临到。

责备人的，终必得人喜悦，胜过那用舌头谄媚人的。

偷窃自己父母财物，并说："这不是罪过"的，这人是与强盗一伙。

贪心的人，必引起纷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

自恃聪明的，是愚昧人；凭着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赒济穷人的，必不致缺乏；闭眼不理他们的，必多受咒诅。

恶人兴起的时候，人就躲避；恶人灭亡的时候，义人就增多。

箴言.

9.

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它宰杀牲口，调配美酒，摆设筵席。

它差派几个使女出去，自己又在城里的高处呼喊：

"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

"你们都来，吃我的饼，喝我调配的酒。

愚蒙人哪！你们要丢弃愚蒙，就可以存活，并且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

纠正好讥笑人的，必自招耻辱；责备恶人的，必遭受羞辱。

你不要责备好讥笑人的，免得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有智慧；指教义人，他就增加学问。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

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必使你得益；如果你讥笑人，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后果。

愚昧的妇人喧哗不停，她是愚蒙，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向过路的人呼叫，就是向往前直行的人呼叫：

〝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在暗中吃的饼是美味的。〞

人却不知道她那里充满阴魂，她的客人是在阴间的深处。

诗篇.

137.

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在那里我们一想起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苦待我们的人要我们娱乐他们；他们说：〝为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忘记技巧〞或译：〝枯干〞）。

如果我不记念你，如果我不高举耶路撒冷超过我最大的喜乐，情愿我的舌头紧贴上膛。

耶和华啊！求你记念以东人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所行的，他们说："拆毁它，拆毁它，直拆到根基。"

将要被毁灭的（"将要被毁灭的"有古译本作"毁灭者"）巴比伦城（"城"原文作"女子"）啊！照着你待我们的行为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

抓住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

罗马书.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

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

下。

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

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

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

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

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

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

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